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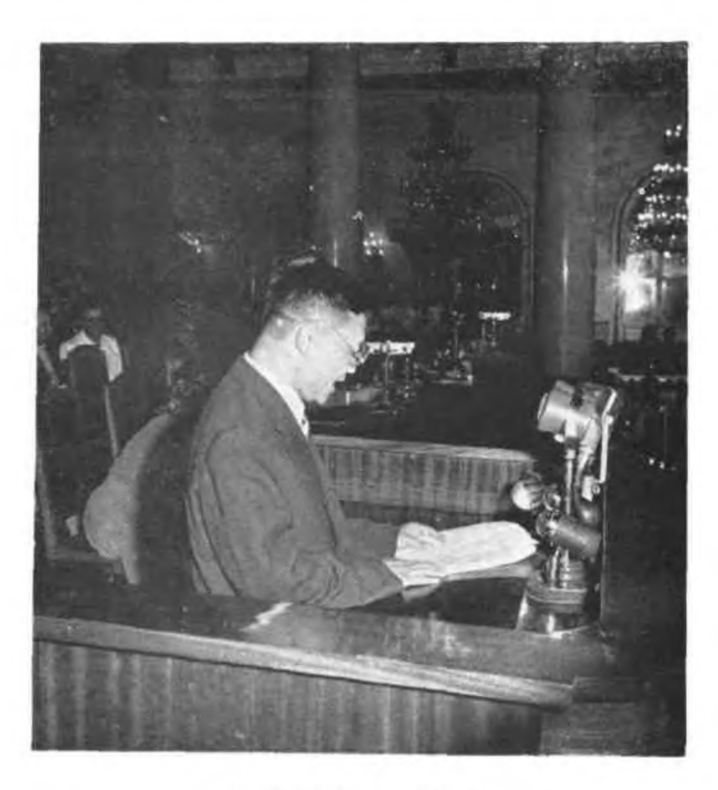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巴金全集

（第十九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93年北京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424-0/Z·68
定价 13.05 元



在契诃夫纪念会上

（一九五四年七月，莫斯科）



偕沙汀(右)、青野季吉(中)合影

(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

《向老托尔斯太学习》手稿之一页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式上

(一九八五年，北京)

集　外　编（下）

目　　录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一年

附　　录

一九五八年

介绍《苏中友好》周刊*

在苏联我常常听见人谈起在北京出版的俄文《友好报》。刚回到中国又听见人谈起就要在莫斯科创刊的中文《苏中友好》。这不是偶然的事。苏联人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他们把中国人当作自己最亲爱的弟兄。他们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大小事情。只要是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不论是一点一滴，一鳞一爪，他们都当作可珍贵的喜讯。苏联朋友的客厅里挂着中国画，陈设着中国的小礼品。他们说他们的家就是中国客人的家，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幸福拿来和中国弟兄共享，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尽量地传授给中国学生。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爱——我们同苏联人有那么多的共同的东西。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上面的。所以我们把苏联一切伟大的成就都看作自己的胜利。

去年十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到天空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互相道贺，以过节日的心情传播这个天大的喜讯。每个中国人都把看见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看作莫大的光荣。第一艘原子破冰船的下水更给六万万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喜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上海《解放日报》。

悦。我们多么渴望知道苏联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连一个水电站，一个集体农庄，一所学校，一个工厂，都能够牵引我们的心。我们热爱我们的苏联弟兄，我们愿意知道他们怎样地过着日子。我们关心我们共同的事业，苏联的每一个新的成就和胜利都给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增加新的力量。我们常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么我们可以在苏联人民劳动的成果上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都愿意更多地知道苏联和苏联人，更多地学习苏联和苏联人。多知道苏联可以增加我们前进的勇气，多学习苏联可以加强我们对工作的信心。我们了解苏联人民欢迎《友好报》的热情，因为我们自己就以那么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候《苏中友好》的创刊。

我们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苏中友好》周刊第一期已经出版，而且寄到中国，寄到上海来了。这是一本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的十六开本的杂志。杂志上面有许多我们熟悉而且敬爱的名字，有许多我们渴望看见而无法见到的图片。不论是关于人造卫星的详细说明，或特快飞机新闻的报道；不论是苏联英雄人物心情的抒写，或苏联建设成就的介绍；不论是关于参加十月革命的中国志愿兵的特写，或者苏联作家访问中国的回忆，没有一篇、没有一行不充满着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这个杂志是专门为中国读者办的；这些文章是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杂志的总编辑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好朋友罗果夫同志，他在上海住过一个长时期，会说中国话、读中文书、爱中国人，了解中国的一切。杂志的支持者是全苏联人民。这个杂志一定办得好，一定会得到中国人民普遍一致

的热烈欢迎，一定能完成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杂志的使命。赫鲁晓夫同志在向《苏中友好》杂志读者致词中说："这个杂志的使命是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从这友谊产生的巨大力量可以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可以给两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这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目标。读完《苏中友好》第一期，我非常高兴。为了庆祝这个新杂志的诞生，我写了以上的祝贺同介绍的话。

写给青年突击手们*

亲爱的同志们，祝贺你们！

今天全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上海，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你们的事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在等候会议的消息。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生产战线上的能手，你们都曾经为祖国创造了若干财富，你们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青春的力量，用年轻人的朝气、热情和毅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你们的先进事迹常常推动了整个工作。你们不仅带动年轻的同志跟你们一同前进，连你们的师傅和前辈们也受到了鼓舞，虽然你们常常在师傅和前辈们的帮助或指导下面进行工作。

你们来自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的各个地区，你们来自各种各样朝气蓬勃的生活，你们把全国各地大跃进的新成绩带到上海，你们把全国人民向前飞奔的雄心带到会场，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期望，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全国人民的力量。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今天聚在一起的虽然只有四百多人，在会场里兴奋、热烈地交流经验，互报成绩的虽然只有一部分的代表，但是全国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上海《劳动报》。

民的心都集合在这个会场里面，为着今天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新形势热情欢呼。你们每个人的声音里，都有一个单位和一个地区的力量。各个地区人民的声音都要借你们的口在话筒里播送出来。今天的会不仅是青年优秀工作者会师的大会，全国人民的愿望今天也要在这里会师。全国人民要通过你们年轻有力的声音表示他们的愿望，要通过你们的言行使他们的愿望更加坚强，而且在极短时期逐渐实现。全国人民的愿望自然也是你们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什么，不用说就是尽可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你们听到我这句话，一定会说："这已经不是愿望，这已经成为行动了。"对！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在缩短建成社会主义的日期。全国人民不顾一切地朝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飞奔。每个优秀工作者，每个先进工作者，每个先进的单位都要在这一场大竞赛中一显身手，谁也不愿甘居人后。一匹马跑到前头，会鼓舞别的人打马前进，迎头赶上。你赶我，我追你，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一同前进，就会造成万马飞腾奔向目标的大场面。这并不是赛会，只看一时的热闹。这是不断地改变祖国面貌的巨大工作，六万万人民脚不停步地前进、再前进，为着那个伟大的目标，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不用说，在这场大竞赛中，在这脚不停步的前进中，你们一定不会落在别人后面，你们一定会不断地创造奇迹，而且会创造出更多的、更惊人的奇迹。

亲爱的同志们，我已经听到你们的歌声了："乘风破浪向前进，我们浑身都是劲，比干劲，学本领，生产指标日日新，我们是青年突击手，建设社会主义的轻骑兵。"

这是多么豪迈的声音，这是多么雄伟的抱负！

我听见这样的歌声，不由得不想起你们的事迹：一个人做十几个人的工作；一晚上做成了要几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克服常人不易克服的困难；接连突破三次全国生产的新纪录……。像这一类的英雄事迹真是举不尽、说不完的。会有人把它们详详细细全写出来，让全國人民都记在心上。你们的确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人，你们的确是歌唱到哪里，手就伸到哪里的人，你们的歌声一定会越唱越响亮，你们的雄心壮志，一定会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开花结果。你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轻骑兵，将来会是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你们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培养。你们有充分的机会在劳动中学习，而且受到锻炼，你们在任何困难的工作中都得到师傅和前辈们的帮助；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是新中国的青年，你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青春的力量，把你们每一刻宝贵的光阴都用在创造性的劳动上面，你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计算出来，你们为国家积累了若干财富。正因为你们享受着今天的幸福，你们就不会忘记过去那许多艰苦、悲惨的日子，这些日子你们也许经历得不多，但是你们的师傅和前辈们就是在那种生活中间熬出来的，没有他们的受苦和斗争，也就没有你们今天这些好机会。你们今天邀请他们的代表来参加你们的会议，同你们一起度过这七天无限兴奋愉快的日子。你们当然不仅向他们“学本领”，你们一定还要学习他们大公无私的

优良品质和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这种品质和精神，不仅是你们应当学习的，它也是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

亲爱的同志们，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为你们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欢呼，今后我还要为你们更光辉的成就欢呼。在这个会上一定你们会发出无比响亮的青春的歌声，上海的新气象一定会搧旺你们心里的火，你们在会场中发出的青春的光和热也一定会鼓舞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在热切地盼望大会的成功。上海人民也因为能够尽地主之谊而感到光荣。我自然也热烈地、诚恳地向你们祝贺。祝你们得到光辉的胜利，祝你们无穷无尽的青春力量，在祖国每一寸土地上开满香花，祝你们不但做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轻骑兵，而且还要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

1958年4月4日。

法斯特的悲剧*

霍华德·法斯特背叛了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这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这样的事情以前就有过，而且以后也还会有。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总是有一个“伟大的自己”。他们最难忘记的也就是这个“伟大的自己”。他们习惯了站在自己的、个人的立场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自然，他们中间也有好些人走到群众中去，有的人甚至让个人的感情逐渐溶化在集体的感情里面。但是更多的人却把个人看得跟集体一样重要，在群众中间始终保持着个人的特殊地位，有些人居然还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上面。他们带着个人的幻想和感情去参加群众的斗争，要是在艰苦的实际斗争中个人的幻想遭到毁灭，个人的感情受到伤害，或者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就大叫大嚷地来一个“转变”。我觉得用“一赌气转身就走”这句话来形容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倒很恰当。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我看不惯”，“跟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这样做不对”，“我再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八期。

不能接受"，（总之离不掉一个"我"字！）他们也不去好好地想一下，也不肯虚心地信任别人，一不高兴，转过身来就走，他们还以为别人会改变办法将就他们，或者会低声下气地要求他们留下，却没有想到自己一动脚就没法站住。他们的本意也许是走一两步试试看，可是越走越远，终于走到反对的方向去了。从左走到右，从革命走到反动，这些人的初衷也许并不是这样。他们当初掉转身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到反对的方向去，他们可能还以为会有第三条路存在，他们甚至可能相信自己是根据正义的指示在行动。那个时候他们一定还有羞耻心，也知道爱惜自己，而且一定过分地信任自己的判断。可是等到他们发觉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第三条路，他们已经掉进了敌人布置的骗局，不但上了敌人的当，而且也上了自己的当，身子陷在污水里面，又臭又脏，就索性不顾廉耻，认敌为友，在污水里打起滚来。结果除了越陷越深，毁掉自己外，什么事也做不出。

随便举一个例子，安得烈·马尔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今天还活在法国。可是他那点发光的才华却早已消灭了。背叛了人民，他再也写不出动人心魄的小说。

法斯特现在走的就是马尔洛走过的道路。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尔德、萨柯与樊塞蒂都是些诚实的人。法斯特选择他们做他的

小说的主人公，而且也用了朴素的笔调来描写这些诚实的人。他的主人公都不是脱离人民独往独来的人。乔治·华盛顿只有"在为他所领导的人民的需要而服务的时候"，才成为伟大的领袖。汤姆·潘恩为革命奔走，贫苦到死，从来没有想到自己。阿尔格尔德复查支加哥草市场的案件，为劳动运动的烈士们雪冤，他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斗争，终于放弃个人的打算去追求真理。两个意大利工人萨柯与樊塞蒂死于美国民主招牌掩护下合法的谋杀。他们正是依靠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援助，才能够在死囚牢中支持了七年，最后勇敢地死在电椅上。这些人一生所走的道路跟法斯特今天所走的路是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法斯特背弃了人民，背弃了他的主人公，去拥抱他过去所憎恨的美国方式的"民主"了。

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自然他以后还可能写出更多的作品，但是他不会写出像过去那样激动人心的诚实的作品了。这的确是值得惋惜的。我并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诚实，我也不认为法斯特最初发出他那"痛苦的哭声"时就有坏的动机。他过去为他的思想和言行吃过苦，受过迫害，坐过牢，受过抵制，后来也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全世界千万读者的敬爱。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但是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毁掉了自己十几年艰苦忘我的劳动所造成的一切，而且一点也不顾惜呢！在去年三月发表的那篇"决定"的最后，他还发出"团结"的声音，愿意同一切反对不义的人团结在一起。可是到了去年十一月他就在新著《赤裸裸的上帝》中写下他最大的诽谤："共产党是

一个监狱"，为美国的"民主"生活作公开的宣传了。这简直是精神上的自杀！

法斯特究竟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一条路呢？他自己曾经解释道："我不能在一个本国的或者国际的运动的检查制度下进行写作。"他更明白地说了一句："我不能接受检查。"所以他背叛了共产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完全是虚伪的托辞。试问法斯特所说的检查制度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什么国家？他的哪一本书受过哪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检查"？谁都知道，他的作品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不但没有受到检查，而且大量翻译、出版，赢得千万读者的心。法斯特含有深意地说，在美国他的书"总是发行出去给人阅读"，"我并没有受到过检查"。这是他有意为他现在所拥抱的美国方式的"民主"吹嘘。可是他忘记了：他自己在什么地方坐过监牢？他的书受到哪一个国家的出版社的抵制？哪一个政府不签发护照让他出国？法斯特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个美国作家曾经为了他的信仰而受到酷刑或被处决。"这句话很明确地说出了他现在的信念，而且很具体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法斯特为了醉心于美国方式的"民主"，而采取了他今天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的道路。

关于所谓美国方式的"民主"，我们单单从法斯特过去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即使法斯特完全否定了他过去的作品，他也不能改变那些历史的事实，何况他还公开地说过："我以我的书而自豪。"那么请问是什么制度把阿伯特·帕尔森司和他的四个朋友送上绞刑台的？是什么制度把萨柯和

樊塞蒂送上电椅的？是什么制度把罗森堡夫妇杀死的？这些人是不是为了信仰而被处决的？若说"酷刑"，难道还有比把一个无罪的人放在死囚牢中天天等死一直等了六七年更残酷的刑罚吗？法斯特写《美国人》的时候，他不会忘记在一八八六至一八八七年美国的"民主"政府干了些什么事情！他写《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的时候，不会忘记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美国"民主"政府干了些什么事情！他更不会忘记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美国"民主"政府干了些什么事情！在这些时候美国的"民主"政府都是很勇敢地拒绝了全世界善良人民的要求和抗议。它宁愿在全世界的良心面前保持孤立的地位，它宁愿让美国的国旗成为"大不义的象征"①，说是要维持传统的法律的尊严。然而正像法斯特在他的小说中所写到的，事实证明这都是"有史以来所未见的凶狠残酷的"②，受贿枉法、收买伪证、杀害无辜的行为。即使法斯特不承认这些"被残酷地谋杀的"③人是作家，但是他们都在美国的民主文献中留下了被公认为不朽的东西，跟汤姆·潘恩、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留下的东西一样。这些东西跟法斯特的过去作品一起揭穿了他现在的谎话。并且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实际生活中的"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上面这些话其实法斯特全知道。他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写的文章里，还提到"那些肮脏透顶的对罗森堡夫妇、萨柯与

---

① 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

② 这是《美国人》的主人公阿尔格尔德的文告中的话。

③ 见《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

樊塞蒂……及其它许多人的诬陷，对于黑人的合法的私刑”。他甚至说“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他过去写出了那许多追求真理的书，他过去又极其愤慨地暴露了美国“民主”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怎么会这样容易地掉转身去拥抱他自己曾经憎恨过、反对过的东西呢？他既然声明他仍然信仰社会主义，他又怎么跟那一家曾经抵制过他的小说的，而且主张不能禁止核武器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合作，跟出名的反共专家哈里·施瓦茨合作呢？他又怎么会写出《赤裸裸的上帝》这本书，宣布“我已经找到了自由”，并且公开承认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个人在他的工作和权利方面得到承认和维护的国家”呢？

法斯特又把他向后转的原因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这正是美国国务院发表这篇“报告”的用意。美国国务院想利用它来诽谤苏联，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法斯特不知不觉地落进了这个圈套，上了当。其实对于法斯特来说，这个“秘密报告”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法斯特后来一再提到的问题早在一百几十年前汤马斯·杰弗逊就已经解释明白了。过去有一个时期法斯特曾经把这个伟大的佛基尼亚人当作他的导师。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杰弗逊的“无限宝贵的传统”。那么他不应当忘记杰弗逊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说过的话。杰弗逊认为一个人不应当“指望睡在鸭绒被上让人从专制抬到自由去”。他甚至明白地说：“人类为了夺回他们久已丧失的自由所作的努力，竟然不能免掉暴力、错误，以至罪行，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们为手段悲哭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为目

的祈祷。"① 在斯大林作领袖的时期中，苏联究竟是向前进呢，还是朝后退？苏联究竟建成了富强的国家呢，还是变成贫弱的国家？苏联究竟建成了社会主义呢，还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苏联的科学和艺术究竟是进步呢，还是落后？这些都是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杰弗逊所说的"目的"。过去的法斯特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也曾一直为这个"目的"奋斗。可是今天的法斯特却成为一无所知的人了。

难道法斯特真是"一无所知"吗？不，他并不是"一无所知"，他是"充耳不闻"。谁也看得见，他已经走得很远了，太远了。他不再像当初他刚刚向后转的时候那样地"精神痛苦和混乱"了。他现在成了反共十字军的一个英勇的骑士。不再是他"上了近代最令人难以相信的骗局的当"，现在是他自己在布置那个"骗局"欺骗别人。他的作品不再受到资产阶级的抵制了。他不再需要自己过去创办的蓝鹭出版社来印行他的书了。他已经在电视节目上发表谈话了。他开始成为资产阶级的宠儿了。他的朋友，一个美国小说家说出了他的秘密："他贪得无厌地要得到称赞，要得到成功。近年来对他的封锁他是受不了的。……我看到他那种要求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坛重新承认他的强烈的欲望。这就是他的目的。我看，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法斯特现在达到了他个人的"目的"，他得到了他所渴望的个人的"成功"。他的确为着这个"目的"干了不少使他过去

---

① 赫伯特·阿普塞卡在批评法斯特的文章里引用过这一段话。

的朋友痛心、使他过去的敌人称快的事情。以后他还会继续不停地干下去，而且他甚至会干出他自己前些时候还认为是"肮脏透顶"的事情。他会做出千万种丑态供他过去的敌人欣赏，为他们服务，来换取他们的喝彩。他会取得一种像过去欧洲宫廷里的弄臣那样的身分，靠取悦主子而生活。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悲惨的"精神上的自杀"么？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悲剧么？

霍华德·法斯特的悲剧是一般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他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溶化在群众的感情里面，在集体的解放中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他不能够放弃个人的特殊的地位。他过分地重视自己，突出自己，甚至为他自己设下一个自我陶醉、自我扩张、自我宣传的罗网。他想依靠他的才能和声望，脱离人民单独去寻找"真理"，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结果他不但没有找到第三条路，他却找到了"灭亡"，他完全毁掉了自己。五年以前法斯特在他的一本小说上写过这样的献辞："献给那些勇敢的美国人——他们在过去和现在宁愿坐牢，甚至死亡，也不肯背叛他们所信奉的原则、他们所爱的国家和信任他们的人民。"那些勇敢的美国人今天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硬。可是面对着这样的献辞，法斯特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在夜深人静，认真思考一再翻读自己过去的作品或者别人的批评文章的时候，法斯特是不是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他的"背叛"感到后悔呢？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不是又有勇气承认错误呢？很可能他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他甚

至还要勇往直前地走上"青云之路"，一直到他跌进万丈深渊为止。究竟怎样，我不能代他决定。但是我想大声提醒他：

回头是岸！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958年3月13日。

〔附〕复《文艺报》编辑部[1]

编辑同志：

来信收到。七篇文章已经读过，现在全部寄还，谢谢你们。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写那篇文章时，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点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给法斯特的信的影响。但是他们的东西是在去年上半年写成的。时间差了那么久。而且我希望法斯特"回头"，劝他不要继续走更反动的路，要他改过自新，我只着眼在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所以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此致

敬礼

巴　金 1958年5月19日。

---

[1] 《法斯特的悲剧》在《文艺报》发表后，《文艺报》曾收到一些读者对该文提出批评的信，并转给作者。这是作者复《文艺报》编者的信，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一日该刊第十一期。

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我读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兴奋得、激动得一晚上睡不好觉。我想起许多事情。这大半年来每天都有多少惊人的奇迹出现。国家在向前飞奔，人民在向前飞奔，不但一天换一个面目，甚至一小时换一个面目。生产增加的速度从几倍到几十倍，几百倍；落后的单位和人一下子会变成最先进的……每个人摊开当天的报纸，就有一种"进入宝山、琳琅满目"的感觉。每个人每天都可以讲几件个人身经目睹的新事。每个人都为整个国家的大跃进感到无限的兴奋和自豪。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说明了这一切惊人奇迹出现的原因，描绘了无限美好的未来的远景，指出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确像灯塔一样地在六亿人民的前面发光。无怪乎全国人民那么热烈地学习、讨论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而且在学习和讨论中增加了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我以上讲的是六亿人民的总的感情。我是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自然也有这种感情。然而我还有个人的感情。我兴奋，因为更看清楚了国家的极其光明的前途；我激动，因为想到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

己落后赶不上形势而着急。国家向前跑得这么快，真是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那种速度。劳动人民每天都在创造惊人的奇迹，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拿什么去跟他们相比，拿什么去赶上他们呢？自己显然落在后面很远了。要向前跑，自己又背了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包袱跑不动。跑不动，就落后更远；赶不上，就会被时代抛弃。所谓“形势逼人”，的确一天比一天紧。倘使自己不甘居下游，就得甩掉背上的包袱，才能够心情舒畅地跟着时代前进。

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感到旧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有许多知识分子不高兴别人给他戴上一顶“旧”的帽子，他们心里想在新中国工作了八九年，也参加了好些运动和斗争，难道不是改造得焕然一新了吗？其实像我们这些在旧社会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怎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完全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旧社会熏臭了的脑筋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气味？最近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不曾暴露出肮脏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有些自命为清高的大知识分子甚至隐蔽着一个市侩的灵魂。这些东西究竟是留着好呢，还是抛弃好？要抛弃它们，就得彻底改造自己。要保留它们，就会阻碍自己走进社会主义。哪怕你用漂亮的包袱把它们包得好好的，它们也会发臭。

其实知识分子的旧与不旧，也是很容易辨别的。考虑问题完全不从个人利益出发、能够始终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齐步前进的知识分子自然不会是旧的。背上有包袱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他把包袱甩光以后，才有可能脱掉那顶“旧”的帽子。甩包

袱也许有碍面子，但是对个人身心却有无穷无尽的好处。倘使不愿意长久落在后面，那就不能不丢光个人主义的旧包袱向前奔去。背上包袱轻一点的人，走起路来可能快一点；包袱越重的人越走得慢。而且这种包袱是越背越重的。我们也见到好些人被包袱压倒，有些人背不起包袱又不肯甩掉，只好坐在路旁休息。这些人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除非他们下决心来一次认真的、彻底的改造。但是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还是愿意接受改造，而且已经在进行这种自我改造了。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也知道改造是他们的事，也是集体的事。旧知识分子要经过认真的改造，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才能够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一点力，才能够在就要到来的文化革命中尽一点力，才能够找到光明的前途。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个人主义思想是与集体主义的事业不相容的，个人主义思想会或多或少地阻碍社会前进，损害集体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中决不能容许个人主义思想存在。所以集体的力量也会促使个人接受改造。改造得多的可以多做些好事；改造得少的做出的好事就少，甚至会做出坏事。不改造的就只能做坏事。

其实拿今天的形势来说，我们旧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徒拥虚名而已。那些只能供自己个人欣赏，不能用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怎么能算是知识呢？我们能够为国家创造财富吗？我们能够推动时代前进吗？我们能够在改变祖国面貌的伟大事业中尽一份力量吗？是谁在推动祖国向前飞奔呢？是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写下"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

的画图"呢？我仿佛看见了这样一个场面：千军万马在前面奔腾，后面远远地有几个小人物背着大包袱弯着背吃力地一步一步向前移动。这真是怵目惊心的场面！

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谁又(即使他是旧知识分子吧)愿意做这样的小人物呢？那么为什么还不早点甩光个人主义的包袱奔赴前程？

我为我自己着急，也为许多旧知识分子着急。

主要是思想内容*

关于"文风"大家已经谈得很多。大多数人都谈得很好。我也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我觉得文章的好坏主要地在于它的思想内容。有了正确的思想和丰富的材料，一定能写出好的文章。我这句话里自然还包括了一个条件：作者要懂得他自己写的东西；他在文章里所阐明的思想应当经过他的消化成为他自己的思想。他要懂得它，才能够说得清楚；他要热爱它，才能够说得动人；他是在说真话，才能够说得恳切；他充分相信它，才能够说服别人。至于语气、辞藻等等都是次要的事。各人写文章可以用他自己的表现方法。有人喜欢开门见山，一开头就说出结论，然后慢慢地解释下去；有人喜欢先举出具体的例子，摆出一些事实，最后才说出结论。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写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现方法。有时候我的思想对了，文章就有可取之处；思想一不对头，我就会写出坏文章来；有时候我的思想不大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那么我的文章就不生动，无力量。所以在思想不对头、不清楚，或者我知道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语文学习》第六期。

太少的时候，我即使拚命在文字上花功夫，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沒法把文章写好。这是真话。

1958年5月。

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

编辑同志：

谢谢你们的好意，让我先读到余定同志的文章，我主张发表余定同志的批评。因为别人的批评比我自己的检查更有力。同志们对我一直很客气，从没有提过尖锐的批评。但是我自己应当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我对自己的错误并非完全不认识，但是有时候也难免要原谅自己。我最近在作协的交心座谈会上也曾谈到余定同志提的这个问题，然而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一下罢了。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再谈这个问题，应当感谢你们和余定同志。是病就应当医治；是疮就应该割掉；有包袱就应当打开、丢掉。今天是大家向党交心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必须加紧改造的时候，在这个万马奔腾的逼人的形势中，我不能够长久背着大包袱落在后面。

解放以来我写过不少的文章，也说过不少错误的话。就是在大鸣大放以前我也发过错误的言论。我的文章在发表前要是多给几位同志看过，提一点意见，错误就可能少些，也可能就没有错误。否则那就难说了。我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几十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年，虽然很讨厌旧社会的一切人情世故，但是自己不知不觉间也沾染了不少脏的东西。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虽然跑出了那个家，而且不到十年那个家也弄到家破人亡，但是自己从一个小圈子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圈子。我想革命，嚷着革命，而终于找不到革命的路，始终钻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来。那么我的脑子里当然有好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旧的，我自以为还懂得一点，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我多少也做过这一类的工作；建设新的，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我只有从头学起。所以我常常说我在解放后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而且懂得很少。有些道理，理性上似乎懂一点点，感性上却不能一下子就想通。有些道理，自己似乎明白，但遇到实际问题，就有些茫然了。所以常常不能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能提高到原则上看问题，所以我常常会发错误的言论，所以我在开始学习总路线的时候特别感觉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

这些也许不是空话，多少可以说明一点我的思想情况。现在再提到我的另一个毛病：我不会公开讲演，或者在会场发言。解放后我才开始参加各种会议，学习在会场上发言，但是至今还不能讲得有条有理。因为我讲话常常容易激动，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并不是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辩解，因为即使急不择言胡乱讲出来，总是自己脑子里有的东西，跟自己的思想有关。我在这里只是解释当时发言的情况。余定同志提出的“把文艺还给人民”一句话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讲出来的。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但是我并非把它当作一种“口

号”。我在去年那次作协的座谈会上讲到上海人艺参加全国话剧会演的节目没有得到好评，我说对于剧本的艺术的估价应当交给群众去考验，不要由少数领导同志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说到最后我忽然讲出了一句“把文艺交还给文艺工作者”。话讲完，自己觉得不对，马上又站起来声明那句话是错误的，改为“交还给人民”。后来我还是觉得不对，就在一位同志谈到作协应该对作家进行思想领导和艺术领导的时候补充说：“思想领导是必需的，这要由党负责、由市委来抓。”我还要求《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把“还”字删掉了。那句话的确是非常错误的。然而一方面我自己还以为我虽然说了错误的话，但是后来补充了一下，就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了：我不过认为应当由群众的考验来决定作品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我自己思想上也的确存在着关于艺术的错误的、旧的看法。一直到最近我才完全认识到自己思想的错误，这一层我在交心座谈会上也讲过。现在再说一下我思想上的毛病。我一直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我一直认为思想领导、政治领导是必需的。但是我始终这样想：只要紧紧抓住思想、抓住政治就行了，在艺术方面是可以放松的。所以那天谈过思想领导之后，我接着又说：“所谓艺术领导还可以研究，在艺术方面作协最好让作家们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关于艺术领导的问题，我过去曾经摸索过，始终搞不清楚，因为我把思想领导跟艺术领导分开了看，怎么能够解决艺术领导的问题呢？而且照我过去那种想法单抓思想，放松艺术领导，甚至会产生艺术不为政治服务的后果。我过去听说一个

电影剧本常常要修改六、七次，花一年、半年的修改时间，更觉得对艺术领导放松会有好处。现在也正是从去年拍摄的一些影片得到了另一种启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好的题材，或者没有问题的剧本会拍成很坏的电影；有些导演或演员说，自己走进摄影棚时满心想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是想不到拍出了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电影。影片拍好不先经过领导审查，就拿到各处去放映，交给群众考验，等于向群众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等到群众起来抗议时，坏的影响已经传开了。这个具体的例子不就可以说明一切么？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文艺思想的混乱。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几次的学习我大致也懂得一点，但是碰到实际的问题或具体的作品时，我就把握不住了。例如前年有人主张办文艺俱乐部我也赞成。后来俱乐部没有办成，受到《解放日报》批评，其实就在当时批评也是完全正确的。我却忘记了深入生活、深入斗争、劳动锻炼、改造自己，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正确的道路，反而发牢骚，说事情未做不应批评。倘使文艺俱乐部真的办成了，在今天的形势下它会成为一些人的多大的包袱，这是可以想象到的。

关于《文艺月报》没有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受到批评以后，我也讲过不满的话。当时我早已不管《文艺月报》的事情，而且那时我在北京开会，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也没有看过陈山同志的批评文章，单从《文艺月报》销路因此大跌的事实，就认为不应当采用公开批评的方式。我甚至不顾组织的决定，乱发表意见，当时还以为自己在讲公道

话，其实是犯了无组织、无原则的个人自由主义的错误。

甚至在大鸣大放以前我也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像我用另一个笔名发表的“有啥吃啥”；我当时没有顾到物资的缺乏、有关部门采购的困难，也没有想到某一些人的故意挑剔，我虽然不赞成“吃啥有啥”，但是我因为不满意推销滞货、买一搭一的办法，就纠缠在“有啥吃啥”的字面上，说有也可以不吃。这种片面的说法等于推波助澜，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因为听到一些无根据的闲言生气，后来甚至为这件事情发过牢骚。不用说这是全凭个人意气用事，丧失了立场了。同时我还写过一篇关于汽车辗死小孩的短文，也是用另一个笔名发表的，虽然文章是根据前一天在我住处发生的事情和《新民晚报》上一个司机同志的讲话写的，而且最后我也说我们一定能够完全消灭这种事故，但是我却用了一个危言耸听的题目《“救救孩子”》。我得承认在那个时候我听见好几个人讲起有关小孩的事情，我也没有研究这些消息是否可靠，我在街上常常看见小孩穿过马路就耽心，看见放学时保姆们只顾谈话让小孩自己在街上跑也耽心，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小孩耽心。这种不太正常的耽心使我更加片面地看问题。像关于出版、戏改、话剧等等我也都发表过一点不正确的意见。当时有人说我片面，我还不承认。现在才认清这还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作怪。自以为是，一切都从个人的一点狭隘的见闻或经验出发，为了顾全面子甚至强不知以为知，这早已脱离了政治，丧失了立场了。

我写了这些话并非为自己辩解，也不是替自己卸责。我只

是说明我个人的一些思想情况和看法罢了。承认错误原是为了改正错误。我前几天写过一篇《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的短文。其实题目上还漏掉了两个字，"改造"上面应该有"加紧"的字眼。我自己说过，要丢光个人主义的包袱奔赴前程。所以我要把我的包袱打开，一一地丢掉。我的包袱并不止这么一点点，而且改造也得凭实际行动。我知道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形势逼人，改造也必须加紧。心多少交出来了一些。我今后能不能做出一些好事，还要看自己改造得好不好。要是改造得不好，我怎么能够跟全国人民一道用同一步伐向前飞奔呢？一个不红不专的旧知识分子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所以我在万分兴奋地宣传总路线的时候，心里常常会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自己究竟能够为总路线做些什么事情？我因为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着急，而苦恼。我耳边老是有一个声音说："加紧改造"。这是自己心里的话，我决心改造自己。

编辑同志，请你们看看，这些话值得占用你们报纸的一些宝贵篇幅么？

此致

敬礼

巴　金 6月9日。

宣传总路线*

这几天总路线喧腾了整个上海。其实，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农村都是这样。每张嘴都在为总路线动，每颗心都在为总路线跳。宣传总路线是人人的事，因为总路线是根据六亿人民的愿望提出来的。总路线是一盏光芒万丈的明灯，照亮全国人民正在走的路和将要走的路。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跟过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虽然隔了四年多，却隔了很多的路，因为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进步得很快，一天就抵上好些年。那个时候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刚刚开始，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了。今天我们好些工业产品已经赶上英国水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舞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提出了确实的保证，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我们工业的水平就会赶过英国。超过英国那是我们祖先所不敢梦想的事。可是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会亲眼看见。而且赶上了英国之后，也有把握赶上美国。并且我们工业水平超过英国，那时候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我们已向着共产主义在迈进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街头文艺》(上海作协编)。

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工人和农民的两只手会创造一切，只要有党的领导，有正确的路线，有坚强的信心，我们还可以把时间缩得更短更短。

小 妹 编 歌*

小妹回到家，兴奋地对母亲说："妈妈，明天我要上街宣传总路线。"

母亲笑道："你也会宣传？你讲得清楚吗？"

小妹扬起头，大声说："妈妈，你忘了我今年十二岁啦！老师还要我编个歌上街唱。"

母亲又笑道："你还会编歌？"其实母亲心里很高兴。

吃过晚饭，小妹在饭桌上摊开纸，先写上三个字："总路线"，就哼起来。她哼的是她熟习的《青年圆舞曲》的调子，她将就这个调子去想词。她哼了两三次，又把老师今天对同学们讲的话想了一遍。

"总路线，像太阳……光芒四射……"她哼着，慢慢地抬起头望着电灯。她好像看见了一颗又红又大的太阳，发出来万道金光，到处都照亮了……前面光辉灿烂真好看。她拿着笔不动，口里念着："真好，真好。"她索性放下笔，两手托着下巴，在想象太阳下面的一片好景象，越想越高兴，把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全想到了。一个人对着电灯在发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街头文艺》(上海作协编)。

母亲在上面喊小妹上楼睡觉。小妹吃了一惊。她看着面前的纸笔，就自言自语："人家工人叔叔要制造新产品，几天几夜都不休息，我连一首歌也没有编好怎么能睡觉？"

她站起来含笑地走去关上了房门。

母亲终于下楼来，走到了小房间门口。房门关得紧紧的，里面传出来小妹的快乐的歌声。小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母亲站在门口听得出神了。

广阔、光明的道路*

——介绍《文艺月报·上海工人创作专号》

我读完《文艺月报·上海工人创作专号》，非常兴奋，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我很想打电话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向他们介绍这一本“月报”，劝他们仔细地阅读那许多好文章。我也想感谢“月报”的编辑部为读者们做了一件好事情，并且祝贺刊物开始走上了广阔、光明的道路。的确从这期“专号”开始，“月报”已经脚踏实地走上了大路。作为读者，我希望“月报”编辑部大胆地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要以为“专号”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停滞不前，或者回头走老路。我这个要求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专号”卷末魏金枝同志的文章（《伟大的开端》）里我们已经看到编辑部的决心了。

到现在为止，像这样的工人创作专号在全国刊物中还是第一本。不用说，它还是新的、年轻的东西。但是它结实、丰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多种多样。有文字，还有图画，全出自工人的笔下。不仅思想性强，而且艺术性也并不弱。从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上海《解放日报》。

到尾充满了乐观、健康的调子。每一篇文章不论长短（长文章并不多），至少描写了一个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人物。所有的作品不管它是哪一种的文学形式，都写出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都是新社会的主人翁，都是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在这些人的思想感情中没有个人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残余。他们每个人都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创造财富。这些人平凡而朴素，开朗而明快，直率而亲切，所以描写他们的文章也是朴素、明快、亲切，没有一点做作，没有转弯抹角、忸怩作态。工人的文章跟知识分子的文章不同。这些工人同志不是在做文章，他们只是在说自己的心里话。他们的文章有充实的内容。他们不喜欢含蓄，倒愿意开门见山。但是这座山却是多么高的山啊！

有人说，这本“专号”是总路线的非常生动具体的学习资料。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里有那么多具体的人和生动的事情。这些人打破了迷信，打破了陈规，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创造发明；或者结合群众的智慧，苦战了若干天，实现了技术的革新。好些事情都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能够赶上英国，或者已经赶上了英国。所有生动的事情无一不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例子。又有人说，要反映上海的现实，从生产战线上来反映最适当，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确是今天上海大跃进中最主要的面貌。这个“专号”里反映面相当广，而且相当及时．例如百万吨钢，五千吨海轮……这些使上海人民感到自豪的奇迹我们都可以在

"专号"里找到。这里不但有生产上大跃进的奇迹，而且还有人与人关系改变的奇迹，像公共汽车女售票员的"乘客们，早!"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例子。两位作者在文章里并没有卖弄什么技巧，但是一个新人的面貌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特别喜欢下面的几篇作品：《测绘》（楼颂耀作）；《为了百万吨钢》（郑松年作）；《传家宝》（刘德铨作）；《老年突击队》（张英作）；《不！我要二十七副！》（丘化顺作）；《车间里的钟声》（俞培荣作）；《泉源》（张明作）；《五千吨海轮下水记》（李家博作）。其实我喜欢的还不止这几篇，可以举出来的还有不少。这就说明这一期"专号"的水平相当高了。像《测绘》不过五千字左右。它写出了两个有性格的人物：两个老师傅，一个刚从上海来，一个在本厂工作；一个要完成测绘的任务，一个要完成生产的任务，都是为了达到跃进指标。要测绘就得停机器；停机器就完成不了生产任务。从黄师傅带着测绘组来厂，厂长和车间主任决定停一部分机器给他们测绘起，矛盾就展开了。作品一开始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读者对两个老师傅都很关心，但是想象不到这个矛盾怎样解决。陈师傅思想搞通了，答应拆机器；黄师傅却又因为不愿妨碍别人生产而迟疑起来。随后他想出了办法：利用晚上停工时间测绘。晚上拆机器，早晨装好，既能测绘，又不妨碍生产，只是给自己添许多麻烦，但是对国家增加了财富。这样两个老师傅就成了彼此关心的好朋友。最后天刚亮、两个老师傅在一起照料装好机器，试车的那个场面很感动人。但是作者只用了这样简单的对话：

“老黄！辛苦啦！”

“老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可把我吓了一跳。”

“我可是睡够了。这里有什么好帮忙的？”

“你既然来了，那就等他们装好车，试车你自己来吧，我到那边去看看。”

最后上班的时间快到了，机器还没有完全装好，黄师傅急得冒汗。上班的工人越来越多。陈师傅便过来对他们说：“走开走开，有什么好看的，到时候给你们开车就是了。”果然没有耽误上班的时间。

这样朴素亲切的文笔的确写出了工人阶级的友爱和今天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

又如《不！我要二十七副！》这篇不到一千字的小小说写出了青年工人的何等豪迈的性格。语言生动，简单明了，通篇没有一句废话。

我不再一一地分析那些好文章了。希望读者们自己细心去读它们，他们得到的一定会比我讲的多过若干倍。好作品是不厌多读的；充实的生活一定会使作品发出夺目的光辉。这些作品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家写不出来的。我们不仅没有那些充实的生活，我们更没有那种当家作主、我为人人的英雄气概。

我读完这一本“专号”，我不仅受到了教育，我还深深感觉到“要文艺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单靠我们少数专业作家或者更多的业余作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文艺。工人阶级的文艺大军正在长成，他们的健康的、优秀的

作品不单在量上能够满足需要，而且在质上也能够满足需要。

《文艺月报》的“工人创作专号”就可以给我以上的话作保证。

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的公报发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要为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这个消息对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并不是意外的。因为中苏两个兄弟国家是世界和平的两大支柱。在任何时候，只要世界和平受到威胁，中苏两国就不能袖手旁观。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肯承认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还想继续奴役亚、非人民，这真是痴心妄想。

美帝国主义者发明了所谓“间接侵略”的强盗逻辑，派遣武装部队登陆黎巴嫩；英帝国主义者也助桀为虐，趁火打劫，侵入了约旦。但是英勇的阿拉伯人民表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中苏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谴责侵略，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卫和平。美、英帝国主义者才知道看错了时机，做不了不花本钱的买卖，又发觉纸老虎渐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落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想进又怕纸老虎给人戳穿，偷鸡不着倒失米；想退又舍不得中东一大片油田。他们终于不得不承认伊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拉克，答应召开首脑会议。其实他们也不是真心认输，无非想拖延时日，制造有利机会。美帝国主义者一面还继续不断地在太平洋公海进行核武器试验，妄想重施原子讹诈，危害亚洲人民。对这些恶毒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打铁必须趁热，纵虎只能贻患，哪怕是纸老虎吧，只要他们不撤离中东，只要他们还在世界各处张牙舞爪，只要他们的牙和爪未被剪除，他们还会肆虐害人。

中苏两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会谈公报是符合我们两国八亿人民的愿望的，是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的。这两个兄弟国家神圣的团结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措施。我们两国牢不可破的团结是尽人皆知的事。我们两国人民比亲弟兄还亲。我们的友谊是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中产生的。人民幸福与世界和平的事业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连在一起。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声明"完全一致"的时候，我们两国人民的确是心连着心像一个人似地献身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世界人民所期待于我们的，也正是这种献身精神。苏联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也正是靠着这种献身精神，靠着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献身精神，和平力量一定能够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我说会谈公报的发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照我的意思，振奋人心的是中苏两国的团结的力量。这个牢得像一个整体的、有无比献身精神的八亿人民的力量，是谁也挡不住的。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也正是这个力量。这个会谈公报，

对中东和亚、非、中南美以及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巨大的支持与鼓舞。对帝国主义，则是沉重的打击。这是有关全人类命运的重大措施。我以万分振奋的心情，热烈拥护这个会谈公报。

1958年8月。

“吸血鬼”的末路*

五日的晚报上有一则新闻：一个英国空军“吸血鬼”式喷气战斗机中队，在一星期以前调到了阿拉伯半岛，但是调动消息到四日才公布。美英帝国主义者这些天一直在把侵略军和武器送到“中东”（我们应当说是“西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吸血鬼”调动消息的突然公布，即使有什么阴谋，也无非虚张声势，用“吸血鬼”来吓唬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这种武力威胁，在若干年前或者可以吓倒一些贪图苟安、认贼作父的人，达到侵略的目的。可是在今天连小孩也不会害怕它了。一个黎巴嫩小孩远远地望着美国侵略军登陆，不是就说过“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么？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站起来了的人民不会有任何恐惧的思想。特别是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八亿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决心已经形成了无敌的伟大力量。会谈公报明明白白地告诉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你们要发动战争，就会被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即使在他们疯狂的时候，听见这样严厉的正义的声音也得好好考虑一下。这种能够彻底消灭他们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

的伟大力量正是他们害怕的东西。前些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因为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已经感到坐立不安了。这两天他一定睡不着觉。他很有可能因焦虑而发狂，但是他决不敢轻易地碰一下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的力量。美国的总统照例是一个会做生意的资本家。他想的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种麻痹思想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常常把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比作过街的老鼠，比作破门抢劫的盗贼。我现在还想给他们加一个封号："吸血鬼"。这是因那一则新闻联想起来的。根据欧美传说，"吸血鬼"昼伏夜出，不断地吸人血来肥自己。要消灭它必须找到它白天藏身的地方，把它的头砍下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专吸人民的血，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都受过他们的毒害。多少城市被毁灭，多少生命受摧残；富裕的土地变成了贫困，自由的人民变成做苦工的奴隶。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巍峨宫殿就是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修建的。关于这个，我们的经验也够丰富了。我们被"吸血鬼"吸去了多少血液，我们的身上也有过若干的伤疤。但我们终于砍掉了"吸血鬼"的头，建立了我们独立、富强的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一直在跟"吸血鬼"进行斗争，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埃及人民终于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伊拉克人民一夜之间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难道黎巴嫩和约旦的人民就不能把侵略者赶出去，就不能砍掉这些"吸血鬼"的头？我虽然不是预言家，但是我想在这里替这些"吸血鬼"算一算命。中东的油田固然肥

沃,“吸血鬼”用吸血的嘴去吸油也很方便,但是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已经开始站起来了，再没有人肯乖乖地躺下让“吸血鬼”狂吸自己的鲜血了,再没有人肯放下武器做服从的奴隶了。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自然不会甘心情愿退出中东的油田，他们还会赖在那里，等待时机，大捞一把，或者大干一下。譬如过街的老鼠，倘使无人喊打，它们会摇摇摆摆，大咬大嚼饱餐一顿；譬如破门的盗贼,要是主人视若无睹,不起来自卫,他们会把整个屋子里的东西抢尽盗光的。对付“吸血鬼”，也得在光天化日之下找到它的藏身地，砍下它的头来，它才不能害人。但是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决不厚待破门的盗贼，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痛打过街的老鼠,中苏两国人民一定不让“吸血鬼”肆虐害人。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如果不把军队撤回本国,一定被赶出中东；他们如果轻举妄动,一定会被彻底消灭。现在中东一片朝霞,中苏国家光芒万丈,“吸血鬼”如果还想猖狂活动,它一定找不到葬身之处!

赫鲁晓夫同志说得好:“干涉者暂时被遏止了，他们停止了猖狂的活动,但是兵力还在继续集结，在这种情况下,爱好和平的国家应当表现出特别的警惕性。”所以只要美英两国的侵略军队一天留在中东,我们就不能够麻痹松懈,我们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支援阿拉伯国家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一直到他们获得彻底胜利为止。

六亿人民一定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不仅正确地表达了六万万人民的愿望和决心，也表达了至今仍在蒋介石集团统治下的台湾同胞的迫切的要求。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有权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解放自己的领土，使台湾人民回到祖国温暖大家庭的怀抱中。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政府神圣的职责，只有神智不清、是非颠倒的人才能说这是“夺取新的领土”，“危及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安全”在哪里？难道台湾是美国的领土，住的是美国人？难道台湾离美国本土很近，中国的军舰侵入了美国的领海，中国的飞机在美国城市上空骚扰？美国的国土在十万八千里以外，是美国的统治者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千方百计“保护”那一批中国人民中的渣滓——反动的蒋介石集团，妄想制造“两个中国”。如果不是美帝为蒋介石撑腰，就是台湾人民也有力量把这一小撮反动派踢到海里去。美帝违背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不顾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在台湾海峡兴风作浪，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不但引起中国人民的愤

* 本篇系与靳以合写，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同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时，改题为《我们要斗争到底》。

怒，也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那中间就包括绝大部分厌恶战争的美国人民。玩弄战争火种的是少数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事，可是在战场上送命的却是广大人民的子弟。难道他们情愿自己的骨肉在远离美国千万里之外，从事不义的战争，以致死无葬身之地么？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也不畏惧战争；美帝国主义应记取在朝鲜战场上的严厉教训，不要轻举妄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团结得像铜墙铁壁一样，工农业生产一跃千万里，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处处和中国人民为敌，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如果美帝国主义还不幡然醒悟，一定要武装干涉中国人民的内政，中国人民有决心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侵略者，六万万人民一定要斗争到底。

我们的决心丝毫不会动摇*

我们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庄严声明。周总理声明中每一句话都是中国六亿人民的正义声音；每一个字都体现了六亿人民的坚强意志。六亿人民高高地举起拳头来回答美帝国主义者无理而又无耻的挑衅。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领土决不容许他人侵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有权利解放自己的领土，也有力量保卫自己领土的完整。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连美国政府也曾经公开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就像加里福尼亚是美国的一州那样。中国人民从未远渡重洋侵犯过美国的一寸土地。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愿意根据五项原则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国政府甚至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谈判，来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美国政府却一直无理地干涉我国的内政，长期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利用台湾作根据地对我国进行威胁和种种的阴谋活动，这一切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

---

* 本篇系作者在上海人民拥护我国政府声明，反对美帝军事威胁大会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上海《解放日报》。

罪恶行为。

美国政府企图用扶植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来实现他们制造“两个中国”的好梦。其实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知道蒋介石集团是中国人民痛恨的卖国贼和战争罪犯，是被中国人民赶走了的盗匪，他们这一小撮狐群狗党是加在台湾人民身上的瘟疫。如果不是美国在台湾地区进行了武装干涉，台湾人民早已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残暴统治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里来了。

美国政府在中东创造了所谓“间接侵略”的强盗逻辑，侵占了黎巴嫩的领土；现在它又发明了“夺取新的领土”的说法，把我国解放台湾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说成是“夺取新的领土”。美国侵略者妄想长期霸占台湾，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战争威胁，危害世界和平，但是它的阴谋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建设自己的祖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战争挑衅是一定要失败的，任何恫吓与欺骗也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

上海市的文艺工作者们！举起我们的笔，拿起我们的一切艺术武器，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正义斗争吧！

美帝的确是纸老虎*

前些天美国国内演了一幕偷偷研究投降学的笑剧，五角大楼闹得天翻地覆，白宫的主人大出洋相，政客们吱吱喳喳地互相埋怨，吵成一团。现在闹声刚刚静下去，那一小撮战争贩子又换上凶恶面孔，张牙舞爪，在叫嚣战争了。

不管杜勒斯阻挠我国解放自己领土的狂妄叫嚣，不管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战争挑衅和军事威胁，不管美蒋军队在我国领土台湾举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演习，我们一定要解放、而且也一定能解放台湾和全部沿海岛屿。六亿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心。六亿中国人民决不害怕美帝国主义任何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对团结得很紧密的六亿中国人民来说，美帝国主义是并不可怕的，它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凡是到过朝鲜战地的人对这个说法都有一些或深或浅的体会。志愿军的战士们都可以谈一段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志愿军战士会打败上百个美国兵，用一根扁担可以活捉几个美国俘虏，甚至用一车高粱米可以换来一车美国兵。像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朝鲜到处都可以听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一九五二年七月我在志愿军某团团部住了几天。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团的某连在前沿阵地上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送来了一些战利品。参谋长拿给我看十多封美国兵留下的信。写信的人有父亲，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女朋友。收信的人不止一个。但是信上的调子却是同样阴暗、低沉的。发信的时间是五月和六月，写信的人却一致地抱怨天气冷，没有阳光。一个兵士的妻子在信上说："我真愿意床上铺十张毯子免得冻死。"一个兵士的母亲在家给儿子祝生日，说唱生日歌，声音凄惨唱不下去；又说："我写信给你妻子要她到我们家来……要她烧掉那些不好的信……"所有的人都写着："我天天祷告上帝保佑你平安归来"；或者"再过两个星期你服役期满，就可以离开朝鲜，上帝保佑你平安无恙"；或者"你要处处小心保全自己"；或者"要是你在家多么好"。几个美国兵都写信回家要东西，有一个甚至要母亲寄面包给他。母亲回信说，面包即使寄得到，味道也变了。这就是那些家信的内容。

我又看到一些志愿军战士的家信。有一封信说："今年家里粮也够吃，我在家中一切事情都很如意。自你参军后，去年八月你妻生一女，名叫翻妮，现在五六个月了，吃得也非常胖，很快活。你听说也很高兴吧。……为父所嘱，只要你好好学习文化，打倒美帝国主义，就是你的任务。"另一封家信说："家中一切都有政府照顾，我们生活很好。你可以放心。望你努力杀敌立功。"还有爱人或姐妹来信挑战，鼓励在前线立功的。

两种不同的家信说明了两种军队的性质，也说明了两种不同力量的源泉。我们战士有的是前进的力量；美国兵有的

是后退的力量。我们战士的家信鼓舞他们杀敌立功；美国兵的家信教他们贪生怕死。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表现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而美国兵上战场却需要长官在后面督战，看见炮火厉害就往后退，一失利就拚命逃跑或者下跪投降。我们的战士愿意牺牲自己来保全多数人；美国兵只想保全自己性命。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可以坚守一个山头；美国兵离开大队就只好投降。我们的战士有崇高的理想；美国兵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只当是替长官卖命。我们的战士以参军保卫祖国为光荣；美国兵却是被逼、被骗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美国兵身在战地、心在家乡。不仅他们自己，连他们家里的人也一样认为：只要能保全性命，就是屈膝投降也比"英勇"战死好得多。像这样的兵即使有最好的武器，也不能发挥武器的作用。像这样的兵尽管外貌装得神气活现，也只能制服那些害怕战争的人。他们遇到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已经给打得头破血流了。他们还受得住六亿中国人民钢铁一般的拳头吗？

不义之师的结果从来就是如此，决无例外。

美帝国主义要靠这种少爷兵来征服世界，不是纸老虎是什么？无怪乎它一面张牙舞爪、耀武扬威，一面又偷偷地在研究投降学了。六亿中国人民都是打虎的武松。我们更不会害怕纸老虎。纸老虎要不赶快滚回去，我们一定要捉住它，把它戳穿，把它打烂！

欢送《萌芽》编辑部下乡*

作协上海分会决定《萌芽》编辑部迁到刚成立的上海郊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去工作，我们一方面向《萌芽》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极大的敬意，另一方面对同志们今后的工作也寄予很大的希望。

《萌芽》编辑部的这个行动是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的。今天全国人民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建设祖国，劳动人民正以空前的干劲在生产上放卫星、创奇迹；人民公社的成立已经给我们展开了共产主义的前景。正如党中央在"决议"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这个跃进再跃进的变化万千的伟大时代，从群众中间每天都要出现千万个英雄模范，千万个诗人和艺术家，千万篇作品。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就是：怎样跟着时代跃进再跃进；怎样有效地为这个时代服务，为生产大跃进、大丰收服务！

时代不会等待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跟着时代大踏步前进。为了使文艺工作和劳动相结合，为了使文艺刊物和当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的斗争相结合，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刊物都必须打破过去窄小的圈子，到广大的群众中间，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扎根，去吸取健康的养料，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真正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不仅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跟广大的劳动人民同劳动，同甘苦，共呼吸，齐心齐步为创造更大的丰收、更多的奇迹而努力，而且要做到刊物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东西，并且是劳动人民所喜爱的东西。刊物上讲的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语言，而且又能鼓舞他们的劳动热情。要这样，刊物才说得上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要这样，刊物才能够反映出我们伟大时代的面貌；要这样，刊物才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拥护。

《萌芽》编辑部可能是第一个迁到人民公社去的编辑部。不用说，在全国各地，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编辑部迁到农村或工厂去工作。《萌芽》编辑部在这方面是一个开路者。开路者是光荣的，但是也有责任为后来的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同志们一定能编出很好的刊物，一定能把自己改造成又红又专的劳动知识分子，而且为全国文艺刊物开辟一条宽广的道路。倘使真正做到这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文艺工作的卫星从同志们中间升上天空了。

杜勒斯的豺狼面目*

杜勒斯这一生不知道干了多少谋财害命的勾当。他欠下朝鲜人民一大笔血债。在中东、在南美有好多孤儿寡妇咬牙切齿地讲起他的罪行。中国人民脑子里也还留着这个老狐狸的印象。他同他那位亲爱的总统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了。尤其是杜勒斯，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善良的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像碰到瘟疫一样。前些时候他在中东干了些强盗行为，挨了耳光，一身涂满污泥。现在他又在台湾海峡地区大显身手了。这一次他给自己化了装，擦了粉，公然断定"台湾、金门、马祖各岛从来没有处于中国管辖之下"，大摇大摆地扬言要阻挠我国解放台湾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就半明半暗玩起"护航"的把戏来。对于杜勒斯的无理叫嚣，我国周恩来总理已经辞严义正地加以驳斥，美国的军舰害怕我国大炮的威力，不敢接近金门，虽然受到国民党的抱怨和讥讽，也只得夹着尾巴逃走了。

现在这位杜勒斯又在讲话了。前几天他的艾克总统才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

言乱语地向美国人民报了一篇假帐，无非卖弄贼喊捉贼的一套故伎，只赢得全世界的一片倒彩声和怒斥声。连美国报纸上也少有捧场的文章。然而，作惯了贼的人决不肯自动收手，即使碰了钉子，也不肯回头。反正他有一张颠倒是非的嘴和一双会抢东西的手。所以接着杜勒斯在全世界目光注视之下，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厚颜无耻地重弹“自己侵略自己领土”的老调，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也掩饰不了他那强盗的豺狼面目，和美帝国主义欺骗与威胁的花招。杜勒斯诬指我国为“侵略者”，要我们“停火”，好像我国的领土被人侵犯，倒是“侵略”行为；而美帝国主义越过一万几千浬侵占了我们的台湾，美国的军舰侵入我们的领海，阻挠我们解放金门、马祖，反倒不是“武装侵略”。美国军队刚刚在我国的台湾省举行了大规模的海陆空作战演习，反倒来要求我们“停火”。这真是强盗的逻辑！

过去有一个时期美帝国主义仗着所谓军事优势，实行原子讹诈，在联合国大会上利用表决机器，为所欲为。但是现在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苏联的科学发展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美国虽然能够发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但是它遭受到这些武器的反击的可能性更多，而且对于那些人口密集、工业集中的大城市，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毁灭性也更大。中国六亿人民中从没有一个人想到像美国的官员们那样去研究“投降学”，每个中国人所想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为着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不惜献出最后一滴血。每个中国人都是热爱自己国家的坚强战士。

陈毅外长警告杜勒斯的严正声明就是六亿中国人民对杜勒斯的答复。他的声明体现了六亿中国人民的坚决意志，也表现了六亿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是说得出做得到的。美帝国主义必须充分认识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杜勒斯以为闭上眼睛用一派胡话就可以抹煞六亿人民的伟大中国的存在，这是他的无知的梦想。他套着自己脖子想在中国沿海岛屿上钓鱼，其实中国人民只要伸手一拉绳子，就会把他绞死。杜勒斯也许以为会玩火的人不致烧身。好，就让你点着火玩吧，万一引起了火灾，烧死的决不是中国人民，一定是美帝国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下场是谁都看见了的。你杜勒斯也想步"戈培尔博士"的后尘吗？

写在亚非作家会议开幕之前*

亚非作家会议就要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开幕了。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万分热诚地祝贺会议的成功，我愿意为这个会议献出我的力量。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们在一个厅堂里坐下来，亲切地、坦白地交换意见，畅快地谈友谊，谈和平，谈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谈论我们文学的光辉的前途，互相鼓励，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介绍情况，让我们对彼此都有更深的了解，也有更深的信任——想到这个场面，想到这次会议的空前盛况，我感到无比的兴奋。

五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们走过长远的路程，来到日暖天青的美丽城市塔什干。作家们在友好的气氛中毫无顾忌地谈着自己心里话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读者们的眼睛也在注视会场。五十多个国家的读者热烈地期待着会议的成就。作家们为读者写作，因此也有责任为读者讲话。亚非国家的人民有的过去受够了剥削和践踏；有的正在努力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有的国家经济命脉还捏在外人的手里；有的国家还受着外国的文化侵略；有的国家里还有外国军队或者外国的军事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地；有的国家里，人民还在殖民主义的皮鞭下过痛苦日子。殖民主义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觉醒了的亚洲和非洲的上空，甚至在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中，殖民主义者还不断地在搞复辟的阴谋。倘使随便问一位亚非国家的读者：谁是他的国家的敌人。他的回答一定是“殖民主义者”。因为他亲眼看见什么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什么人使他们长期受苦，什么人在他们的国家里横行。连一个黎巴嫩小孩也嚷着要把美国军队赶出去。亚非国家的人民深切地知道要争取自己的独立和幸福，就得消灭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亚非两洲猖獗了多年的瘟疫。扑灭瘟疫是亚非国家人民共同的愿望。

我们亚非国家的文学中，一方面充满了痛苦的呻吟和沉痛的控诉，另一方面也充满了战斗的呼声和胜利的信心。一部分亚非人民已经坚强地站了起来，一部分亚非国家已经显示了使殖民主义者战栗不安的强大力量。我们的文学里也放射了新的夺目的光辉。

我们的文学事业是在人民中间生长的。即使是最有天才的作家，也必须和他的人民共呼吸，同甘苦。人民的愿望一定会在文学中得到反映。作家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程，并不是为了讲一点个人的琐事；每个作家都带着无数读者的心来到塔什干。大家到这里来寻找一种共同的语言，一条共同的道路，希望通过文学的发展，通过团结与合作来促使实现亚非两洲人民共同的愿望。

这次会议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功。亚非作家的紧密、友好的团结一定会加强两洲人民的团结。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

和繁荣是跟两洲人民的独立和幸福分不开的。这一切只有在殖民主义的瘟疫完全扑灭之后才能够实现。因此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团结的语言，我们共同的道路就是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亚非作家会议一定会实现亚非两洲人民共同的愿望。

欢迎金日成首相*

金日成首相到上海来了。中国人民把金日成首相当作自己最敬爱的朋友，连刚刚进小学念书的孩子们也熟悉金日成首相的光辉的名字。在上海有不少人看见金日成首相的照片，就想到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就想到世界上最崇高、最美好的感情。八百万上海人民正在鼓足干劲加倍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接待英雄的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感到莫大的光荣。每一个上海人都盼望看见金日成首相的愉快的笑容或者听到他的亲切的声音，都盼望得到一个机会到金日成首相面前向他问一声好，或者祝他身体健康。

我也有这样的愿望，我也有这样的感情。我曾经在山明水秀的朝鲜国土上，在勇敢、热情的英雄人民中间度过我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我的笔记本上还留着一个伟大领袖的签名。我每次打开这个宝贵的笔记本，就仿佛回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到达的那个地方，好像又听到了那句非常亲切的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你们辛苦了。"我觉得有一股暖流通过了我的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

身，我的心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仿佛我还在一片废墟的英雄城市平壤，我还和十几个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围坐在防空洞里一张大餐桌旁边，金日成首相仍然坐在我们的中间。

金日成首相是那么健康，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眼光里流露出对于胜利的坚强的信心。他对我们谈话像对自己家里人讲话一样，亲切，明确。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向我们直爽而扼要地介绍了共和国的情况和未来的远景。他用数字和事实来说明朝鲜人民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过程。他愤怒万分地谈到美国侵略军的残酷暴行。他充满信心地谈到抗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充满感情地谈到中朝人民的友谊和朝鲜人民军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友好关系。他谈得兴奋的时候，把头微微向上一扬，丰满的脸上露出微笑，笑容里有一种任凭什么力量都不能动摇的坚定的表情。他谈到后方的斗争，谈到朝鲜人民对祖国的贡献，他忽然用发光的眼睛望着我们，特别强调地说："朝鲜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金日成首相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进入朝鲜国境，不过半个月的光景，朝鲜妇女的英雄形象就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中。我们坐在"英雄的嘎斯车"上，沿着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过了好些地方。在平壤我们更受到朝鲜友人热情的招待。我们参加了地下食堂的宴会。我们在地下剧场中欣赏了朝鲜古典名剧。我们参观过车间设在地底下的工厂，我们访问过在瓦砾堆中挖一个大坑搭两间小屋居住的朝鲜家庭。到处我们都接触到朝鲜人民的心，到处我们都听到看到朝鲜妇女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朝鲜的妇女不仅英勇地杀敌立功，慷慨地成仁就义，她们还坚守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各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效忠，使屹立在瓦砾堆上的平壤城，使朝鲜的整个后方都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和战斗的力量。她们不仅能忍受痛苦，并且热情、乐观，她们用舞蹈、歌声和笑语不断地鼓舞人们前进。在朴正爱同志的身上我早就认识了朝鲜妇女的崇高的优美的精神。有一次我听见她在华沙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发言。平时她是那么朴素，谦虚，和蔼可亲。可是她站在讲台上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时候，她那怒吼一般的正义的演说却使得八十个国家的代表们佩服，感动。她表现了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多的力量！这就是在金日成首相和劳动党领导下面的朝鲜妇女的英雄形象。

金日成首相看见我们的感动的笑容，知道我们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他也衷心愉快地笑了。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跟他的心挨得多么近，我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我放下了笔，我用不着再记录了，我会把他的话永远记在心上。同志们都请首相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签了名。他的笔迹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使我们更容易克服我们可能在战地遇到的一切困难。大家小心地藏好了笔记本，向金日成首相告别的时候他还殷勤地嘱咐我们代他向中国人民问好。

我们出了洞子，才知道美国飞机刚刚离开平壤的上空。在这一个钟头里面，我们不仅认识了朝鲜的过去和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未来。从这个朴素而庄严的小小客厅里，我们带走了鼓舞我们前进的莫大的力量，我们带走了对于最后胜利

的极大的信心。以后不论在山沟里，在掩蔽部中，在老大娘的茅屋内，在志愿军战士们挖的坑道里，朝鲜人民的热情的关怀和照顾常常使我感动到流泪。离开平壤的时候，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对这英雄的城市，对这美丽的国土和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言语说明的热爱。"离开朝鲜的时候我又写道："我爱朝鲜，爱朝鲜人民。"在任何时候我只要想到金日成首相那些热情的话，就不能不对朝鲜人民表示我的感情和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人和一个党在领导你们进行斗争，争取胜利，你们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今天朝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还在建设中取得了胜利。朝鲜人民正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飞奔。金日成首相对我们描绘过的美丽远景已经在朝鲜实现。作为胜利的人民的领袖，金日成首相带了朝鲜人民的心到中国来，他又会把中国人民的心带回朝鲜去。中朝人民心连心，——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能具体地说明我们两大民族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了。您，朝鲜人民的伟大的领袖，两国人民同样深地敬爱您。中国人民献给您鲜红的心。这里面也有八百万上海人民的心。请接受上海人民的真诚的敬意和生死不渝的友情。请不要忘记，在您和朝鲜需要的时候，上海人民愿意献出他们的一切。

一九五九年

让我们大声欢呼*

苏联发射的巨型宇宙火箭已经飞越月球，这是一九五九年的第一件重大事情。全世界人民都在为苏联科学的伟大成就欢呼，这一伟大成就又一次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到现在仍然放不起大卫星，飞不出宇宙火箭呢？苏联人民在接连放出三颗人造卫星之后，又发射了第一支宇宙火箭，令人欢欣鼓舞的不仅是这三颗卫星和一支火箭，更值得我们欢庆的，是苏联整个国家在科学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很高的水平。苏联人民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在工业方面达到了高度电气化的水平，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文化普及与繁荣的速度惊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有目共睹的，苏联人民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景仰的。苏联人民不仅发射了三颗卫星和一支火箭，他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多更大的奇迹，不仅是科学上的奇迹，而且是各方面的奇迹。

苏联人民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他们不仅在科学技术上，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五日上海《解放日报》。

且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苏联的宇宙火箭飞越月球，这的确是值得欢庆的大喜事。其实，飞越月球的火箭，只是一支我们看得见的火箭，同时，还有无数的我们看不见的苏联火箭在天空飞，在地上飞，在人心上飞！

苏联人民每年每月每天都做出不少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宇宙火箭不过是一九五九年苏联一连串伟大成就的第一件，也只是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阵营一连串伟大胜利的第一个！

红旗已经在太空中飘扬了，让我们大声欢呼，让我们的敌人号啕大哭吧！

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

古巴革命成功，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垮台，英勇的古巴人民正在向着独立与民主的大道迈进。古巴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终于得到胜利，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新的光明。血腥的统治推翻了，工会的权利恢复了，出版的限制取消了，流亡的人士纷纷回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古巴人民的胜利在拉丁美洲竖起了一面大旗，不仅鼓舞了拉丁美洲的人民，也鼓舞了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在为古巴人民的胜利欢呼，古巴人民正在贡献全部力量建立自己国家的新秩序。古巴人民的幸福与自由，并不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古巴人民审判本国的战犯更未危害美国的安全。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却千方百计干涉古巴的内政，制造舆论，散布谣言，包庇战犯，叫嚣"制裁"。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要"古巴当局考虑美国的舆论"；美国的报纸公开宣传"古巴必须要有美国"；"古巴靠美国……活命"。古巴人民的答复就是哈瓦那百万群众的反美大示威。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日报》。

古巴的革命领袖宣布要废除外国企业的特权，并且严正声明古巴不但要求政治上自由，还要求经济上自由。古巴人民要坚决保卫他们的革命果实，他们决不是美国的威胁所能吓倒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挽救自己的失败，都不能破坏古巴的革命，都不能使古巴人民痛恨的独裁者在古巴复辟，更不能阻挡拉丁美洲的革命怒潮！

刚果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怒吼也是一九五九年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不用说，刚果人民的斗争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比利时的殖民主义者用了史无前例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在八十年中间把刚果的人口减少了一千七百万，他们当然不轻易放过一个敢于反抗他们的刚果爱国者。甚至最近他们还在继续进行血腥的暴行，来维持万恶的殖民统治。然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土地称王道霸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比利时的殖民当局即使制造更多的利奥波尔城事件进行更多的残酷镇压；即使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加紧榨取刚果的富源，奴役刚果的劳动人民，也不能阻止历史前进，也不能剥夺刚果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权利，更不能剥夺刚果人民的生存权利。比利时跟刚果相隔那么远，土地只有刚果的七十七分之一，人口不到刚果的四分之三。远隔海洋的殖民主义者凭什么理由不撤离别人的土地？凭什么理由甚至在一片“捉贼”声中还要拿起武器继续干明火抢劫的强盗勾当？要等职业强盗良心发现、洗手不干，这是痴心妄想。强盗是请不出去的，但是他们会被赶出去。“无情的”历史不会给殖民主义者帮忙了。非洲的人民要作非洲土地的主人，要

用自己的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非洲的人民一定要把所有的强盗全赶出去。非洲的怒火不但一时不会灭，而且在短时间内，革命的烽火会燃遍整个的非洲。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任何力量所压制不了的。一九五九年可能是非洲的革命年和独立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

在全世界人民“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强盗们的末日一定会早日到来。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从新安江回来*

我的书桌上，一个盛满清水的玻璃缸子里，有几十粒五颜六色的小石子，这是我从新安江带回来的。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新安江的生活。最近，我在那里的水电站修建工地上住过四个夜晚。离开工地的那天大清早，我又跑到招待所附近的悬索桥上去。我站在桥上望前面的拦河大坝。我望着用竹子搭的跑道和脚手架，望着有钢梁的栈桥，望着骄傲地耸立在坝上的门式起重机，望着高空中像两只仙人脚横跨两岸的缆索起重机，望着从下面两个导流底孔流出来的汹涌波涛，我想起前一天我经过跑道时所见到的一切，我又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在那里忘我地劳动，我更想到，还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斩江断流的壮观，我心里非常激动。

紫金滩原是一带荒山，几年前可能还是老虎出没之地，现在我们却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化的大楼，其中之一便是招待所。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三楼，早晨开窗一望，江水和沙滩一齐映入眼帘；夜晚在露台上还可以望见对岸繁星似的灯光。一位朋友从上海到这里将近两年了。他熟悉工地上的生活。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浙江日报》。

上他来看我们，常常激动地对我们讲许多生动的故事。不用说，他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英雄人物，这就是那些又朴素、又可爱、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大家的普通工人。这样的人我们到处都见过，在新安江的工地上我也见到不少。

有一个从东北来的中年工人，带着我们走了几个地方去看他创造的小型电焊器。我觉得重要的倒不是他的创造发明（虽然这也解决了当地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而是他一个管子工人（过去还是文盲）居然会想到创造这种东西。他为这个创造耗费了不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目的只有一个：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快、更省。这个人在家里闲不住，下了班也常常留在工地上。他宁愿多做工作，少拿报酬。过去有一个时期他对报酬有不同的看法，钱越多越好，多了，就喝酒，请人喝，自己也喝，而且要喝个痛快。可是后来他不常喝酒了。他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好，夫妻和睦度日，他把自己的工余时间大半花在新工具的发明创造上，替国家减少了一些开支。他从东北丰满到河北的官厅，又到四川的狮子滩，现在已经在新安江工作了一个时期，明年还不知道要调到什么地方去。总之，哪里修水库，哪里就需要他这样的人。他当初到这里来，除了青山绿水，就只见一片荒凉；可是等不到大坝建成，开始发电，他又要到别处去做开辟的工作了。谈起这些事情，他倒十分高兴，他有两个理由：一则祖国工业建设事业非常兴旺；二则自己能够在这些建设事业上尽一分力多么好。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姓名，并非我不知道这位可尊敬的工人的名字，只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先进小组的组长，人很朴素，不大会讲话，干起工作来却很有办法。他不仅自己苦干，而且能够团结别人一起积极干活。工作紧张的时候，家里小孩生病他也不肯回去看看，下了班，仍然留在工地上想办法出主意。我见到他，正是在领导上想方设计要他回家休息的时候，一则因为他的孩子生病，二则前一天晚上由于厂房封顶争取时间，他也参加苦战，一夜未睡。这时封顶工作刚刚完成，他因为集体事业的这个胜利，兴奋得不想马上离开战地，他愿意在这个时候多多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个浙江省的东阳人，也不过是无数新安江工人中的一个。他将来也要到另一个工地上去创造更多的奇迹。

我还听见人讲过出色的潜水员的故事，我也看见列车电站上技术革命的光辉成就，我多么羡慕那些把整个祖国当作自己的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处奔走的人！而且我也听见在那比河床还低的“廊道”中工作的英雄们豪迈的壮语。（真可惜，我没有到那里面去过，是我自己失掉了好机会！）当一个月前江水暴涨，洪水快要封住“廊道”出口洞门的时候，现场指挥部发出了几次命令，才使得英雄们放下工作。后来别人问他们是否想到自己的安全。他们的回答就只有这么一句：“大坝的安全才是自己的安全，这关系着子孙万代的幸福！”在十年前，在旧社会中这样的豪语不知会吓倒多少人！那些时候，“各人自扫门前雪”成了人们处世之道。可是今天在新社会里，人们都懂得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让自己活在千千万万、世世代代人的心上。整个社会的风气改

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改变了！

我爱新安江，跟我爱祖国的其它建设工地一样。今天不论走到东南西北，我们都可以看见新安江，也看得见出色的新安江人，因为新安江的生活也就是新中国的生活的缩影。这就是那种激动人心的“沸腾的生活”。不用说，沸腾的不止是整个新安江的工地，不止是整个浙江省，整个中国都在沸腾，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心都在沸腾。新安江四天的生活，使我想到很多的事情。我和过去那许多参观访问的人一样，从新安江带走了不少的东西。从新安江回来，我觉得我更清楚地看见祖国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前途了，我更逼近地接触到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无限豪迈、无限崇高的心灵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四天里多么丰富的见闻。书桌上没有生命的小石子，到今天还在向我讲那些沸腾的生活和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

7月27日，上海。

对敌人咒语的回答*

这两天，所谓“自由世界”的高等绅士们又忙起来了。他们又在那里吱吱喳喳地念咒语。不用说，他们念来念去还是那个老调子。他们痴心妄想，总以为已经抓到了我们国家的“生庚八字”，只要拚命地念一阵咒语，就会使新中国化为血水。然而偏偏事与愿违，他们念来念去，新中国不但不曾消灭，反而一天天地强大。他们纵然闭上眼睛，不愿意看见新中国的存在，可是我们这里连续的大跃进的声音已经吵得他们整天坐立不安，甚至睡不好觉了。他们心里越害怕，嘴上越叫得凶。不要看他们有时候会提高声音大吼一阵，可是声音是那么空虚，仔细一听就听得出来他们开始在哀号。毛主席指出的那个真理：他们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命运！但是他们不得不看到事实的确如此。他们当然不甘心灭亡。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拚命地念咒语，到处寻找“救星”。他们居然发昏到把我们的人民公社当作他们的“救星”，诬蔑我们“破坏家庭”，梦想会从此垮掉。这一年来他们发出了多少次的“预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日报》。

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过无数诬蔑我们人民公社的言论，他们恶毒地嘲笑过我们大跃进的成就，他们甚至断言我们的号召是吹牛。在这一切的“预言”诽语相继破灭之后，这两天他们又在我们调整本年的主要指标上大做文章。但是任凭他们怎样吱吱喳喳，总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国家将在短短的两年中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指标；……人民公社不但没有叫新中国垮台，反而使五亿农民战胜了本年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取得了丰收；人民公社不但没有使得农民家破人亡，反而在农村中产生了紧密团结、共同劳动的一片欢乐气象。靠了人民公社，靠了大跃进，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国家的前途愈来愈光明美丽，而且以后我们的日子还要继续不断地好下去。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齐步前进的英雄气概使得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发表了称赞：“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像一九五九年的中国那样使我惊奇，使我感动。”不用说，这一类的话是我们的敌人所不高兴听的。

敌人的吱吱喳喳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敌人的恶毒的诅咒也动摇不了中国人民向前迈进的决心。总路线仍然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愈来愈加显著。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便是我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锋利武器。跃进是没有止境的。现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动起来了，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了，全体人民都动起来了。不论男女，不论老幼，大家齐步齐心向前飞奔；拿出冲天干劲，献出全部力量；有一分

热的发一分热，有一分光的放一分光，哪怕做一砖一瓦，也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到底。这就是我们对敌人咒语的庄严的回答。

一个作家的无限的快乐*

我的书桌上一个盛满清水的玻璃缸子里有三十九粒五颜六色的小石子，这是我从新安江带回来的。看到它们我就想起许多事情。最近我在那里的水电站修建工地上住过四个夜晚。离开工地的那天，大清早我又跑到招待所附近的悬索桥上去。我的身子微微靠着作为栏杆的铁丝网，静静地望着前面的拦河大坝。我望着用竹子搭的跑道和脚手架，望着有钢梁的栈桥，望着骄傲地耸立在坝上的门式起重机，望着高空中像两只仙人脚横跨两岸的缆索起重机，望着从下面两个导流底孔流出来的汹涌的浪涛，我想起前一天我经过那个跑道时所见到的一切，我又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在那里忘我地劳动，我更想到还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斩江断流的壮举，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参观水电站的建设工程，这并不是第一次，三年前，我到过官厅水库，然而在那里我仅仅耽搁了几个钟头，便匆匆地坐原来的专车，经过新建成的丰(台)沙(城)铁路回北京去。那一次同去的都是正在北京开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很多。大家在车上兴奋地谈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日印尼《生活报》。

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火车接连地穿过不少的山洞，大家有说有笑，连声称赞工程的伟大和建成时间的迅速，并没有人感到气闷。这次我从杭州坐汽车到新安江，同去的八个人都是作家。紫金滩原是一带荒山，几年前可能还是老虎出没之地，现在我却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化的大楼，其中之一便是招待所。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三楼，早晨开窗一望，江水和沙滩一齐映入眼帘；夜晚在露台上还可以望见对岸繁星似的灯光。我们白天到各处走走看看，或者访问工人。晚上在招待所里，我们或者请工程局的一位同志来谈谈情况，或者在露台上纳凉，闲谈些创作上的问题。有一位我们认识的诗人在这里的工会里工作，他从上海到这里将近两年了。他熟悉这里的生活，晚上他来看我们，总要坐到十点或十一点钟才走。他常常激动地对我们讲许多生动的故事。不用说他也介绍了一些英雄人物，这就是那些又朴素、又可爱、少想自己、多想到大家的普通的工人。这样的人我们到处都遇见过，在新安江的工地上我也见到不少。有一个从东北来的中年工人带我走了几个地方去看他创造的小型电焊器。我觉得重要的倒不是他的创造发明（虽然这也解决了当地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而是他一个管子工人（过去还是文盲）居然会想到创造这种东西。他为这个创造耗费了不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目的只有一个：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快、更省。这个人在家里闲不住；下了班他也常常留在工地上。他宁愿多做工作，少拿报酬。过去有一个时期，他对报酬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钱越多越好，有了钱就多喝酒，而且要喝得痛快。可是后来他不常喝酒了。他

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好，夫妻和睦度日，他把自己的工余时间大半花在新工具的发明创造上。发明创造的结果并不为他自己增加财富（因为在中国谁也不会想到什么专利权），却替国家减少了开支。他从东北的小丰满到河北的官厅，又到四川的狮子滩，现在已经在新安江工作了一个时期。明年不知道要调到什么地方去。总之，哪里修水库，哪里就需要他这样的人。他当初到这里来，除了青山绿水，就只见一片荒凉；可是等不到大坝建成，开始发电，他又要到别处去做开辟的工作了。谈起这些事情，他倒十分高兴，他有两个理由：一则祖国工业建设事业非常兴旺；二则自己能够在这些建设事业上尽一分力。我在这里没写出他的姓名，并非我不知道这位可尊敬的工人的名字，只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多，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人们谈起我们今天的生活，常说"沸腾的生活"，我觉得这句话挑选得很好。譬如，在这里我们看见机器在动，人在动，还有光海一片，人声、机器声和炮声齐鸣。山削平了，江斩断了，水上立起了大坝，平地上建起了高楼……但是构成"沸腾的生活"主要成份的还是人们的心，燃烧的心，沸腾的心，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的心。只要我打开书房的门走出去，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触到这样的心。对作家们来说再没有比人们的心更可宝贵的了，何况又是这种"沸腾的心"，何况到处都是！的确，只要投身在这个"沸腾的生活"的海洋中，谁也不能不激动。我常常有这样一种幸福的感觉：我全身充满了感情和精力，这都是我周围的人给我的，而且也是维持我个人的生存所用不完的，我必须把它交出来。我觉得我能够了解那个

管子工人的心，这是莫大的幸福。在我们国家里，人们常常称作家为“灵魂工程师”。这样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不过作家也有崇高的理想。即使我们不能塑造人们的灵魂，然而经常接触人们的心，这总是事实。这些年来我特别感觉人们的心灵的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了我的心灵。我周围的世界在改变，我的心灵也在改变。一个作家不仅写作，他同时也在生活。他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他的心灵也不可能不改变。他的人物的生活改变了，心灵也改变了。他们现在借作家的笔讲话，那么他们讲的一定跟过去的不同。

我反复地谈到改变和变化，因为它们不仅在我的写作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上都成了主要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变成世界强国之一，看见自己的同胞由一盘散沙变成坚固团结，我不能无动于衷。三十二年前我写过《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二十七年前我在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序文中说过：“许多悲惨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说过“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像一根鞭子似地永远在鞭打我”。二十六年前我的一本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有这样的看法，“人活着多么受苦呵！”十一年前我在一本长篇小说的后记里还这样地写道：“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手边的日报上就有《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大字标题”。总之，在那么长的岁月中，我很少发过快乐的笑声，我的四周无处不是苦恼，到处我都听见痛苦的呻吟。我跟人们接触，要不听见没完没了的沉痛的诉苦，那么就是人们对我关闭了他们的心。整个

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上面罩满乌云，我的生活里怎么能有快乐？我的作品又怎么能够给读者们带来多大的希望？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二十年中间，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所谓作家的生活是极其可悲的生活"，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那些时候我总是跟主人公一同受苦，一同悲哭；努力奋斗，却找不到出路。我常常因为主人公的悲惨的死流眼泪。我想给正直的普通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然而在那些时候的中国社会里，靠自己一双手和一个脑子生活的正直人要摆脱悲惨的"命运"，是多么困难！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寄来诉苦的信，他们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了心里的话，可是我始终爱莫能助。我为了想帮助人，想对我周围的人，对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有所贡献，我才拿起笔写作。然而在那些时候我的文章只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苦恼。我唤醒了一些年轻的灵魂，却让他们遭受旧势力的横暴摧残。看见别人受苦而无能为力——再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事情了。然而想不到连我这些写得软弱的作品有时候也会遭到禁止。在一九三四年的七、八个月中间我不得不用一些不同的假名发表作品。不论是北洋军阀或者国民党政府，对新文学都没有好感，它们把所有认真写作的人都看作仇敌，好像多一本文学作品，它们的寿命就会减少一天。它们把作家当作瘟疫看待，决不容许他们接近人民。事实上中国的新文学作品中也没有一页一行讲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好话。有良心的作家们不会睁起眼睛，把"灾难"当作"幸福"，把"痛苦"写成"快乐"，把"黑暗"描写为"光明"。我最近编辑我的文集，重读我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八年的二十年中间写的那些东

西，我因为那么多的痛苦和灾祸而吃惊。人们不断地受苦，接连地死亡，眼泪就好像没有尽头。想到过去那些日子，我真有点不寒而栗！

但是我毕竟比一些同辈的作家幸运，我活过来了。我的几位敬爱的友人却贫病交加，在中年就痛苦地死去。我见到了光明，而且可以毫不迟疑地写下了人们的幸福，因为我看到了人们的幸福，因为我自己感到了幸福。我记得很清楚：十年前十月一日下午三点钟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听见毛主席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望着下面数不清的头和手，望着下面红旗的海洋，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这颗心好像要从口腔里跳出来，我深深地感到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我这种感觉只有长期受过痛苦的人才能够了解。过去那根一直在鞭打我的鞭子消灭了，在我的眼前展开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么响亮的热烈的欢呼声我一生哪里听见过！那么多衷心愉快的笑脸，我一生哪里看见过！游行的群众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散尽。我回到住处，耳朵里还留着六个小时的欢呼声，我激动地在纸上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从此我便用我这管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这也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我自己也参加了我所描写、所反映的生活，我自己也分享了我所歌唱的人们的幸福。今天的中国作家不再跟人民隔离了，却直接投身在各种各样的生活里面。人们把我们当作亲人看待。我们无论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到工地，到山区，到海岛，总之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种种的帮助和方便。我

们在生活里见到种种动人的场面，听到种种动人的故事，而且同我们的主人公一道生活，一道工作，一道欢笑。我们也就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所起的作用：鼓舞人们的劳动热情，增加人们前进的勇气。短短的十年中间我们就有机会看见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间开放美丽的花朵，看见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而且随时随地都意识到自己的心跟全国人民的心贴得多么近。对作家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幸福么？每当我写倦了放下笔休息的时候，我望着窗外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会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十年来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中也有我的份儿。过去我们中国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今天的中国人削平了山，填平了海，在波涛滚滚的长江架起走火车的大桥，要在十几年中间叫黄河水澄清。这只是我们人民做过的或者正在做的几件大事情。过去有一个时期中国人民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前途的信心，自卑心在旧社会中极为普遍，“各人自扫门前雪”成为流行的谚语。谁也不关心在个人之外还有一个集体。我们整个国家就好像抱着金饭碗在讨饭一样。然而在新中国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自卑心了。今天的中国人民喜欢发出豪迈的壮语。人们常说：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向时间夺钢，向大地要丰收。这不是信口开河，痴人说梦。我们是边说边做，或者做了才说，或者说到做到。随便举一个例子：长江上第一座大桥在武汉建成以后，第二座大桥又快要在重庆完工了。到处都在建设，天天都在变化。正因为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我们得从头做起；正因为中国过去落后，今天必须迎头赶上；正因

为我们过去有精力无处使用，现在得到机会，谁不愿意拿出全部的力量！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谁也认识到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大家，同时也为着自己。工人在工厂中机器旁边紧张地工作，农民在田上辛勤地劳动，不论大大小小的工作，人们都是全力以赴。劳动成了新中国公民最光荣的事情。谁也不愿意躲在角落里浪费时光，谁也不愿意比别人偷懒。作家们自然也不是例外。他们并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他们倒以生活在人民中间、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骄傲，为幸福。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看做作家的崇高的任务。

今天我仍然接到从中国每个角落寄来的信。读者们把作家当做他们最知己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他们最深的感情，表示他们共同的愿望：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读者们不断地给我送来鼓舞和信任，希望我和他们一同前进。和读者一同前进，这的确是我的愿望，我也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这些年来我到过不少的地方，我看见祖国的面貌不断地改变。我也感觉到人们的心灵不断地在改变。但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有一样东西并不改变却越来越显著，那就是：个人紧密地跟集体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不会消灭个性，反而给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这大半年中间我访问了几个地方的人民公社，我看见在农村办起来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工厂，我看见男女农民在地里的集体劳动，我看见长得可爱的庄稼，我看见一片欢笑声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我见到的尽是些欢乐的景象。在新安江工人住宅区那个幼儿园里，我看见那么多

叫人心爱的又活泼、又清洁的胖娃娃。我们还参观了杭州西湖一个公社生产队的幼儿园，那么多的小孩拉着我们，亲热地叫我们做“叔叔”，要我们抱他们。三年前我在上海近郊看见的合作社托儿所的设备，还没有这么完全，这么好。玩具多、保姆多，衣服用具干干净净，孩子们脸上毫无呆板的表情。看见这么多天真可爱的孩子，我想到新中国农村的未来，想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前途，我觉得我有无比的勇气和无限的信心，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只为了使笑容长留在孩子们的脸上。我愿意为他们写下更多的新中国的美好的事情。这时候我才充分地了解个人溶化在集体中间的无限的快乐了。

“塔什干精神”万岁*

——纪念亚非作家会议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开幕。亚非两大洲的作家们走过了遥远的路途，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个天青日暖、鸟语花香的中央亚细亚的城市，亲切地会见、诚恳地交谈。我们怀着燃烧的心，带着两大洲十五亿人民的愿望，来寻找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条共同的道路，希望通过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通过作家们的团结与合作，来加强两洲人民的团结与合作，促使两洲人民共同的愿望早日实现，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我们在庄严、美丽的纳沃伊剧院里进行了六天的会议，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倾吐了希望和决心；我们认真地进行讨论，毫无保留地交换意见；在我们中间也有过争论，任何不同的意见都有充分发挥的自由。我们终于达到了互相的了解和一致的协议，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道路。大会发出的《告世界作家书》不仅得到全场一致的同意，而且说出了每个到会作家的心里的话。在会议进行的期间，人们越来越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

深地感觉到"信心更大，勇气更多"，正如《告世界作家书》中所说："深信我们这些国家和我们的文学有远大前途，我们为各国人民和平与友好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亚非两大洲的作家们庄严地向全世界宣言：人民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同人民一起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毒害，反对核武器战争的威胁。……作家们鲜明地表示自己的信仰："只有在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自主的条件下，文学才能真正的繁荣昌盛，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文学创作充分发展的条件。"

我至今还记得那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那么响亮的热情的语言，充满感情的眼光。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作家激动地说："现在我的头举得更高了，我觉得自己更庄严了。"一位非洲的年轻作家说："我更懂得友谊和团结的意义了。"一位中年的亚洲作家说："我的心多么暖和，我们的前途多么光明。"所有的作家都从塔什干带走了一个同样的东西，那就是"塔什干精神"。塔什干的会议是在一种异常乐观的气氛中闭幕的。

要具体地说明"塔什干精神"是什么，它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也许有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说，十五亿人民的智慧和愿望产生了"塔什干精神"。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精神"早已存在，不过我们在塔什干更明显地感觉出来罢了。我们不仅在当时，在会场内外，在会后的友好活动中时时刻刻接触到、感染到这种精神，而且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仍然生活在"塔什干精神"里面。我曾经这样地解释过："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友谊，有和平，有幸福的生活，有为着民族独立的持久斗争，

有为着保卫民族文化的艰苦奋斗，有为着建设新生活的忘我劳动，有为着人类幸福的献身的努力……那么就一定有'塔什干精神'"。这里面有战斗的号召，也有友情的鼓励；这里面有团结的旗帜，也有奋斗的目标；这里面有光明的前途，也有胜利的保证。

塔什干的会议完成了十五亿亚非人民交给亚非作家们的任务，为亚非国家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亚非人民斗争的胜利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塔什干的会议给亚非作家们指示了明确的前进道路，并且给了他们以更有效的战斗武器；塔什干的会议不仅开辟了亚非文艺复兴的光明大道，并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影响，对世界人民的斗争也有鼓舞的力量。

"塔什干精神"是二十世纪中叶一种不可阻挡的精神的主流。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旗帜将越来越普遍地飘扬在亚非两洲的天空。在站起来了的人民中间将开放出和平、团结与友谊的花朵。独立与自由的人民的智慧将在无数的文学杰作中得到最高的表现。用鲜血保卫民族的文化、打击殖民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人民，一定献出全部力量来发展他们的文化；不顾惜生命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一定热爱和平，而且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塔什干会议闭幕以后的一年中间，"塔什干精神"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广泛地推动人们前进。古巴革命的胜利就是塔什干会议以后的第一件大事。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拉丁美洲，但是它对亚非各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却起

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中国人民的继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壮大，再加上中国十年来各方面的巨大成就，这一切极其雄辩地说明一个伟大的事实：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创造出这么大、这么多的奇迹。对于正在进行艰苦斗争的亚非国家的人民，这的确是一个光辉的榜样。苏联三支火箭的上天，又一次显示了世界和平阵营的无敌的力量。人类征服宇宙的初步胜利给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无比光辉灿烂的远景；人类飞向月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了。

这一切辉煌的成就，这一切振奋人心的大喜讯，这一切无限美好的事情都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更是亚非各国人民所热烈欢迎的，它们用响亮的声音、用触目的颜色，反复说明、反复描绘一个尽人皆知的真理：

"塔什干精神"万岁！

明年秋天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将在开罗举行。不用说将有更多国家的作家参加下一次的会议，将有更多国家的辉煌成就、更多振奋人心的大喜讯、更多的无限美好的事情来迎接未来的会议，也将有文学大繁荣的新局面来表现独立、自由的新亚洲和新非洲的面貌。那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更响亮、更雄壮、更乐观的呼声（十五亿的亚非人民在为自己的胜利欢呼）：

"塔什干精神"万岁！

英　雄　赞*

这几天，在我们祖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锣鼓声响彻云霄，人们欢欢喜喜，好像在办大喜事一样。我们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刚刚过去，来自祖国各地的六千多英雄好汉又在北京聚首一堂，胜利会师。六亿五千万双眼睛在注视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六亿五千万颗心跟英雄们在一起，倾听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在群英会上活动的，不仅是几千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战线上的巨大成就和连续大跃进的奇迹，将在这个会上发射夺目光芒。今天的英雄人物，不是一个一个地出现的，他们一群一群地出现，一队一队地成长。先进的集体越来越多，先进的事迹越来越普遍。一个人民大会堂容纳不了全国的英雄模范，参加群英大会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不用说，还有更多的英雄好汉，守在工作岗位上用辉煌的胜利来支持他们，鼓舞他们。这种一马飞奔、万马奔腾，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万人一心、共同前进的伟大场面，在今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外国朋友称赞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称赞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展望》第四十四期。

们“创造了一年等于五十年的奇迹”，并不是毫无原因的。谁都看得出，这十年来，中国人民做出了数不清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就要听见你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发出来的响亮的声音了。英雄们的豪言壮语会传播到我们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激发人们最好的感情。你们是工人阶级的精华，你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你们是贯彻党的总路线的急先锋。十年来，无数移山倒海的大事情里面，哪一样没有你们的心血和精力？你们为祖国生产了巨大的财富，你们为祖国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我没法在这里列举你们的英雄事迹，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比得上人们熟悉的英雄传奇；你们的思想感情写出来，也会胜过许多激动人心的诗篇。你们跟大自然作斗争，你们征服了大自然；你们跟时间赛跑，你们让时间远远地落在后面。你们一个人可以做十几个人的工作，一年可以做完十几年的事情。对你们来说，跃进是没有止境的，潜力也是无穷无尽的。党号召你们走到哪里，你们就奔到哪里；祖国需要你们完成什么工作，你们就一定提前完成。从前，人们办不到的事，你们一定要作得好；过去只能在神话里出现的场面，你们把它带到了人间。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你们把中国人的力量表现得多么伟大，把中国人的气魄表现得多么雄伟！岂止高山低头，大河让路，在英雄们的干劲下面，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事业不能完成！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自广大祖国的各个地区，你们来自各种各样朝气蓬勃的生活，你们把全国各地大跃进的新成绩

带到北京，你们把全国人民向前飞奔的雄心带进会场。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期望，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积蓄着全国人民的力量。你们在会场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次的群英大会，不仅是先进生产者的会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要在这里会师。全国人民的愿望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们祖国的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全国人民的愿望就是让社会主义早日在中国建成。通过你们，这个愿望已经变成了行动。你们的会师将在全国掀起新的生产高潮；你们的先进经验会推广到祖国的每一个城市；你们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千千万万的人。每个人都愿意学习你们，赶上你们，跟你们一同前进。你们的崇高品质、坚强决心和冲天干劲带动着全国人民一齐前进。你们的确是党的好儿女，建设社会主义的好战士。你们将在人民大会堂里把号角吹得更响，把红旗举得更高，把队伍编得更整齐，把口号喊得更响亮，用最坚决的行动响应党发出的战斗号召，向时间发起更大的冲锋，向技术革新继续进军，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每个角落，把一九五九年远远地抛在后面。全国人民会骑着战马擂着战鼓来支援你们；会有更多更多的英雄跟你们一起作战，来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会征服时间，把它变成永远听话的奴隶；中国人民一定会把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间乐园。那么你们过去所经历的辛苦，所遭遇的困难，所贡献的劳动，都会在新中国光芒万丈的前途中，得到最大的报酬。

安息吧，靳以同志*

——在公祭靳以同志仪式上的悼词

今天各界的同志们集在这里向章靳以同志的遗体告别。我们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同志和章靳以同志长时期在一起工作，他的亲切的言谈仿佛还在我们的耳边，他的愉快的笑容仍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的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至今还使我们的心激动。对着他的遗容，我们怎么能制止悲痛的眼泪！

章靳以同志是优秀的作家，是认真、负责的编辑工作者，是文艺战线上英勇的战士。他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开始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旧社会中他因为写小说受到轻视，因为编辑文学刊物受到迫害。但是三十年来，他一直坚持文艺工作，始终不肯放下手里的一管笔，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工作仍然充满信心。他不仅给我们留下几百万字的小说和散文，他还编辑了几种出色的进步的文学杂志和文学附刊，今天好些作家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这些杂志和附刊上发表的。章靳以同志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工作者，他长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二十二期。

时期在大学担任语文教学工作，跟青年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鼓舞了不少的年轻人憎恶黑暗，走向光明。

章靳以同志一生正直诚恳，爱憎分明。三十年来他在文学道路上一直不断地前进。他从抒写个人感情，宣泄个人痛苦出发逐渐走到揭露社会病态、攻击反动统治，从向往光明出发终于找到了生活中的灯塔，找到了党。无怪乎解放以后他那么热情地参加各种工作、各种政治运动，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而且献出全部力量唱出最响亮的“心的歌”来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歌颂英雄的新中国人民，歌颂光芒万丈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的笔越来越有力，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他的感情越来越健康，他的心情越来越年轻，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今年他的入党要求被批准以后到他最后一次进医院短短的五个月中间，他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文章，歌颂大跃进，歌颂总路线，歌颂我们建国十年来辉煌的成就。我们读他的文章或者听他本人谈话，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谁也想不到他会这么快地离开了我们。

他在三十三年前发过的风湿性心脏病终于夺去了他的宝贵的生命。他自己常常说，他要战胜疾病，他要活下去。他躺在医院里病床上，常常谈的也只是编辑工作和创作计划。他那么深切地热爱新社会，他不愿意一个人冷清清地走向死亡。我们今天埋葬他的遗体，但是他的形象将永远刻印在我们的心上，他的精神要永远活在我们的中间，他一切未完的工作会有更多的人来接班、来完成，他的优秀的作品会鼓舞更多

的读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

敬爱的章靳以同志，我们还记得你那句话："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只有在我们全心全意用文艺武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只有在我们为着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向前飞奔、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你的心跟我们的心靠在一起，我们才会看到你的笑容重新在我们的眼前出现。敬爱的同志，你静静地安息吧，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了。你并没有死。你还活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你还活在我们伟大祖国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

舞剧《蝶恋花》鼓舞我们前进*

我看完大型舞剧《蝶恋花》，心里很激动，想写几句话，可是几次拿起笔又放下来。对音乐和舞蹈我都是外行，对毛主席原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和深度我也了解得太少，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舞剧。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也有我的感受。在剧场内短短的两小时里面，我的心好像经历了我们国家三十多年中间所走过的路程。我痛苦，我愤怒，我仿佛给压得透不过气，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搅动我的心。但是接着我又兴奋起来。我感到一股暖流渐渐地通过我的全身。我的心情越来越高扬，我的眼前越来越明亮，我的身体越来越轻快，我仿佛生出了一双翅膀，我的心不仅跟着烈士们飞上九重天，而且跟着烈士们的"泪雨"飞回到天安门前，听那一片欢乐的胜利的歌声，听那一曲无比庄严雄壮的《东方红》，我看见鲜红的太阳在舞台上升起的时候，我好像看见灿烂的万丈红光照遍了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最后那个雄壮而欢乐的场面把观众的心跟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那个场面所表现的虽然是十年前国庆之夜的"普天同庆"，但是它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

也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雄伟气魄，也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阔步向前的英雄气概。不用说今天的生活现实比舞台上那个场面更壮丽、更丰富得多。何况舞台上表现的还是十年前的欢乐。但是单单那个场面就足以振奋人心了。我走出剧场的时候我的眼前还亮着灿烂的红光，我的耳边还响着《东方红》的雄壮的乐声，我觉得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是莫大的幸福。

我听见人说"看这个舞剧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同意这句话。我坐在剧场里跟着舞台上的人物一起流泪，一同欢笑。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抓住了我的心。失败的悲痛和胜利的喜悦把观众的心一捏一放，观众或者静静地屏住气，或者轻快地吐一口气。烈士们的精神面貌把我们带到一个崇高的境界。从"星星之火"发展到"普天同庆"，整个舞剧把我们今天的幸福同烈士们的活动、斗争与牺牲紧紧地连在一起，因此也把我们同子孙万代的幸福连在一起。我们的幸福的确得来不易。为了它我们应当感谢为革命献身的"忠魂"。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固然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比烈士们幸福，我们能够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荣事业，但是，献身的精神仍然是非常需要的。献身的精神是建设新社会的最宝贵的材料。二十二年前烈士们点过的火炬在解放了的人民中间又燃起来。过去那几面小小的红旗却变幻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前面红色的海洋。为了纪念两位烈士种下的杨柳也已经长成了供后人乘凉的枝叶繁茂的大树。这说明烈士们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他们的精神仍然在鼓

舞我们前进。一般地说，许多场面和舞姿都很美，雄壮而有力量，我看到它们，常常不自觉地联想起今天的生活。是艺术的力量促使我把它们连起来的。从今天看“过去”，我们更容易了解烈士们崇高而丰富的思想感情。在舞台上出现的先驱者的精神面貌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所谓子孙万代幸福的意义，因此也增加了我们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整整两个小时中间我得到了艺术的享受，我更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喜欢这个舞剧，它自始至终贯串着斗志昂扬的情调。我在前面说过“压得人透不过气”的话，那是在反动派屠杀农民、革命者被处死刑，无辜的群众遭受凌辱的时候。但是，革命的队伍及时袭击了刑场，革命的火炬接着就高高地举起来了。甚至在第二幕烈士们牺牲的时候，也并不让观众有悲哀和绝望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场面很悲壮。有人说似乎处理得不够明白。我却在这里看出了“化悲痛为力量”的意义。我记得在休息的时候，听见一位著名的音乐家谈起这个舞剧，他用手比划，说这个舞剧使人掉眼泪。我没有机会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我以为他指的是观众的感动。不必说柳直荀儿子参加红军誓报父仇，连观众们也有了用行动为烈士报仇的渴望。这就是优秀艺术的感人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歌舞团演出的成功。《蝶恋花》编剧、作曲、导演、演员同志们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他们谦虚地说这是尝试，我祝贺他们在第一次的尝试中就取得了这么出色的成就。

一九六〇年

愿和你们分享快乐*

在台湾的朋友们：

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刚刚过去，一九六〇年的元旦又将届临了。回想庆祝建国十周年前夕，我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士对台湾军民同胞的广播大会，在这个会上，各界著名人士或者用热情的语言和生动的事实，或者用优秀的表演和动人的歌唱，说明了我们伟大祖国十年来的辉煌成就，描绘出上海社会的崭新面貌。从这些精彩的节目中，你们一定能够体会到祖国大陆各地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和祖国人民对你们悬念、关怀的深厚感情。大会进行了将近五个小时，我坐在观众席中跟舞台上著名演员们一同欢笑，一同歌唱。节目完毕我走出会场以后，一连几天我的耳边还响着那些衷心愉快的歌声。我想到远在台湾的你们，想到你们过的那些黯淡无光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把我的怀念之情写在纸上，让你们也分享到我这种节日的欢乐。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香港《文汇报》。

创造奇迹的“聚宝盆”

一挥笔，我就觉得纸太短话太多。我要让你们分享我的欢乐。可是我怎么能把十年来在我们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来在我们祖国出现的移山倒海的奇迹完全写在纸上？我即使为你们写下一百万字的大书，也写不尽这十年中间的新人新事。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话有丝毫的夸张，凡回大陆参观访问过祖国的同胞，就明白真实比描写更美丽。新社会就是创造奇迹的“聚宝盆”。你们过去饱尝了辛酸，受尽了雨淋日晒、风吹霜冻。你们过去看够了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外国军人在上海马路上任意打人，现在的台湾仍然有美国人骑在你们的头上，所以你们体会不到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我们到处受欢迎

我在这里以事实告诉大家，你们朝夕想望的出头的日子早已在祖国大陆实现。请允许我在这里回忆一段往事：一九三五年我住在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宿舍，几个便衣侦探半夜里推门而入，无缘无故地把我带进拘留所关到第二天傍晚；一九四〇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经过越南，看见很多的同胞在海关横遭帝国主义官员的欺凌。这都是解放前的事情。但是解放十年来，我出国八次，到过六个国家。也曾在上海的家里接待

过不少的外国朋友，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被当作最亲爱的弟兄和最尊敬的客人；在民族独立的国家里我们被那里爱好和平的各阶层人士尊为上宾；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我们普遍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祖国的工农业产品销行世界各国，好些国家的人民都喜欢购买我们的货物，我们出国的艺术家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争先恐后的欢迎。我们青年运动员接连地突破了世界纪录，我们的文学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北京城成了各国人士景仰的世界名都，人们都以到新中国作客为无上光荣。所有出国的代表团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外国人对中国的歌颂

美国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博士今年九十一岁了。半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们夫妇。他谈起二十九年前他到过上海，还记得外滩的面貌，可是现在他找不到那个地方了。三年前一位德国小说家到上海访问，要求看看外滩，再到酒吧间去耽搁两个钟头，他早想好了一篇小说的开场，他预想的题材是：外国轮船停在外滩的码头，一个水手哼着小曲到酒吧间去找寻他认识的那位年轻姑娘。可是小说家到外滩走了一转，又到从前酒吧间所在的那些街道去找了一阵，不但酒吧间没有了，连街道也变了，过去又肮脏又吵闹、流氓打架、干不正当营生的外滩，现在也变成了风光如画的江滨公园。结果，小说家只好放弃了旧的题材；改写今天的上海。我不知道德国小

说家的新小说是否已经脱稿。可是我最近读到了杜波依斯博士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他这样说："六十七年前我到欧洲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我已经游览了地球上的广大地区。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像一九五九年的中国那样使我惊奇，使我感动。……我从未见过像我在今天的中国所见到的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多么热心地追求科学知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大地战胜了人类的贪婪、嫉妒和自私。"他最后说："我曾经十五次横渡大西洋，一次渡过太平洋。我见识过世界，可是我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而灿烂的奇迹。"一位从西德来的客人、《另外报》的主编葛莱斯贝格也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在中国看到了奇迹》，说："我在上海没有看到一只苍蝇。我在广州曾在很拥挤的小巷中走过，袋里的东西也没有遗失；我到过上海的街道，没有遇到肮脏和臭气。"他结论似地说："我懂得了对中国人民说来'解放'的意义不止是政治领导的改变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的结束，而且是摆脱了千百年来像重病一样压在他们身上的灾难。"

做一个中国人真值得骄傲

从这些文章中你们可以了解新中国今天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十年来，我们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外宾，各种各样的客人从我们这里带走了难忘的印象，对我们的成就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有些人甚至争取重来的机会，有些人惋惜访问的时间太短，更多的人热诚地爱上了我们的国家。

前些日子，我听见一位从印度尼西亚回来观光的侨胞说："我盼望了多少年，头发都盼望白了，总算亲眼见到了。今天做一个中国人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说得多么好，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他这句话有多么深的意思：做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让我们的笔尖上开出友谊的花朵*

——给波列伏依的回信

夜渐渐地静了。可是我的心还不能平静，好像这一天里的见闻都抢先要在我的心上刻下磨洗不掉的迹印。它们那么强烈地搅动着我的心。我的心热得发烫，甚至在寒冷的夜里我也有一种在十分暖和的阳光下面的感觉。好些时候来我就是这样。我多么高兴，我生活在这个一年都是春天的英雄时代；我多么高兴，我生活在这个强大、富裕、友好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间。

今天我仔细地读了你给我的回信，保利斯·尼可拉耶维奇，你可以想象到我的激动。你的热情的语言像火一样使我的心燃烧。你的友情透过纸背在我的房间里发热放光。这是一九五九年的最后一夜，不，最后的半个钟头了。我刚在信笺上落笔的时候，就仿佛听见一九六○年飞奔而来的声音。我放下笔倾听，我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使得整个楼房里的空气震动，我甚至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这并不是我的幻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年二月一日《峨嵋》二月号。

我知道你一定也受到这个力量的推动。不单是你和我，一九六〇年正以无比雄伟的气势推动着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

我觉得雄伟这个形容词用在这里还显得苍白无力。单单拿就要过去了的一九五九年来说，我们作家即使用尽了伟大、美丽的字眼，也难描写出这个英雄时代的真实面貌，也难说明我们两个国家一年来的辉煌成就。从前人们常常说文学落后于现实。今天连语言和文字也赶不上劳动人民的创造一切的手和集体智慧了。我给你那封信发表后八、九个月中间，在你们那里出现了很多反映当前现实的优秀作品，在我们这里也有了不少的好文章。这些作品用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教育了读者，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热情，也鼓舞了人们前进的勇气。但是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向前迈进的惊天动地的场面和气概在这些作品里还不曾得到充分的反映。(你一定看过了影片《风从东方来》，苏联专家和中国工人手挽手立在江中筑成一道人墙，挡住了波涛汹涌的洪水，这个场面多么真实，多么使人感动。但是可惜这样的影片还不多！)一九五九年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跃进的一年，也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一年。在我们中苏两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出现了无限光辉、无比壮丽的春天。我们作家的笔还来不及把这个春天好好地记录在纸上，另一个更光辉、更壮丽的春天马上就要来叩门了。时代在推动我们，时代在逼我们。它不会停下来等候我们赶上去。它要拉住我们往前跑。前面是一片光辉灿烂、万紫千红。我们越是往前跑，越是觉得浑身轻快。我们越是往前跑，越是觉得美景无穷。我们两个国家

的前途越来越光明，我们人民的创造力越来越旺盛，我们周围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的英雄人物也越来越多，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地产生，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这一切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超过了不知若干倍。而站在我们面前的一九六〇年也不是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所能看得尽，更不是我们用今天常用的字眼所能解释明白的。

其实，不单是我们自己，不单是我们的朋友对一九六〇年无限壮丽的远景，可以发表许多许多伟大的预言，连我们的敌人也惊惊惶惶地在那里叽叽喳喳，自问自答：在新的一年内苏联大概要发射火星火箭和金星火箭吧？苏联的七年计划要再提前若干时候完成吧？中国又会有一个全面的更大跃进吧？人民公社会更加巩固而且有更大的发展吧？西方的高等绅士和流氓政客担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们在举杯迎接新岁的时候，也不会有衷心愉快的笑容。而在我们两国的首都，在庄严雄伟的克里姆林宫和人民大会堂中举行的新年联欢会上将会充满胜利的欢乐气氛。在西方世界里人们常常只能祝望新来的一年不要比过去的更坏。可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却满怀信心地欢庆已经得到的胜利，而且预祝今后更大的胜利。我们的确是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我们两个国家像两个胜利的巨人，肩并着肩，沐着阳光，大踏步向无限光明的前途走过去。单是这两个光芒四射的巨大身影就可以吓倒那些在角落里唧唧哝哝的鬼怪了。这一年中间我们两国的亲密团结与友好合作，我们两国在各方面的巨大成就都是他们所共睹的。用不着为他们开一个展览会，只要提起苏联的三支宇宙火箭，就使

战争贩子们胆寒；中国的大跃进也叫高等绅士们睡不安枕。可是在我们这里，六亿五千万人没有例外地为苏联的每一支宇宙火箭鼓掌欢呼，七年计划的辉煌成就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欢乐和鼓舞。而我们的震惊世界的大跃进里也少不了苏联老大哥的无私的帮助。……中苏两国的亲密合作与兄弟友谊不仅给我们两国带来繁荣昌盛，不仅保证了两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且也保卫了世界的和平。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听见一九六〇年的响亮的叩门声吧。在我从容落笔的时候，一九五九年的最后半个钟头早已悄悄地过去，一九六〇年的雄壮的歌声也开始飞上云霄。在你们那里，还只有七点多钟，正是灯火辉煌的时候。我好像看见高尔基大街上车水马龙的盛况。我好像看见红场上百货大楼里熙熙攘攘的节日景象。我好像看见盛装的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戏院、剧场。我好像看见你住的那个公寓前面院子里的积雪。你可能正在某一个宴会上举杯庆祝过去一年的丰收；你可能正在酒会中滔滔不绝地谈一些振奋人心的最近见闻或未来计划；你也可能在你那个和睦的家庭中同你的裘丽亚和十四岁的阿略沙欢度佳节。我仿佛也分享到你们的欢乐，我也可以说，我有了两倍的欢乐。正像我在两年前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两倍的手，两倍的脑子，两倍的力量，因为我们有着像苏联人这样的朋友，永远鼓舞、帮助我们前进的朋友，因为我们两国人民的身上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因为我们两国人民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

的确，再没有比这种友谊，比我们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更值得歌唱的了。你刚刚在信里讲过了你的新中国三千里的旅行，我又在对你描写我的莫斯科的印象。你刚刚对我谈过苏联读者如何关心中国的一切，我也想让你知道这里淮海中路的画廊前观众经常不断，从苏联来的每一张图片都吸引了上海人的心。我还想告诉你，人们踊跃地参加中苏友谊馆的各种活动，取得更多的关于苏联的知识。两个半月前我曾陪着尼·吉洪诺夫在这里参加中苏友协积极分子的集会，参观过这里的陈列馆和图书室。吉洪诺夫大概向你讲过这里工作人员创造性的设计和上海青年学生与工人对苏联的热爱吧。你一定想起你的上海的经验。但是吉洪诺夫见到的上海已经不是三年前的上海了。上海和我们两个国家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它的面貌天天在改变而且越来越大。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上，在文化教育上，在市政建设上，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甚至在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上，上海都向前跨了一大步。你常说你要重游中国，再来上海。你喜欢扬子江就像喜欢伏尔加河一样。倘使我能够陪你到各处走一转，你一定会为这几年的大变化而感到惊喜。而且你一定会注意到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那就是我所屡次谈到的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的不断发展。你会在我们每一个成就和每一个胜利上看到这种友谊，你会在每一个人的快乐的笑容上看到这种友谊，正如我在苏联的任何地方访问都好像生活在友爱的家庭里一样。不用说，这种友谊已经在我们两国广大的土地上开遍了美丽的花朵。不用说，这种友谊是写不尽绘不完的。我感谢你的诺言，也感谢你的

鼓励：用我们的笔为这种可以传之子孙万代的友谊写下诗篇，留下记录。用这种取之不尽的题材一定会产生激动人心的发光的艺术品。这样的艺术品不仅能激发人们身上最美好的感情，而且有鼓舞读者、教育读者的力量。这样的艺术品由友谊产生，它们又会给友谊涂上光彩。我欢迎你的建议，我接受你的建议。我还要重复我在上一封信里说过的话："这是我们两国作家共同的责任。"我愿意参加这个竞赛，虽然我明知道你一定占先，因为你是世界闻名的快手，你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但是我想起了我们的一句俗话："众人拾柴火焰高"，多一支笔多一分力量。希望这个竞赛尽量地扩大，让我们两国所有的作家都为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尽一分力吧……。

一九六〇年的鲜红的太阳已经升在上海的天空，整个城市好像披上了光辉夺目的金纱一样。在莫斯科一九六〇年的阳光也开始在克里姆林宫钟楼的尖顶上照耀了。看见我的孩子在阳光下面跳荡，我就想起你的阿略沙，我就想起用欢笑迎接新年的苏联孩子。让我紧紧握着你的手，让我的孩子紧紧握着阿略沙的手。我相信这样的握手也会继续到子孙万代的。今天我们互相祝贺，不仅像我们每年互寄贺年片那样，祝彼此新年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还要互祝在竞赛中获得胜利。

亲爱的朋友，你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一九六〇年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十周年，一个半月以后两国人民就要热烈地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人们会回忆十年来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会展览出开得最鲜

艳的友谊的花朵，会接待自己最好的朋友，会唱出最热情的赞歌《莫斯科—北京》，会感觉到心连心携手前进的最大幸福。每个人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加深两国人民间相互的了解，加强相互的尊重，加强相互的爱；每个人都会用最响亮的声音歌唱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友谊。让我们的竞赛就从这个节日开始，让我们两国作家的笔尖上都开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中苏友谊的花！让共产主义的阳光使这无数友谊的花开得特别鲜艳！让我再一次紧紧地握你的手，亲爱的、亲近的朋友！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形容词："近"，我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的确靠得多么近，好像你就站在我的身旁一样，我多么高兴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你！

1960年1月1日，上海。

谈《上海英雄交响曲》*

读了您的信，我倒不知道应该谈些什么了。《上海英雄交响曲》的观众是那样地多。许多人用热烈的语调称赞它，许多人看了它得到了鼓励和教育；有人把它当作"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本"，有人认为它是"英雄时代的诗和政论"。您说："从样片到完成片，已看了不下六七遍，每回都是激动得浑身增加了新的力量。"可见您比我更熟习这部影片。这部片子我只看过三次，头两次还是没有剪接好的毛片。的确我也很喜欢它，而且我从它那里得到了不少的东西。说实话，我对于机器完全是个外行，平日参观工厂的机会并不多，自己对机器的知识也很有限。但是这部片子的每个镜头都不使我感到陌生；不单是人，连机器也显得非常亲切。机器跟人配合得真好。人在机器旁边工作，更显得生龙活虎。在这部影片里，机器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机器活了，操纵机器的人也更活了。机器不管多么庞大，怎样奇形怪状，可是在人的手里它们却变得多么渺小，何等驯服听话。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机器，在这里更具体地、更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工人阶级智慧和力量的伟大。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大众电影》第三期。

就是“机器的诗”。影片中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镜头：“榔头一响震天下。”我至今还仿佛听见那么响亮的“镗”的一声。那一击多么有力量，真有惊天动地的气概，真是振奋人心的一击！这种力量贯串着整部片子。好几千尺的影片中容纳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其中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可以作为一部故事片的题材，可是影片把千头万绪组织在一起，却首尾连贯、条理分明，好像是一气呵成。

整部影片从头到尾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的确配得上《英雄交响曲》这个好名称，而且每个镜头都有吸引人的力量。不用说，最吸引观众的还是人，就是大家都熟习的那几十个英雄人物。这些人的相貌和服装都很寻常，身心却是那么健康，心灵是那么丰富，思想是那么崇高。然而他们并不是单单使人崇拜的高不可攀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的思想感情，用他们的英雄气概来感染、来推动每一个观众。英雄们并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人物，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你追我赶、我帮你拉、大家一起向前，甚至带动集体一同前进。我看影片，越看下去越兴奋，也越觉得精神爽快。可是我回到家里却不能不想那些人和那些事，孟德和、曹慧菊、裔式娟、倪海宝、孔林根、夏川祥、陈灿芝……的异常鲜明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他们逼着我多想，逼着我拿自己跟他们相比，这一比叫我连觉也睡不好了，岂止红脸而已！这么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推动我，我怎么能够始终赖在后面呢？

我第三次看影片，还是半个月以前的事。可是我至今仍然感觉到它在推动我。其实在这里用“鞭策”两个字倒更适当

些。一般地说，受到鞭策并不是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却有衷心愉快的感觉。整个国家大踏步飞跃前进，中国人民步伐一致地向着锦绣前程飞奔，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整个社会都是一片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我天天看到惊天动地的变化，时时接触到创造奇迹的先进人物，我怎么不体会到生活在这个英雄时代的无上幸福！我受到了鞭策倘使能前进一步，跟英雄们的距离也就会缩短一步。这样的事想起来都叫人兴奋。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以后了。可是我坐在写字台前仿佛还看见孟德和在填写关于技术革新的报表，倪海宝在练接头，裔式娟小组在学《矛盾论》，曹慧菊把自己操作的机器让给孔自力，孔林根向着喷火舌的转炉奔去。……这许许多多英雄事迹显得多么朴素，多么可爱，又多么惊人！我想到它们就觉得整个房间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我也感觉到像您所说的"浑身增加了新的力量"了。我好像听见了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无比雄壮的歌声。我仿佛看见了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的一片红光。我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在上海，在全国，千千万万的英雄们骑着战马，擂着战鼓，唱着战歌，冲锋陷阵，向时间夺取一分一秒，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功效劳。我的血也在沸腾，我的心也在燃烧。我不能够孤零零落在后面。我也要前进，跟着英雄们前进。这不会是我一个人的感受，看了影片的观众们都应当有这样的感受吧。

《交响曲》就是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胜利凯歌，它也是一九六〇年更大跃进的序曲。它是时代的记录，它又是热情的

颂歌。它忠实地记录下过去一年的辉煌成就，它又展示了无比光辉的未来远景。它不仅是大跃进的英雄赞歌，它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优秀果实。的确，这部片子是上海市委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大协作的产物，您一定同意我这个说法。影片的"插曲"中有两首民歌，解说词和朗诵诗内有不少工人的语言。定场诗里也有工人业余作者和青年诗人激动人心的诗句。我虽然挂了一个"文学顾问"的名义，其实我出力最少。因为我出力最少，我才可以毫无顾虑说出我心里的称赞话。虽然我出力最少，我却得益很大。我多少知道一点这部片子拍摄的经过，也了解一点天马厂好几位编导和摄影同志为它花费了多少心血。我不敢分享他们的胜利的喜悦，我却愿意预祝他们像黄宗英同志所说的那样："再接再厉，深入生活，投入现实斗争，反映英雄的时代、时代的英雄。"

《上海英雄交响曲》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始，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今年一定会看到更多的、更好的大型纪录片。

1月14日深夜。

中苏友谊　万古长青*

前些时候我在中苏两国合拍的影片《风从东方来》上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场面：苏联专家和中国工人手挽手肩并肩立在江中，筑成一道人墙，挡住了波涛汹涌的洪水。这是一幅多么真实的图画！十年来谁没有见过这一类的场面？谁不曾有过这样的感受？我自己也曾想象过另一个伟大的场面：两个胜利的巨人肩并着肩、沐着阳光、大踏步向无限光辉的前途走去。要说明中苏两国人民的永恒的友谊，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不同场面和生动的事例。两年前我们谈过新疆聂银初拉着铁索过江、抢救苏联女专家斯捷潘诺娃生命的事迹，最近大家又在谈论赤塔洛玛诺夫厂长为中国女英雄徐学惠安装假手的事情。最近的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两个感动人的消息：一位苏联母亲感谢中国朋友救活她的儿子；两个苏联姑娘的皮肤救了中国男孩的生命。像这样可歌可泣的事早已不是罕见的了。我们用不着亲眼看见徐学惠那双"中苏友谊之手"，我们已经看到了她用友谊之手写下的字："中苏友谊，万古长青"。不用说，她以后还会用它写出无数的字。可是这八个字就像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天上的明星一样放射不灭的光辉。

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对徐学惠所说的"深情厚谊"有过很深的体会。我说过，在苏联我好像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几次我真愿意把我的心挖出来，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感情。在那些时候我明明觉得自己的心发热，自己的声音发抖，仿佛有那么多的感情要从我的身上迸出来一样。一年多以前在塔什干老诗人古良姆家的饭厅里，我们和热情的主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令人毕生难忘的欢乐的夜晚。老诗人激动得讲话也吃力了，他接连地说："我的家就是你们每个人的家，我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打开着。"在塔什干，在基辅，在莫斯科，都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古良姆的家里和在考涅楚克与波列伏依的家里一样，我留下我的一部分的心，也带走了又深又浓的友情。

今天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多么符合八亿五千万人民的愿望！）签订十周年的前夕，我呼吸着早来的春天的气息，我又想到了我的塔什干的家，基辅的家和莫斯科的家，想到那无数鼓舞我们、帮助我们前进的苏联朋友，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了两倍的力量。我的手边放着最近收到的波列伏依的《中国三万里》的新版，他在里封上又提到竞赛的话，因为我们曾经反复地谈过中苏两国作家共同的责任：为这种可以传到子孙万代的友谊写出伟大的诗篇，他建议来一个竞赛，让大家拿起笔多写。多一支笔就多一份力量，何况"莫斯科—北京"两个首都的名字连在一起，已经产生了而且还在产生无穷无尽激动人心的故事。我们究竟把它们记录下来多少？为

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日益巩固、日益发展的中苏友谊，难道还有比它更能鼓舞人、更能教育人的题材？波列伏依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不仅像热爱苏联那样热爱中国，他不仅出版了热情洋溢的歌颂中国的书，他还准备再来、三来北京和上海，写出描绘中国大跃进面貌的第二本、第三本书。我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怀着度节日的心情，我想起了莫斯科那个公寓门前的积雪，我多么希望波列伏依能够来到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北京和上海，看到中国人民创造的不断跃进的奇迹，用他的热情奔放的笔写出中国人民移山填海的英雄气概，记下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深情热爱。我又想起了考涅楚克家发出金属声音的刻花玻璃高脚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基辅的黄昏，我们和《前线》的剧作家与《虹》的作者不知道碰了多少次杯。殷勤的主人笑着说："杯子碰得越响，友情越深。"他们夫妇常常说："一定要再去中国。"考涅楚克和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常常回忆一九五五年的中国旅行。他们忘不了那些地方和那些人。其实人和地方都已经换上了新的面貌，他们有一天再来中国，可能不认识那些地方，他们一定会因为那些巨大的变化而感到惊奇和高兴。但是他们会发现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中国人对苏联朋友的深厚友情，它越来越加深、加浓、加强。

乌兹别克的老诗人加富尔·古良姆一定会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一生未到过中国，可是他对第一次见面的新中国的客人表现了那么高的热情。他激动地望着我们，含着眼泪结结巴巴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呢？你们为什么不常来呢？你们

为什么不多住些时候呢?"在饭桌上一共有几个亚洲国家的客人，他却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好?"他的"学生"塔玛拉·哈依一定对他讲了不少访问中国的动人故事吧。饭厅里有丰盛的酒菜，院子里响着唢呐的声音，老诗人戴着乌兹别克小帽，一只手按住胸口，默默地对我们深深鞠躬。人民演员塔玛拉·哈依垂着两根大辫子，穿着有小背心的民族服装，邀请客人一起跳民族舞蹈。唢呐声使我回想起过去在中国办喜事的情景。中国人在苏联人家作客，或者苏联人在中国人家作客，这的确是一件大喜事。分别的时候老诗人说:"我会长久地想着你们，你们的声音和笑容还留在我的家里……"我至今还好像听见老诗人和女演员的声音，看见他们的笑容。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心连心的温暖。在那个充满阳光的城市里，在那个用东方的音乐和舞蹈装饰得无限美丽的院子里，老诗人古良姆将坐在葡萄架下铺着床毯和坐垫的大方床上，弹着乌兹别克的弦琴，唱出他最热情的新诗，来迎接两国人民的共同节日吧。我多么怀念他!

我的见闻和感受是写不完的。我自己常常说，我在苏联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苏联找到无数的家。跟苏联朋友在一起，我不仅感到心情舒畅，我还觉得充满了勇气和信心。我好像有了两倍的手，两倍的智慧，两倍的力量。不单是在苏联，在别的国家中，我们跟苏联同志见面，也仿佛见到了亲爱的弟兄。四年前我和周立波跟费定和瓦·科热夫尼科夫几个人同住在柏林一家旅馆里，快要分别的时候，他们约我们聚餐联欢。大家不断地碰杯，为

我们两国各方面辉煌的成就、文学事业的繁荣和领袖们的健康干杯，毫无拘束地畅谈种种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一直谈到深夜两点钟；我们离开餐厅，还到房间里谈起彼此回国后的情况。苏联朋友关心我们的事业就像关心自己的事业。在任何国际性的会议上中苏两国的代表友爱团结、互相支持，好像携手前进的兄弟一样。

作为作家，我常常收到苏联读者的来信，他们亲切、热情的语言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当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范围的时候，有一位苏联读者写信来说，万一美帝胆敢发动战争，他要像保卫自己的祖国似地保卫中国。我相信苏联的作家一定接到了更多的中国读者披肝沥胆的信函，多年来苏联文学就是中国读者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中国的读者不仅熟悉苏联的文学作品，而且从它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要说明中苏两国人民中间的深情厚谊，例子是举不完的，而且也用不着多举了。我又想到了徐学惠写的那八个字。固然，十年来谁不曾写过、说过那八个字！可是徐学惠用“中苏友谊之手”写的八个字却有着更丰富的内容。徐学惠一定会为共产主义做许多工作，洛玛诺夫也一定会为共产主义做许多工作。他们的工作成绩将会留到子孙万代。他们的友谊也会传到子孙万代。两个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携手前进，这样的场面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两个伟大国家的全体人民正向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进。八亿五千万人民团结得像一个整体，八亿五千万颗心团结成一条心，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象，这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和苏联人筑成的人墙战胜了洪水；两个胜利的巨人前进的脚步使得垂死的旧世界地动山摇。中苏人民的团结力量会给全世界争取到真正的和平，会不断地创造惊天动地的奇迹，会在我们广大辽阔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

王林鹤同志*

我从来没有见过王林鹤同志，在一个多月前我才听见人谈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去看看他在那里作工的“弄堂小厂”，我仿佛记得一年半以前我常常走过它的门前。可惜我记错了地方，我走了一大段路，始终找不到那个飞出“金凤凰”来的“草窝”。然而我也并非白白地出了一身汗，一路上我都在想王林鹤同志的事情。

沪光科学仪器厂的二十九岁青年工人王林鹤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经过三百七十一次的试验，终于制成了一万伏的高压电桥，他的先进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上海。报纸上刊出了他的照片，广播电台的节目里有他的讲话。看相貌，他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健康，乐观，志气大，勇气大，信心足，干劲足。这种可爱的年轻人在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有，大家都见过不少，所以我看见王林鹤同志的照片，读到谈他的事迹的文章，会有一种见到熟人的感觉。

王林鹤同志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照过去的说法，他确实缺少攻尖端、攀高峰的任何条件。可是他有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三月一日《上海文学》三月号。

志、有决心，他不怕困难，又有坚持下去的毅力，而且非常急切地想看见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早日改变。十年来祖国各项建设上辉煌的成就给了他多么大的鼓舞，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大批涌现的英雄人物给了他多么大的勇气；厂里的党组织给了他多少的鼓励和支持，周围的同志们关心他的工作，不断地给他帮助。他要在那个由客堂间改成的车间里制造中国从来不曾生产过的高级精密的产品。祖国的建设事业那么迫切地需要一万伏和一万伏以上的高压电桥，单靠外国进口已经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了，从全国各地送来雪片似的订货的信函和电报，还有些认真负责的采购员远迢迢地来到上海热切地要求工人同志的支援。整个国家在前进，生活在沸腾，在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发出胜利的捷报。奇迹接连不断地产生，工业战线上一个个的空白都被填满。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有的，现在更多、更精了。过去不开花的，现在不但开花，而且结了丰美的果实。人人都在贡献力量来装饰自己心爱的祖国。沪光厂的工人当然不是例外。王林鹤同志当然不是例外。他跟一切有志气的工人一样，早就下定决心：国家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党指向哪里，就跑到哪里；市委号召上海工业进一步向高、大、精、尖的方向发展，就大搞技术革新，猛攻尖端。对于全国各地的迫切要求他们更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可是制造高压电桥，从哪里着手呢？他们没有图样，没有样品，没有材料。工厂里也没有制造精密仪器所需要的那种自动调节温度、湿度、控制光线和防尘的现代化设备。然而这一切的困难都改变不了英雄

的决心。党支部书记的鼓励给了王林鹤同志无限的温暖："人家能够做，我们也一定能够做。有什么困难，要什么材料，就提出来，依靠党、依靠群众一起来解决！"王林鹤同志深深地感觉到有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在支持他。他毫不迟疑地开始了战斗。他知道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他充满了信心。他决不是一个走捷径的人，他不仅能苦干，他也懂得实干和巧干。他不会想只花一天的功夫就登上高峰，他脚踏实地迈步前进，勤苦钻研，克服困难。他向老师傅请教，向同志们请教，向书本请教。他学会了念英文书、日文书，后来又开始念俄文书。他一空下来就到书店，到图书馆。每天不论工作怎样忙，他回到家总要拿起书看上一两小时。他翻读了四个国家出版的六十四本有关的书籍，最后才在一本书里看到三页关于高压电桥的材料。他反复研究，才想通了一点道理，总算心里有点数了。他就在这个基础上边学习、边创造，有时还到别的工厂（上海电表厂）去讨教。他花了多少个夜晚，终于把这台有两千多个零件的仪器的草图画成了。接着在领导的支持和全厂同志的帮助下正式开始了试制的工作。他试一次，失败一次。没有材料，他就找代用品。为了解决高级绝缘材料的代用品，他翻读了一本本的参考书。同志们还设法到苏州、杭州和别处去替他找寻材料。材料的供给愈来愈困难。失败到第九十次，他有点灰心，有点动摇了。但是跟党支部书记谈话以后，他又兴奋起来。不管接着来的还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他仍然热情地继续工作，勤学苦钻，想尽办法。有一次夜深他下班回家，在公共汽车上一直想他的试验，下车时差一点把衣服都

忘在车上了。又有一次他领到工资就跑到外文书店，花去大半买了一本外文书，只为了想得到一点启发和帮助。还有一次他病倒了，发着高烧，到医院去也不曾忘记带一本书，在医院里他仍然考虑高压电桥的问题。再有一次他听说宜兴陶瓷的绝缘性能好，连家里也不通知，就匆忙地搭火车去宜兴，一路上冒着雨摔着跤走到窑场，天已经快亮了。他拿到材料回上海，下了火车也不回家，马上就到工厂去进行试验。

王林鹤同志就这样地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一直记住党支部书记对他说过的话："年轻人要有志气，不要怕失败，失败了再来。"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回答："决不向困难低头。"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年轻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就是再试一千次，也要攻下这一关。"他的确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倒是困难向他低头了。他并不曾得到再试一千次的机会，他只试到三百七十一次就成功了。一万伏的高压电桥居然在一个"弄堂小厂"里正式生产了，而且已经有两百多台运到了各地。最近王林鹤同志的那个小组又试制成功了五万伏的高压电桥。……

我在那一段时间里所想的并不止这么一点。我的思想比我的笔跑得快！而且我即使用十倍多的文字，也写不尽三百七十一次艰苦的战斗，也绘不全王林鹤同志为祖国为人民立下的雄心大志和他那不屈不挠攀登高峰的英雄气概。他攻下了尖端，登上了高峰，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给一代青年树立了敢想敢做猛冲猛闯的光辉榜样。他获得了"红旗青年突击手"的光荣称号，他的先进思想和事迹

在各处传播，他的创造革新鼓舞了千万人的劳动热情和前进的勇气。学习王林鹤，追赶王林鹤，超过王林鹤，已经成为上海青年的响亮的口号了。在最近一个“猛赶王林鹤、杨新富、李素兰”的会上，青年们接连地走上讲台吐出一定要超过王林鹤的豪言壮语，一个要把兔子养得跟狗一样大的红领巾小姑娘也信心十足地表示一定要超过“王林鹤大哥哥”。这是我们这个英雄时代的青年的声音。有着共产主义风格的年轻人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另一个“红旗青年突击手”杨新富同志不就是受到王林鹤同志先进事迹的激励和启发的吗？他不就是学习王林鹤同志而且赶上了王林鹤同志的吗？

王林鹤同志一定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坐在主席台上用那么愉快的笑容来回答每一个年轻同志的“挑战”。他听到宣布“红旗青年突击手”的数目已经从三位增加到三十一位并且还增加了二十五个“红旗青年突击队”的先进集体，他的健康的脸上闪耀着多么动人的胜利的光彩。他的确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赶上了他，还有更多的人表示要超过他而万分高兴。他看见我们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在繁荣！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景象：鲜红的太阳升上东方的天空，蓝天下一片灿烂的金光，一个人骑一匹马举一面红旗向金光飞奔，接着无数的人无数的马无数的红旗奔腾上前，你追我赶，你拉我推，你呼我应，最后并骑前进。金光下漫天红旗迎风招展，欢乐的凯歌响彻云霄。

那时候王林鹤同志的响亮的声音已经溶化在六亿五千万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胜利歌声中了。

箇旧的春天*

我离开箇旧市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老阴山的上空，金湖给照得像一大片发光的明珠，云锡公司的大楼庄严地立在湖的那一面，车子开出金湖宾馆，沿着门前的马路往左驶去，春天的风吹拂着路旁的幼树，也吹进开着的车窗抚我的乱发。我不停地掉头朝两边看。左面山坡上高高低低一幢一幢土红色和灰色的三层楼房吸引着我的眼光。它们都是工人的宿舍，右面公路旁好些年轻的男女工人在那里劳动，两三声笑语送到我的耳里显得多么亲切。车子继续地往前走，我的心却不愿意跟着它前进。我惋惜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刚刚爱上了这个地方，怎么能毫无留恋地离开呢？

我的心又回到我住了六个晚上的金湖宾馆。喷水池畔石栏杆上那些盆景仍然用它们独特的姿态欢迎我，每一层楼上挂着浅红色窗帷的玻璃窗好像在对我微笑。谁想得到这座现代化的漂亮的洋楼是在乱坟堆上出现的呢？一位老工人告诉我，解放前只有带枪的人才敢在晚上走过这个地方。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我在三十年前听到的故事。那个时候别人对我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三期。

“外地人要是到了死城，就休想活着出来。”现在我亲眼见到的却是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崭新城市。过去人们称这个世界闻名的锡都做死城，因为二十世纪的人间地狱就在箇旧的矿山上。今天谁也看不到戴脚镣、穿麻布衣裤、背塃包的砂丁了。连那些浸透砂丁们血汗的“蛇洞”也全垮了。我跑了两天，问来问去，才在两个地方看到老洞的遗迹。第一个在老厂竖井地底下两百米的大坑道里面，铁轨旁洞壁上有一个小洞眼，工人同志们帮忙我爬到那里，用煤石灯照着往上看，洞子已经封住了，但是我还可以想见童工们背着塃包从这里爬上去的景象。另一个在公私合营的建设坑，这个洞子已经废弃了，现在这一带是露天采矿。洞子虽然完整地保留着，但也不是旧日的面目了，老工人对我解释，解放后至少加宽、加高了三分之一，不用说，木头架也早换过了。在从前除了童工外，人们只能爬进爬出。

只有在这个公私合营的露天矿上我还看到旧时代的一些痕迹。老厂厂长笑着对我说：“你幸好这个时候来一趟，再迟半年你连这些东西都看不见了。”这个矿现在由老厂代管，老厂已经拟好计划，要在年底以前消灭手工操作和笨重的体力劳动。明年我再到这里就看不到人们在露天用鹤嘴锄挖土，或者躲在棚里泼水选矿，也看不到一匹马推一个磨的土磨群了。其实这土磨群也是近几年中的改革，在从前豪绅矿警称霸作恶的日子里，这种马干的笨活也是由砂丁做的。一位十多岁就来箇旧当童工下矿背塃的老工人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只晓得自己是砂丁、红脚杆、扛月活的，根本不晓得自己是工人。”“蛇

洞”的生活并不曾毁掉他的健康，如今他不但作了先进工作者、当了矿长，而且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要上北京开会去了。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老厂的招待所。我刚从矿井回来，脱下矿工的衣服和胶鞋，洗了脸走进客厅，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到饭厅吃饭，他一边吃一边谈话，讲起过去的日子，他的眼圈都红了。……这天傍晚我回到金湖宾馆，矿长比我先到，他第二天要动身上昆明去准备发言稿，我们在会议室里握了手，我看见他坐在沙发上注意地听别人谈话（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昆明航空站候机室里一张长沙发上，一边拿着粗粗的竹烟筒抽烟，一边看朋友们打百分，他笑得那么愉快。这是我离开云南的那个早晨的事，也就是我同他在個旧见面以后六天的事情了）。

汽车不停地在蜿蜒的公路上奔驰，我的思想仍然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徘徊。二十八年前我曾经根据一位朋友的叙述加上我个人大胆的想象在中篇小说《砂丁》里描写了这个两座大山中间的城市。那个时候除了“死城”外，我也想不到别的适当的称呼，我更想不到我后来会用“美丽”这个形容词加到它上面。那个时候这里没有花，没有笑，没有在阳光下灿烂发光的金湖，没有平坦的马路，没有漂亮的高楼，更没有心情舒畅的歌声和笑声。有的只是谋杀、剥削和抢夺……。在那个有树有花的文化馆里，台阶上有一间“矿工今昔展览室”。我在这个房间里停留了一个多钟头。我感到痛苦，感到愤怒，最后我心情愉快地走了出来，我好像从十八层地狱回到了无限美好的人间。我呼吸带着花香的空气，想起了这几天我天天都

看见的那幅壁画。我从宾馆散步到百货公司，就要经过那堵画着“大寿桃”的粉墙。五个胖胖的青少年(三男两女)抬着这个大桃子，后面的一男一女，男的扛两把锄头，女的提一个装水果的篮子，桃子前面是天安门，后面是梯田。画的左下角有一首民歌："踏上梯田上云霄，摘下王母大蟠桃，献给亲人毛主席，愿他福寿比天高。”这就是今天个旧人民的声音。在过去人们常常唱的是：“个旧矿山雾沉沉，一年到头苦死人，牛马还得歇口气，最苦不过矿工们。”还有“槺头好比催命鬼，老板好似活阎王”……像这一类的民歌，上了年纪的工人至今还不曾忘记。可是现在的工人却唱出了这么豪迈的歌声：“人人都说星星多，没有锡都炉子多，个个铁炉顶天地，铁水奔流似红河。”半文盲的工人王梅保在大战钢铁的时候也写了非常出色的歌子：“秋风飒飒雨绵绵，英雄顶雨战炉边，铁水翻飞彩虹现，疑是春天到人间。”今天的矿工跟过去的砂丁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展览室的门口立着两个矿工的塑像：一个戴一顶小毡帽，穿一件破麻布衣和一条破裤子，光着的脚胫上戴一双脚镣，脸黄肌瘦，眼睛微微向上抬，露出痛苦和怨愤的表情；另一个身材高高，身体结实，穿一条蓝布长裤、一件白布衬衣和一双黑皮鞋，昂着头两眼向前，带笑的眼睛里露出无限的勇气和信心。不用说，前一个是旧日的砂丁，后一个是新中国的矿工了。不仅在展览室里，我在露天矿上、在车间里机器旁边也看到了新矿工的雄姿。拿握着水枪向泥山进攻，将红土大块地冲下来，驾着车开动电铲把土山削平，或者在坑道里用风镐打眼埋炸药准备爆破……像这样的英雄气概哪里是从前的砂

丁梦想得到的？从前的砂丁在“蛇洞”里爬上爬下，塃包的两头压在胸前和胸后，背七八十斤重的塃，拄一根木棍，走几步路就要大声喘气，爬出洞来交出塃就倒在地上，脸色铁青，双眼紧闭，直伸伸地躺在那里，好像死人一样。今天下井的矿工戴着安全帽、穿着帆布衣裤和胶鞋，在通风的大巷子里或者开着电机车出去，或者顺着铁轨推动运塃车，交给马拉到升降机跟前。升降机旁边有一个小卖部。明亮的电灯光下，一面是柜台，左右两面靠壁安放着两排长木凳，凳前一边放三张长桌，另一边放两张，每张桌上有二十个磁茶杯。疲乏时谁都可以到这里来，坐在长凳上休息片刻，喝一大杯糖开水，或者到柜台前买一包香烟或一包糖果。我在地底下走了一大段路，也得到机会坐在这里愉快地抽着厂长递给我的香烟，安闲地望着人把刚从地上运来的热气腾腾的开水从木桶里倒进大水缸去。

在那个展览室里我还看到“伙房”的模型，那是旧日砂丁的住房。从一把活动的梯子上去，楼板上铺的是烂草、滑席，盖的是蓑衣、破絮，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铺上，屋角还放了一个便桶。没有窗，只有一扇门，砂丁一进屋，门就给狗腿子（工人叫他做凉饭狗）锁上了。“伙房”四周都是碉堡，矿警住在里面，要是有人逃走，他们就开枪射击。有的砂丁逃出去被捉回就吊在楼下用鞭子打得死去活来。有一个砂丁生病，拿了老板一床烂被盖了一天，那个姓孙的老板说他偷东西，叫人把他拖去用枪打死。砂丁苦苦地哀求：“老板，四年来的工钱你还没有给我一文。你扣我的工钱好了！”这也救不了他的命。过

去的矿山上有一个"干麂子冲"。那里到处都是野狗啃剩了的白骨。

今天我纵然走遍矿山，也看不到这种茅草顶的伙房了。我看见的尽是土红色和灰色的三层楼的洋房。一位从四川来的老工人对我说："过去箇旧街上七坑八洞，只有几所资本家的洋楼。这种房子我们哪里有得住？"我访问了住在有电灯的"三层楼的洋式房子"里的工人家庭，也去看过单身工人的宿舍。我们一共三个人作为不速之客叩过两家的房门，两位主妇同样热情地招待我们。一位是家属委员，另一位是卫生模范。家属委员的大儿子在箇旧市师范学校念书。卫生模范的怀里有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每一家都有不少的箱子，还有热水瓶和别的日用品。白壁上挂着带镜框的照片，也挂了几串干辣椒。单身宿舍里每一个大房间有四张床，各有上下两层铺。八个人住一间房，上早班的到厂里去了，做夜班的现在正在床上酣睡。好几个男女青年在宿舍外面洗衣服，他们或立或蹲，有的带笑讲话，有的小声唱歌，脸颊红红，身体结实，都显得那么高兴。

我们经过一幢一幢的工人住宅，沐着春天的阳光走下山去。好些楼房的大门口都贴得有红纸春联，门楣上还有四个大字："前途似锦"。山下面几株桃花开得那么红艳，金湖上泛起灿烂的银波。响亮的汽笛震得安静的蓝天也仿佛在微微摇动。对面老阴山顶上的旧索道和山坡上的绿树历历在目。山脚下灰白色的云锡公司的大楼和背后的职员宿舍似乎在不停地扩大和加高。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美景。我连

连低声念着这四个字："前途似锦。"我想起了前一天云锡公司的一位同志对我讲过的话：过不了两年又会有两个大厂在这个城市里出现。单是这两个厂的产量就要比现在的总产量多。这仅仅是许多好消息里面的一个。这两天到处听见报喜的锣鼓声，特别令人兴奋。

在老厂我看见刚扎好的柏枝牌坊和刚贴上的红纸黑字。在选厂，墙上贴满了"标兵成列，红旗成林……"的大字标语。在炼厂，人们站在梯子上把写好字的方形红纸贴到正面墙上，刚贴到"欢庆"两个字。到处都在办喜事！我遇见的工人和干部都是满面春风，喜气洋洋。老厂厂长说："我们今天开运动会。"选厂的党委书记连声称赞工人的干劲大，群众的情绪高。炼厂厂长热情地谈起技术革新的成绩。我没法把采、选、运、炼各方面工人技术革新的项目全记在心上。老厂厂长含笑地说："今年不到三个月，已经抽出了三百个工人，到年底还可以抽出九百来。矿上的三百匹马也要全部送到别处去。"在炼厂我看到刚建成的自动化车间，也看到了"长江大桥"。我第一次听见老工人自豪地谈起他们的"长江大桥"，我惊奇地想：红河里怎么会有长江水？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炼厂工人为锡水长流安装的管子桥，用水泵把锡水吸上来，通过管子送到另一个车间的大锅里去，再经过一道工序把粗锡炼成了大锡。这座"长江大桥"是技术革新运动的产物。没有它的时候，工人得用很重的长柄铁勺舀起锡水倒在模子里铸成粗锡，然后再把一块一块五十公斤左右的粗锡搬到另一个车间去继续冶炼。空中烤矿也是一九六○年的创造发明。像这种消灭笨重体力劳动、

节约大量人力的发明在矿山上到处都有。我们参观一九五三年建造的新索道的时候,坐在一根横放在低坡上的长木头上,望着飞兜不停地往左右两个方向来来去去,想不到它们会是从十五·四公里以外装了水来或者运矿砂到十五·四公里以外去的。飞兜进了车间就需要人把它接住,矿砂装好又需要人把它推出去。工人们正在车间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有把握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人力节约下来,让飞兜自动地进进出出。

汽车在明媚的阳光下继续飞奔。前面一阵尘雾,一阵响声,两部运木头的卡车过去了。尘消雾散,车窗外仍然是红花绿叶,蓝天黄土。可是我的眼前还出现着飞来飞去的铁兜,那四百五十个铁兜每天上上下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那几个年轻工人的创造可能在今天得到成功,也有可能还要遇到一些困难。我惋惜自己没法看见他们脸上的胜利的笑容。可是我却见到了选厂厂长脸上的笑容。他站在自动化流槽前面,对我解释一位被称为"长寿标兵"的青年钳工的新创造,他望着流槽一个接一个地翻身,高兴地说:"这证明自动化也可以革新。"他还告诉我,厂里正在开展万条合理化建议运动,现在已经有了七千多条,到月底一定超额完成。他和别的负责干部一样,满身都是劲,满肚子都是好消息。我分享了他们的快乐。我还看见工人们敲锣打鼓,穿红着绿,走过宾馆的门前,有的捧着大红喜报,有的一路上表示决心。持续的大跃进把箇旧的春天装饰得更加美丽,技术革新运动已经在这里开出了无数的花朵。

离开箇旧的前一天,我邀请了五位工人同志到宾馆来作

客。不用说我只是“借花献佛”。我和他们在一起过了五个钟头。他们畅快地谈起矿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谈到资本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他们谈到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的幸福。每个人有他自己伤心断肠的回忆和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然而也有共同的今天的美好生活和无限美好的前程。要不是有人来催我们下楼吃饭，我们还会继续谈下去。五个钟头怎么会过得这样快！吃过晚饭我们一起去京剧院看《杨八姐游春》，看到皇帝出洋相和挨骂的时候，大家笑得多么高兴！

飞奔的汽车忽然停了下来。年轻的驾驶员回过头对我们含笑道：“休息一会儿吧。”我应了一声，打开车门第一个走了下去。我问他：“出了箇旧没有？”他笑道：“走了这么久还不出箇旧？”他马上又加一句：“不过还是在红河自治州的境内。”

我自己也奇怪：怎么会发出这样的问话？也许是这样吧：我的心还留在箇旧，所以我以为我的脚也还在箇旧了。

3月25日，上海。

为北京歌唱*

在生活像开水一样沸腾的日子里，在奇迹像鲜花一般开遍全国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心跟祖国的首都贴得多么近，每一颗心上都亮着北京的灯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论是高山或平原，甚至在我们祖国最偏僻的角落，也都是一片万马奔腾的景象。每个人向前飞奔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在心里念着"北京"两个字，眼前立刻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形，一副慈祥的面容，一对发光的眼睛，于是谁也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强的信心，谁也看得见前面宽广的大路和光芒万丈的太阳。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猛冲猛闯、飞跃前进的时候，常常感觉到自己是在向着北京飞奔，带着礼物去献给最敬爱的领袖。

在睡眠的劳动者的梦里，北京发射灿烂的金光；在彻夜工作的人的眼前，北京是永不落山的红日；在孩子们的幻想中，北京是五彩缤纷的乐园。北京好像有强大的吸力一样把六亿五千万人吸引到它的跟前，它又像一根仙带把六亿五千万颗心紧紧地系在一起。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深深地热爱北京！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北京日报》。

有一个中国人不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同北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闪亮着从毛主席的办公室里透出来的灯光！

谁都愿意参加天安门广场上游行欢呼的行列；谁都想看一眼人民大会堂里大会场顶棚上的大红星；谁都愿意在庄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了解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谁都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一束鲜花。哪怕是拿着手提包走过堂皇的北京新车站，谁也会感到自豪地昂起头。就是二龙路人民公社那个像小工厂又像百货商店、非常清洁的邻里服务所也一样牵系着我们的心：两个刚走出家庭的妇女穿着白衣在替儿童理发，我至今还记得她们脸上的笑容。一位和蔼可亲的五十八岁的老太太很能干地管理着那个有二百六十几个人的街道工厂，谁也想不到这个厂就是由她们几个人白手起家办成功的……北京每时每刻飞速的变化都在给全国人民引路。从北京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响彻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整个空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用最大的热情来响应北京的号召。每个人用最亲爱、最宝贵的字眼来描绘北京。在人们的想象中，这幅最美丽的图画上包含着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北京的每一个新的面貌、每一个新的景象都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人的心上，鼓舞着最崇高的忘我精神。

谁能够忘记在北京过的那些令人振奋、欢欣的日子？谁不曾口如悬河地讲起十年来我们首都的千变万化？谁又没有惊喜交集地赞美过平地出现的高楼、大厦和美丽的现代街市？谁又不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和共产主义的风格而感到

心连心并肩前进的幸福？看到北京就仿佛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祖国的无限美好的远景；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就好像听得见全国持续跃进和技术革命的欢呼。整个祖国跟着北京不断地前进，全国人民带着最好的礼物向着北京前进。六亿五千万人民有最深的感情和最热烈的语言要向北京倾吐；有最大的决心、最强的毅力和最旺盛的精力要为北京创造一切惊天动地的奇迹。

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北京。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来到了北京。这个春天是无比明媚，这个节日是无限美好！不仅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连每一个角落、每一小方土地都在发热放光，每一个人都好像长了翅膀似地活泼轻快；每一张脸上、每一颗心上都开了花，每一双手都有无穷的力量。六亿五千万双手动得那么勤，六亿五千万颗心跳得那么快，它们要为北京、为全中国创造出百花不谢、春光不逝的伟大奇迹，而且一定会创造出这种奇迹来。

北京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也是我们幸福的泉源。让我们尽情地为北京歌唱，为北京欢呼！

4月27日，上海。

对美帝国主义的警告*

头号战犯艾森豪威尔一贯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手段，在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后，到亚洲进行阴谋备战活动，日本和亚洲人民早已看穿他这一点，所以和他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他的“访问”。

艾森豪威尔此行目的，是为了挽救岸信介集团，挽救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把日本正式缚上美国的战车，实际上是等于把脖子上的绞索拉得更紧了。外强中干的美帝国主义，最后必将失败。

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已亲自尝到亚洲人民的味道，在台湾也不会好过；因为三年前台湾同胞已举行过反美示威，这次一定也会表示他们的坚强斗争意志。

我们炮轰金门，一方面是对亚洲人民和台湾同胞的支持，一方面也是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警告，不许它们继续侵占台湾，台湾一定要解放！然而美帝国主义是不会自己觉悟的，他们的最后归宿是自己勒紧绞索完蛋。美帝国主义走狗岸信介集团也将在日本人民严正的指责下迅速垮台。岸信介集团虽对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日本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但是日本人民一定将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帝国主义一定会失败。

把绞索拉得紧些，再紧些！*

头号战争贩子艾森豪威尔现在溜回他的老家去了。十天以前，他摆出恶狠狠的面孔离开华盛顿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大挨耳光、夹起尾巴、滚回老窝的尴尬场面。连美国记者也说："在外交史上很少有一位美国总统接连遭遇到三次像艾森豪威尔所忍受的那么大程度的挫折。"可见这真是"盛况空前"的大出丑。我们把艾森豪威尔叫做"瘟神"，因为他每到一处，就给人们带来灾难，人人都讨厌他。更多的人喜欢把他比作过街的老鼠，这倒是非常形象化。十几年前我在重庆看见一只大老鼠过马路，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场面：过街老鼠起初得意洋洋，大有招摇过市的派头。后来人人喊打，个个动手，它就慌慌张张，狼狈逃窜。不消说，它终于被人打断了尾巴捉住了。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已经受到了人人喊打、个个动手的"欢迎"。菲律宾的石头，日本的闭门羹，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冲绳岛十万群众的包围，这些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警告而已。可是他已经有些吃不消了。要是没有直升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

飞机，要不是他逃得快，恐怕他真会让人当场捉住。现在他回到了老巢，又可以躲在白宫里大发脾气或者大吹牛皮，然后把他那些狐群狗党召集起来偷偷地搞一些新的害人勾当。他决不会接受挨打的经验教训，他更不会想到他是脖子上套着绞索逃回去的。

日本人民狠狠地打了艾森豪威尔一记耳光；艾森豪威尔很可能向麦克阿瑟第二出气，打他一记耳光；麦克阿瑟第二又会找岸信介算帐。打来打去，挨打的还是他们"自己人"。他们动不了日本人民的一根手指头。岸信介这个卖国贼一方面奴颜婢膝地向美国主子低头道歉，另一方面杀气腾腾地对日本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但是现在连他的主子都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人给他撑腰呢？昨天三十万人示威，今天六百万人罢工。一个桦美智子倒了下去，成千上万的桦美智子高举着拳头站出来。所谓新日美"安全条约"必须撕碎！卖国贼岸信介必须滚蛋！美帝国主义必须滚出日本！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最后一定会大获全胜！

艾森豪威尔这次九天的强盗旅行，给全世界人民解答了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的力量大，还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大！艾森豪威尔一定要访问日本，岸信介一定要欢迎艾森豪威尔。可是日本人民不许战争贩子的脚踏上日本的国土。结果艾森豪威尔只好取消了他的"访问"。不管美国有多少原子武器，有多少军事基地，有多少直升飞机，不管它有多大的"威慑"力量，不管岸信介动员了多少警察，进行了怎样横暴的镇压，然而艾森豪威尔始终进不了日本国境。岸

信介可以用几个大汉挟一个人的办法把反对派的议员弄出众议院，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对付团结得很紧的日本人民。谁也想得到这几天岸信介在针毡上过日子的滋味。其实他的美国主子艾森豪威尔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看起来这位总统好像安安稳稳地回到了白宫，可是套在他的脖子上的绞索又多绕了几转，而且拉得更紧了。

毛主席早说过，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看起来凶神恶煞，其实戳穿了还不是肚里空空。帝国主义是靠侵略为生的。世界上没有一种不干侵略勾当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吃人口软，看钱说话，为了想多得"美援"，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美帝国主义决不会放下屠刀，除非你把它打倒。它是老虎，老虎是要吃人的。然而它又害怕你狠狠地揍它，因为它是纸老虎，经不起长期的、坚决的打击。全世界人民的同声怒吼，万拳齐下，一定会把美帝国主义早日送进博物馆去！

把美帝国主义送进博物馆，这是全世界人民的神圣的义务。这里面有日本人民的义务，也有我们中国人民的义务。我们始终没有忘记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我国神圣的领土台湾，还在干涉我们的内政。这是六亿五千万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万炮怒吼不过是对侵略者的一个严正的警告。不用说，老鼠不会长期躲在洞里，它总要出来作怪；纸老虎没有被烧成灰，它仍然要张牙舞爪。所以我们要打，就要打到底！只有这样，世界和平

和各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有保障。

美帝国主义的末日越来越近了。让我们把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拉得紧些，再紧些，更紧些！

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我曾作过简短的发言，谈一些个人的感受。我谈到新中国作家的莫大幸福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多么伟大的时代里，多么可爱的国土上，多么勤劳、勇敢的人民中间；在我们周围有着充实、多彩的生活；在我们前面展开更光辉、更美丽的远景。我们有取之不尽的丰富题材，我们有千百万爱护创作的热心读者。我们的作品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起作用，我们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教育。我们跟着时代前进，时代推动我们前进，我们的作品也有可能推动时代前进。……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辈作家所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整整四年过去了，我今天又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觉得我有了更多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这不是因为我个人在这四年中有什么值得提说的成绩。恰恰相反，我并未好好地尽了作家的职责。然而连我也看得很清楚，这四年中间在我们祖国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变化，出现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迹，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使我们祖国以一天

---

* 本篇系作者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等于二十年的高速度向前飞奔，使我们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放射出万丈红光。共产主义的光芒照亮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前程。中国工人阶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汇成了一片红旗的海洋。同时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花园中也出现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呈现出了大跃进、大发展的新局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群众创作运动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大量的、有民族风格、民族气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新民歌开创了一代的诗风，鼓舞着全国人民齐步前进。像《红旗谱》、《创业史》等等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接连地出版，态度鲜明、风格崭新的短篇小说大量地出现，使广大的读者受到了鼓舞和教育。更值得高兴的是不少有才能的工农出身的作者带着蓬勃的朝气和健康的感情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给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注入了新的健康的血液。毫无例外，在有火热斗争的地方就有激动人心的诗篇。许多先进工作者刚刚放下生产工具，就拿起生花的诗笔。不少工农业战线上辉煌的成就和生动的事迹很快就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传遍全国。表现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和人民英雄的崇高品质与英勇气概的作品也已成为中国青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我见过汽车驾驶员在停车的时候专心阅读《林海雪原》；在遥远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我还听见年轻人热心地谈论《山乡巨变》和《青春之歌》；在简旧单身工人的宿舍里我看到了《百炼成钢》；在西湖湖滨垂柳下石凳上一个年轻干部读着《红日》度过他的星期天。我们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有着新的道德观的英雄人物

常常是广大读者的忠实朋友和前进榜样。我还可以这样说，新中国的文学已经不止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事业，而且是全体进步人类的事业了。我们不少作家经常接到国外读者的热情信函。我们作品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也鼓舞了国外读者斗争的勇气。我们的作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一天天地在扩大。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在繁荣。会场外面就是那条宽广的阳关大道，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的作家队伍不断地在发展，在壮大。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象，这是多么光辉的前途！

我在这里首先描绘美丽的景象，无非说明我们作家的责任多么重大。既然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就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应当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读者从来不会嫌好作品太多。好作品越多，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越大。何况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民！今天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献出全部力量来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些所谓"灵魂工程师"更不应该落在后面。作家跟普通劳动者一样，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与持续的劳动中得到锻炼。我们必须投到紧张的劳动中去，用劳动的成果来为社会主义的大厦添上一砖一瓦。我们必须不停地写，不断地练，练好我们的笔，赶上向前飞奔的时代。捉住时时刻刻大批涌现的先进事迹，把它们迅速地反映在我们的新作品里面。我们也要争取在文学事业中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我知道同志们不会责备我在这里片面地强调追求数量，因为快和多是完全可以同"好"结合起来的。而且我首先就得批评自己，我写得少又写得差。我们的生活是那样丰富多采，

斗争是那样激烈尖锐，意气风发的英雄人物成群结队地产生，他们的面貌非常丰满，事迹本身就十分动人。一个星期革一个命，奇迹一般地完全改变了一个工厂的面目。这样的生活不就是完美的艺术品？当然，这是对那些肯到群众中去、愿意参加火热斗争的作家说的。只有在他们的心跟群众的心贴在一起，自己和群众共思想、通感情之后，他们才懂得热爱我们生活中一切闪着共产主义光芒的东西，用极大的热情把它及时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们才能够精力充沛、才华焕发地描写新的事物，而且用他们优秀的作品来帮助新事物尽早地取得胜利。至于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对新事物熟视无睹的人，那些盲目崇拜古人和外国人、捧起几本十九世纪的名著凭吊旧生活的人，他们是看不到新事物的光辉的。至于那些贩卖修正主义货色，甘心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气象万千的新生活当然会变成了"漆黑一团"，因为在我们生活里是没有他们的前途的。他们不断地叫嚷"写真实"，要求"创作自由"，也无非想用他们的笔歪曲我们的现实来反对社会主义。这种阴谋诡计当然骗不了人们雪亮的眼睛。但是那些搞阴谋诡计、用种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和人民文学事业进攻的人，也不会一遭痛击就缴械投降。所以几年来在文艺战线上进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有重大的意义。我自己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些思想斗争使我的眼睛睁大了，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改造世界观的迫切需要。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能掌握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新的人、新的生活与新的道德；就认不清什么是现实

生活中的主流，就会把现象和本质混在一起，甚至于连新生力量和腐朽力量也区别不出来。现在大概不会有公然表示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作家了。可是要用它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却不是容易的事，首先就得把自己脑子里那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完全去掉。我的脑子里就有不少那样的东西，虽然我不断地在跟它们作斗争，但是今后我还得作更大的努力。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封建家庭里，在那个要闷死人的专制环境中整整生活了十八、九年，才有机会跨出那一道包铁皮的门槛。可是后来我又钻进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嚷着要突围出去，要改变生活方式。成都那个封建家庭早垮了，我在上海那个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也并非铜墙铁壁，可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和决心。从这个也看得出来过去的生活在我的身上日积月累地留下了许多东西。还有，我年轻时候很爱读小说，古今中外的小说，好的坏的我都读过不少。我不加选择地阅读它们，并非为了学习，只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听故事。我并不想向它们学习什么，我当时也无非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是结果我得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这是各取所需，而且是不知不觉中吸取来的。那些小说的作者要不是封建文人，至少也是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也曾隐约地感觉到这两种人在我的脑子里打架，不到多久封建文人就给赶跑了。我自己呢，我并没有打过防疫针，可以想到有多少病菌钻进了我的身体，而我又把它们带到我的文章里面。其实我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书本和作者，而且也不能

说我就没有从那些小说中得过一点益处。我也曾从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里得到了启发和鼓舞，使我更有勇气追求光明，憎恨黑暗。我自己还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如果不曾读过那许多小说，那么我一九二七年三、四月一个人在巴黎有话要说、有感情需要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的时候，我也不会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但是在我自己写的许多小说中就可以找到我从别处传染来的各种各样的病菌。不用说，还有更多的发霉、发黑的东西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虽然我并不想把任何病菌或渣滓放进我的作品里面，而且我本人也受不了它们，可是它们自己却钻到我的书里面来了。我这种说法并非卖弄玄虚，把创作说成神秘。我有过这样一种体会：作家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生活，因此他无法在作品里装假。一个作家要不在作品里暴露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作家常常不由己地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习惯的想法写在小说里面；作家也常常让作品中的人物替自己讲话。而我们过去有些封建文人却走得更远，他们把自己写成能文能武、十全十美的主人公，自己在生活中想望过而做不到的事都要在小说里做到。这种靠写小说过瘾的作家，我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里也只是借用他们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见：作家有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习惯。我常常在一些作品中看到作者本人，同样，别人也会在我的小说中看到过去的我。在我那些小说中我不曾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就因为我自己当时并没有找到这样的出路。我自己也常常想过，为什么十九世纪欧洲许多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写了那么一大堆病史，而不肯开一张

药方呢？为什么他们空有一腔悲愤，看不惯坏人得志，受不了乌烟瘴气，却只能到处散布淡淡的哀愁，无名的烦恼和悲观、绝望的情调呢？原来他们自己就没有找到出路，也不知道治病的药方。他们白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却只做了生活的旁观者。

以上这些例子不过说明：我们今天的作家如果不认真地、坚持地改造自己，就很难不把那些错误的、有害的东西带到作品里去。有人写正面人物总要加一些缺点，可能因为作者自己欣赏有缺点的人；有人把英雄模范写得十分苍白，毫无光彩，可能因为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是另一类人。这些作家并不一定想在作品中暴露自己，然而他们下笔的时候却无法掩藏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所以道德品质恶劣、思想落后的人，即使有很高的才能，也写不出振奋人心、鼓舞人们前进的作品；要写好新人新事，自己就得热爱新人新事。作家自己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不可能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真正热爱我们今天社会的作家绝不会写出诬蔑新社会的小说。据说居然有人读了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好作品，就认为要提高技巧必须大写阴暗面，他在新社会里找不到阴暗面，就把一些个别的缺点故意放大，甚或索性捏造事实，编写阴暗面。这种人其实别有用心，挂羊头卖狗肉，甘愿和修正主义者走一条路；因为热爱新社会的人在我们光芒四射的生活里看到的是阳光普照大地的雄伟景象，听到的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这些找寻阴暗的人存心在作品里说假话，可是他们却想不到会向读者老老实实地暴露了自己的

灵魂。他们跟修正主义者一起不断地嚷着"写真实"，也以为自己写了真实。他们真的写了真实吗？不，他们是用阴暗的眼光看光明的新社会。难道中国人民三年来震惊世界的持续大跃进不是真实吗？中国工人阶级以共产主义的风格和真正忘我的劳动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祖国的面貌，难道这些不就是真实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李承晚被南朝鲜人民赶下台，夹起尾巴偷偷逃走。日本人民的严正讨伐和英勇斗争，打得卖国集团的头子岸信介坐卧不安，不得不辞职滚蛋，吓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撤走一部分间谍飞机。艾森豪威尔的强盗面目已经完全揭穿，在世界人民面前大出丑。他一出行就尝到了菲律宾的石头和日本的闭门羹，再加上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和冲绳岛十万群众的包围，吓得他垂头丧气，只好厚起脸皮滚回去。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旭日东升；旧制度奄奄一息，新社会光芒万丈。这才是最大的、真正的真实。要写真实，就得写这个。几只苍蝇和几堆垃圾，倒用不着先生们多花心思。要是真有苍蝇飞过，一个"红领巾"也会马上拿起苍蝇拍把它打死。至于垃圾，不但昨天堆垃圾的地方会变成今天美丽的花园，而且连垃圾，连污水、废料现在也要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了。哪有身为作家的人还死死地抱住过去的垃圾大做文章？

可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和修正主义者偏偏因为我们没有写苍蝇和垃圾，就诬蔑我们"没有创作自由"。其实这正是我们

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地方。我们不写苍蝇和垃圾，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对读者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的作品是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在新中国和在苏联以及其它兄弟国家一样，作家们享有最大的创作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题材、自由采取表现的形式，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深入生活，参加各种火热的斗争。我们就只缺少一种“自由”，那就是造谣说谎的“自由”。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家的劳动经常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与重视。我们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但不曾受到任何干涉，相反地还得到了说不尽的鼓励与帮助。我们不论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到工地，到山区，到海岛，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待我们像待亲人一样。我们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参加了自己所描写的生活。我们有机会和我们作品的主人公一起工作，一同欢笑，接触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经历激动人心的生动场面，我们用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给共产主义的萌芽浇一点水，还可以看见它们在读者中间开花结果……这些自由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所没有的，而且是他们所得不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自由。可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却反而大言不惭地到处夸耀他们的“创作自由”。我还记得有一位到过美国的外国女作家在我们面前大吹她的“创作自由”。她的所谓“自由”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也多少了解她那里的情况。在她的国家和在美国一样，作家的作品不过是掌握在出版公司老板手里的商品罢了。能够给老板赚钱的就是好作品。在美国，大出版公司的老板们可以用协商分赃的办法和资本

主义的经营方式，使一本书在出版以前就成为一版几十万册的畅销书。不像在我们这里，书的印数是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决定的。无怪乎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诲淫诲盗的小说充斥市场，用色情的陶醉来腐蚀、戕害年轻的心灵，钻牛角尖、讲假话、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品到处皆是，使读者们彷徨迷路，悲观绝望。我可以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跟资本主义的"创作自由"的确是不同的！这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差别！

我从前在旧社会中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曾享受过什么创作自由。我脱离群众，一个人拿起笔关上门写作，自己说是"孤独奋斗"，其实"孤独"倒是真话，说"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然而即使是这样，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也不肯放松我。我不得不常常在作品里使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给发表我的文章的刊物招来麻烦。甚至在抗战前一年，我在短篇小说《窗下》里写到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就不能用"日本"两个字，抗战前两年我在日本写过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回上海，检查老爷干脆把它从《文学》杂志中抽去，这篇散文始终没有能发表，后来我把它改成《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才能在短篇集中印了出来。这是因为日本浪人不许我们讲他们的坏话，国民党又害怕我们讲日本浪人的坏话。……在那些时候我虽然一直不曾放下笔，但是我没有科学的头脑，没有革命的实践，又没有正确的世界观，离开了人民，我空有一个年轻人的正义感和一支热情的笔，我在生活里没有找到出路，在创作里也没有出路；我一心追求光明，可是在旧社会

中却只看到一片黑暗。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就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我的第一本短篇集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每夜每夜在我的耳边响着一片哭声"。我在解放前写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的后记里还有这样的话："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手边的日报上就有《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大字标题"。我很想在作品里给正直的普通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然而在漆黑一团的旧社会里单靠自己一双手和一个正直性格孤军"奋斗"、想独善其身的人要摆脱悲惨的厄运，有多大的困难！读者们不断地寄来诉苦的信，希望我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我始终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我的作品反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苦恼。我最近重读从一九二八到一九四八这二十年中间我的作品，我惊奇自己怎么会写那么多的痛苦？我受不了过去许多作家的悲观绝望的结尾。可是想不到在我自己的作品中也会有那么多忧郁、痛苦的调子。

其实在我们那一辈的作家中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有的人不得不永远丢开了笔，有的人贫病交加，刚到中年就悲惨地死去。我却见到了新社会的光明，而且有机会用我那管写惯了痛苦与灾祸的秃笔来描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虽然我这些年中间写得非常少，但是我总写下了一点新的感情，我在全国人民普遍的幸福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一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和不少的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听见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兴奋地挥动着的手和看不尽的迎风招展的红

旗，听见春雷一样的热烈的欢呼，那个时候，我真觉得好像我这颗心就要从胸腔跳出来一样。只有长期受苦的人，只有长期享受不到自由的作家，才了解我这种感情。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那一天接连六个小时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和毛主席响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它们一直在鼓舞我前进！

我想，用不着我再往下叙述那些人人都经历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已经反映在同志们许多优秀出色的作品里面了。这些篇幅有长有短、风格多种多样的作品将作为我们伟大时代的光辉记录而流传下去。自然我们今天的现实比这些作品更光辉，更激动人心；而且跑得更快，更远。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比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更丰满，更有光彩，而且闪耀着更多的共产主义的光芒。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的文学赶不上时代；相反地，我们的文学将来一定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我们的作家都有攀高峰的雄心大志。新中国的作家要攀登文学的高峰，这是一定办得到的。要这样才配得上六亿五千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雄伟气魄。既然我们的运动健将已经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为什么我们文艺战士就不能把五星红旗插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峰顶？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会是一个鼓干劲、争上游、立大志的跃进大会。在这个会上大家不仅热情充沛、心情舒畅，而且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在我们会场外面，世界人民高举着光明的火炬向着那个正在作垂死挣扎的黑暗势力进军。这一片阳光

的大好形势正是我们施展身手的好时光。我们有毛主席思想的武装，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和热情关怀，我们跟着六亿五千万人民一同前进，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什么事业不可以完成！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树起最大的雄心，鼓足冲天的干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奋勇前进！

万古长青的友谊*

我读到关于朝鲜的文章，就会想起我在那个国家过的那些日子。我在八年前写的一句话至今还强烈地打动我的心。我当时的确是用颤抖的手把它写下来的："对这英雄的城市、美丽的国土和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指的是美帝国主义用四十二万多颗炸弹都炸不垮的平壤城，我指的是在血和火的熬煎中依然遍地鲜花的民主朝鲜，我指的是和我们一起共患难、待我们比亲人更亲的朝鲜人民。

我常常把我在朝鲜过的日子看作我的一段最幸福的生活。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深切的爱和强烈的恨，我也曾深刻地体会到血肉相连、亲如一家的友谊，更具体地懂得"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光荣。美国侵略军用现代化武器屠杀善良的朝鲜妇女，流天真孩子们的血，却始终毁不了朝鲜的一寸土地。我在朝鲜见过正在燃烧的房屋、还在冒烟的瓦砾堆，孩子在母亲的尸体旁边哀哭，老人对着废墟发呆。但是我也见过人们埋好死者，揩干眼泪，更坚强地继续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进，或者在瓦砾堆旁搭起简陋的房屋继续工作；妇女们填好炸弹坑在土里埋下种子，或者背着小孩在公路上挖土修路。敌机还在天空盘旋，可是在地下工厂里，年轻的妇女用无比的劳动热情为国家生产财富，在地下剧场里有才能的演员们用光辉的英雄形象鼓舞人们的斗志……。用不着我把自己在朝鲜见过的许多人和许多事全写在这里，千千万万到过朝鲜的人都有比我更深的感受。没有人不痛恨嗜杀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没有人不热爱勤劳、勇敢、热情的朝鲜人民！

在阴湿的坑道里，在大树丛生的山上，在有花有水的山沟里，我常常听见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吐露他们的胸怀：为了夺回朝鲜阿妈妮的幸福，甘愿献出个人的生命。在每个志愿军战士的心里，朝鲜人民的幸福和祖国人民的幸福多么紧密地连在一起。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情。多少朝鲜阿妈妮的屋顶给我遮过雨和雪，使我受不到风吹霜冻。在寒冷的夜里，母亲一般的老大娘拾枯枝、捡干草，为我烧起了地炕，给我带来无比的温暖。在那些艰苦的时日里，朝鲜的老大伯老大娘分给了我们多少宝贵的东西。哪怕是一碗白开水，一声亲切的问好也含着深厚的友情。我和阿妈妮握手仿佛在握自己母亲的手；我牵着朝鲜孩子去看志愿军文工团的节目，好像是和自己的孩子一块儿走路。在农家的小院里，志愿军战士们帮忙阿妈妮打井、舂谷子，一边劳动一边谈笑，我在他们中间仿佛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心连心的友谊在不断地生长。我越爱朝鲜人民，就越恨美帝国主义。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话：“美

帝国主义好霸道，不让朝鲜人生活！我要拚命打击敌人，给他们报仇。"朝鲜人民的血海深仇像火一样烧着中国人民的心。我们把朝鲜人民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也把朝鲜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终于把美国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给朝鲜人民报了仇，夺回了朝鲜母亲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也保障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朝两国英雄和烈士的血凝结在一起，培养了这棵万古长青的友谊之树，使它开出无限美丽的花朵。我们的友谊不是用语言来表示的，我们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友谊。我想举出几个尽人皆知的名字：罗盛教、吕玉久，朴在根、金永洙的母亲。……志愿军战士为朝鲜人交出性命，朝鲜人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志愿军战士的健康和自由。为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为了人民的幸福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谁都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把吃苦当作最大的光荣；人民军战士奋勇杀敌，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朝鲜人民顽强地、乐观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勇敢地克服困难，支援战争，取得胜利。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越来越深，越来越强。我在朝鲜常常听见人说："中朝亲如一家。"这是大家心里的话。其实我们两国人民岂但亲如一家，我们比一家人更亲！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友谊！鼓舞我们一同前进的友谊！

今天的朝鲜早已不是我在七、八年前看见的朝鲜了。跨上千里马飞奔的朝鲜正在创造惊天动地的奇迹，而且一定会完成和平统一全国的光辉事业。我可以想象到朝鲜人民的昂扬斗志、冲天干劲和欢乐情绪。但是我还常常想起过去的那一

段生活。我称它为幸福，因为我自己天天在十分鲜明的爱憎中受到了教育。在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要迟疑、要旁观，是完全不可能的。人必须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爱朝鲜人民就要为他们尽力，爱祖国就要献出一切来保卫祖国，恨美帝国主义就要用全力打击美国侵略军。由这种爱憎产生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每天都在激动人心，推动人们前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是一个炼人的洪炉。多少人在这个炉子里受过了锻炼，只可惜我留在朝鲜的时间太短了。

在战斗中发展的中朝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手携手、心连心迈步前进，不仅要保卫我们已经得到的胜利，而且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至今还侵占着南朝鲜，还霸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战争的危机还在威胁着亚洲和整个世界。我们决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占据我们两国的一寸土地，我们决不能让我们两国母亲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再遭到破坏。我们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社会主义阳光普照三千里江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多么渴望看见那无数亲切的脸上更甜的笑容，我多么愿意听到那无数更欢乐、更响亮的歌声。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朝鲜人民伟大的节日，我为英雄国家的繁荣富强，为朝鲜亲人的万代幸福不停地欢呼、鼓掌！

一九六一年

卢蒙巴总理的血决不会白流*

刚果共和国合法政府总理卢蒙巴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被杀害了！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又在非洲的土地上犯下了一次滔天的血腥罪行。当卢蒙巴总理遭到所谓“联合国军”软禁的时候，当蒙博托卖国集团在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指使和帮助下公开绑架卢蒙巴总理，并且对他加以野蛮残酷的拷打的时候，当卢蒙巴总理被刽子手们从“联合国军”总部所在地劫往加丹加省的时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许多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独立自主的亚非国家不止一次异口同声地反对联合国阻挠卢蒙巴总理行使职权，要联合国保证他的安全，恢复他的自由。可是这一切正义的呼声都不曾打动那些戴白手套、穿燕尾服、吸惯亚非人民鲜血的绅士们的心。他们的罪恶的手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他们垄断集团的利益，他们可以带着微笑干尽伤天害理、背信弃义的事情，杀害卢蒙巴总理，不过是他们恶毒诡计的一个步骤。今天他们还在刚果进行更恶毒的阴谋，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哈马舍尔德不肯滚蛋，“联合国军”赖在刚果，美、比新老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继续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

助卖国集团。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消灭刚果的合法政府，让殖民主义的统治在刚果复辟，以便继续掠夺刚果的财富。刽子手决不会放下屠刀。倘使不把他们罪恶的血手斩断，他们一定会蛮干到底。他们害怕的只有实际的行动和迎头的打击。

卢蒙巴总理死在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以后，死在美帝国主义准备大举渗入非洲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因的。卢蒙巴总理是刚果人民争取独立的领袖，是非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战士。他不肯向殖民主义让步、投降，他坚决维护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所以新老殖民主义者和卖国集团互相勾结杀害了他。他是美帝国主义侵入非洲的障碍，所以美帝国主义一定要假手于"联合国军"和卖国集团去掉他，所以肯尼迪今天还在为杀人犯和卖国集团吹嘘，认为他们"领导下建立的政府"是"合法的当局"。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在肯尼迪的这种无耻吹嘘中间暴露无遗。现在，在非洲的土地上，谁还相信肯尼迪那一套骗人的话呢！

卢蒙巴总理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活着的时候用他的热情的语言和坚决的行动打击了敌人，鼓舞着刚果人民前进；他遭害以后，还用他的血照出了他的敌人（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和卖国贼）的原形，他的血洒在非洲的肥沃土地上，使非洲的自由火炬燃得更亮，举得更高。新老殖民主义者以为在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窒息一个民族的自由；他们以为杀害一个人就可以使千百万人胆寒，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事实上正相反，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万的战士更勇敢地向前冲锋。伟大的刚果人民决不会再被敌人征服！伟大

的非洲人民一定要把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赶出去！卢蒙巴总理的血决不会白流。他的血将永远鼓舞着他所热爱的“自由而幸福的人民”前进！而且“在这伟大非洲的心脏……赢得胜利”！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示威的拳头下开始发抖了。

在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上的致词*

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感到万分自豪。我看到了亚非两大洲文化复兴的无限壮丽的远景，我们亚非两洲的作家经过长远的路程，来到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东京。我们在这个厅子里发表意见，倾吐胸怀，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样友好地交谈，我们不会忘记亚非两洲人民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的继承者，我们的祖先都曾对人类文化作过辉煌的贡献，我们的同胞一直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增加世界人民的财富。我们亚非两洲十五亿勇敢、勤劳、善良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有一个最美的理想，那就是从世界上消除一切压迫、剥削、罪恶、灾难，使整个世界充满自由、和平、友爱、幸福，在人类生活中创造出无限美好的春天。人民的愿望就是我们作家的愿望。我们呕心沥血所写出的每一部作品，每一首诗篇都是在鼓舞人们飞奔向前迎接这一伟大的春天。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会见，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畅谈，我们不能不感谢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的决议，我们更不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四期。发表时题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巴金致词》。

不感谢日本作家们的热情的支持和周到的安排。我们远渡重洋来到这里，首先是为了友谊、为了团结。这几天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海洋中，受到团结力量的鼓舞。我们跟日本的作家们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接触，认识了不少正直、优美的心灵。日本的作家不仅以他们优秀出色的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他们还站在人民斗争的前头，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贡献。几年来我们中国作家不止一次地紧握着日本朋友的手，互相倾吐友谊和信任的语言。今天让我再一次披肝沥胆地表示我们深厚的友情和坚定的决心，我们永远站在你们这一边，用整个身心支持你们，取得胜利和幸福。

的确，对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人民的胜利与幸福更高、更美的理想么？在我们前辈留下来的丰富的遗产中就找不到与这理想背道而驰的东西。在我们同辈作家的许多为人民喜爱的作品里，也都贯串着这样的理想。在塔什干集会的亚非四十个国家的作家曾经庄严地宣言："我们作家都是人民的良心。"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人民的生活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我们的人民需要有一个独立自由、和平安宁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我们作家也需要有一个独立自由、和平安宁的环境来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当民族的独立自由和人民的和平安宁的生活遭到破坏的时候，即使是不问世事的作家也决不会放弃口诛笔伐的天职。

因此，在我们这个友好、团结、欢乐的聚会上，我们不能不谈到我们作家的责任和任务。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或宗教的信仰，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在进

行写作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我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从什么书受到过什么样的影响。每个作家都接过不少读者的充满信任的来信。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读者们的指路明灯，初入社会的年轻读者更容易把作家们当作他们的人生的教师。对于许多青年性格的形成，我们的作品的确起了不少的作用。优秀的文章像如膏的春雨帮助年轻心灵的发育。作家们的错误往往毒害年轻读者的一生。究竟给读者什么呢？是养料还是毒药？这是每个作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此，实现我们人民的共同愿望，促成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便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厅子里开会讨论，我们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恳切交谈、交流经验，围绕着我们亚非作家的责任和任务，自由、坦白地交换意见。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单独一百左右的作家，在我们周围还有十五亿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读者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在会场里进行的一切。我们的文学事业同我们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不仅对我们的人民负责，我们还要对后代的子孙负责。我们相信，只有在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自主以后，只有在人民得到胜利和幸福以后，文学事业才能有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不论回顾遥远的过去，或者注意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形势，我们对我们意义重大的工作和无限光明的前途都充满了信心。亚非两洲是产生人类文化的摇篮，几千年来，我们人民为人类创造出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我们人民有过光荣的

历史，就能创造更光荣的未来；我们人民有过极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也就能够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传统，创造更优秀的新的文化。这是一定做得到的。我们并不讳言我们有过文化停滞的时期，因为多数亚非国家曾经遭受到巨大的损害和灾难，民族文化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摧残，许多民族丧失了独立和自由，有的民族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至今还在殖民主义者的皮鞭下挣扎受苦。殖民主义者的铁蹄把我们两大洲开满鲜花的原野踏成一片不毛的荒地。帝国主义者用我们人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他们任意分割我们的土地，残杀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各民族之间竖起种种人为的障碍，用种种阴谋毒计毁灭我们的文化……但是殖民主义称王称霸、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觉醒了的人民向前迈进的雄伟步伐是任何黑暗势力所不能阻挡的；在获得了自由的亚洲和非洲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文化复兴的时期就要开始了。新生的文学反映了新生的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被殖民主义者一度破坏了的我们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逐渐恢复而且日渐频繁，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在东京会议召开的今天，尽管寒冷的风雪在地球上并没有完全消失踪迹，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感到春风拂面了。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听见了枪炮的声音。

我们首先想到了刚果。在那里人们以激动的声音朗诵着这样的诗句：

让我们的自由而幸福的人民

在我们的刚果，在这伟大非洲的心脏
生存下去，赢得胜利吧

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的这个伟大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亚非人民不会忘记卢蒙巴的庄严的语言："我知道而且我的内心深处感受到，我国人民终将摧毁内外的敌人，每一个人将站起来对殖民主义、对骄横的也是垂死的殖民主义说'不!'，将赢得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庄严地生活的权利。"非洲将写下自己"庄严而光荣的历史"。

阿尔及利亚诗人沙阿达拉的响亮的歌声激动了我们的心灵：

前进的人们
有着狂风般的意志
舞动大旗
奔向幸福的明天

在阿尔及利亚广大的土地上法国殖民军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对争取自由的人民进行着血腥的镇压，然而美国制造的现代武器决不能阻挠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挽救帝国主义的崩溃。

我们熟悉老挝的历史，这个亚洲古老的民族酷爱和平，宣传舍己救人的美德，从老年唱诗人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想见老挝文化的黄金时代，可是今天的老挝诗人却唱起了战斗的诗歌：

坚固的城防
灌满年轻人纯洁的血液
他们的精魂
英勇地守城杀敌

是什么地方制造的枪炮破坏了老挝的和平，使它美丽的首都遭受摧残，叫无数和平居民流离失所呢？现在亚非人民已经看穿了美帝国主义在老挝进行的阴谋诡计。对老挝内政的任何无理干涉都只能激发老挝人民的战斗意志。老挝人民的胜利对亚洲的和平与文化复兴都会有很大的贡献。

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英勇斗争获得了全体亚非人民的尊敬和支持，对亚非人民也是极大的鼓舞。在去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怒潮里，不少的诗人、作家、文化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用笔、用行动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听到日本诗人的愤怒的声音：

愤怒吧，富士
要真心的愤怒
我们民族的山呀

我们感到一种火山爆发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日本人民的胜利和日本人民的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了。富士山将永远光辉地耸向日本的天空。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在这里谈和平、谈友好团结、谈文学、谈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在一部分亚非国家里，人民正在流血，文化横遭摧残。对这个紧张局势我们决不

能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同时我们还应该想到在某些国家里，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家们正在遭受迫害、逮捕、囚禁、杀害或者被迫流亡，作品被禁止，声音被窒息，生活没有保障……这一切事实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文学事业和我们各国人民命运间的密切联系，更明确地认识只有团结的力量才能够保证我们工作的胜利与事业的繁荣。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义不容辞地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把十五亿人民的心带进会场，我们就不能辜负十五亿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把一切外国的侵略者、干涉者和榨取者完全埋葬之后，独立、自由、和平、繁荣的亚洲和非洲将在世界上放射万丈的光芒，十五亿的人民将发挥无穷的智慧，创造出可以光垂万世的高度文化。……伟大人民的这样的希望一定会实现！为了亚非人民美好的未来，为了亚非文学的繁荣昌盛，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行动，促使我们人民期望的无限美好的春天早日到来。让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家携起手来，共同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诗篇。

鲁迅先生仍然同我们在一起*

上海文艺界在这里举行庄严、隆重的大会纪念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我们怀着同样的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来到会场，向我们大家热爱的伟大的先辈致敬。我们望着先生的巨幅画像，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鲁迅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同我们在一起。

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先生是一个勤恳不倦的劳动者，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坚强战士。先生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用笔、也用行动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先生那许多不朽的著作至今还教育着中国的青年，它们不单是中国优秀文学的精华，而且成了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得到各国人民的热爱。一位著名的朝鲜作家曾经恳切地说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在唤醒亚洲各国广大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先生的思想和文章，在这个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中越来越放射更大的光芒。解放了的人民和正在战斗的人民都把鲁迅先生当作他们的知己朋友。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在战斗的英雄的古巴刚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日报》。

刚出版了先生的小说选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相信进步，相信未来。先生正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才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活。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崎岖的、漫长的。但是先生从来不消沉，不绝望，始终踏踏实实地向前迈步。虽然遇到各种各类的凶恶敌人，遭受各式各样的残酷迫害，先生永远坚决地战斗，不倦地追求。阻力愈大，先生信心愈强；困难越多，先生锐气越盛。先生敢于面对一切的诽谤、攻击、诬蔑、漫骂；先生藐视通缉和暗害的威胁；先生甚至不惜"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不断地改造自己，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为人民工作，更坚决地为真理战斗。先生终于抛弃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在寄居上海的最后十年中间，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始终"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铁一般顽强地战斗前进"。甚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极其猖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毒计加紧进行的时期，先生仍然信心百倍地为着"中国人的生存"，为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坚持战斗。先生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配合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先生作为一支无敌的文艺新军的主将，冲锋陷阵，斩将搴旗，打垮了反动势力的重重"围剿"，在文艺战线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胜利，使得一切"御用文学"、"说谎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站不住脚，一切走狗、败类、反动文人永远抬不起头。

鲁迅先生真是中国人民的"硬骨头"，中国文艺工作者的

好榜样。先生一生爱憎分明。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掷向人民敌人的"投枪"。先生对一切落后的、丑恶的、腐朽的、反动的事物都深恶痛绝，决不宽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卖国集团、买办流氓、文化特务、革命叛徒……等等都是先生攻击的对象。先生彻底揭露，无情打击，口诛笔伐，毫不妥协。先生提倡"打落水狗"，不让敌人有反扑的机会。先生全部的著作、毕生的战斗都是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奋斗，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的时代铺平道路。早在一九一九年先生谈到年轻的一代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先生的确为着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将来呕心沥血、勤勤恳恳、全心全意、鞠躬尽瘁。先生到快要吐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谦虚地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在那个时候先生只看到中国人民胜利的无限壮丽的远景，完全忘记了个人的死亡。

同志们，鲁迅先生朝夕想望的"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也已经在我国实现了。今天我们在"宽阔光明的地方"，在"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新社会里，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好像同先生在一起欢度他的生日一样。我们中间虽然有不少的人没有机会见到先生，也不熟悉先生所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但是我们全是先生所关怀、所期待的后辈，我们或多或少地读过先生的著作，我们或深或浅地接触过先生的心灵。我们想到先生，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了更多的勇气，对我们的事业有了更大的信心。先生的深情厚爱和殷切期望至今还使我们的心感到温暖；先生的完美的人格和战斗的精神仍然是我

们的鼓舞的泉源。先生生前不曾有过我们现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就有更大的责任，也应当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庆祝先生的生日，每个人应当带来自己的一份寿礼。让我们在这个礼堂上向着先生的遗像表示决心：我们要认真地、老老实实地学习鲁迅先生，用我们的文艺武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心血，更亮地燃起我们心灵之火，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像鲁迅先生那样充满献身精神地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智慧，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来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来保卫世界的和平，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早日在全世界绝迹，让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早日在中国实现。再没有比这个更能使先生满意的寿礼了。

1961年9月25日。

一九六二年

喜悦和感激*

我在广东住了整整一个月,带回来一篮子的贝壳、珊瑚和一个本子的笔记。前两天我才把贝壳和珊瑚安顿在一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里,我的男孩对它们很感兴趣,他不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还动手另外布置了一番。我不一定满意孩子的改动,可是看见孩子喜欢这些东西我也很高兴。我对它们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一部分是海南岛的朋友送给我的,另一部分是我自己在海边一个一个地拾来的。今天在这个落雨的晚上我打开了小小的笔记本,好些歪歪斜斜的字迹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我一页一页地翻看下去。我并不责备自己写得潦草。孩子对笔记本的兴趣不大,他看不懂我写了些什么。但是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体会到当初下笔时的心情。在那些时候我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写,我多么兴奋,我真愿意有更多的眼睛,更多的耳朵和更多的手,把一切全收进眼底,记在心上,写在本子里。我要记得多,记得详细,我的笔动得急,却没有想到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堆搞不清的数字。可能有人以为我会对着这些奇怪的数字发愁。事实却不是这样。它们像魔法师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羊城晚报》。

法宝，把明媚的阳光倾注在我的书房里，我又看到那一个月中间在祖国南方所看见的一切，我又感到那种使人满心欢畅的兴奋，我又闻到浓郁的花香、草香和树叶香。我仿佛又在椰子林里散步，在咖啡园中徘徊；我仿佛又坐车走过曾经是海的地方，我仿佛又登上高高的青年亭赞叹运河的壮观……

一个月的见闻我真不知道从哪里写起！我又一次看见在荒地上建成崭新的城市，将海岛连接起来，在经常缺水的土地上开凿运河，改变大自然的面貌，使贫苦的地方变成了粮仓和宝岛。……这一切在过去都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奇迹，如今却成了开遍全国的花朵。我对许多人说，我的见识增长了，我的确见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我的信心加强了，我更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祖国土地的富饶和人力的伟大。

我在湛江专区青年运河的五四坝、三八坝……上面望着一平如镜的绿水和水中风景如画的小岛，听人讲起修建运河的故事，这条比巴拿马运河长一倍的青年运河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建成，工作紧张的时候，有三十几万人参加劳动，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有说有笑，又歌又唱，好像在参加赛会过节日一样。我相信这个热心人的描写，我自己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到湛江市的人，都想看看堵海的工程。我也走过海上长堤，到了旧日的孤岛。堤上还有人在做加固堤身的工作。青年男女，个个身强力壮，面带笑容，有的挑土，有的推车，有的拿锹……他们动作灵活，脚步轻快，单单听他们愉快的谈笑也教人心情舒畅。一个穿花衣服的脸孔黑黑的姑娘刚刚把一车海泥倾倒在斜坡上，她一只手还按着车柄，对着我们亲切地

微笑，她的笑容里露出一种多么鲜明的自豪感。我记起来了，这样的自豪感我在许多人的脸上看见过，我在许多人的谈话里也体会到。我走的地方越多，看的场面越多，我的感受也越深。我后来向熟人谈起这些见闻，那时我才注意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自豪感。有一天我在海南岛太阳河畔的华侨农场作客，我喝着本地出产的又浓又香的咖啡，坐在新建的温泉招待所的厅子里，听人讲农场发展的故事。阶下庭院里一片红花绿叶，各种热带作物都在展示它们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远地方一些槟榔树和椰子树的大叶迎风飘舞，像风磨转动，又像凤凰展翅。农场场长陪我们在阶前散步，他把我们引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听他的解释，我好像在读《镜花缘》一样，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宝物。我固然赞叹大自然奇妙的手工，可是我更加赞叹中国人民的干劲。解放以前这一带只有荒山废地，疟蚊成群，没有人敢在这里住家立业。现在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有九千多位华侨参加劳动的富裕农场。晚上我在房间里洗过温泉澡以后，不曾放下蚊帐就安稳地睡到天明。第二天上午我们坐车在农场里跑了一转，仅仅参观了第四分场的一部分。在归途中我们遇见几位劳动后回家的印度尼西亚归侨，好客的黄家夫妇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小坐，我们受到亲切的招待，吃了他们女儿做的香甜的木薯糕。主人比我年轻，但他的额上已经有了不少的皱纹，这都是他在海外度过的长岁月留下的痕迹，现在他受尽欺凌之后，终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找到了幸福。在这间敞亮、干净的屋子里，我感受到和睦家庭的温暖。家具虽多，却布置得井井有

条，不显得拥挤。我坐在近门的藤椅上，听主人谈他半生的故事。这里面有多少辛酸的眼泪啊。但是他昂起头，眼睛发亮，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回到祖国来了。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今年比去年好，明年一定比今年好。"他说我们，当然也指他十三岁的女儿和十岁的儿子。那个大眼睛的女孩有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穿一件浅蓝色绒线衫，满脸带笑一次两次地端着盘子请客人多尝她亲手做的点心。她的弟弟一直高兴地在旁边微笑。姐弟两人都是农场办的学校里的学生。他们先前还赤着脚跟邻居的小朋友们一块儿蹦蹦跳跳，现在却斯斯文文地在家里当主人了。身体强健的主妇有时讲几句话，表示她愉快的心情，有时用满意的眼光望望她的一双儿女。他们的谈话中并没有提到困难。我不能说他们过去完全不曾遇到困难，但是他们已经克服了困难前进了。因此他们多么珍爱自己的幸福生活。主人不止一次地说："海外华侨现在有祖国了。"他的每句话里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感情：有一个伟大的祖国是多么幸福的事，又是多么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自豪感同幸福感的确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不过是一家人的生活的变化。我要是挨门挨户地拜访，还可以写出许多动人的故事。黄家夫妇比我更有理由相信今年比去年好，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荒地涌现出丰收，他们的农场生长得多么快，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促成了农场的生长。在兴隆农场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不仅为现在努力，而且还时时看到将来，谈起将来。人们说几年后这块地方要出现一片可可林，那块地方要变成一个漂亮

的居民点，这一处要修建一个温泉疗养所，那一处要开办一座加工厂；人们还说，过一年要给国家生产多少财富，过几年要给国家增产多少财宝。他们不是在谈个人的梦想，乱开空头支票，他们说的是自己有把握做成的事情。我没有见过坐等将来的人，我见到的全是制造将来的人。我们准备离开农场的时候，热情的场长对一位同来的友人说："你上次来，还没有这些房子；你下次再来，一定认不出这个地方。"我相信他的话。在湛江专区一个新兴城市里，一位年轻的北方女同志陪我们走上招待所的露台看夜景，远近的高大建筑物露出密密麻麻的星星似的灯光，夜微有凉意，好像下面几株不结果的椰子树舞动大叶搧起了凉风。女同志指着远处那些闪烁不定的小小光点，兴奋地说："过了桥，那边才是中心区，将来要建设得比这边更好。"她指了好几处，说这里将来是什么区，那里又是什么区。她说得清清楚楚，非常具体，好像她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一样。我的眼睛虽然只能看到一些光点，但是我不会怀疑她的话。我的面前便是一条非常宽敞、清洁的马路，对面一家很大的新华书店，左面一家更大的百货公司都是灯光明亮，顾客盈门。我在半小时前还到这两个地方，书店里有很多工农业方面的书籍，百货公司的货架上、陈列柜里有不少引人注意的品种，我从顾客的笑语中听出了几个省的口音，好多上海人在这里安家了。谁想得到几年前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旧社会的人望着地下的珍宝挨饿。我眼前的一切几年前只有在人们的谈话中存在，它们却像变戏法人的道具似地一下子全出来了，连高高的椰子树也是从别处搬来的。无怪乎从北

方来的女同志会爱上了这个平地涌现的城市，连我这个过路人也对它发生了感情。在我们国家里人们想的、说的大都是就要出现的事实。我还记得去年四月在从化温泉有人对我说：“你下次来，就要住湖边的大楼。”八个月后我再去从化果然住在新建的大楼，拉开窗帘便看见一清见底的湖水。在新会我听到响亮的口号：“荒山变果山，河流变鱼塘，农村变花园，稻田变谷仓。”多么豪迈的语言！县委书记谦虚地说：“这是奋斗的目标。”可是谁也看得出口号渐渐地变成事实了。我不是已经看到了果山、花园……吗？风景如画的圭峰山，一片翠绿的葵林，百鸟欢聚的“小鸟天堂”……我二十九年前在同样地方看见的却是另一种景象。那么我下次再来，不用说更是一片琳琅满目的美景了。

在海南岛那大的宝岛新村里，我第一次看见许多奇花宝树。但是使我惊奇的却是那雄伟的校舍和美丽的植物园。整个学校（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便是一座崭新的城市，我们花了一个上午只看了它一个角落。工作同志谦虚地称这里为“新村”，它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成为全国知名的“宝城”。一九五八年春天学院从广州迁来，这一带乱草丛生，罕有人迹，师生员工们就在草房上马，办起茅屋大学。他们一边建设，一边工作，教学、研究、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年以后不仅建成了现在的规模，而且学院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站在二楼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但见绿树成林，高楼如带，我望不见校园的边际。当天下午我要回到海口市，不能在这里多停留，我带着鲜明的印象和惜别的感情离开了“新村”。

但是我绝没有沮丧的情绪。几个小时以后，旅行车载着我们一行九人跑到了海口郊外椰树高耸的公路，篮子里的贝壳一直在我的脚边发出声音，我手里还拿着摊开的笔记本，我不是在看先前记下的数字，也不是看书页中间发香的树叶（这是我们几个来自江南的访问者在植物园里得到的宝贝），这个本子里有多少地方明媚温暖的阳光，有多少人对祖国忠心耿耿的深情热爱，有多少雄伟、壮丽的图画，有多少光明、美丽的远景。……我看见过，我热爱过，我相信过……而且我永远热爱，永远相信。我的本子上永远留着那一切美好的东西，我的心也永远同那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一起……

我拿着这个封面已经染了好些黑印的本子，在楼外雨声不绝的寒夜中翻看它，在阳光灿烂的早晨翻看它，现在又在日光灯嗯嗯作响的小饭厅里翻看它。我一边翻看，一边写，我写的不是一个地方的见闻，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感情。我的秃笔连我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都写不尽，它更写不了我们伟大祖国无比壮丽的现实。我希望它能写出我的喜悦和感激。我要向我在这一个月中见过面的新旧友人道一声谢，问一声好。

3月1日在上海。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

——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开幕词

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十二年中间整个世界和我们国家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在国际形势上出现了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局面，在国内形势上出现了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踏步前进的雄伟景象。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克服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今天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和争取独立、民主的国家的光辉榜样。我们人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大量地涌现，他们以为集体利益献身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风格创造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给文学艺术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给我们文艺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上海《解放日报》。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文化城市，又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十二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立下了巨大的功勋。上海的文学艺术工作也随着整个人民事业的飞跃进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上海文艺界在毛主席文艺思想万丈光芒的照耀下，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遵循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系列的坚决斗争，战胜了各种各样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了自己，巩固了团结，扩大了队伍。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接连地产生，才华出众的新生力量逐渐地成长，文艺工作者队伍的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也巩固地确立了。这就出现了一片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二十年前发表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而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问题，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出了文艺工作者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道路。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不少的作家和艺术家自觉地到群众中去，参加了各个不同时期的重大政治斗争，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改造。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给上海的文艺界带来了更大的鼓舞，作家和艺术家们纷纷地下乡、下厂、到部队，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参加了实际斗争和劳动锻炼。他们在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

同斗争中，进一步熟悉了自己所要服务、所要歌颂的对象，和工农兵群众也有了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并且逐渐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觉悟。上海不少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批反映当前伟大现实和具有鲜明革命性的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经验证明：只有全心全意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作家和艺术家，才能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够正确地表现人民群众，他们的作品也才能够为人民群众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六年来，我们上海的文学艺术工作，由于贯彻了这个方针，调动了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文艺问题自由讨论的风气形成了；创作兴旺的景象出现了；群众文艺创作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水平也显著地提高了；民间文艺的发掘、整理工作和创新工作，也都获得了新的成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了上海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形式、风格和流派的发展。各种艺术形式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题材的广泛和丰富表现了创作道路的广阔。我们的文艺作品，不仅表现了现实的斗争，而且也描绘了革命历史的斗争；不仅塑造了当代英雄的形象，而且也再现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戏曲表演上的各个流派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争妍的新局面。

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上海的文艺理论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大力培植下，迅速地壮大起

来。在这支队伍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已经树立，理论批评上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几年来，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美学问题、诗歌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规律问题、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音乐的民族化问题、歌剧的风格问题以及喜剧和历史剧问题等等的讨论，树立了自由辩论的良好风气。我们的理论批评，是结合着创作实践，贯彻了群众路线，遵循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发展的。因此，它有效地发挥了它的战斗性能和促进创作的作用。

十二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所以我们取得了上述的各项成绩。我们的成绩的确是很大的，所积累的经验也是很丰富的。但是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成绩，也要正视缺点，以民主的方式总结我们的经验，加强我们的团结，认真地克服缺点，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在这个春光明媚、万花竞艳的时候召开大会，欢聚一堂，商讨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大会是民主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也是繁荣创作的大会。我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们不能不万分兴奋，我们不能不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尽管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这样的成绩并不能满足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对我们的殷切的要求。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是十分正当的。我们应当有忠实地、全面地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雄心壮志。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一致、意气昂扬，充满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和坚定信

心，表现出移山倒海、降龙伏虎的英雄气概。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描绘我们时代的英雄，发挥高度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人们不断地前进。要产生这样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艺作品，要产生深刻地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掌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继续深入工农兵生活，加强自我改造；同时，还要刻苦钻研业务，加强艺术实践；不断提高艺术技巧。只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努力，我们一定会画出最美的图画，写出最好的诗篇，创造出不辜负我们光辉时代的伟大艺术品。

我们必须继续运用文艺的武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阴谋；继续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还要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民主的事业作出最大的努力。

同志们，我们的时代是无限光辉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是无比壮丽的生活，我们的人民具有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好文艺的忠实读者和观众。时代需要我们，人民需要我们。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们满怀信心。我们一定能完成时代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更坚定地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更勇敢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虚心学习，大胆创造，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精力饱满、信心百倍地奋勇前进！

毛泽东文艺思想万岁！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

我首先声明，我的发言既不全面，也可能有很多错误。我只是讲我个人心里的话。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畅所欲言的民主权利。我最近参加了一些会议，听过一些报告，现在又参加这个庄严的大会，我有很多的感触。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好好地运用文艺武器为人民服务。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叫：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文学事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可是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有时我也为这个着急，我还感到惭愧，甚至坐立不安。但有时我也会因为想到自己留下的东西不多，反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然而我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须认真写作，必须重视作家的勇气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文学》第五期，作者在大会上宣读了全文，发表时曾由本人删去多处(收入本卷时已予恢复)，"文革"初期"造反派"在作者家中抄去原稿，作为批判资料全文印发给某些机关。

和责任心。新中国的作家更不应该有但求无过的考虑。不过我又得承认，要去掉顾虑并不是容易的事。说实话，我并不怕挨骂，我受得住严厉的批评，有时给批评打中了要害，在痛了一阵以后，我反而感到心情舒畅。但是请允许我讲出我的缺点和秘密：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总想好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我还记得三年前有一位上海的大学生写信来说。他读了我的小说，后来犯了错误，受了批评，要我检讨。

我并没有照办，因为这是他自己和他那个学校的事情。我三十年前写的小说，反封建，即使反得不对头，也不会在新社会里起那么大的作用，好像一本小说就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我有位朋友去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久刊物就收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不用说，是迎头一顿棒打，有人甚至说作者别有用心。事实上这位文教战线上的老英雄不过在文章里批评了一个女售货员，还附带批评了他的一个学生。他没有在文章里重复人们常说的话，因此引起了这一场风波。固然读者有权对任何一篇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谁也不能乱打棍子，伤害别人。幸好这几年来编辑同志的胆子大多了，他们接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来信，并不太紧张，也不要作家低头认错。我们不要以为拿框框、捏棍子的人代表了舆论，其实占大多数的不写信的读者并不会同意他们。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都不敢稍露锋芒，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

关。前不久我们好些人谈起现在的文风，都觉得现在的文风跟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和当前的国内形势都不相称。“双百”方针已经发表好几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怎么还有那许多框框？为什么我们许多优秀作家还不能通过创作实践把文学艺术的百花园装饰得花红似锦呢？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位外国朋友到中国作客，他在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等等大城市进行了访问，他后来对人讲起他在每一个城市都受到热情的招待。我们的友情使他十分感动。但是他奇怪的是在不同的宴会上，他从不同的主人口里听到差不多相同的谈话。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花红似海、百鸟朝凤？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全国人民思想的一致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但词汇的相同就不值得夸耀了。要是许多人都用“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写文章，那才是人力物力的浪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我们人民的心灵是非常优美，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贫乏，我们作家的头脑也并不简单，我们的队伍中间也不见得有多少懒汉，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障碍。障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怕挨整的顾虑就是最大

的障碍。

我一再提到顾虑，并非在这里信口开河。在公开的集会上虽然很少听见讲起个人的顾虑，但是我和一些作家私下谈起来，我们都认为这种顾虑的存在正阻碍着创作的繁荣。(周总理在紫光阁座谈讲话中说：曹禺同志写《胆剑篇》时有些胆小)。我们私下也会批评某一位作者胆子小，顾虑多。其实我们中间谁又能说自己胆大呢？今天再没有人说《洞箫横吹》是一部坏电影，《布谷鸟又叫了》是一个坏的剧本了。可是当棍棒齐下的时候，有哪几位作家站出来讲几句冷静的话，发表一点合乎实际的意见？当斯汤达尔的小说给骂得一文不值，有人要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替右派分子受过的时候，那些研究西洋文学的专家，好像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现在有的是"事后诸葛亮"。他们看到别人挨棍子是不肯站出来打抱不平的，可能是害怕乱棍错打在他们的身上。然而我们国家需要的却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却是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来爱护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艺工作者(固然有些是非是一时看不出来的)。可是有些真假每个人都知道，真理和科学始终明如白昼。当浮夸盛行的时候，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也闭上眼睛，隐瞒真实，我们文艺工作者并不例外，不少的人热心用艺术武器为浮夸推波助澜。要是当时大家站出来讲真话，我们国家的损失便可以减少许多。我不是在这里批评别人。我自己就应当接受批评，因为我也写过文章替"浮夸"宣传。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热爱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并且准

备为它献身的勇气也是极其可贵的。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勇气，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愈辩愈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要繁荣创作，首先需要作家们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有人以为只要批评家笔下留情，多讲好话，就可以促成创作的繁荣。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据我看，只有在作家和批评家

互相学习、彼此帮助、互相尊重、携手前进，共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的紧密团结的局面下，才会有万花吐艳、百鸟鸣春的盛况。

这样的盛况是一定会出现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以无限兴奋、无比欢快的心情来迎接创作繁荣的高潮。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来了！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大会，会场外面一片大好的春光。我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就在春光明媚的五月，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本天才的著作，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它使我们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六年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说过："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去年四月我在日本东京对华侨同胞又说："今天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我在这里重述这两句话，我现在还十分激动。像我这样在旧中国生活了四十几年、在旧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多么深切地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我的写作道路上并不是铺满鲜花的。过去很少有阳光照亮我的书桌，在我的窗前永远是黑暗的寒夜。整整二十年中间，我和我的读者一起追求，一道挣扎，一同受苦；我和我的主人公一同经历那些悲惨屈辱的生活。我亲眼看见反动的官僚、恶霸骑在人民头上，欺压剥削，无所不为；好人受苦，坏人得志；我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有一个时期我像一个无家的孤儿，到处遭受白眼；在国外听见人用轻蔑的声调在我背后叫"中国人"或"支那人"，我常常红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就是在上海的马路上见到外国巡捕和大兵或者喝醉了的外国水手，我也抬不起头来。那些时候我心里有多少恨，多少痛苦，多少愿望！我多么希望祖国母亲的一双手来抚摩我心上的创伤。可是当时的中国像一个患病垂危的老妇人，她自顾不暇，只好让自己的孩子受人欺凌。在那些时候我空有满腔的热情，我写了一大堆病史，却开不出一张药方。我在黑暗和灾难的重重包围中冲来撞去，却始终找不到我所追求的光明。我苦了自己，也苦了读者。写作对于我成了苦役，可是丢开它，我更感到空虚。我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迟，我不能说我读了一遍、两遍，就完全理解《讲话》的意义，可是我那停滞的心灵已经震动了。以后我一次、两次……反复地思索那些浅显易懂的文字中所包含的光辉的思想，我不知不觉地冲出了重围，终于看到了广阔的大路。光明就在前面！我甩开了过去压在我身上的石头，我赶走了那些忧郁的思想，我好像从泥淖中自拔出来一样，感到一身轻快。我拿着这本照彻心灵的小书，回顾我后面那条长长的弯曲的路，我开始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么响亮的声音使我的头脑清醒了。

在我的眼前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遍地创伤的东亚古国中，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时代开始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黑暗和痛苦永远消失了。我的读者不再是给压在三座大山下面憔悴呻吟、艰苦挣扎的人民了，他们意气昂扬，满心欢畅，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用移山填海的力量，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广大地面上绘出了美丽的图画，

而且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些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者亲切地、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来。……

我怎么能不记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光明大道，又兴奋、又感激地奔到他们那里去？我怎么能不丢开过去写惯痛苦的秃笔跟他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大厦添一片瓦、砌一块砖？他们，我的读者，也是我的教师，我过去一心一意想为他们写作，可是我的作品对他们毫无益处，我跟他们离得多远！今天我终于到了他们跟前，同他们在一起，了解他们，学习他们。现在不是作家同读者、同主人公一起在艰难的地狱里受苦刑，而是主人公和读者带着作家向光明飞奔。

“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结合”，“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些简单的句子中间包含着多少发光的真理。我究竟了解多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仿佛进了宝山，走得越远，实践越多，越感觉到宝藏丰富。时间有限，我不在这里谈我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的生活同感受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幸福的开端。但是我越来越明显地认识了这个真理：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同感情、共呼吸，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也只有在作品真正起了“战斗武器”和“教育工具”的作用的时候，作家才算是表现了他的勇气、尽了他的责任。那时候什么框框、什么棍子都不在话下了。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正在团结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会场，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会场外面，风和日暖，百花争妍，到处热浪滚滚，生气蓬勃。全国人民，全上海人民正在用紧张的劳动迎接一九六二年的春天，献出自己的全副精力和全部智慧，要把我们美丽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我们的祖国在前进，上海在前进，任何大大小小的困难都挡不住巨人的雄伟步伐。我们的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它是团结的大会，也是前进的大会。团结是为了前进，前进就是要繁荣创作。为了团结，我们应当在会上畅所欲言，以诚相见，让心与心接触，使大家团结成一个人；为了前进，我们必须丢开一切的顾虑，抱定为人民立功的决心，精力充沛、热情横溢，有几分热发几分热，有多少光放多少光。让我们整个上海文艺界团结得像一个牢固的整体，心连心，手携手，奋勇前进。我们不能辜负我们伟大的时代，我们更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出现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

优美的艺术享受*

——为上海评弹团到香港演出而写

听说上海评弹团要去香港演出，我到仙乐书场去听那些优秀的艺术家演唱，我一连去了两天。

在上海的作家中间，我不算是"评弹迷"，四川人听苏州话，不能说字字全懂，因此欣赏力总得打一个折扣，而且我的兴趣很广，时间却有限，我无法经常去书场坐两三个钟头。不过我也有机会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在家里欣赏一些评弹的节目。有时我自己并没有精神准备，我打算做别的工作，可是一听就走不开。事情给耽误了，但我并不懊悔。有一位朋友（奇怪，他也是四川人）说，"听评弹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我同意他的话。又有一位朋友（他也是作家）说，"听评弹是一种学习。"我也同意他的话。我觉得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的确有一种塑造人物的出色本领。靠一张嘴和一两样简单乐器的伴奏就可以把一个甚至几个人物说得活灵活现，仿佛他们就在你身边，不仅相貌、举动和服装清清楚楚，而且精神面目与内心活动都很鲜明；不仅性格突出而且语言生动。你闭上眼睛，好像那些人便在你面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香港《文汇报》。

前活动,各人有各人特殊的语言,不单是口音不同,而且从话里还可以听出讲话人的性格来。传统节目中好些人物都是我十分熟悉的,许多故事和情节我从小就知道,有的早让人写成了小说,有的早给人搬上了舞台。同样一个人物,经过不同艺术家的加工会露出各种各样的光彩,尽管有深有浅,每一种面目都能够吸引人。现在这些人物到了评弹艺术家的嘴上,他们的面貌更生动了,心灵更丰富了,声音更响亮了,语言更活了。不说像孔明、张飞、赵云、武松这些人人皆知的大英雄,便是武大郎那样的"小人物"的命运都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真是出色的艺术家!真是生花的艺术!有一次我听《武松别兄》,几乎落了眼泪,艺术家从现实生活里吸取了不少的东西,丰富了他的人物,那个"三寸丁谷树皮"的真诚的感情和喜怒哀乐深深地打动了我。艺术家把人物说活了。又一次听《长坂坡》,我觉得张飞和赵云就活在我的眼前,他们同我非常接近,我看透了他们的心,他们的英雄气概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增加了我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勇气。还有一次听《三笑》里的"追舟",我笑得多么畅快。那个好像狡猾、其实老实的"船家"划着小船替年少风流的"才子"去追一只官船,追一个女人。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每个人的心毫无隐瞒地让听众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彼此并不了解,因此闹出了好些笑话。……我不多举例了。真实的人物不一定是这样,然而艺术家把他们刻划得十分细致,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有血有肉。不论哪一个朝代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真是假,一经评弹艺术家加工,他们都会活在听众的面前,叫你爱他,同情他,或者恨他,反对

他，总之，你不能无动于衷。像这种塑造人物、刻划人物的手法和本领，的确值得人学习，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作家有启发的作用。……

我在仙乐书场度过了两个晚上。靠了幻灯片的帮助，我连唱词也全听懂了。我非常感谢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演唱给了我多大的享受，同时我也得到了不少的启发。接连不断的掌声说明了听众对节目的热烈欢迎。场子里经常有人低声赞叹，点头微笑；书场外不少的人站在门口等退票。我刚刚下车就受到包围，人们一拥而上问有没有多余的票子。上海人的确爱好这种说唱的艺术。那么上海人把他们非常喜爱的艺术送到香港去，也就说明他们对港九同胞有多么深的感情了。

我不是在信口说空话。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感情。我到仙乐书场不仅是为了学习和享受，我还要请这些我所敬爱的艺术家把我的心意带给港九的同胞。一年前我在这个美丽的岛上度过三四天愉快的日子，我也曾见到一些同胞的生活。我们关心你们，想念你们。我们把你们曾经熟悉的艺术送到你们的眼前，你们一定能领会我们的心意，你们一定喜欢这些优秀的艺术家的演唱；这是在你们出生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艺术。你们要是在场子里安静地坐下来，在这种优美的艺术享受中，你们还会感觉到你们的心跟我们的心贴得多么近，一千万上海人民的关怀和问候将通过台上卓越的说唱艺术传到你们的心中。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不能占用报纸上更多的宝贵篇幅来介绍评弹艺术的优点。我看，已经没有

这样做的必要了。上海评弹团已经到了你们那里，你们会听到那些艺术家的亲切的声音的。那么，再见，请接受我诚恳的问候。

6月，在上海。

古巴必胜！*

甚至在静夜，打开收音机，我还听见海涛一般的人声，那么多的人充满力量和信心，愤怒地高呼："古巴必胜！"

在凛冽的寒风里和在暖和的阳光下，一连几天，人们不分男女老少，都拿着古巴国旗，举着卡斯特罗总理的肖像，走上街头，发出怒吼的声音："古巴必胜！"

我不论走到哪里，不论见到什么人，我都听见人们用热情的语言谈论古巴。千千万万的人拿着信走到报社："请把信转到古巴去罢，在信里我献出了自己的心。"

有一个下午，我也举着古巴国旗，同人们一起，在广场上叫哑了声音："古巴必胜！"在这个时候我真愿意拿出自己的心送到古巴。

古巴！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来不曾踏过这个国家的土地，也没有见到它大片美丽的甘蔗林，可是在我的眼前，加勒比海上的明灯越来越明亮。在我们这里连孩子们也相信加勒比海上再大的风暴，都减少不了那盏明灯的光芒。我们的心全向往着古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文学》十一月号。

究竟是什么把千千万万颗心都吸引到古巴去呢？

人民！古巴的人民！站起来了的革命的人民，英雄的人民！

请听一听这些不寻常的英雄的声音：

"我们出生在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的自由国家。我们不会同意做任何人的奴隶，除非我们的国土沉入海底。"（一九五三年二十六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法庭上的演说。）

"我们保卫我们权利的决心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在这里，全国人民，男人和女人、儿童、青年和老人，都对自己说：'或是战胜回来，或是战死回来'。"（卡斯特罗总理的电视演说。）

"我们对肯尼迪从来没有抱过幻想，他企图扼杀古巴革命，我们应该用血和火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大学生战士桑切斯的话。）

"我们到这里来献出我们的鲜血，我们还决心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献出我们的生命。"（工人民兵巴维洛尼亚说。）

"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死敌。我们有子弹、棍棒和牙齿，决不让他们踏上祖国的一寸土地。"（女战士米拉斯说。）

像这样的充满英雄气概的豪言壮语实在太多了。我们中间谁不会凭记忆背出五句十句？谁又能说自己不曾受到它们的鼓舞？英雄的语言和英雄的事迹不断地引着我们的心飞越过加勒比海。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烈火一样燃烧的心……不就近在我们的眼前？古巴的人民！难道还有比他们更英勇的人民么？

伟大的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称他的人民为"英雄的

人民”，“不可战胜的人民”。他自己便是英雄中的英雄。他和他的人民走过了多么艰苦的道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一次失败了，又开始第二次；一些人倒了，另一些人又出来接过武器，从十二个人、七支枪终于发展到团结成一个整体的七百万人和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的胜利的确得来不容易，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了自己的血汗和烈士的生命换来的。

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古巴人民是何等坚强的人民！不用说，美帝国主义的炸弹和炮火吓不倒他们；敌人的破坏活动和阴谋诡计更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站起来了，而且昂头挺胸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切切实实地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英勇、坚决地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这样的人民在原子弹和核武器面前发抖，这是做梦！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者才会做这样的梦！要这样的人民在海盗的“封锁”面前投降，那是发痴！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者才有这种痴心妄想！是谁在吉隆滩歼灭了入侵的敌人？是谁打落了U—2飞机？……古巴人民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七百万人好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站在加勒比海畔，不论在风里雨里都一样屹立不动，他们庄严地向全世界人民宣言：“革命势不可挡地继续向前向未来前进。”革命人民的团结的力量是无敌的，是任何强大的武器所抵挡不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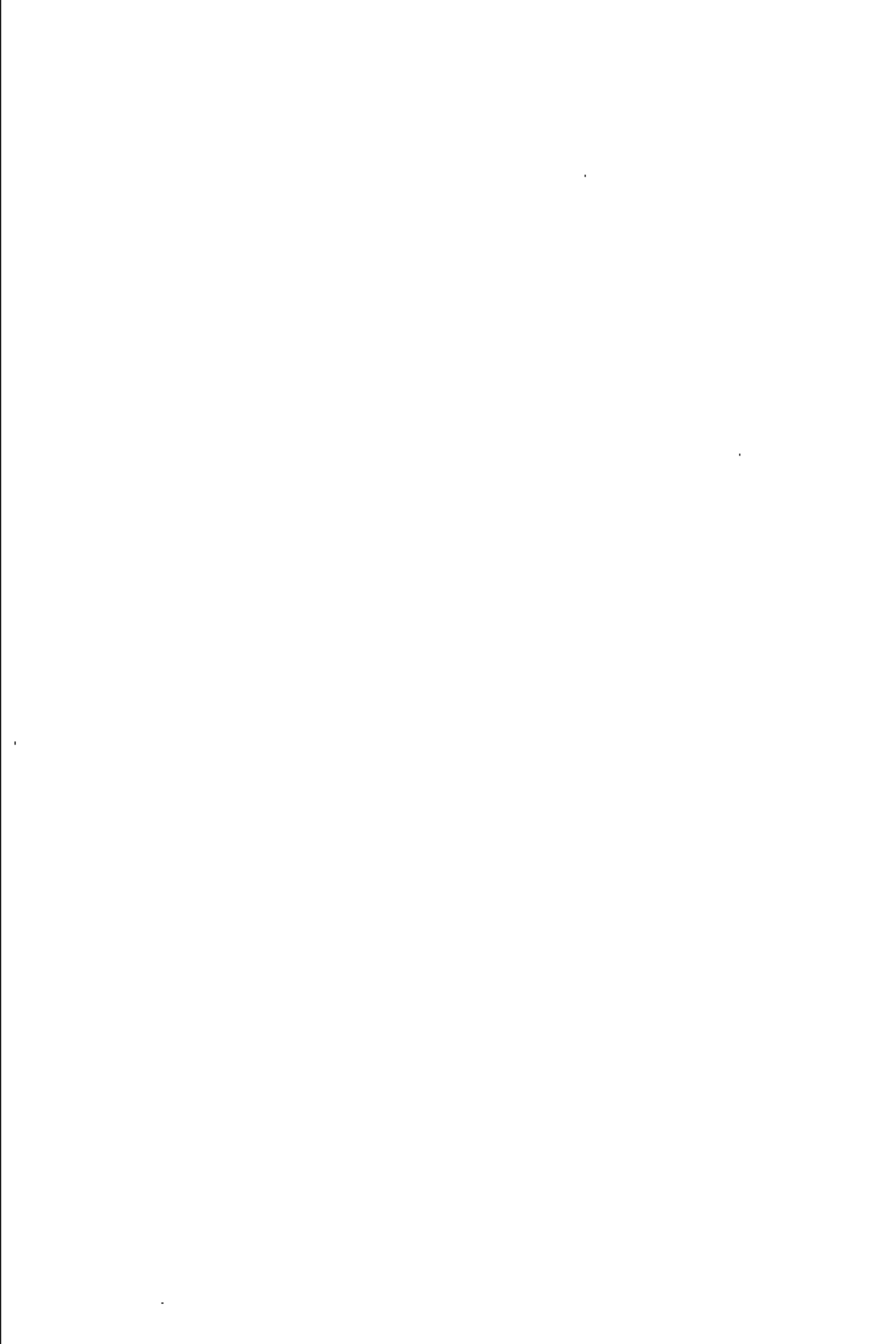
谁能够挡住古巴人民向前迈进的步伐呢？七百万人的雄壮声音：“古巴必胜！”不就压倒了一切躲在幕后的吱吱喳喳和一切花言巧语吗？不就压倒了一切流氓骗子和海盗的战争叫嚣吗？

“古巴必胜!”从收音机里送出来用各种语言高呼的这一句响亮口号!我分辨不出这里有多少人,有多少国家的人的声音。全世界人民都在叫喊:“古巴必胜!”这不是口号,这是坚强的信心。古巴人民是全世界人民光辉的榜样,是中国人民热爱的朋友。我们有这样的朋友,真感到万分自豪。

“古巴必胜”的声音越来越高。我不由自主地跟着播音小声叫起来。我仿佛又到了人民广场,在游行的队伍中间;我仿佛到了古巴,到了哈瓦那,和古巴人民在一起,在海滩上,在山坡上,在战壕里,在任何地方……我更兴奋,我更充满信心,斗志昂扬,我觉得我的心和古巴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

我珍惜,我感谢这种心连心的友谊。亲爱的古巴的弟兄,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坚决支持你们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你们任何正当的主张和要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让大家手拉手肩靠肩一道前进吧。你们的朋友也愿意为着你们的胜利献出一切。

收音机早已寂然无声。可是“古巴必胜”的雄壮声音依旧留在我的耳边。这个声音是不会消失的。在一个长时期里我们的心上都会反复地响着这一声怒吼,这一声欢呼:“古巴必胜!”古巴一定要胜利。



一九六三年

迎接一九六三年*

前几天，我收到了日本朋友寄来的贺年片。这是最早的一张贺年片。接着国内的朋友也陆续寄了祝贺新年的画片来。我把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美丽的画片放在桌上，一一地拿起它们，仔细看了几遍。在每张涂满友情的画片上，我闻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气息。薄薄的纸片还在发光、发热，仿佛整个房间一下子暖和起来了。我兴奋地抬起埋着的头，眼前一片亮光，一九六三年像一个通体光明的巨人站在窗外敲着玻璃，要我打开门去迎接它！

对于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新年，我应当带什么礼物去欢迎它呢？……我继续向前看，我的心里好像烧起了一股火，在万丈光芒中我看见了那么多的美好的希望。一九六三年要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要怀着更大的信心，抱着更多的勇气，昂起头，挺起胸膛，张开两只胳膊去迎接一九六三年。我要把我的心献给它。我要同全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一切力量维持它的光辉！

我并不曾忘记过去的乌云暴雨，我也无意缩小我们前进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解放日报》。

路上的困难，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正在加紧进行种种的阴谋活动。和平的最凶恶敌人——美帝国主义仍在张牙舞爪，横行霸道，到处为非作歹，屠杀人民。……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人民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谁也不会忘记，用不着我在这里替它算细帐。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乌云时聚时散，可是太阳始终高悬天空。不论狂风暴雨有多么厉害，灯塔却一直在放光明。我们亲眼看见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论在风里雨里，云里雾里，红旗永远飘扬，而且越举越高。

"反华大合唱"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我们知道，造谣中伤，颠倒是非，任何不正当的手段都不能动摇人民中国的一砖一瓦。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个打不散的钢铁一样的整体，经得住水冲，也经得起火烧，是吓不倒，压不坏，咒不死，骗不了的；《社会主义好》的雄壮歌声表达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抱负；在阶级斗争中，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那些东拼西凑、不成腔调的"反华大合唱"，早就让我们的春雷一般的凯歌压倒了。今天响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是亿万人民的声音，是亿万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大合唱"。这种气贯长虹、响彻云霄的革命人民的声音是任何势力所不能阻挡的。至于牛鬼蛇神的"反华大合唱"，它同人民的声音比起来不过是一碰就断的游丝罢了。它能够损害我们一根汗毛么？不能！绝不能！"反华"的调子不管唱得多么高，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人民中国并没有给"反"得弱下去，却一天比一天更强大。

看，在那里熊熊燃烧的不就是加勒比海畔斗争的烽火么？

半个天的红光照亮了所谓“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照亮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七百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古巴人民威严地屹立在加勒比海畔，他们用昂扬的斗志、坚定的决心和英雄的气概，保卫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颠覆活动、阴谋勾当、新式武器都挡不住古巴人民的前进步伐。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吉隆滩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还有人替美帝国主义擦脂抹粉，一方面给纸老虎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又主张人虎同榻，但是，在一九六二年的天空中闪耀的绝不是帝国主义的“命星”。它们坏事做得越多，人民的眼睛越亮，牛鬼蛇神见不得阳光的丑恶面目已经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脖子上套着无数根“绞索”，英勇的日本人民在拉紧“绞索”，南朝鲜人民在拉紧“绞索”，全世界革命的人民一天一天地在拉紧“绞索”，用不着我们替它算命，它的日子很不好过，它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在一九六三年的天空中灿烂发光的仍然是人民的“命星”；在一九六三年的天空中迎风招展的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人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革命的红旗越飘越鲜明。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的红旗下面，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继续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我们有同志，有朋友，有无数宝贵的经验，有无限光明的前途。我们的旗帜举得越高，我们的同志越多，我们的朋友也越广。坚持真理的人永远不会孤立。敢于斗争的人一定得到胜利。一九六三年是属于坚持真理、敢于胜利的人

民的。

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人的确是幸福的事情，的确是值得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我心里那股烈火就是让这种幸福感、这种自豪感燃起来的。我不仅要打开门去迎接一九六三年，我还要打开自己的心去迎接一九六三年。我要献出全部力量同一切的牛鬼蛇神斗争到底！

为《红色宣传员》欢呼*

几个到过平壤的朋友见着我，总喜欢谈朝鲜的事情。我们都爱做朝鲜的梦。我只要闭上眼睛想一想，就会看见许多动人的场面，听见许多热情的声音。我常说我把朝鲜带回来了，又说我把心留在朝鲜了，朋友们懂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大家都爱上了那个国家，因为我们都在那里过了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或者更可以说，都在那里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我们忘不了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我们更忘不了那些勇敢、勤劳、热情的人民，那些待我们像待亲人一样的朝鲜的父母、兄弟、姊妹。

有一个时期我接连住过不少朝鲜的农家。美国飞机野蛮、残酷的轰炸始终摧毁不了战斗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丰富感情。农村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到处都有歌声和舞姿，老大爷、老大娘、大嫂子、弟弟、妹妹……他们严肃地斗争，辛勤地劳动，艰苦地生活，乐观地过日子，可是他们接待中国同志又是那么慷慨、亲切、善良。我们这些人中间，谁没有从朝鲜带回来说不尽的恩情呢？谁不因为朝鲜人民近年来在各方面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大众电影》第四期

巨大成就而万分高兴呢！朝鲜人民骑着千里马向前飞奔接连攻克高地的英雄气概，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常常根据传闻、凭着想象，兴奋地描绘朝鲜农村美丽的新面貌，我们感到莫大的幸福。我们深深地爱着朝鲜的亲人，我们觉得在精神上我们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朝鲜影片《红色宣传员》来了！我真感谢朝鲜的亲人们给我们送来这个珍贵的礼物。我又激动又喜悦地看完了影片。我不用多提艺术的享受，难道还有比崇高的理想和优美的心灵更能振奋人心，更能激发人们美好的情操的么？那些人的精神世界，他们远大的理想和愿望，热情忘我的劳动，团结友爱的气氛，朝气蓬勃的农村景象……在看着电影的一个半小时里面，我好像也骑上了千里马，我的心也仿佛长了翅膀，向着光明飞奔。影片快要结束，宣传员李善子看见堆得高高的粮食袋，一下子扑过去，靠在上面流着眼泪的时候，我也流了泪。可是我又多么高兴，我只觉得满目阳光，到处都是希望，我充满了感情，我也愿意为着社会主义的事业献出一切。朝鲜的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心和主人公的心来换观众的心，把观众引进这么优美的精神世界里去，这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但也是最高的艺术的享受！

面对着银幕，我仿佛又到了朝鲜，又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影片的故事、场面，甚至对话都是非常朴素，然而它们强烈地打动观众的心。我不过是受到感动的无数中国观众中的一个。影片上的那些人我仍然很熟悉。每张脸对我都显得十分亲切，那样的笑容，那样的眼泪，那种充满感情的眼光，那种

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干劲，在艰苦的、战争的日子里，它们给了我多少温暖！多少勇气！多少信心！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切身感受，千千万万到过朝鲜的中国同志都记得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心坎里保留着不少光辉的英雄形象。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怀着敬爱的感情不断地讲到"朝鲜同志"。"朝鲜同志"这个称呼里包含着多少美好的东西。我们想到曾经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过、战斗过，我们深深体会到同甘苦、共呼吸的快乐。我们始终热爱着朝鲜同志，而且我们珍惜这份感情。

在影片上出现的那些人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好同志，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至今还刻印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见过他们怀着那么坚强的意志进行激烈、艰苦的斗争，我们也见过他们热情洋溢、干劲冲天地从事和平的建设。但是今天再见到他们，我觉得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美丽的新农村，每个人的面貌都显得更加光彩了，心灵更加丰富了，眼界更加广阔了，意气更加昂扬了。特别是红色宣传员李善子的形象，她的喜怒哀乐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像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爱说爱笑的圆脸姑娘，我在朝鲜农家不知见过多少。可是现在我才看清楚了她感情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这样一个平凡的年轻人，她内心有着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吸引人们、鼓舞人们、团结人们、把人们引向前进道路的东西。我想把这些东西称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心灵之火"。这把火烧毁了那些自私自利的落后感情，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然后改变了整个合作社的面貌。年轻的宣传员进行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教育

改造群众的工作是多么艰苦、多么细致、周到的工作。李善子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她从不灰心，一直虚心、认真、踏实地坚持下去，终于得到了成功。首先给争取过来的是在战争中给美国鬼子害得家破人亡、性情乖僻的寡妇李福善，热情的帮助和亲切的关怀温暖了她的孤寂的心。她搂着善子，满脸泪痕地说："我错了。"其次是不安心搞农业生产的高中毕业生崔官弼，善子用周到的照顾、直率严厉的批评和大公无私的行动感动了他，他看见善子用身体堵住堤坝决口的时候，一切个人主义的打算全让那奔流的水冲走了，他痛苦地责问自己："爸爸和我为别人做过什么？"最后改变的是官弼的父亲崔镇午，那个狭隘、保守、固执、自私的老农民，他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只图多挣工分，不肯认真劳动，受了批评，就装病躲在家里，有一个晚上他发觉善子带病整夜偷偷替他干活，由于过度疲劳在田边睡着了，他又感激又惭愧，含着眼泪脱下自己的上衣盖在善子的身上，一个人起劲地在地里除起草来。落后的前进了，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给烧掉了。大家的心连在一起了，目标一致了。人们同心同德、齐步齐心地跟自然作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丰收。在完成了这样的艰巨工作、获得了出色的成绩之后，李善子到平壤去见了金日成首相，受到了表扬。一片笑声、歌声和鼓声欢迎她回到农村，群众要求善子讲话，刚刚贴着粮食袋流过眼泪的善子只说了一句："从明天起，我们一定要积更多的肥！"就激动得再也讲不出来了。一位老大娘在旁边接一句："这个孩子，她心里就只知道干活儿。"在一阵男女群众的笑声之后，银幕上现出了最后一个画面：李善子和别

的人拿着农具走向地垠，远远地现出了农村美好的远景。这个结尾多么真实，多么动人！一句短短的话，几声快乐的笑，一个常见的画面……不罗嗦，不做作，却又非常明确。有一种朴素的美，还流露出很深的感情。“多积肥”、“只知道干活儿”……这里面包含了说不尽的意思。观众完全明白，而且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深思，不能不联系自己想到将来，想到无限美好的前途和极其光荣的事业，不能不把自己的感情化在实际行动里面。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英雄形象挺立起来了。这个为党、为国、为人民忠心耿耿的好姑娘挖出自己鲜红的心放在观众的眼前，她这颗心是谁都看得透的。谁能不爱她、敬她、相信她、跟着她一起前进呢？

我看完了影片不断地在心里称赞：“真好！真好！”我的心又给拉到了朝鲜农村。我看到了长得那么好的庄稼，堆得那么高的粮食袋，笑得那么愉快、干得那么起劲的男男女女。我好像又坐在简单、整洁的农家木廊上，听老大爷、老大娘谈心事、话家常。他们的话里有辛酸的眼泪，也有胜利的喜悦。胜利来得并不容易啊。道路很长，路上又有数不清的绊脚石，但是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朝鲜人民是不会让困难吓倒的。他们终于把高地拿下来了。我为他们攻克了粮食高地的伟大胜利欢呼。我为他们不断的前进欢呼。我为红色宣传员李善子的十分出色的工作欢呼。我为伟大的兄弟国家朝鲜和它的英雄的人民欢呼！影片结束了，可是生活仍然在向前发展。朝鲜人民的英雄气概、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又一次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李善子优美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始终非常鲜明。我

知道她不是一个特殊的人，在朝鲜有无数的李善子。她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她们的青春在遍山遍野开出美丽的花朵，使朝鲜的农村变得越来越美丽。

我们生活在一个英雄模范成群结队出现的时代。社会主义的英雄模范是新生活的创造者，他们向前迈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然而他们并不是单独前进的，他们鼓舞人们前进，带动人们前进。他们的鲜红的心，像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朝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感谢剧作者赵白岭同志给我们绘出了这么一个永远发光的英雄形象。感谢朴鹤同志给我们导演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影片。我还不曾看到最近开始在上海公演的舞台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不论是看过影片的或是看过舞台剧的）都会受到很大的感动，都会精神振奋、意气昂扬地同英雄的朝鲜兄弟姊妹们手拉手肩并肩向着这条光明大道前进，不断地前进！

4月7日于上海。

一九六四年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声音*

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激动了中国人民的心，也激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美国占领军公然在巴拿马运河区向赤手空拳的爱国示威群众开枪，屠杀和平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妄想用血腥镇压来扑灭巴拿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巩固它对运河区的占领，保护它从巴拿马人民那里偷来和抢来的赃物，它甚至妄想威胁各国人民，保护它在世界各个地区进行的偷盗抢劫行为。但是它的如意算盘是靠不住的，它的阴谋勾当是注定要失败的。英雄的巴拿马人民是吓不倒的，世界各国人民也不容许强盗持械行凶、杀人放火。美帝国主义在巴拿马放的火，一定会烧到它自己的身上。巴拿马人民的血洒到侵略者的脸上，美帝国主义逃不掉全世界人民的惩罚。

这些年来，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个地区干了多得数不清的坏事。它借口推销"民主"、传播"自由"，杀了无数的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有时明目张胆地抢，有时偷偷摸摸地盗)。它不仅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它还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强盗。它讲"民主"只是为了放胆地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它讲"和平"只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上海《解放日报》。

是为了更多地进行不宣而战的“局部”战争；它讲“人道”只是为了掩饰它那种野蛮、凶残的种族歧视；它讲“自由”只是为了更无顾忌地掠夺和奴役它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尽管有些人在替它擦脂抹粉，想把它扮作“和平天使”，但是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受过它的毒害和正在遭受它的毒害的人民更不能忘记那些血海深仇。南越人民绝不会把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枪弹、毒药当作杨枝甘露。刚果人民绝不会把杀害卢蒙巴的盗贼看作“明智的”救星。巴拿马人民也绝不会把刽子手的枪弹当成善意的礼物，他们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为维护国家主权斗争到底。这只是美帝国主义的无数罪行中的几件。大家都知道它在朝鲜还欠下那么一大笔血债！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喜欢制造舆论吹嘘自己，欺骗人们。但是它们压制不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世界人民怎样看待美帝国主义呢？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披着“人”皮的狼，最恶毒的吸血鬼，最狡猾的狐狸，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称号太多了，倘使全写下来，恐怕写一天也写不完，不过“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断语就包括了一切。美帝国主义这只野心狼，连它的朋友和伙伴，它也要狠狠地咬几口，它哪里肯放过它一向视作眼中钉的各国人民呢？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巧辩，罪行总是掩盖不了的，责任总是推卸不了的，美帝国主义的确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于这样凶恶的敌人，必须进行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主席就巴拿马人民斗争发表的谈话，是六亿五千

万中国人民的声音，也是全世界不愿意做奴隶的广大人民的声音。这个响亮的正义的声音，对于正在受苦和正在斗争的人民有极大的鼓舞的力量。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毛主席的谈话指出了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条道路就是伟大胜利的保证。毛主席说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近年来，我们在许多国家里都听见过："美帝国主义滚出去"的战斗口号。今天全巴拿马的人民都在高呼"美帝国主义滚出去！"为了使这个口号成为现实，英雄的巴拿马人民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的确到了美帝国主义滚出巴拿马运河区的时候了。刚才看到中东通讯社的一则巴黎消息，说"巴黎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今天在巴拿马运河区所面临的局势，类似法国和英国八年前在苏伊士运河所面临的局势"。这倒是法国人的真心话和旧伙伴的经验之谈。八年前英、法帝国主义在苏伊士运河区干了些什么坏事，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有目共睹的。苏伊士运河的前途就是巴拿马运河的前途。美帝国主义除了"滚出巴拿马"以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不管它手里有多少原子弹、氢弹，它也没法赖在巴拿马不滚出去。巴拿马人民一定会把它赶出去！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在一九六四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无恶不作的美帝国主义又在巴拿马共和国放了一把火，美国占领军首先向带着巴拿马国旗进入运河区的一名学生开枪射击，后来又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进行野蛮残酷的屠杀，打死打伤共三百多人。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一致的愤怒和痛恨；巴拿马人民的正义行动和英勇斗争得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一致的尊敬和支持。英雄的巴拿马人民是吓不倒、杀不尽的。美帝国主义在巴拿马放的火一定会烧到它自己的身上。它在巴拿马抢夺的财富一定要退还给巴拿马人民。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斗争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从巴拿马运河区滚出去！

美帝国主义是臭名远扬的国际宪兵，它也是横行霸道的世界强盗。我没法在这里列举它的数不清的罪行。我只举出其中的几件：它曾经拿日本人民的血肉作新式武器的试验品，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准备投降的时候，它在广岛和长崎接连丢了当时它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杀死二三十万和平居民，至今每年还有一百几十个人因患原子病死亡。它在朝鲜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侵略战争，使北半部多数城市和乡村变成废墟，它到现在还赖在南半部的土地上行凶作恶，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它为了掠夺刚果的丰富资源，杀死刚果的民族英雄卢蒙巴。它在越南南方进行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拿飞机大炮屠杀人民，用化学毒药使得草木庄稼都不能生长。它到现在还强占着古巴的关塔那摩，对古巴不断地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它至今还霸占着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千方百计阻止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它霸占着日本的冲绳岛，在那里建成了以我们中国为目标的亚洲最大的核武器基地。像这样双手染满了各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呢？是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呢？是！当然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尽管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还在他的"国情咨文"里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最后目标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尽管有人大肆宣传吹捧这个国情咨文，尽管有些背叛人民的人昧着良心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称赞它的"明智"，甚至要把它变成"和平天使"，以为屠刀不放就可立地成佛。但是巴拿马人民的血是永远洗不掉的，它揭穿了一切坏蛋和骗子的谎言，让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谁都知道美国派遣了一百多万军队驻在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它在三十五个国家里建立了九百多个军事基地，还在扩

建十五个洲际导弹基地。每天二十四小时里都有美国飞机载着氢弹在空中飞行，都有美国核潜艇在海洋中游弋。难道这就是约翰逊所说的"没有战争的世界"吗？难道这都是"和平天使"的仪仗队吗？不，这都是野心狼的牙齿。朝鲜人民称美国侵略军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在越南南方、在古巴、在巴拿马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只有野兽才做得出来的。全世界人民称它为"和平的敌人"。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不是和平的敌人，还能是什么呢？

美帝国主义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而不受惩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有句古话："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美帝国主义甘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它一定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惩罚。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美国侵略军行凶杀人以后居然蛮横地把巴拿马人民称为"暴民"，一再叫嚷要继续霸占巴拿马运河，唱起道地殖民主义的腔调，摆出十足帝国主义的嘴脸，想用武力使英雄的人民低头。但是巴拿马人民的答复是继续展开英勇斗争保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侵略，决不屈服让步。全世界人民的答复是，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巴拿马人民站在一起。中国人民的答复是，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行动。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就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声音，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音。这是一个庄严的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正如毛主席所说，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在全世界人民的坚决支持下，巴拿马人民的伟大的爱国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从巴拿马滚出去！巴拿马运河区一定要回到巴拿马人民的手中！

战争与和平*

——答松冈洋子

松冈洋子先生：

我很感谢您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同您和《读卖新闻》的广大读者谈论有关和平的问题。

读着您的来信，我感到非常亲切。您一开头就描写您过去抱着孩子躲空袭时的心情，这使我想起了若干年前我在广州楼房底层听见飞机俯冲、机枪扫射、炸弹爆炸的情景。您和我在那些时候的心情虽然不同，可是我们同样热爱生命，热爱和平。我曾经几次立誓要为制止侵略战争尽最大的努力；从您的来信里我看出来，您对保卫和平的事业也非常关心。您谈起您和多数日本人的那种“不要战争”的心情，那种“反对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心情，我很了解，而且十分同情。正如您所说，日本是唯一的、而且曾经三次遭受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灾害的国家。日本人民要求禁止核武器、制止核战争的意志非常强烈，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是十分正当的。原子弹虽然从

---

* 本篇最初摘要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日本《读卖新闻》。所附松冈洋子来信为瞿麦译。

未落到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中国人民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决心也是极其坚定的。

说实话，再没有比中国人民更热爱和平、更需要和平的了。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相比，我们从战争受到的痛苦，都不能说是不多。拿我个人来说，我的六十年的岁月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给我带来数不清的灾难。我们中国人在长期遭受战争灾难之后得到了和平建设祖国的机会，这个机会来得多么不容易，因此我们非常珍惜它。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十五年中间，全国人民紧密团结，用忘我的辛勤劳动，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改变祖国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在工农业生产上(不是在军备竞赛上)超过世界上富强的国家。这些年中间有不少日本朋友访问过中国，我的话是真是假，我们这里有的是和平建设的气氛，还是战争的气氛，我们的客人可以随便谈出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几次访问日本的时候，常常对朋友们谈起，我们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里含有不少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感情。这友谊正是在我们为"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共同努力中发出更大的光辉的。为什么我们两国人民要在日本岐阜市和中国杭州市立下两块"中日不再战"的石碑呢？为什么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禁止原、氢弹的运动呢？这不正是说明我们人民同样地要和平、不要战争吗？

中国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的态度一向是十分明确的。中国的主张和行动从来是光明磊落、理直气壮的。我们从不隐蔽我们的观点。然而为什么在贵国还有人误解它们呢？别

的国家的朋友也曾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听到不少离奇的谣言，有点替我们担心。其实这些谣言不仅是通过口头传播，而且一再地印在纸上。有人一口咬定中国人“好战”，说我们要发动热核战争，准备让自己人死去三亿 叫人类死去一半，以便在死尸堆和废墟上建设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又不合情理。可是散播谣言的人有名有姓，又掌握着巨大、完备的宣传机构，他们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有凭有据，令人不能不信。其实说穿了也很可笑，美国自己公开宣布已经贮存了两万五千个核弹头，而我们中国连一颗像美国丢在广岛和长崎的那种原子弹也没有，我们用什么来发动热核战争呢？我们有什么办法使人类死去一半呢？

中国人口众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拿我国的土地和自然条件相比，我国人口的密度还不及英、荷、比、法等国家，况且我国拥有尚待开发的丰富资源，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任务又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所以我们并不因为人口多而担心。不过我们现在也在提倡计划生育，我们以为这样做，对我国人民健康的保护和一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的看法和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在人民中国每个人都受到尊重和爱护。我们救活了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的钢铁工人，我们让年轻工人的一只断手复活，在我们这里连自小瘫痪的姑娘也能念完大学、就业结婚，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医学特别发达，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有它的优越性。一个人的命运常常得到整个社会的关心，任何人遇到困难，四面八方都有人伸出手来援助。不说三亿人，人民中国

连一个人的生命也看得十分宝贵。我们是否"好战"，日本朋友非常清楚。翻遍历史，从未见中国军队踏上日本的土地，一千二百多年前到过日本的中国的文化使者鉴真大师今天还受到日本人民的崇敬。一向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也从未把侵略带到任何国家，我们输送出去的只有友谊。正因为我们长期遭受战争的灾难，我们对战争才有深的体会，对战争的性质才有深的理解。别的不讲，单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回想到过去的痛苦，就不能不恨帝国主义。我知道世界上有些好心人不愿意听到"帝国主义"的字眼，他们以为一提起帝国主义就有所偏袒，还有可能得罪别人，引火烧身。然而事实如此，我不能撒谎：我一生经历过的大小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那些战争规模不同，方式也不一样，有时帝国主义者把军队送到我们国土上直接参战，有时他们站在背后教中国人打中国人。甚至军阀混战，也要把帝国主义当作靠山。我少年时期住在成都，某国领事馆就在我住处的隔壁，每次战争的前后，执政的军阀总要去拜访那位领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不是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内战就打不起来。今天要不是美国军队霸占我国的台湾省，台湾早已回到祖国的怀抱，许多离散的家庭也可以团圆了。台湾离美国那么远，蒋介石同美国又非亲非故，为什么美国军队要远迢迢地跑到台湾来，美国的第七舰队要封锁台湾海峡，不许中国人同中国人往来呢？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除了一个：侵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战争的根源了。美国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就是战争的根源。只有消除战争的根源才能够制止战

争，不会使“不要战争”的愿望成为空话。

我同意您的见解：和平是不能分割的。我们不能只求炸弹不落到自己的身边，而别处流血遍地，就可以熟视无睹。我们不能不关心今天在越南南方发生的事情。美国军队直接参加对南越人民的战争，美国军火（也包括化学毒剂在内）残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使大片村庄变成废墟。为什么美国军队要远渡重洋到越南南方来作战呢？难道南越人的生存妨碍了美国的安全？受过战祸的日本人民，一定愿意看见南越人民得到和平。南越人民的面前只有两条路。放弃抵抗，乖乖地给关进所谓战略村，让美国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便是坚持斗争，把不请自来的美国军队赶出去。在某些人看来，关在战略村里做牛马才是“和平”，坚持斗争就是“好战”，而在南越人民看来，必须把侵略者赶走，才有真正的和平。可见，和平有真有假。战争也有两种：美国军队用美制新式武器屠杀南越人民是一种，南越人民用缴获的美式军火和土造的原始武器解放自己的土地又是一种。两种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前一种是侵略的战争，因此是非正义的战争；后一种是自卫的战争，因此是正义的战争。我这个解释可能引起一些好心人的疑问：战争就是战争嘛，怎么会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呢？这样的疑问在您提到的电影《士兵的颂歌》里就有过。我听说，有不少人用漂亮辞句恭维这部电影。不过我看了却并不曾像有些人那样深受感动。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赞词：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人格化的敌人，敌人就是战争”，“在我们的眼前是人和战争的伟大对立”。照这样

说战争就只有一种，它还不是由人发动，却是与人对立的，好像战争可以离开人而独自进行一样。倘使说战争使“个人的幸福”破灭，那么罪魁就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而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人却应当得到尊敬。国家的安危与民族的存亡是不能不首先顾到的，如果不分别战争的性质，单纯地把战争作为敌人，那么德国法西斯军队刚刚攻入国境，马上全国投降，战争停止了，“敌人”没有了，个人的幸福也就保全了。《士兵的颂歌》向人宣传的正是这种“活命哲学”。再让我谈一点个人的经验：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中间我在广州、在桂林、在昆明、在重庆遇到多次的轰炸，我在郊外看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轰炸机投下炸弹的时候，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投弹的飞行员和我是站在一起的，我们的敌人是炸弹，是战争。今天南越人民也不会同美国军队和平共处，而把战争当作他们共同的敌人。

我是赞成和平共处的人。不过我赞成的和平共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共处。中国政府便是五项原则的倡议者之一。著名的五项原则是不会被人忘记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在一九五五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又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一向是遵守这些原则的。为什么不应当遵守这些原则呢？您说得好：根据这些原则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就是“向着和平跨进了一大步”。但是要实现这种和平共处、首

先就得请求帝国主义国家改变它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我用的"请求"这个字眼，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事实上的确有些好心人是这样想的。

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我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多痛苦的经验了。我们受够了欺侮和掠夺，千请万请都把帝国主义请不出去。只有在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我们才做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得到了幸福和安宁。

我们今天在幸福和安宁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我们也希望各国人民都得到幸福和安宁。去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的时候，中国政府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就遭到有些人的谩骂。有人说我们同战争狂人站在一起，而事实呢，首先在条约上签字的偏偏是那只染满了南越人民血迹的手。后来在巴拿马打死手无寸铁的巴拿马人也是这只手。前两天报纸上还刊出柬埔寨和塞浦路斯两国人民举行反美示威的消息。您瞧，连佛教国家的人民也在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了。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人在叫"美国佬，滚回去！"在贵国这样的叫声也很高。这一切正好说明侵略正在进行，要保卫和平，只有依靠坚决的斗争。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日本人民反对《新安保条约》的爱国斗争。作为中国人，我应当向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日本读者比我更熟悉这个条约的内容和性质。虽然有人认为在贵国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可是我想起您提过的那件事，实在替你们担心：一九六二年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的海军、空军进入了乙级、陆军进入了丙级紧急状态。还有，去年八月二十二日"老挝之

声”电台广播说，包括日本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外国军官在美国帮助之下进入了老挝。还有，在日本驻扎了好几万美国军队。在日本本土有二百多个美国军事基地。在冲绳岛还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核武器基地，这些基地都是以中国作为目标的。万一有一天美国利用那些基地进攻中国大陆，日本怎么办呢？《新安保条约》已经把日本绑在美国的侵略战车上面，是不是日本的自卫队也要跟着美国军队走上战场呢？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从来不曾威胁过日本的安全，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增进友好的愿望又是十分迫切，为什么美国能够把这个条约强加在日本的头上，让饱经战祸的日本人民冒着再一次卷入战争的危险呢？无论如何，我们要遵守“中日不再战”的诺言。日本人民相信我们的友谊，也决不愿意让美国的侵略战车拖上战场。连续几年，日本人民英勇、热烈地进行各种运动，要求废除《新安保条约》，要求撤除美军基地，反对美国核潜艇、核飞机进驻日本，要求归还冲绳，要求恢复中日邦交。这些爱国斗争反映了日本人民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正当愿望。中国人民多次恳切地表示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两国人民不要战争的共同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

我不止一次地对日本朋友说，我们对现在、对未来都很乐观。我并非博古通今的学者，但是关于我们祖先过去所走过的长远路程也略知一二。我坚定地相信，武器支配不了人类，而是人类支配武器。虽然武器的发明越来越多，它们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可是千百年来只见人口增多，在毒气和细菌武器发明以后，人类也并未面临灭绝的危机。现在又有了核武器

了，为什么美国过去在朝鲜战争中、现在在南越战争中都不敢使用核武器来挽救它的失败呢，既然它吹嘘核武器的威力是那样大？理由很简单，它害怕人民，害怕那些经常游行、示威、罢工、集会的人民。中国有句古语："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连封建时代的人也知道人民团结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纵然是手无寸铁，核武器也奈何他们不得。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我们的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宣传核武器毁灭人类的人，不过是那些拥有大量核武器、而且千方百计想垄断核武器的大国的首脑。他们就是用这种"危言"来进行讹诈的。您说"像《在沙滩上》之类的美国电影多么强烈地煽起了人们的恐怖心"，这种电影正是为了执行原子讹诈政策服务的。我看过《在沙滩上》，当时我只有厌恶的感觉。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多么不真实，多么做作。我并不否认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我也觉得人爱惜生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把核武器的破坏力夸大到那样的程度，把人对死的恐怖歪曲到那么可笑的地步，只能说是别有用心。其实像这样的宣传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早在一九五〇年我出席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一位美国代表的发言中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旧金山有一个小女孩听见她哥哥讲起原子弹的恐怖，便问母亲："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到一个没有天空的地方去？"这个沉痛的故事十分激动人心，但是它也只能说明那些别有用心的宣传发生了很坏的作用，却并不能证明人类前途是一堆死灰。让我们仔细想一想，美国在日本

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以后，这二十年间究竟有没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故A.赫胥黎先生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人不能控制机器"(核武器)的意见。至少我举不出一件事来。那么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说人类对核武器无能为力呢？核武器，不管它的破坏力有多么大，它还是同任何类型的武器一样，它的试验、制造、贮存和使用都完全掌握在人的手里。武器始终是由人使用的。决不可能有一天核武器自己作了主人，或者会发生一种以核武器为一方、以人类为另一方的战争。单纯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却放过发动战争、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俗话所说的"无的放矢"。不制止侵略，单单反对武器，这等于束缚自己的手脚，让侵略者为所欲为。我们反对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不但不反对侵略，不反对核武器，不禁止制造、贮存和使用核武器，它反而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它反而使核大国垄断核武器合法化。原缔约国的人们解释说："做一部分事情，总比什么事情不做要好，向前迈进一步总比原地踏步或后退要好。"但奇怪的是，条约签字后不多几天，美国就宣布进行了地下核试验，而且接连进行了几次，都不见那些自命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出来抗议，因为地下核试验已经合法化了。我不明白，既然三个核大国关心世界和平，而且有"减少发生热核战争危险的共同愿望"，为什么它们签订条约时，又决定保持它们所拥有的罪恶的核武器，而且并不保证不使用这些武器呢？就说停止核试验吧，为什么又要把地下核试验除外呢？难道从地下来的灾难就比从天空降下的轻一些吗？我感到奇怪的是，根据条约，三大国以外的任何国

家都不得拥有核武器，而三大国不但可以永保核武器的垄断权，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大量制造、贮存，甚至使用它。更奇怪的是，三个核大国开创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恶例：不许别的国家事先讨论这个条约，却强迫它们签字遵守。在历史上只有战败国才受到这样的待遇，可是三大国却用它来对待许多主权国家。爱好和平的中立国家柬埔寨表示不在未经自己讨论过的条约上签字，这个态度是多么使人肃然起敬，中国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当然有权拒绝在这个未经自己讨论过的条约上面签字。说实话，中国人并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是原子弹迷，我们相信的是人民的团结的力量。去年九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有过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而前下跪。"我们从不悲观。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的力量一定能够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且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绑住核大国的手脚，才能确保世界和平。至于三国条约，它是垄断核武器的专利证书，它是走向战争的通行证。我们反对它，并不是我们要分享垄断权，我们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消除针对着我们的美国的核威胁。

在一阵宣传热潮之后，大家静下来认真地想一想，仔细地看一看：有了三国条约，我们的世界是不是离和平近了些、离战争远了些呢？八个月的时间便是最好的证人。美国的地下核试验还在进行。美国的F—105D型核飞机已经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进驻横田等机场，并且进行了射击演习。南越战争也在不断地扩大，前几天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先生还公

开表示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单是这几件事就可以证明三国条约原缔约国之一的美国并不是"和平天使"，而是"战争之神"。三国条约倒成美国进行侵略活动时的护身符了。

那么怎样才算是向和平跨进一步呢？

据我看，倘使能够实现中国政府的彻底销毁核武器、全面停止核试验、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在内）、建立各个无核武器区的主张和为此召开世界政府首脑会议的倡议，那才是真正的向和平跨进了一步，而且是大大的一步了。

我没有在这里引用中国政府声明的全文，因为这个声明早已在贵国某些报上刊出。我认为它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制止核战争、保卫和平的有效办法。许多国家都赞成这个主张，而且有不少国家响应了中国政府的倡议，现在就要看作为三国条约原缔约国的那些核大国的态度了。我相信，不管愿意不愿意，核大国总有一天不得不同意签订一个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条约。一个大国不管它拥有多少核武器，它也抵挡不住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的力量，终于不得不低头。侵略者就是害怕人民团结的力量，所以总有人在制造、散布悲观、绝望的气氛，来瓦解人民的团结。像《鸟》那样荒唐、虚伪的影片就是叫人在侵略面前放弃斗争、束手待毙。影片上鲜血淋淋的眼珠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人连鸟群都对付不了，何况核武器！我倒想反过来说，鸟联合起来连人都不害怕，那么人团结起来，还会害怕核武器吗？而事实呢，人能制造核武器也就能毁灭核武器。我的乐观不是毫无根据的。我和全中国人

民一样都要为保卫世界和平献出全部力量。

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这么多，我应当请求您原谅。正要向您告别的时候，我伸出手来，才感觉到有一片“东海”横在您和我的中间。您知道我说的是人造的“东海”。为什么像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国家的邦交到今天还不能正常化呢？为什么贵国政府到今天还不肯承认六亿五千万人的中国的存在呢？我想起最近日本人民要求“立即恢复日中邦交”的盛大运动，心里再一次充满了感谢之情。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团结是保卫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力量。松冈先生，让你们和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首先把人造的“东海”填平，使两国人民恢复邦交的愿望早日实现，那么我们也算是向和平跨进了一步了。

敬祝日本人民得到幸福、安宁与和平。

〔附〕松冈洋子来信

巴金先生：

回忆第二次大战末期，再三再四地遭到厉害的空袭的时候，对于拥有幼儿的我来说，和平，首先就是意味着母子换上睡衣，能够好好睡一个夜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日本是和平的。中国朋友们处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而流血斗争的时候，枪弹未曾在日本乱飞过。在越南南方，已故肯尼迪

总统所谓的"没有宣战的战争"还在继续着的现在，凝固汽油弹也未曾在我们头上爆炸过。

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去年十一月，总选举的时候，有个保守党候选人在竞选演说中所说的"革新政党是撒谎，尽管他们叫嚷着《新安保条约》联系着战争，但还没有发生战争嘛"，这种想法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加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朝鲜战争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想，人们对局部有限战争的性质不加研究，对它抱有幻想。

因而，我们在考虑和平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想到：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意味着防止全面核战争；并脱离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一天也没有间断过战争的这个现实，来探讨防止新战争的可能性的倾向较多。我并不是说，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跟日本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现状联系起来，我们往往只考虑到只消缓和"局势的紧张化"现象就可以了。

在日本，一提起战争，就联想到全面核战争的倾向较多，依我看，根据我们过去的体验，有两个因素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一是广岛、长崎曾经遭受原子弹灾害；另一个因素就是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的反省。不仅是广岛、长崎，我们还尝过第五福龙丸的惨剧的滋味，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地反对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这种心情，相信您是能够理解的。将近二十年前，遭到原子弹射光影响的

人们，至今仍患着原子病，逐渐死去。在这样的日本，像《在沙滩上》之类的美国电影，多么强烈地煽起人们的恐怖心呀，相信您是能够谅察的。"不要战争"这种心情，与其说变成"追求战争的原因——不仅是全面核战争，还包括其他战争"的态度，不如说容易转化为"无论如何，不要战争！"这种心情。

第二个因素，即对引起战争的反省，现在虽然一部分人唱反调，但可以说，它在日本国民中强烈地存在着。尤其对长期遭受战争灾害的中国朋友们，抱着反省的心情，为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而努力的人，可以说为数不少。对《新安保条约》所以能够开展规模如此之大的反对运动，不能不考虑到有这种反省的心情。我想：在这个反省的基础上，"不要引起战争"的想法从我们当中产生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正确的。从"不要引起战争"这种心情出发，我们有不少人看了苏联电影《士兵的颂歌》以后深受感动。

对于处在这种状态的我们来说，中国对和平的想法、行动不是简单地能够理解的。这一点，您是能够了解的吧。我自己，倒不如说包括我在内的多数日本人，并不是至今还认为：和平就是意味着不受空袭的威胁，每晚能够舒适地睡一夜。只要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仍存在着枪弹、凝固汽油弹对人身的危害，就不能认为有了和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和平是不能分割来看的。同时，在日本领土上虽然没有发生互相射击，但前年美国对古

巴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的自卫队立即进入“警戒状态第四号”的战备状态。由此可见，我们跟战争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两年前看到日本新闻记者所报导的：在老挝使用日本制造的武器的消息，我好像看到一脚踏进战争的日本的姿态。因此，不少人为了探讨为什么会这样，并为消除其根源而努力。于是，我想到：和平就是世界上的人们各自为废除切身有关的危险而努力，并不断地努力下去。

通过这些实践，我进一步想到世界各国应共同遵守如下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这些原则在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十项原则中已加以阐明，追溯到以前，这些原则作为正确处理国际社会关系的理所当然的章程，被世界上的多数人所共认。是否可以认为：根据这些原则，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是向和平跨进了一大步？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原子弹、氢弹这种以前没有过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现在，存在着在从前人类的概念中没有过的“大量杀伤”的核武器威胁，我觉得不得不考虑到核武器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一九六一年，在印度举行的纪念泰戈尔逝世一百周年国际辩论会上，阿达斯·赫胥黎认为：当前人类的危机是人与机器（核武器）的问题，他说，机器本来是为了有助于人类而制造的，现在人不能控制它了。大约在一年前吧，在日本引起注意的希奇卡克导演的电影《鸟》，我想就是表现这种观点的作品。

如果认为人类对核武器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产生绝望和虚无感。近一、两年来，我所看到的从美国和欧洲来的多数电影中渗透着这种虚无感。人们不难看出，这种虚无感跟上述这种观点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绝望了，认定命运如此，不是连考虑如何争取和平的气力和意志也产生不了了吗？

我认为：作为争取和平的人不可缺少的态度，就是应该确信依靠人类的智慧和努力，能够禁止使用核武器。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乐观。人民是历史的创始者，如果丧失了对人的因素的信赖感，我觉得对和平问题也无法思考了。对我在上面强调的这些问题，也许您会说，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嘛，不仅是您，恐怕大多数的日本人也会这样说的吧。恕我多说，敬希见谅。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而且不仅在那瞬间，它是长期危害人类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日本人有切身体会。正因为这样，一方面日本人比较容易受到核武器的威胁；另一方面，在这种恐怖感转化为绝望和虚无感之前，也容易考虑如何反对实验、制造核武器以及如何禁止使用最危险的核武器的问题。

考虑到先生是在本报“和平问答”专栏头一次撰文的中国人，特地围绕我认为与中国和日本关系较大的问题写了一下。唯恐写得粗浅而又不充分。请您就怎样才算向和平跨进一步，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等当前的问题发表高见，是幸。

永远同越南人民在一起*

美国总统约翰逊不顾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强烈抗议，悍然下令派遣海军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连续扫射和轰炸了清化等几个沿海城市，使越南人民遭受损害。这样，刽子手的魔掌已经伸到了越南北方，美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步。“世界人民公敌”、“世界和平敌人”的真面目又一次彻底地暴露了，所谓“国际局势已经缓和”的大谎话又一次被揭穿了。美帝国主义是绝不会自动放下屠刀的，它的侵略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它对越南人民犯下了一连串血腥罪行之后，现在又加上了这笔武装侵犯的血债，所有这些罪行一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近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了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使用大量的化学毒药、直升飞机和水陆两用装甲车，残酷地屠杀越南南方人民，阻挠越南全国的和平统一。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在越南南方用尽了一切残酷恐怖的手段和恶毒狡诈的阴谋，始终不能使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屈服，也无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山西日报》。

法在越南南方站稳脚跟。越南南方人民用原始武器狠狠地打击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队，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丑态毕露，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连它的盟友、伙伴也担心第二个“奠边府”就在眼前。可是美帝国主义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一再叫嚷要把战火引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又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并且以这个事件为借口，犯下空袭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滔天罪行。

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花言巧语，它始终掩盖不了自己那副侵略者的强盗面目。越南和美国相隔那么远，风俗习惯毫不相同，语言文字相差很大，试问越南人的生存什么时候妨碍过美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凭什么理由挤进越南南方，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的土地，残杀越南人民？是谁给它这种权利？谁又承认过这种权利？美帝国主义凭什么理由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美帝国主义凭什么权利不让越南人踏上南方的土地，阻止许多暂时分别的亲人团聚？试问越南的土地到底是属于越南人，还是属于美国人？美帝国主义必须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美帝国主义自封为国际宪兵，一直干着国际大强盗的勾当。它毫无顾忌地在世界各地进行偷盗、抢劫；它那染满各国人民鲜血的魔掌抢走了大量的财富，到处留下了血印。它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血债越欠越多，胆量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了。它欠越南人民的每一笔血债都必须加倍偿还。它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挑衅和武装侵犯一定会得到沉重的回击。越南人民是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英

雄人民，是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者。所谓“不沉的陆上航空母舰”也挡不住越南人民军的猛攻，终于认输投降。当时的法国殖民军还得到了美国飞机的大量支援，难道美帝国主义就忘记了这个惨痛的教训？现在的越南人民军比奠边府战役时代强大多了。试问美帝国主义可真有打不沉的航空母舰？击不落的喷气式飞机？事实摆在眼前，越南人民军已经打下了八架敌机。对于越南人民军保卫祖国的辉煌胜利，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其实，这不过是第一次的警告，倘使美帝国主义胆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和侵犯，它的结局只有一个：灭亡。正像一位越南南方诗人所说的那样，它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替自己挖坟墓，它越是猖狂，坟墓也就挖得越快，越深。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越南人民绝不是孤立的，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他们。我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庄严声明：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这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响亮的声音。我们中国人民绝不是光说不做的。越南人民是我们亲如弟兄的好朋友、好同志，我们永远同英雄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在需要的时候，我就是用两条腿走，也要走到越南，去保卫我们亲爱的兄弟邻邦，保卫越南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止是我，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决心。

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不然，它就会给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

新 中 国 人*

四年前我访问箇旧回来，写过两篇回忆文章。前几天一位读者从锡城写信给我，讲起四年来的一些变化：挖泥船已经在当地造好，正在进行疏浚金湖的工作；湖畔出现了一条宽广的马路，从前路边的土堆变成了整洁的楼房，马路两旁种上了凤凰树，过两年就可以看见绿树成荫，花红似火；七层楼的百货公司建成了，职工们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大楼顶上还有一颗大红星，夜里红光四射，照得远近一片亮光。

像这样的变化的故事，我听到的、见到的真不知有多少。不单是我，倘使坐下来闲谈，每个人都可以讲许多这一类的故事。它们并不是人们凭自己的想象和愿望编造出来的故事，它们是人们用集体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真实事情，它们是人们亲眼看见、亲手创造、亲身经历的真实事情。人们喜欢用自豪的语调谈自己周围的变化，他们对这些变化有很深的体会，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之下，推动了这些变化，创造了这些变化，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跟着起了变化。这些变化和他们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例如那位写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收获》第五期。

来谈锡城变化的读者，他在箇旧工作了八年，他初到那里的时候，连湖也没有，可是采矿、选矿都需要大量的水；当时的城市和矿山有着另一种面貌。他在箇旧的土地上流了不少的汗，每一滴汗珠都溶化在城市和矿山的大小变化中。其实他看见的已经是改变了的面貌，在旧社会里那个城市被人称为“死城”，整个矿山是所谓人间地狱。旧时代的血泪，今天只有在今昔对比的陈列室里看到。他怎么能不热爱他周围的一切大小变化呢？

为什么锡城的红星这样牵引我的心呢？因为我到过那个地方，因为我在若干年前就听见人谈过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因为新社会的红光照亮了过去浸透工人血泪的矿山，因为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的例子。但是像这样突出的大变化并非绝无仅有，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来。

我以上讲的是从旧到新、从死到生、从黑暗到光明……的变化。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憔悴等死的人一旦生活到春光明媚的今天，他们怎么能不感到这些变化同自己血肉相连的关系呢？他们怎么能不献出全部力量来保卫这些变化，推动这些变化呢？我住在上海，目睹了上海的变化，也写过上海的变化。大家都知道长期遭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上海是个什么样的城市！过去，对千千万万的人来说，生活是苦刑，是劳役，是慢性死亡。可是今天上海工人为祖国生产了多大的财富，上海人民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多少的干部，上海的青年满怀雄心壮志奔赴祖国的边疆。从前所谓“西方冒险家乐园”的罪恶都市现在变得多么健康，有着无穷无尽的活力！

不少的上海青年亲身参加了另一种变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荒原建设崭新城市……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例子也是很多的，而且这一类的新城市不停地在发展，在扩大，用“日新月异”这一类字眼来形容，也毫不夸张。像这样建设起来的新城市遍布在全国各地，不用说，它们是为社会主义工业服务的。它们的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说实话，站在大型机器面前，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毫无所知。但是连我也了解从靠进口货过日子的时代到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时代的伟大变化，连我也因为工业战线上一连串的“奇迹”感到自豪。进了工业展览会，我仿佛进了宝山，满目琳琅，光辉耀眼。我不是说我们的工业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结束了使用“洋油”的时代，的确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像这样震惊世界的大事还多着呢！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手里，什么事做不了！再大的变化也能发生，而且一定要发生！

人变了！我常常注意到人的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这个。今天的中国读者可以读到不少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英雄形象的文学作品。有人说这些英雄人物都是让作者理想化了的，他要求作者写普通人物、“中间人物”的“人之常情”。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我觉得今天生活中的人物比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还要高，还要多；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习见的“常情”绝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苟安度日”、“活着就是一切”；“舍己利人”、“全心为公”、“为集体利益不顾一切”、“敢作敢为”的先进人物倒像花朵一样开

遍新中国的山野。表现新时代、新风尚的新人新事天天有，处处有。任何人只要走出自己的屋子，去到群众中间，他就会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仿佛四面八方都有人伸出手，为他引路。年纪较大的人应当记得在若干年前的上海，连向人问路也会遭到白眼。今天一位旅客在途中遇到困难，马上有无数的人出来给他援助。一个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许许多多人毫不迟疑地跟着他的脚迹前进。伟大的战士雷锋牺牲了，接着就有千万个雷锋活动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各个工作岗位上。用不着我在这里举许多名字，每天的报刊上都有不少篇幅介绍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和创造这些事迹的新人。人的变化有慢有快，快起来也的确惊人。我常常注意我周围的人，有时我离家两三个月，回来不是听说这家的孩子报名去了新疆，就是听说那家有人支援外地，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安了家。许多大中学生去农村几个月，回到家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年轻人以接受遗产为耻辱，认参加劳动为光荣，把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看成自己的任务，这已是很寻常的事情。在年轻人中间有一种新的苗正在迅速生长，有一种新的力量正在不断发展，有一种革命烈火在熊熊燃烧：怀抱雄心壮志，树立远大理想，不怕困难，不辞艰苦，摆脱个人的小圈子，奔赴广大的集体，把青春献给祖国，为人民赴汤蹈火。这样的革命烈火已经燃烧到我们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遥远的荒山高原，海上小岛，我们年轻人美好的青春也在那里开花结果。我个人的脚迹虽然不广，但是我也见到许多这一类的无名英雄。

我常常带着原稿旅行，我写这一小段的时候，我正住在五

台山的所谓“台怀”中一个小院子里，在这里是看不见那五个峰顶的，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个台顶上有一所气象站，有一些年轻人在那里工作，而且做出了成绩。据说人们住在石头建筑物里，在地面上煮饭不熟，烧水不沸，只能在地下室内做饭，每年只有几个月可以到外面活动，冬天很长，到大雪封山的时候，同山下交通断绝，连吃的东西也都是在夏天运上山来的。我穿了一件毛衣还感到冷意，坐在桌前，在煤油灯旁，听着静夜里窗外的雨声，想到那些整年累月在山顶石屋里工作的年轻人，我因为过去连他们的存在都不知道而感到惭愧。千千万万这样的年轻人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和不知道的工作岗位上埋头工作、辛勤劳动，只是为了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想着他们，我想着这个年轻人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我觉得仿佛屋子里燃了一盆火，又好像窗外照着一片阳光。

我带着原稿下了山，在一个供销社休息。路给大雨冲坏了，我们坐车去一个地方，看见几位干部一路上拿锄头挖土或者搬开石块，为来去车辆和行人方便。这些年轻人身强力壮、满面笑容，仿佛从来不知疲倦，为别人辛苦两三小时倒像是自己的莫大愉快。半个月来我走了好些地方，到处都看见这样精力饱满、充满信心的年轻人的健康的面貌，而且感觉到他们同我有密切的关系，好像他们都是我的亲人。过去我写过不少的旅行记，我哪里有过这样愉快的心情？看见孩子在刘胡兰烈士的墓前严肃地行少先队敬礼，在烈士就义的地方肃立沉思，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那个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感情？孩子们的心灵也在变化、在成长。他们有许多引路人，有许多

学习的好榜样，只要他们不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就会有多么光明的前途。

在旅途中有时和朋友们闲谈，谈到人的变化，我还举过一个例子：一位常常到我们家来捉白蚂蚁的女同志。她在一九五八年初还是家庭妇女，大跃进时期才参加工作。老白蚁专家李始美到上海作报告，传经验，她算是当了一名学生，以后就在我们那一区的房管处担任搜捕白蚁的工作。近两三年，她常常和一两位同志到我们家，钻进地板底下，忙个一天半天，挖出一段给白蚁蛀空了的木头。虽然白蚁的主巢始终找不到，白蚁的活动仍然猖狂，地板还是不断地损坏，但是她并不灰心。今年五、六月她和一位助手来过几次，她因为前不久在别处找出了一个白蚁主巢，对自己的工作更有了信心，她到处搜索，在园子里几株新枯死的树木的树根上找到不少白蚁，她又在这些地方设下陷阱，几次诱捕了更多的敌人。可是没有找到这里白蚁的主巢，她一直不甘心。有一个下午她在我们家楼下过道的白壁上看到一个线索，终于在这附近的天花板上发现了那个经营了七八年的主巢。我看见她站在梯子上，在飞扬的尘雾中紧张地工作，小块的灰泥不断地从头顶上落下，最后隐藏的主巢完全露出，她便打进砒霜粉，让白蚁全部死在巢里。在这中间她还不时兴奋地对我们解说蚁巢的构造。两天后她来挖下那个相当大的白蚁主巢，放在院子里，让我们全家看清楚这个要把我们整所楼房蛀空的敌人的大本营。我在她那略带苍白的平凡的瘦脸上，看到了胜利的喜悦和昂扬的斗志。不久我又听说她在附近一所楼房里挖出了一个有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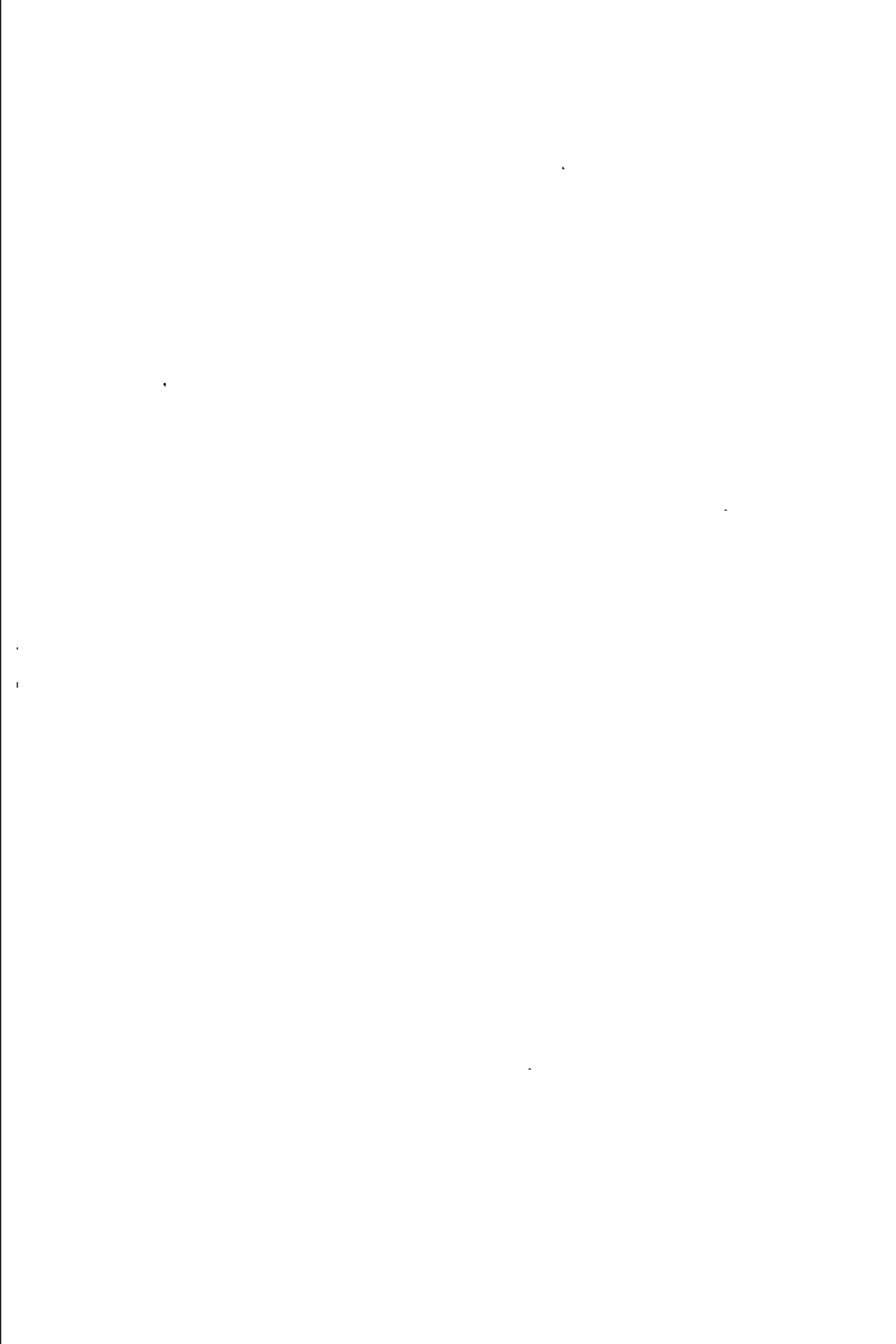
历史的主巢。那里是我两位朋友的住家，住在二楼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蚁巢是在不住人的楼下发现的，在挖掉主巢以前，常常晚上开了灯，白蚂蚁满屋飞来飞去，几乎使他不能坐在书桌前工作。再过一些时候，一天上午，她来搜索残余的白蚁，遇见我，满脸笑容地说，她又在这条街上找到了一个有半个浴缸那样大的白蚁主巢，这天下午就要在那个人家开现场会议，各区房管处都有人参加。在那张见惯了的瘦脸上我又一次看到了那种胜利的喜悦和昂扬的斗志。但是只有在这一天我才注意到这位身材瘦小、相貌平凡的女同志身上有一种任何困难都难不倒的力量，革命烈火已经燃烧到她的心上了。这以后我有时在街上遇见她，戴着工作帽，拿着工具，瘦脸上永远露着笑容，谁也想不到她已经几次战胜了白蚁、挽救了一所一所的楼房！她靠着刻苦钻研、紧张劳动、虚心学习、全心为公，终于渐渐掌握了技术，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要是没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也许她今天还是一个生活在小圈子里面一无所长的家庭妇女。她的变化不过是整个大变化中的一个极普通的变化，她今天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人中间一个极普通的新中国人。她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今天的常见的新生事物。她已经走上了光明大道，以后一定会为祖国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而且现场会议也不是白白召开的，她的事迹会鼓舞和帮助更多的搞同样工作的人。一个人迈步前进，一定会带动许多人迎头赶上。

两天前我参加了一个专区文艺界的座谈会，在会上，谈到人的变化时我讲过另一件事：二三十年前我在国外遇见华侨，

常常相对叹息，仿佛两个孤儿遇在一起，只能讲彼此遭受欺侮的经历；近几年在国外同华侨见面，大家心情愉快，欢聚畅谈，我每次都有满腹的胜利消息带给侨胞。去年在越南河内和一位华侨谈起最近我们党和政府发表的文件和声明，他说："我们坚决拥护我国党和政府的主张，并不是出于民族感情，我们是在拥护真理。我们因为我国党和政府坚持真理而感到万分自豪。"过去华侨一直被称为"海外孤儿"。十五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从他们的口中听见这样的话！从前是痛苦的遭遇和悲愤的心情把我们（他们同我）连在一起使我们一见如故；现在是作为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大旗的新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责任心把我们连在一起，使我们海外相逢，亲逾骨肉。

我拉杂地讲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我讲的正是极其普通的新中国人的新事情。我何幸生活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伟大时代！我何幸做一个新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十五年正是千变万化的十五年，是光辉灿烂的十五年，是中国人民大踏步前进的十五年。拿对我们非常亲切的这十五年同旧时代的漫长岁月相比，再想到前面无限光明的未来，我不能不感觉到做一个新中国人是多么光荣，但又是多么不简单！虽然我还配不上这个称号，也没有充分尽到自己的责任，可是我绝不能辜负这个称号，我要尽最大努力跟着我们伟大时代、伟大祖国的步伐前进。倘使能做到自己的每一滴心血、每一颗汗珠都溶化在我们伟大时代、伟大祖国的千变万化中间，那才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1964 年 8 月 14 日在太原。



一九六五年

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它在越南南方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到惨重的失败，不顾全世界人民不断的强烈谴责，不顾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再严正的抗议，不顾我国政府辞严义正的警告，一再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战争挑衅。去年八月五日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二十多次派遣飞机、军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和破坏。本月七日和八日，多批美国喷气式飞机根据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命令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空，连续轰炸和扫射洞海市和广平省其他地区，以及永灵地区的和平城市和村庄，连医院、学校和民房也不能幸免。美国政府在它对越南人民犯下了一连串血腥罪行之后，现在又加上了这笔武装侵犯的血债，而且约翰逊还蛮横地露骨威胁要进一步扩大战争，甚至下令向越南南方增派防空导弹部队。约翰逊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举起屠刀，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露出他"国际强盗"、"和平敌人"的狰狞面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除非它进入坟墓，它绝不会缩回它那双杀人、抢劫的魔手。但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的越南人民是绝对吓不倒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上海《文汇报》。

他们已经给全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一个极其光辉的榜样。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已经几乎用尽了它的法宝，它能使用的现代杀人武器，从小到大，从钢铁到药粉，全用过了；它能用的花言巧语，从欺骗到威胁、从威胁到欺骗也全用过了。却让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打得狼狈不堪，丑态毕露，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除了滚出越南南方外，不会有别的下场。它一再叫嚣要扩大战争，可是它点起的战火只能烧死它自己。正如我国罗瑞卿副总理所说，美帝扩大侵略战争之日，就是它进入坟墓之时。美帝国主义欠下的一切大小血债都必须偿还，它的大小罪行一定要受到应得的惩罚。现在是越南人民审判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了。

我们热烈祝贺越南人民军保卫祖国的辉煌胜利。击落十架敌机，不过是对侵略者的第一个惩罚。越南人民军是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者。当时所谓"不沉的陆上航空母舰"，也挡不住越南人民军的猛攻，终于投降。难道美帝国主义真有打不沉的军舰？击不落的飞机？倘使美帝国主义胆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和侵犯，我可以断言，它的结局只有一个：灭亡。一年前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写信给我，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所作所为都是在替它自己挖掘坟墓。的确是这样，它越是猖狂，坟墓也就挖掘得越快，它落进坟墓的时候也就越近。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的日子的确越来越近了！

我到过永灵和洞海，我接触过不少勤劳、朴素、勇敢、热情而好客的居民。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使我深受感动。我无

法记住每一位越南朋友的姓名，但我不曾忘记那许多亲切的面孔，那些充满友情的声音，和那一片辛勤劳动、蓬勃建设的景象。我更忘记不了我离开那两个城市的前夕同越南朋友在一起联欢的情景。在那两个安静的夏天的夜晚，许多当地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唱了不少歌颂南方斗争和倾吐人民感情的南方民歌，每首优美的民歌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告别的时候，我们含着眼泪紧握着彼此的手，用颤抖的声音互相勉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学事业奋斗到底！我后来不止一次地对越南朋友谈起那两个晚上我的心情，我说这种庄严的决心，这种心连心的友谊，我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现在炸弹落在那两个地区，我不能想象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有多少居民伤亡，多少房屋被破坏。但是我知道住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勇敢地守住自己的岗位，狠狠地打击敌人，我知道每一个居民都是顶天立地的硬汉。我在永灵的乡村里听到许多斗争故事，我亲眼看见小孩们锋利的眼光，也接触到无数火一样燃烧的心。今天我的心又回到了那两个地区。我听见了炸弹的声音，但我也听见战斗的呐喊，我还听见胜利的欢呼。"越南人"三个字，已经成了非常光荣的称号。越南人一定胜利，美帝国主义一定失败！

越南人民的英雄气概、战斗意志和革命精神，早已得到世界革命人民的钦佩。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他们。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因为有像越南人民这样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同志，而感到万分自豪。我

国政府庄严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这正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话。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本月九日的声明，这个声明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强烈意志。谁伤害了我们的情同手足的兄弟，就是伤害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用全力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我去年说过：在需要的时候，我就是用两条腿走路，也要走到越南，去保卫和我们唇齿相依的邻邦，保卫兄弟的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我也是这样说，这样想，而且我的心已经飞到永灵和洞海，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了。

总之，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凶狠、狡猾，不管约翰逊有多少手花招，美国军队在越南南方只有一种命运：灭亡。英雄的越南人民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

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

访问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国人，都深深地体会到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友谊。我曾经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生活过五个星期，在这五个星期里，我仿佛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面，生活在亲爱的兄弟姐妹中间。我接触到的每一位越南同志，都对我倾吐了最深的感情。永灵区区委书记用激动的声音谈起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广平省人委一位委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兴奋地互相勉励，要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奋斗到底。我从河内去永灵，动身的时候，一位家乡在南方的诗人忽然热情地同我拥抱。这些动人的语言和情景我至今不能忘记。我们两国人民的确是心连心的情如手足的好朋友、好同志。我们说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我们不仅是支持我们的兄弟邻邦，警告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真有战火烧在自己身边、利刀刺进自己肉里的感觉。我们说，越南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越南人民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全心全意地关心、支持越南兄弟的斗争。

在贤良桥边，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越南人民渴望祖国统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的迫切心情，更具体地了解了南方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英勇斗争，也看到了北岸一片辛勤劳动、发展生产的繁荣景象，三天中间，我听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面对着这样不怕困难、不怕威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人民，我不能不动感情。我曾经充满敬意地向越南兄弟表示，只要对越南人民的斗争有利，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今天，我多么希望能够重到永灵和洞海，向那里的越南兄弟祝贺他们先后击落入侵美国飞机的辉煌胜利，留在那里同他们并肩战斗，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的确，我的心已经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了。我相信全中国人民的心都飞到了越南人民的身边。我们说心连心，绝不是一句空话。倘使美帝国主义真像它的头子约翰逊所威胁的那样，胆敢扩大战争，那么它的日子绝不会好过，三千万越南人民，加上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就会把它送进坟墓里去了。

美帝国主义今天还在张牙舞爪，横行霸道。它们疯狂地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空，轰炸扫射和平城市和村庄，连学校和医院也不放过。美国政府不顾国际法的起码准则，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不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严正抗议，不顾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一意孤行，把万里之遥的越南南方一直据为己有。现在，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空内为所欲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约翰逊又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露出了国际宪兵的狰狞面目，他的确是国际强盗，的确是世界人民的公敌。他的花言巧语，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试问，美国凭什么派军队到越南南方，分割越南土地，杀害越南人民？美国凭

什么理由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试问越南的土地到底属于越南人，还是属于美帝国主义？试问谁给约翰逊权利把防空导弹部队运进越南南方？谁又承认他有权利在越南土地上为非作歹？

全世界人民一致的愤怒回答是：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欠下的血债实在太多了。杀人、放火、剖腹、挖心，无恶不作；现在它又连续轰炸越南北方和平城乡，杀害北方人民。它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霸，血债越欠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了。它欠的每一笔血债，必须加倍偿还。越南人民不会放过它，中国人民不会放过它，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不会放过它！越南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惩罚了这个侵略强盗，而更大的惩罚还在后面，那就是：彻底消灭侵略者。这才是美帝国主义应得的惩罚。连小孩也知道，不管约翰逊怎样猖狂嚣张，美帝国主义倘若不滚出越南南方，它一定会埋葬在那里；倘若它胆敢进犯越南北方，贤良江就是它最好的坟墓，永灵的居民从来不曾让混进来的敌人有一个漏网。战争越扩大，美帝国主义的坟墓挖得越快，灭亡也越快。中国人民早已严阵以待了。越南人民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一个极其光辉的榜样，现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向美帝国主义讨还血债的时候了！真理是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必败，越南人民必胜！

大寨英雄——“老石匠”贾进才*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有一个大寨大队。这个大队有八十三户人家，三百六十多口人，男女劳动力不过一百多一点儿。在旧社会，大寨村是个最穷、最苦的山沟，全村六十来户人家就有四十多户是贫下中农，很多人在外面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羊，还有人靠讨饭过活；遇到好的年成，最好的地上生产的粮食也不到一百四十斤。我去年访问大寨大队，却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干沟、高山变成了整齐如画的梯田；到处都是长得一样齐的玉米苗，每天有几百人来参观这里的庄稼，他们是远近各公社的社员和干部，大家连声称赞：“庄稼长得好。”去年，大队的粮食亩产量已经超过了八百斤，冬天里大寨人还冒着风雪修沟，整地，他们今年还要打更多的粮食。

解放前，在昔阳县，离开大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县里有这么一个大寨村。今天，大寨大队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到处都有人在谈大寨道路，讲大寨的故事。大寨人，从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算起的七个支部委员，个个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儿童时代》第七期。

"铁扁担",包括前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在内的社员,人人有向着集体的"红心";大寨人不怕天,不怕困难,千方百计改造自然,把七条大沟和几十条小沟变成肥沃的良田,取得一年比一年好的收成;大寨人生活越好,越是省吃俭用,粮食越多,越是辛勤劳动,他们绝不是单单为了改善生活,陈永贵说:"人活一世,只图个吃吃喝喝有啥意思!"贾进才说:"咱们闹革命,为的是共产主义。"从办初级农业社的时候到现在,十二年中间,大寨人一共向国家交售了两百万斤商品粮。一九六三年八月,大寨遭到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地冲垮了不少,长得很好的庄稼都倒了,窑洞和住房塌坏了大半,大寨人不肯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要"与天老爷比高低"。他们不向国家要一分救济费,也不要一斤补助粮,更不要一样救济物资。他们还保证:一不减少卖给国家的商品粮,二不减少社员口粮,三不减少下一年的投资。他们说,自己能走过去,就不要别人搀扶;他们说,遭了灾要国家扶植,算啥先进队?他们说,这次遭灾,要遭出一个新农村来。他们说得出,做得到。我在大寨看到的新窑洞、新瓦房、电线杆、电碾、电磨……都是遭灾以前所没有的。其中崭新的瓦房和窑洞,上好的梯田和庄稼,不用说都是大寨人忘我劳动的成果。大寨人的肩是铁肩,大寨人的手是铁手,他们靠党的领导,靠集体的智慧和团结的力量,什么事都办得到,什么任务都能够完成。

大寨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大寨有一棵大柳树,过去一个贫农的女人拾着地主丢掉的一穗玉米,地主把她吊在这棵树上吊了半天,后来她就死了。解放后,树荫下成了小广场和会

议处，大寨人每天清早端着碗到这里边吃饭，边议论，边谈心；有批评，有表扬，是好是坏，什么对，什么错，都要在大家面前分清楚。在这附近一间新瓦房里，去年成立了大寨展览馆，听说是省文化局派人来帮忙布置的。我走进展览馆，便看见光荣榜，大幅红布上贴着好些张照片。榜上有名字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少的英雄事迹，我无法把这些模范人物全介绍给小读者，我挑选了一位老英雄，现在谈谈他的事情。这位老英雄便是人称"老石匠"的普通社员贾进才。

提起贾进才，我马上想到他那和蔼的笑容和他那双了不起的铁掌。今天人人称赞大寨的好舵手陈永贵，陈永贵的确是一位很出色的先进人物，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不用说，他也是在党的热心培养下成长的。可是谁是他入党的介绍人？谁建议选他当党支部书记？谁在工作上一直坚决地支持他？贾进才！就是贾进才！

贾进才今年五十六岁，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他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这五年，他亲手培养并且介绍入党的人一共有七个，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陈永贵就是其中的一个。陈永贵七岁到大寨，是他父亲用筐子把他挑来的。他八岁放牛，十一岁当小长工。抗日战争时期，陈永贵给八路军带过路，送过信，掩护过党的工作人员；解放战争中他到火线背过伤员，立过战功；解放后斗地主、搞土改他也是积极分子；成立互助组的时候，他同全村最穷的九户贫下中农组织了"老少互助组"，有人说他是"自找亏吃"，他干脆地答道："我不能撇下穷兄弟们不管！"陈永贵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了贾进才

的注意。贾进才经常找机会给陈永贵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他的阶级觉悟；经常给他布置工作，让他在实际工作中受到锻炼。一九四八年陈永贵入了党。第二年支委会改选，陈永贵当选为支部副书记。一九五二年初级农业社成立以后，贾进才向支委会建议改选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他自已改任副书记。贾进才第一次的建议没有得到支委会的同意，他后来又第二次提出建议，还恳切地说："怎样对党有利，咱就怎样干。"这样支委会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第二天贾进才就到昔阳县去汇报，得到了县委的批准。一九五六年，大寨成立高级社，贾进才又向支委会建议，改选复员军人贾来恒担任支部副书记。有人说："来恒年轻，缺乏经验。"他便说："革命不是一辈人的事情。有了好人材，不及早培养，到要紧时就赶不上了。"这以后他就只担任支部委员。到这一年冬天，有人提出：妇女顶着半边天，支委会里应当有一个妇女委员。贾进才便又主动辞去了支部委员的职务。他说："我让出一个位置，支委会就多一个新生力量，对工作有利。我当支委是为了革命，不当支委也是为了革命。"

贾进才现在是一个普通社员，可是他始终服从支委会的领导，全心支持陈永贵的工作；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叫苦，也不叫累。不管叫他放牛放羊，凿石开山，他总是干得很好。一九五五年，大寨人为了制服狼窝掌沟，干了整整一个冬天，第二年夏季一场洪水就把垒起的石坝全冲垮了。一九五六年冬天，大寨人第二次治好了狼窝掌沟。可是一九五七年夏天的洪水又把大坝冲毁了。陈永贵主张三战狼窝掌的时

候，贾进才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贾进才在贫下中农会上说："治水、闸沟，是为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对，不用说再三再四，再五再六咱也干。"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接连干了二十七天，筑了三十八条石坝，坝身比前两次筑得更高，每条大坝都筑得很牢，像一九六三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冲不走它的一块石头。

贾进才是一个打石头的能手。大寨人三战狼窝掌，大寨人治山、治水、闸沟、修窑洞，哪一次少得了他！社员们说："我们修筑的每一道坝上都有贾进才打出来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有他的手印和汗水点子！"我听见这句话，就想到了金石坡村外沟里那个大石坡。石坡有一亩半大小，外壳光溜溜，好像一个"乌龟壳"。好多人打过这个大石窝的主意，可是它那个"乌龟壳"硬得像块铁板，一般石匠都不敢轻易下手。有人说："要打开这个石窝，顶少也要半年功夫。"陈永贵说："老伙计，还是你来开罢。"贾进才点点头就带了两个助手去了。他们干到第七天，就打开了石窝口子。贾进才冬天打石头，他的手指冻得像红萝卜一样，手上裂开了一道一道的缝；石头像钢刀，又像铁锉，手碰到它的棱角，就会出现一道道口子，可是他毫不在乎。每天天蒙蒙亮，贾进才就背着铆锤，拿着凿子上山，一直干到天黑。他用的大铆锤足足有三十八斤重，是他从前当长工时地主专门为他制下的。头几天他收工回家，一双手鲜血淋淋，连饭碗也不好端。裂缝越震越大，也痛得越厉害，他涂了一点油再干；血出多了，他就用布条裹住手干下去。捎来的饭冻硬了，别人劝他烧把火热一下，他边吃边说："咱这苦里

生苦里长的人，没有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冷饭就变成热饭了。"社员对他说："老贾，你把那大一点的好石头打上一块，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给你立块碑！"他哈哈笑道："共产党闹革命，可不是图名求利啊！"

我访问大寨，同贾进才在一起过了两三个钟头，他始终是那么谦虚，那么朴素，那么亲切。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忽然想起他那双"铁掌"的故事：解放军某部英雄八连访问大寨，战士们排队立在贾进才面前，挨着次序上前向他敬礼，要求他伸出手来，他们怀着极大的敬意，注视这双手，抚摩这双手，他们感动地称赞这双"铁掌"，这双"英雄的手"，这双"改天换地的手"，这双"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我也要求看看、摩摩他的手：手掌上结了一层一层的老茧，又让厚厚的死皮紧紧裹了起来，好像树皮那样粗糙。这双手就说明这位老英雄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作出了多么出色的贡献！

大寨人的英雄事迹说不尽，贾进才的故事也讲不完。英雄们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大寨人现在又大步前进了。去年同我一起去大寨的朋友最近又去了大寨，他来信说："大寨人的面貌又变了许多，去年冬天大寨人又四战狼窝掌。陈永贵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同毛主席一块吃了饭，毛主席还问到贾进才和大寨人的生活情况，对大寨人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誉。他们的干劲更大了。"这是多么好的喜讯。祝英雄的大寨人继续不断地前进！

三千万越南人民大踏步前进*

不久以前我接到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的来信。在那封充满英雄气概、战斗热情、兄弟情谊和豪迈语言的长信里，诗人满怀信心地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解放了的我们越南南方的土地上，迎接您和中国文艺界的其他朋友们。到那一天……我们要请你们畅饮南方的甜椰汁，为你们表演中国和越南的舞蹈，唱我们两个兄弟国家的战斗和胜利的歌曲。……我们还要叙述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战友间和同志间的故事。"

最近，一位家乡在涧海郊外的北方诗人春生同志，写信来感谢中国作家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支持，他用坚决的语调谈起他们"对最后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

江南同志刚刚"和解放军战士们一起生活了、战斗了五个月"。春生同志正在北方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昨天还读到他那首《为春天夺取胜利》的诗：

……………

我们热爱生活，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文艺报》第四期。

我们歼灭敌人，是为了使东方更加美丽发光，
谁敢讥笑我们只有桩板坑，
那就请他来试一试愤怒人民的力量！

我感谢江南同志和春生同志“在春天里把南方的温暖带给我”。他们那种开朗的心境，那种强烈的革命感情，那种对胜利的极其坚定的信心，使我十分感动。我知道他们不过是千千万万越南人中间的两位。他们的心境、感情和信心是“生活在一个十分壮烈的历史时期”中的越南人民所普遍具有的。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见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三千万越南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他们无比英勇、无比坚强地战斗，他们斗志昂扬、脚步坚定地朝着胜利前进。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见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尽管美帝国主义侵占越南南方，轰炸越南北方，在越南土地上掷下数不清的炸弹，使用各种各样最新式的武器，派遣成千上万的军事人员，到处杀人放火，甚至洒毒剂、放毒气，但是越南人民仍然屹立在自己神圣的国土上，而且越打越猛，越战越强。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见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尽管美帝国主义到处张牙舞爪、疯狂叫嚣，然而在越南挨打的正是它；它越是要扩大战争，就越是给打得头破血流；飞机来得越多，给打掉的也越多；人来得越多，给打死、打伤的也越多。越南就是美国侵略者的坟墓。

今天全世界都在倾听越南人民的声音，全世界都在阅读越南作家的作品。越南人民正在用气贯长虹的英雄行为写下

壮丽无比的伟大史诗。越南人民正在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的革命精神、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接连不断的辉煌胜利给世界人民树立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正在为他们亲爱的祖国，他们美丽的河山，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跟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猛烈和英勇的斗争。越南人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吸引着世界人民的注意，鼓舞着世界人民的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支持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雄壮声音。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始终如一地同亲如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拥护胡志明主席的庄严的声明："越南北方和南方的人民反对和击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和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不管美帝国主义者的行动怎样疯狂和肆无忌惮，都无法阻挡越南人民把他们的爱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越南人民的正义声音和英雄语言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越南人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英雄民族的英雄历史。"

"在整整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越南民族从来不曾在侵略者面前屈服过。今天，我们三千多万同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集团的斗争，以保卫自己神圣的祖国和维护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民族权利。"

"每一个人都是同敌人不共戴天的战士。"

"即使我们还要进行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斗争，还要遭受更大的艰难困苦，我们也准备好了，并且决心战斗，战斗到底，直到在我们国家看不到一个美国兵为止。"

越南北方和南方人民的英雄语言好像都是钢铸铁打出来的，字字放射光芒，句句响彻云霄，每一篇声明都是气壮山河的檄文，每一句话都是激励人心的战鼓。越南人民说得出做得到，他们用行动表示自己的决心，他们用生命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用胜利证明他们语言的力量。我读着从越南传来的每一个捷报，我读着越南人民在斗争中发表的每一个文件，我总是精神振奋，意气昂扬，我看到了在张皇失措的美国侵略者面前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光辉的越南人的英雄形象。

将来一定有千万册文学作品记录越南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今天已经有许多越南英雄的光辉名字在世界人民中间广泛流传。"越南人"已经成了十分光荣的称号；"越南人"已经成了非常亲密的称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人民要用越南英雄的榜样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各国人民都认为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是莫大的光荣。"同越南弟兄一起前进！"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哪一个地方没有千千万万只手伸向越南人民？哪一个地方没有千千万万颗心同越南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越南人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打虎英雄，他们已经把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不用说，他

们在斗争中曾经遭遇过、今后还会遭遇到很大的艰难困苦，但是他们越战越勇，而且越战越强。他们一定能把美国侵略者完全赶出越南！越南人民不单是为着祖国的独立与统一在战斗，他们也是为着世界人民的利益在战斗。他们有权利接受全世界三十亿以上的人民的全力支援，而全世界人民也有义务对这样英雄的人民、对这样正义的事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越南土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千万越南人民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说得好："越南北方和南方是一家。这种感情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深。这个真理正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是任何力量所动摇不了的。"十一年前美帝国主义撕毁了日内瓦协议，侵占了越南南方，用现代化的杀人利器和野蛮的法西斯手段把南方丰饶、美丽的土地变成了一片凄凉的废墟。从此贤良江上出现了一堵铁墙，一个民族给分割成两个部分，连父母、子女、弟兄、夫妇也不得团圆。十一年中美国侵略者和它所豢养的走狗在南方杀害了将近十七万人，其中有五千多人给活埋，甚至被剖腹挖心；拷打成残废的人将近八十万；至今还有四十万人给关在一千多所监牢里面。这就是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建立的所谓"自由世界"的"文明秩序"。这就是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强盗集团在越南南方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一九六三年初夏，我站在贤良桥畔望南岸，只见到一片荒凉、冷酷的景象；我沿着贤良江走了一大段路，也只看见几座伪装的碉堡，见不到对

岸一个老百姓。永灵特区的同志们对我讲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使我想起北方人民和南方人民是心连心的骨肉同胞，每一个故事都使我记起越南朋友常讲的“手给砍断，心不能不痛”的老话。我不止一次地听见越南朋友愤怒地说：“美国强盗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加倍的惩罚。”美帝国主义恶贯满盈，现在已经到了越南人民向它讨还血债的时候了。美国侵略者如果不滚出越南，就要给全部埋葬在越南。再没有第三条路。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是一定要实现的。

美帝国主义忘记它自己从万里以外闯进来的强盗身份，拿它自己编造的越南人“侵略”越南人的鬼话作借口，破坏国际法的起码准则，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不顾越南民主共和国多次严正的抗议，不顾我国政府一再严正的警告，悍然采取了逐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严重步骤，不断地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领空，轰炸和炮击北方城市的交通线和居民区，连医院和学校也不肯放过，甚至进行夜间空袭；同时还几次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越南南方，并且在解放区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甚至施放连希特勒也不敢使用的毒气。这一切野蛮、残暴的强盗行为并不能表示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却只能说明它的虚弱。若干年前美国强盗和它的帮凶们就在宣传、吹捧它的种种“优势”。可是直到今天还看不见这些“优势”起过什么大的作用。说实话，我在朝鲜就领教过美国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了。这种“威力”并不能挽救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的失败。试问美国强盗在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能干出什么名堂呢？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说得多么好：“石灰、

砖瓦咱们自己会造，木材咱们有的是，还用得着去买吗？他们的飞机炸塌咱们的房屋，咱们马上又盖起新的。但是他们的飞机却一架又一架给揍下来。”

不能否认，在接连不断的狂炸中，有一些北方的妇女和儿童遭到美国强盗的杀害，我在最近一期的《越南邮报》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孩的尸体。照片头上印着几个大红字：“我们要替她们报仇！”我看到这张照片，想到那种情景，心里燃起仇恨的怒火。我要高呼：“一定要替她们报仇！”美帝国主义的“优势”和“威力”只能激起世界人民的无限仇恨。只有信奉“活命哲学”的胆小鬼才会相信美国强盗吹捧自己的鬼话。而“把仇恨放在枪口上”、“宁死不受奴役”的英雄人民却有决心跟美国强盗周旋到底。越南人民要“打，从这一地方打到另一地方，在美国强盗进攻的任何地方都要打。”越南人民要“打，从这一代到下一代，只要美国侵略者还存在一天，就要打！”那么究竟谁占优势？究竟谁的威力大？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吗？何况美国强盗早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至于躲在岘港的八千海军陆战队，这些看见幻影都要心惊胆战的美国兵能够吓唬越南人民吗？如果他们敢于跨过贤良江，那么接待他们的将是丛林一样多的枪。我刚刚读过越南《人民报》上一篇报道广平、永灵军民反击美国空中强盗的通讯，我感到非常亲切，两年前我在永灵区和洞海市访问，我只见一片欢乐、繁荣的和平景象，现在那些喜欢唱民歌、脸上带笑容的劳动人民都拿起了枪。记者同志写道：“枪，到处都是丛林一样的枪。一位海军少校说：‘你想知道我们的战斗

英雄模范吗？可以说，我们军队中每一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英勇而自豪。'……"丛林一样的枪是不会放过美国强盗的。让他们来试一试愤怒人民的力量吧！

美国强盗头子约翰逊在"优势"破产、"威力"垮台、叫得声嘶力竭之后，这些天又举起橄榄枝唱起"热爱和平"的小调来了。他玩着"无条件讨论"的花招，进行"十亿美元投资"的诱骗。他相信"金钱可以通神"，巧言也能惑众，以为自己一面继续扩大战争，使用武力，一面戴上面具充当"和平天使"，就可以坐在谈判桌旁，做杀人不见血的买卖，把他在战场上抢不到的东西骗到手里。这个双手染满了越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个下令施放毒气的强盗头目居然厚颜无耻地大谈"和平事业"，好像他派遣军队到万里以外去杀人放火也是为了"和平"，这真是对"和平"的讽刺，对世界舆论的挑战。尽管今天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幕前幕后紧张活动、到处奔走，替美国强盗卖力、卖命，兜售让美国强盗长期赖在南越的"无条件讨论"的假"和平"，但是这一切阴谋活动、花言巧语都骗不了越南人民。越南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从来不存幻想，他们更不相信"拿着屠刀、便可成佛"的鬼话。越南人民绝不让人出卖他们。对于约翰逊的连篇鬼话，越南人民的回答很干脆："烈火炼出真金，困难锻炼力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第二次长期抗战，反抗美国，战胜美国。我们民族的声誉也必将加倍地名扬四海。"

越南人民一定战胜美国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一定彻底失败。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威胁恫吓，任何新式武器都改变不了

美帝国主义灭亡的命运。印度支那战争愈扩大，美帝国主义失败得愈彻底。美国赌徒在越南下注越多，就输得越惨。现在连美国人也说，美国政府在越南所作所为“使人想起了日本在三十年代的做法”。约翰逊正在向日本的近卫文麿和东条英机学习，他一定会落到他这两个“老师”可耻的下场。

越南是我们的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越南人民是我们的亲逾骨肉的同志和战友。我们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一向是同甘苦、共患难、心连着心的。越南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越南人民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同越南弟兄永远站在一起，热烈支持范文同总理最近提出、而且得到越南国会一致通过的四项正义主张，坚决反对出卖越南人民的和平骗局，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事业。让我们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力量，同越南弟兄并肩前进，为实现范文同总理描绘的光辉前景而斗争到底：

> ……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国土上的社会主义故乡，解放南方，把侵略者完全赶出我国的领土，使我们的河山恢复青春，使我们的天空恢复明朗，使我们从红河流域到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越南人民早日团聚一堂！我们亲爱的祖国将多么美丽和灿烂！

三千万英雄的越南人民正在大踏步前进，迎接这个无限美好、无比壮丽的前景。他们齐声高唱：

> ……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我们和子孙万代的幸

福，为祖国永恒的春天，我们向前进！①

三千万英雄人民前进的步伐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

4月18日。

①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五年元旦祝贺信中的一段。

谎话一定要给戳穿*

看《不夜城》，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开头你就感觉到别人在向你撒谎，而且强迫你听那无穷无尽、无边无底的大谎话。影片不惜工本用了那么多“美丽”的画面和“漂亮”的颜色来使你眼花缭乱，来为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涂脂抹粉。可是那些庸俗的画面只能使你作呕，那些虚假的情节只能使你愤怒。我看下去，我受不了那些颠倒黑白的花言巧语，我受不了那种剥削阶级耀武扬威的“英雄”气概。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会出现这样一部美化剥削阶级、歌颂资本家的影片，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和愤怒。

影片是把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小老板张伯韩当作“英雄”来歌颂的。影片从张伯韩回国开始，到他们夫妇在庆祝公私合营联欢会上男欢女喜、全家团圆结束，在银幕上张伯韩一直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才能、有气魄、既正直、又善良的“事业家”，连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也都是正直、善良的人。在影片的开头老老板张耀堂说：“我到上海当学徒的时候，是光身带个铺盖卷来的，吃辛吃苦几十年，才撑起了这点家业。”影片快结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上海《文汇报》。

束的时候张伯韩经理又说："这点事业是我们半生心血呀！"张仲鸣厂长还说："这厂是爹辛苦一辈子留下来的，并且我们也花了半生心血。"仿佛张家的人一生辛苦为人民创造了财富，为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是有"资格"大摇大摆地走进社会主义社会似的，仿佛张耀堂真是靠劳动起家，仿佛张家那种无比豪华的生活真是靠"吃辛吃苦"换来的，所以张伯韩一出场，就充满信心、理直气壮，俨然像一位英勇坚定的"爱国志士"，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经历了各样的风险，国民党军人的勒索不过使他"破了点财"，他的妹夫串通美国洋行买办坑了他，也"没有让他们搞垮"。到一九五一年他居然成了"工商界的头等红角"。他吹嘘"这回我要把我们的厂好好地发展一下……让大年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办厂的"。他得意地举杯"为我们的黄金时代干杯"。在"五反"运动中得到"从宽处理"以后，他在工厂里还借口"使我们厂的生产能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提出一种有问题的"加速运转建议"，胁迫工人冒险试验。只有在女工沈银弟因为试验这个建议受了重伤给送进医院以后，这位经理先生才说了一句："我要检讨的"，只有在银弟的公爹老瞿把瞿海生的手举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得赔银弟的命！你还得赔我儿子的手！"的时候，这位经理先生才含着泪水说了一句："我该死呀！"这哪里有一点点"检讨"的气味？他哪里有一点点"认罪"的表示？就是在决定申请公私合营的时候，他还吹嘘"二十年我一直跟命运斗争，尝够了多少酸甜苦辣。"最后他接到他三年前"不辞面别"的独养女儿文琤来信说："你们的小珍珍已经成为一个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于是他一通百通，居然慷慨激昂地教训起他的兄弟和亲属来："难道我们就愿意永远背着这个剥削阶级的臭名声，永远过着那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吗？我们有能耐呀！为什么不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呢？"这样一来真是屠刀未放，立地成佛，开会庆祝，通宵联欢，男欢女喜，城开不夜。影片中还有人(团的干部)公开宣传："资本家有什么？我们党能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带"字已经用得很奇怪了。可是这里连"带"字也说不上，我们看见的只是老板们的狂欢，他们带着自己"半生心血"洋洋得意地给"请"进"社会主义社会"，而这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老板们的天堂。这真是弥天大谎！

看完这部电影，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说："对老板们说来，再没有比《不夜城》更能使他们感到心情舒畅的影片了。它不仅替他们说话，它还替他们吹嘘，把他们当作'一直跟命运斗争'的'英雄'来歌颂。对于他们，这部影片真是体贴入微，爱护备至。"

可能有些"好心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说："影片对资本家不是有揭露、有批判吗？"同志，这算是什么揭露、什么批判呢？工人瞿海生的手指头给轧断了，工厂开除了他，他父亲偷偷跑去向老板求情，老板说："你儿子不讲交情，他不像你，……要是我用了像你儿子那样的人，我的厂还开不开啦？……我可以给你钱，三个月的遣散费……"好像还是他老板讲道理、讲交情。又，老板不发工资，工人代表来找他谈判，毫无结果，后来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突然到厂勒索，反而

替他解了围，以后再也没有下文。这无非向观众说明张伯韩两面受"逼"，值得人同情。又，"五反"运动中发现张伯韩"有些五毒行为"，例如"替政府加工订货按小厂标准把成本提得那么高"，可是影片早已为这个行为找到了理由：小厂家要求照顾，同业提出意见，张伯韩全是出于帮助别人的好意。此外还有什么呢？做投机生意买美棉，受了骗损失十几万美金，这也不过说明这位有胆有识的大老板一下子变得天真起来，上了自己妹夫的当，显得多么善良。……总之，说揭露，说批判，都不恰当。在这些地方，影片偶尔轻轻碰了张伯韩一下，还害怕得罪他，连忙替他拍拍身上的尘土。电影占用了那么多的胶片，连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也不曾挨到一点点；连究竟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财富还是老板们的心血创造财富、究竟是工人们养活老板，还是老板养活工人这样的大是大非也不敢分辨清楚，仿佛一碰到真理，就是对老板们的大不敬。甚至甘心叫人们相信大业主、大老板真是靠劳动、靠"吃辛吃苦"起家，为这种大谎话作义务宣传员。试问，工人农人，谁不靠劳动过日？谁不是"吃辛吃苦"？可是谁见过贫苦的工农当上了大老板？在旧社会里不靠剥削，就不可能发家。在剥削者中间尽管有强凌弱、大吃小的现象，可是一切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有一个共同的剥削对象——工人、劳苦人民。

我并不是说，像张伯韩那样的人完全不可能改造。但是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教育，怎么改造？区委工业部长主张不算帐，其实张伯韩就没有认过剥削帐。他在人前说："我一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的。"对自己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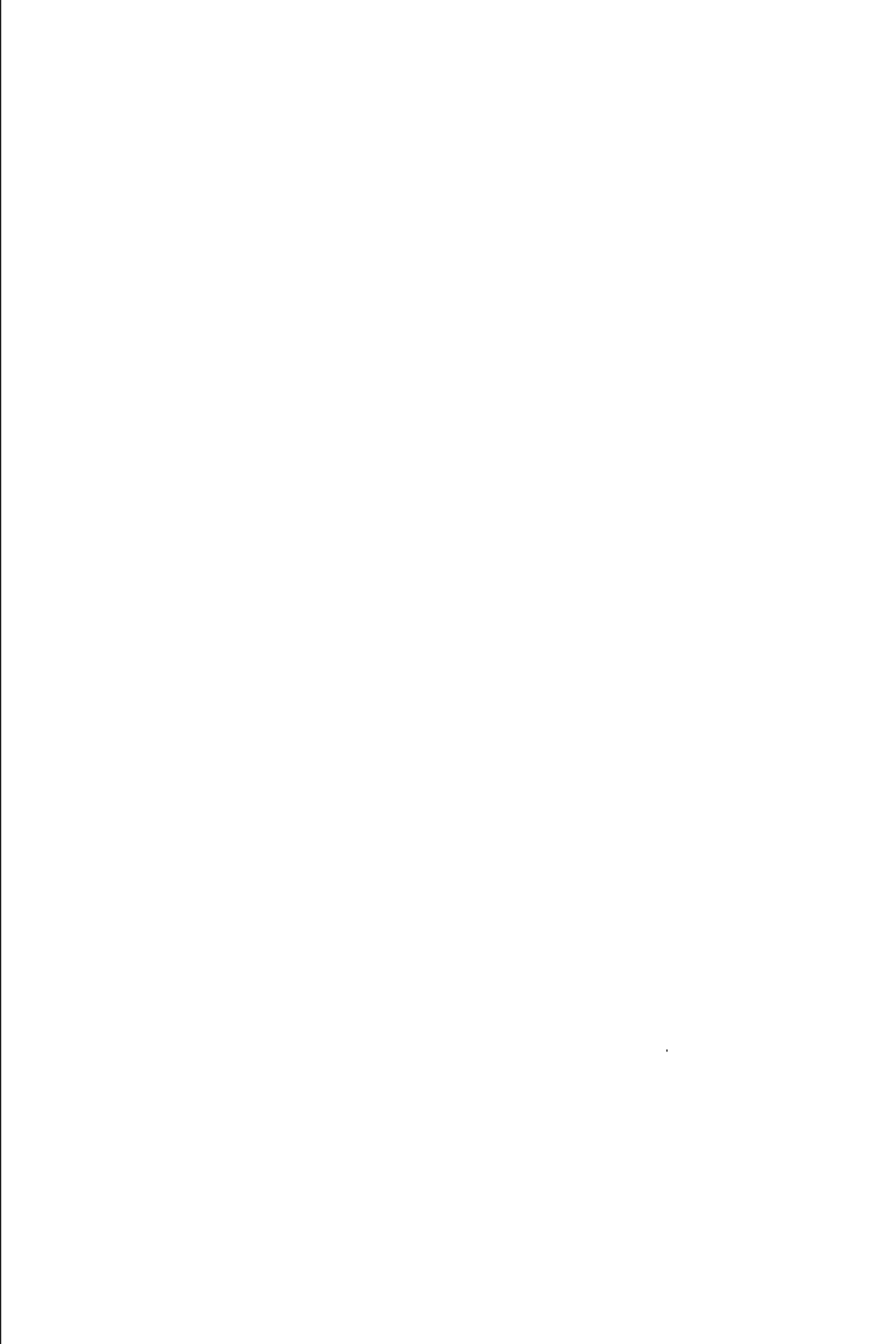
婆他却说："这些个工人们，往后更要爬到我们头上来了！"对这样的人不加以批判、揭露，不通过斗争，却只是一味吹捧、歌颂，倒反而害了他，他一辈子也不可能改造！

然而电影《不夜城》却反映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张伯韩全家父子、兄弟、夫妇、父女，它毫无例外地一律美化，连那个表兄兼妹夫的凌大年，那个为了美金不惜坑自己亲戚、逃到香港当"白华"，落得家破人亡、只好跑回来靠亲戚的凌大年也大言不惭地谈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居然在庆祝会上通宵狂欢。这真是毫无原则、取消革命的一团和气了。

在影片上是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影片上当然也有工人。可是这里的工人对资本家都很客气，在老板们面前都显得很委缩。瞿海生手指轧断后让老板开除，不见工人们进行斗争，只见老瞿瞒着儿子白白地向老板哀求。老板不发工资让工人饿着肚子干活，工人派代表到厂长室谈判，却始终客客气气，拿老板没有办法。在解放以后，厂长要担任生产委员的女工沈银弟"带头先在小组试验"他们那种违反生产安全的"加速运转建议"时，她"也不表示什么，只好无奈地默许"。甚至在她受了重伤以后，她的爱人瞿海生在医院里遇见张伯韩，也只是说："张经理，不爱惜工人是天大的罪过……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这是什么话！明明是阶级斗争，偏偏说是"私仇"。说"不记私仇"，其实是要人忘记阶级斗争。要求资本家"爱惜工人"，就是放弃阶级斗争，走投降主义的道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把希望单单寄托在资本家的"明智"和"良心"上，以为一旦实现公私合营，就普天同庆，万事大吉。这真是荒唐之至！

关于《不夜城》，我想说的话很多，可是有些意见已经有人讲过，而且讲得很透彻，用不着我在这里重说了。不少工人观众对这部电影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呢？有什么理由把剥削阶级当作英雄人物“请”上社会主义的银幕呢？有什么理由用我们的文艺武器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呢？这样的问题也已经有人回答过了。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你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你不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你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替剥削者讲话。《不夜城》是这样，《林家铺子》也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二十一年前在贵阳一家医院的三等病房里听到的几句话：“我没有钱，哪里有药吃？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天天打针受罪……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这个烧伤的工人躺在病床上痛得天天惨叫。医生只给他打医院里制造的盐水针，却不替他治病，也不让他吃药。医生说：“你是替公司做事烧坏了的，论情理，凭良心，他们都应该出钱把你医好。”可是公司里的人说：“他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公司并没有责任，上次给的医药费已经很够。现在一个钱也不给！”公司不给钱，他身边一个钱也没有。我亲眼看见这个身体结实的工人受尽痛苦地死去。他的惨叫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响着，响着。试问：哪一个资本家的发家史里没有这样的惨叫声？这是瞿海生所勾销不了的对剥削阶级的控诉！



一九六六年

雄壮的声音　战斗的友情*

当美帝国主义的"和谈"骗局破产，它继续扩大战争、遭到迎头痛击的时候，当越南人民越战越勇、越战越胜的时候，当全中国人民正在为越南人民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当全世界革命人民正在学习越南人民痛打侵略者的光辉榜样的时候，越南歌舞艺术团带着越南人民生死不渝的战斗友情和越南文艺工作者振奋人心的优秀节目来上海进行访问演出。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反美斗争前线的文艺战士，我们热烈欢迎我们亲如兄弟的越南战友。

见到歌舞艺术团的同志们，我好像见到全体英雄的越南人民，我好像听见年轻高射炮手的豪言壮语，我好像听见青年民兵打落敌机、活捉飞贼的英雄事迹，我好像听见公路上驾驶员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听见在海边巡逻的渔家姑娘讲自己抓特务的故事，我好像听见青年们带着简单工具走向最艰苦地方的脚步声，我好像听见摧毁美国机场的隆隆炮声，我好像听见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痛歼美国"王牌"军的喊杀声……我好像看见越南北方和南方生产、战斗双丰收的伟大的场面；我明确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地认识到这个坚如磐石的英雄集体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我深深体会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强烈地感觉到坚强战士革命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见到歌舞艺术团的同志们，我好像又听见越南人民的响彻云霄的庄严声音："打，从这一地方打到另一地方，在美国强盗进攻的任何地方都要打。打，从这一代打到下一代，只要美国侵略者还存在一天，就要打！"这种钢铸铁打一般、字字发光的英雄语言已经深深地印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上，也激动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今天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往的英雄国家，越南人民正在用气吞日月的英雄行为写下无比壮烈的史诗。越南人民是当今的打虎英雄，他们把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打得它深陷泥淖，进退两难。不论是在北方或者南方，越南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每一座山头都闪耀着战斗的光辉，每一位战士、每一位民兵都显示出无敌的力量。为了祖国统一，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人民的利益，成千上万的越南青年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每一个越南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下定决心要战胜他们最凶恶的敌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支持的伟大斗争，全中国人民都把这个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而且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斗争。我们和越南同志一样，坚定地相信这个斗争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我们也愿意为这个斗争贡献最大的力量。

见到歌舞艺术团的同志们，我想起了我两次访问越南民

主共和国的亲身经历。在这个英雄的国家里、英雄的人民中间，我见到许多美好的东西，我也得到不小的收获。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事实说明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极其深厚的友谊。其实每一个访问越南的中国同志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接待我们像接待最亲密的弟兄。我们夜间行车，到农村借宿，每一家都像款待亲友一样让我们住得安适。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越南同志也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许多人见到我们，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我见到中国同志了。"还说："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同志始终站在我们的身边。"这些简单的话里包含着多么深的感情！我不止一次地含着眼泪向越南同志解释："我们不仅因为你们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而尊敬你们，同时也感谢你们对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支持。"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这根红线把我们两国人民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我们和歌舞艺术团的同志见面好像和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亲人欢聚一样。

我们感谢歌舞艺术团给我们带来许多优秀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在战斗中产生的，都是描绘越南英雄的光辉形象、反映越南人民的战斗生活的。这些节目都是越南人民的豪迈语言、真挚感情、战斗武器和革命号角。有一部分节目我在越南看过、听过，我很喜欢它们，我受到感动，也受到鼓舞。我在越南访问，同越南文艺工作者也有过比较广泛的接触。在最艰苦的地方，在最危险的地方，都有文艺工作者的歌声和舞姿，他们深入生活，深入前线，上山下乡，到阵地演出，为战斗服务，甚至在以英勇战斗震惊世界的昏果岛上，也有女歌唱

家的脚迹。在河内大剧院中，在清化招待所餐厅内，在洞海郊外的农家茅屋里，在奠边府山上部队的茅棚中，在十七度线附近一座旧建筑物的厅子里，我都曾看过越南文艺工作者的优秀节目，并且有机会和一部分演员同志交谈，从他们的演唱和谈话中，我体会到那种像火一样的对美帝的刻骨仇恨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我们交谈以后他们就背着乐器和道具出发，走几十里夜路，第二天在另一个地方演出。我们在二十度线以南各省观看演出，常常中途听见敌机在上空盘旋，连阴暗的灯光也得掩上、罩住甚或吹灭，可是演员们仍然认真地进行表演。我在洞海市听过一次广平省文工团的女声小合唱《广平，我的家乡》，演员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演唱的。茅屋里黯淡的灯光使我看不清楚五位演员的面貌，但是我理解她们准备用自己生命保卫广平的感情。我永远忘不了那种朴素而动人的歌声。在河内大剧院纪念阮文追烈士的文艺节目演唱会上，贵阳同志唱的那首《你的声音万古流传》，真使我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我也听过陈孝同志几次唱南方歌曲，我仿佛跟着他充满感情的歌声到了我梦寐难忘的越南南方，同南方军民一起战斗，狠狠打击敌人。我们去十七度线的前夕，越南同志在文联的园子内举行联欢晚会，德润同志弹一曲独弦琴给我们送行，那种独特的琴声仿佛在讲心里话一样，表达了越南艺术家对我们的期望和友谊。《解放南方》和《越南—中国》我不知听过多少回，到处都在唱，人人都在唱，多么雄壮的声音，多么豪迈的感情，多么坚定的信心，多么顽强的斗志！在河内我也看过一些反映越南人民战斗生活的舞蹈，像表现南方斗

争的《木头手榴弹》、《在解放阵线的大旗下》，表现北方斗争的《高炮阵地相会》、《一手撒网，一手拿枪》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知道不少越南观众喜爱这些舞蹈，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越南人民的战斗生活、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每一个节目都表现了越南文艺工作者的鲜明的爱憎，都描绘了英雄人民的精神面貌，都表现了革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心。世界革命人民需要这些激动人心的舞蹈节目。

我在越南的这些经历和感受是我一生难忘的。今天晚上刚刚看了越南歌舞艺术团在沪的第一次访问演出，剧场内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观众们兴奋地为演出的成功欢呼，许多人感动得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些把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结合在一起的革命文艺节目不仅给我，也给我们上海的观众带来巨大的鼓舞。这些节目可以说是用艺术形象表现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巨大功绩。这些节目给我们带来越南人民火热的革命红心，让我们的心同越南英雄的心贴在一起，永远贴在一起。我们也请歌舞艺术团的同志们把我们的心带到战斗的越南，带给每一位在战斗岗位上的越南兄弟，我们的心永远守在越南兄弟的身边，我们要同他们一起战斗，一直到把美国侵略者一个不剩地赶出越南，赶出印度支那。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因为有越南人民这样亲密的战友感到万分自豪，上海文艺工作者和全国文艺工作者一样，能够同越南文艺工作者并肩战斗，携手前进，我们感到莫大的光荣。这种战斗友谊是要传到子孙万代的。

昨天我们在车站欢迎越南歌舞艺术团，火车进站的时候，

阳光灿烂，欢声雷动，我忽然想起团长瞿辉琏同志七年前写的一首题作《半个春天》的诗，我还记得最后的一句：

春天啊，你将在全国版图上降临！

三千万越南人民朝夕想望的这样一个春天必将到来。美帝国主义给赶出印度支那的日子的确不远了。

为了迎接这样一个春天，为了迎接越南人民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让我们两国人民肩靠得更近，手拉得更紧，不断地向前进！

3月3日，上海。

一九七七年

除恶务尽*

喧嚣一时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奇谈谬论，从头到尾，都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谎言和诡辩。它能猖獗十年之久，全靠它的炮制者搞阴谋诡计，以势压人，用他们窃持的权力来镇压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据我看，从它被林彪、江青同谋抛出来的时候起，就没有人完全相信它。我自己当时的确感到惶惑不解。他们说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说得那样霸道，那样武断，简直不容怀疑，不容讨论。当时我就想：十七年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在管文艺界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很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召开了全国文代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作了很重要的讲话："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十七年中间，文艺战线每次重大斗争，从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九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专栏。发表时题为《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五五年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两个重要批示，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每次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周总理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十七年间，毛主席接见我两次，周总理接见的次数更多。周总理参加文艺界的各种集会，经常指导我们。要说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试问将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将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四人帮”炮制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恶目的，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篡党夺权。

十七年中，有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当然有。斗争并没有停止过。在一些时间内，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身上，甚至表现得相当严重。但是，那些问题，那些缺点错误，毛主席总是及时地指出，及时地纠正过来了。

至于文艺战线十七年中的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同志已经摆出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狠狠地回击“四人帮”的无耻谰言。我这里从队伍方面再多说几句：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抗战期间有一个“文协”，也只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而且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破坏，也很难开展工作。拿我来说，我一直是个人活动，个人奋斗；我进行创作，不找人指引，也不征求意见，连交流经验的机会也没有，单靠个人探索、追求，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道路。没有学习，没有领导，谈不上思想改造，也谈不上团结战斗。像我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在旧中国，进步的书刊经常受到压制、查禁；进步的作者受

到迫害。大量的毒草充斥市场，多少读者和观众被引上了歧途。解放后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也大大地改变了。正像周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与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在这个新方向下面，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组织起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系列的光辉著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有了贯彻这个方向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在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团体中。通过学习，深入工农兵生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改造思想，觉悟提高了，好作品一天天多起来，许多好书、好电影、好戏、好歌、好画，同志们都提到了。读者和观众也大量增加，人民的文化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尽管我们的队伍里也混进过坏人，例如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也有人蜕化变质，有人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是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愿意改造世界观、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我们的文艺队伍不断扩大，也不断提高。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说是"黑线专政"的结果吗？绝对不能！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很清楚，这完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是党的教育的结果。

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也足以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

的荒谬。解放前我写了二十年，写旧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痛苦、死亡，字里行间散布着淡淡的哀愁，或者走投无路的悲观绝望。我自己痛苦，也使我的读者痛苦。解放以后，是毛主席的教导，是毛泽东思想，使我看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明大道，使我懂得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力武器的战斗作用。一九四九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上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我说："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灵魂。"我要向这些人学习。在党的指引下，在全国文联组织的帮助下，我第一次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一个时期。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一下子来到革命大家庭，精神上的冲击不用说是很大的，可是我感到温暖，受到教育。我开始爱上了那种生活，爱上了那些人。在斗争最尖锐的朝鲜战场上，人们习惯于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爱和恨的感情。年轻战士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使我感动，给我教育。我和志愿军指战员们交了朋友。我的思想感情也渐渐发生变化。

我第一次去住了七个月，第二年又去住了五个月，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作品写得不多，也不好，但在我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年轻战士的英雄形象。在朝鲜战场上，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我也多多少少把我的感受传给我的读者。直到今天，我还在写抗美援朝斗争的作品，因为我所爱的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激动着我的心灵，他们的鲜明的形象一直鼓舞我前进。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说是“黑线专政”的结果吗？绝对不能！广大群众很清楚，我自己也很清楚，这完全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多年来培养、教育的结果。但是“四人帮”硬说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说我是什么“黑线人物”。这是什么逻辑！？即使在我受到他们那一帮迫害打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不服的，我不相信他们那套不合逻辑、不符合实际的歪理。我始终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接见我和赵丹等同志时的教导。毛主席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写文章都是以理服人，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四人帮”一伙把“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精神枷锁强加在我们头上，就是以势压人。他们根本不讲理，只靠阴谋诡计，挥舞棍子打人害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祭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法宝，就是要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矛头针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而否定十七年各条战线的光辉成就，最终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及其余党举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面黑旗，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既然是“黑线专政”，就得来个大换班，他们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文艺工作者都说成是“黑线人物”，都得消灭，换上他们的心腹爪牙，拼凑起他们的帮派体系。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

根错节，作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对"四人帮"的余党、爪牙、帮派体系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斩草除根"；不把揭批"四人帮"清查余党和爪牙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将对革命事业、对子孙万代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文艺战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的流毒，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清除了这些垃圾，将毒草用来肥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才能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壮丽景象！

1977年12月10日。

一九七八年

个人的想法*

听说《外国文艺》创刊，我非常高兴。我谈一点个人的想法。像我这样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正需要这样一份刊物。首先我们需要学习外国的"有益的东西"，向一切优秀的作品和丰富的经验学习。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这个借鉴很重要，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说到借鉴，只要是别人的长处，不论是外国古人的，或者外国现代人的，对我们都有用。有没有这个借鉴，正如毛主席所指示，关系到"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我在三十年代认识一个作家，他说自己不看别人的作品，免得受别人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是否坚持了这个原则，不过后来他也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情况。我们生活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要争取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要和各国人民交朋友，同外国人进行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应当对别人有所了解，应当知道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文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外国文艺》第一期。

化水平，应当熟悉他们想的、讲的、爱的、恨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应当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有所理解。我们能出去走走看看，当然很好；倘使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得求助于各国的文艺作品，外国文艺是帮助我们了解外国人民的最好工具。总之，我们不出大门就想知道天下大事，就想了解别人的情况，只好多读别人写的东西，多读反映别人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可是近十多年，我在这方面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一年多来我接待过一些外国朋友，交谈起来，他们问我喜欢哪一位现代外国作家，谈起西方现代文学的情况，我只好承认我一无所知，虽然这并不是光彩的事情。不能怪我，这是“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恶果。“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搞阴谋诡计，宣扬种种谬论，推行种种歪理。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划一个圈圈，把圈外的一切完全勾销，吹嘘只有他们的“阴谋文艺”世界第一，用不着向别人学习。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有些人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不读外国作品就不会受“封资修”的影响，好像什么事都不做就不会犯错误那样。也有人这样看：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得远离“资本主义文艺”。“四人帮”的流毒今天还没有肃清。尽管读者排长队如饥似渴地购买外国文学名著，还有人不敢决定多印几本外国作品。我说，“四人帮”不准介绍外国文学名著（不准图书馆出借，不准出版社出版），这只是一方面，他们有时也介绍几本他们喜欢或者对于他们有利的外国东西，甚至大吹特吹，欺骗青年。他们搞起阴谋来，对外国的东西也尽量利用。他们也办文艺《摘译》那样的刊物，

借口介绍外国文艺情况，用外国人的文章攻击今天中国的现实，攻击中国的革命老干部。他们搞“洋为帮用”，把外国文艺作为他们害人的利器，加注释，添说明，造谣中伤，诬蔑诽谤，这都是他们擅长的伎俩。你若认为他们真正在介绍外国文艺情况，那就会上大当。他们既然可以编造历史，当然也会胡诌外国文艺。总之，对“四人帮”的流毒必须严肃对待，彻底肃清。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别人可能还有不同的意见，当然编辑部的同志也有自己的主张。我相信编辑同志会密切联系读者，了解读者的需要，办好刊物，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978年5月11日。

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

——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在一九六〇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我谈到新中国作家的莫大幸福，我说："我们生活在多么伟大的时代里，多么可爱的国土上，多么勤劳、勇敢的人民中间；在我们周围有着充实、多彩的生活；在我们前面展开更光辉、更美丽的远景。我们有取之不尽的丰富题材，我们有千百万热爱创作的读者。我们的作品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起作用，我们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教育。……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辈作家所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我又说："我们的文学一定要跑在时代的前头。……这一片阳光的大好形势正是我们施展身手的好时光。……我们跟着六亿五千万人民一同前进，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奇迹不能创造，什么事业不可完成！"

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奇迹并未创造出来，我们的事业遭到了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可是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我仍然感到这样的幸福，我仍然充满了勇气和信心。我们眼前还是一片阳光的大好形势。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一期。

坏不了的，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团结是破坏不了的。文艺工作者紧跟党中央干革命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每个人都有使不完的干劲，用不尽的热情，要为这个伟大的新跃进时代，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献出一切。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六周年。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许多我想念多年、以为今生再也不会看见的同志、朋友；我们有多少话要彼此倾吐，可是一两次紧紧的握手和一两句笑声问好怎么能表达出我们深厚的感情？在我们中间再也看不到老舍同志、赵树理同志、周信芳同志、盖叫天同志、郑君里同志、严凤英同志了，这几位在艺术上有成就对人民有贡献的同志都是受到迫害而死亡的。"四人帮"涂抹在他们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名字上的污泥必须洗刷干净！我还要向遭受残酷迫害、带着满身伤痕来到会场的同志表示敬意。今天回想到"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日子，我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个人的遭遇是很渺小的事情，何况我受到的冲击和迫害比许多同志所遭受的要轻。我虽然被诬蔑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待在牛棚，经常给揪出去批斗，但我却没有被逮捕，没有被隔离，也没有受到任何肉体的摧残。只是长期靠边中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弄得我睡不安宁。我常常梦见受到妖魔围攻，挥动胳膊保护自己，在家里我在梦中打破床头的台灯，在干校我梦里大叫，摔下床来。倘使"四人帮"的阴谋完全得逞，我纵然不死也可能住进了精神病院。以上海文艺界命运的主宰自居的张春桥、姚文元不止一次地公开点我的名，张春桥说："我们不杀

他，不枪毙他，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像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他们的爪牙们不止一次威胁我说：“不杀你不解恨！”“论你的罪行，枪毙十次，也不算过分。”我有什么滔天罪行呢？据他们说我是“三十年代‘老朽’”、“反共老手”，我是“上海的大‘文霸’、‘黑老K’”，我写过“‘邪书’十四卷”，说我搞过无政府主义，在小说里描写一些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我对“四害”横行时候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负责，说我在一九六二年上海文代会上发言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张春桥所说的：知识分子“这个瘤是很强的”，要“把它化掉”。他们的确想要“化掉”我。十年中间他们剥夺了我的一切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创作和发表的权利，千方百计把我赶出文艺界，不让我接触斗争生活。他们以为把我打倒在地，永世翻不了身了。但是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审查、受到批判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这些年我经常联系自己学习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讲话》既是一盏指路的明灯，又是一面照透灵魂的明镜，用光辉的《讲话》来照自己，真假是非，一清二楚，自己的错误明明白白摆在眼前。我没有抓紧自己的思想改造，虽然决心丢开沾满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笔，可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没有彻底摧垮。我有许多缺点，又写过错误文章，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应当“化掉”的毒瘤，我决不承认我的小说全是大毒草。另一方面我也用这一面明镜来照那一伙自

已吹嘘为"左派"和"旗手"的"四人帮"，我倒发现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他们所作所为，没有一样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他们以文艺起家，却把文艺糟蹋得不像样子。他们在文艺领域中实行法西斯独裁，严密控制，不许"百家争鸣"，只准一草独放，由江青一个人说了算。他们利用文艺搞阴谋诡计，完全脱离生活，关起门来，鬼鬼祟祟，暗中炮制。为了陷害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打击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真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颠倒是非，造谣中伤，手段之毒辣真令人发指。他们的滔天罪行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两年前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继和我们永别的时候，每个人心上都压着一块大石头，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大家有多么深的感情没法倾吐，有多么大的劲头使不出来。每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八亿人民有着坚强的信心：绝不能让毛主席、周总理亲手缔造、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颜色。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为党锄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忿。万恶的"四人帮"终于给一举粉碎了。若干年来没有听见了的普天同庆的幸福歌声又重新响遍祖国的大地。许多家庭得到了团聚，许多人得到了"再生"。我也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给"四人帮"夺走了的笔又回到我的手里。为了表示我对社会主义祖国、对人民、对党中央的热爱，我要奋笔写作，我制订了创作和翻译的规划，写到

八十岁我有把握，只要六分之五的时间有保证，我一定能完成计划。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我从上海来。上海是过去受“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一个重灾区。“四人帮”粉碎后一年多以来，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文艺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上海市文联和各个协会已在三个月前宣布恢复活动，文联最近开始在抓下面三项工作：繁荣创作、深入生活和培养新生力量。我来的时候曾和部分同志交换过意见。现在就这三方面简单地谈一点我们的看法。

繁荣创作，是当前文艺战线上最重要的事情。首先，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规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个总任务，体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无数革命先烈的遗愿，充分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一切爱国人士的理想和根本利益。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这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要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另外，过去十年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文艺园地万花凋零，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很不高兴。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应该迅速改变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缺少各种文艺作品的状况，改善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这都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当然，“四人帮”粉碎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万木复苏，生机勃勃，总的形势是好的，也出现了像《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丹心谱》、《东进！东进！》这样的好作品，受到了全国

人民的欢迎。但是，少数的好作品并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因为“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书荒”太严重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贫乏、枯燥也太严重了，精神粮食太缺乏了。

为了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作者和读者都迫切地需要阵地。去年十月，上海办了一本《上海文艺》，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恢复《收获》和《萌芽》，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应当尽早地努力促其实现。

除了创作的数量问题，还有一个质量问题。毛主席说过：“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如果我们的作品艺术质量不高，数量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当前，在作品质量问题上面临着两大公害：一个是“模式化”，另一个是“虚假”。文艺作品本应使观众和读者感到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但是我们的一些作品刚刚相反，却使人感觉到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为什么使人感觉到在“情理之外”？因为“虚假”，关门硬造，不合情理。为什么使人感觉到在“意料之中”？因为“模式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

“虚假”和“模式化”，是妨碍文艺作品质量提高的两大公害，必须克服。造成“虚假”和“模式化”的罪魁祸首就是“四人帮”。“四人帮”为了炮制阴谋文艺，鼓吹一整套“三突出”、“主题先行”、“反真人真事”等等修正主义文艺谬论，从根本上搞乱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今天，“四人帮”及其炮制的阴谋文艺虽然完蛋了，但是他们那一套谬论的流毒

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在害人。当前创作中出现的“模式化”和“虚假”的现象，就是“四人帮”流毒的表现。因此，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首先还得把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放在第一位。我们绝对不能看轻肃流毒这项工作。肃流毒就要搞干净，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也是为了开辟未来。肃流毒绝不能手软！肃流毒不搞彻底，党的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创作也搞不上去，而且后患无穷，子孙后代都会骂我们。

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大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我们主张题材多样化，但同时又主张应该以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为主。“多样化”同“为主”是辩证的统一。在“多样化”中应该有“为主”的题材；而“为主”的题材本身也应该多样化。今天，我们在党中央率领下搞三大革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本身就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多采的题材。因此，前不久我们上海作协召开了小说散文作者座谈会，号召大家大力表现当前为实现总任务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毛主席说，人民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是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因此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大力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创作要上去，作家就要下去，这个道理很明白。但是，“四人帮”根本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他们把文艺作为他们搞

反革命阴谋的工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有时甚至把文艺当作杀人的刀、打人的棍棒。他们的文艺都是脱离生活、闭门编造的谎言假话，广大群众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念。"四人帮"不仅反对作家深入生活，而且大搞"劳动惩罚"，把他们不喜欢的人赶下去，到工厂、农村，或者干校长期劳动，不让这些同志参加工作、参加艺术活动。因此，长期待在下面劳动的人无人过问，在群众的眼里仿佛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高高在上不接触生活的人倒成了是遵循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是多么反常的现象！

现在文艺工作者摆脱了"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他们意气风发地奔赴生活基地，他们决心做"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出人民群众需要的好作品。

文艺工作者再没有像今天这样地感到迫切需要深入生活了，因为他们已经被迫白白浪费了十年的宝贵时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多数文艺工作者都被剥夺了下生活、搞创作的权利，有的甚至被迫改行，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积累，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脱离了生活，作家还有什么可写呢？不从生活出发，就只好从概念出发，求助于想象。作家有没有生活，人们从作品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作家缺乏生活积累，生活底子不厚，在写作品的时候，种种缺点都会暴露出来。我自己深有体会，五十年代我要不是通过全国文联的安排两次奔赴朝鲜，我就绝对写不出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品。但是我只在朝鲜待了一年，生活的积累究竟有限，日子久了，熟悉的又变为生疏，新交的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我写

出的作品不多，质量也不高。要创作出反映今天新时期的新文艺，光有过去的生活积累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新的生活积累、新的知识和本领；而这些，都只有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才能逐步熟悉和掌握起来。只有深入今天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才能写出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新的时代精神的作品。

关于深入生活问题，需要文联和各个协会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具体的安排。例如年老体弱的老一代作家，也很需要接触新的生活，吸收新鲜空气。可以采取"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的方式，进行参观访问。

对于身体条件好的，就可以深入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并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

还有不少的青年作者，大都是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已经战斗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就应当在那里扎根，坚持业余创作。同时，也要给他们创造条件，扩大生活面，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平。

总之，我们要继续批判"四人帮"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种种罪行和谬论，把深入生活作为繁荣文艺创作的关键问题抓起来。

现在大家都在谈青黄不接。在文艺界也是这样。培养新生力量，是当前文艺战线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十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了今天文艺战线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严重现象。"四人帮"控制上海文艺界的时候，以他们的帮刊《朝霞》为中心，也曾"培养"过一批青年作者。但"四人

帮"不是用"羊奶"来喂青年，而是用"狼奶"来喂青年，坑害了一代人。今天，我们更需要在肃清流毒的同时，对受"四人帮"毒害的青年作者进行教育和挽救，帮助他们同"四人帮"划清界线，使他们真正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新军。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他们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培养文艺新军是文艺事业的百年大计，抓好这件事，还需要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才能改变这个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

以上是我们的不成熟的意见，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上一次全国文联扩大会议是在一九六三年召开的。敬爱的周总理不仅给我们作了报告，还参加了我们的联欢晚会，亲切地同大家交谈，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但是不到四年，全国文联就给"砸烂"了，各个协会也给"砸烂"了，多数文艺工作者都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现在春回大地，日月重光，我们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推倒了"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夺回了我们使用多年的文艺武器。我们意气昂扬，精神振奋，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得比任何时候更加紧密。我们这个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我们自己的组织全国文联恢复了，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了。其他的协会也将逐步恢复工作。它们都是砸不烂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满目阳光，前程似锦。三个月前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叶副主席作了《关于

修改宪法的报告》，他讲到"再过二十三年，跨入二十一世纪，你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吧！"他仿佛已经看见了二十三年后极其光辉、壮丽的景象。我们敬爱的叶副主席，声音颤动，热泪盈眶，他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无比强烈的热爱、无限深厚的感情、十分坚定的信心，我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现在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时光。让我们树雄心，立大志，表决心，订规划，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紧跟党中央，在新的长征的路上向前飞奔，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迎接花红似火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

1978年5月28日。

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闭幕词*

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经过十天的紧张工作和热烈讨论，它的全部议程已经进行完毕，现在会议就要胜利地闭幕了。

我们衷心感谢党中央，因为只有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三百几十名代表才能够欢聚一堂，举行这样一次盛会。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学习的大会，战斗的大会，是一次深入揭批“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大会，也是一次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誓师大会。

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在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和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

会议期间，我们听取和讨论了黄镇同志代表中央宣传部所作的重要讲话，我们聆听和讨论了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的书面发言，听了茅盾等同志的讲话。今天张平化同志抱病到

---

* 本篇原收入一九七九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文件发言集》。

会，给我们作了重要的讲话，乌兰夫同志代表党中央来看望我们，对我们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的指示，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关怀和鼓舞。

连日来，同志们怀着极大的愤怒对万恶的“四人帮”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控诉，揭发了“四人帮”残酷迫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的法西斯罪行。

同志们满怀革命豪情，信心百倍地畅谈今后的创作计划，决心大鼓干劲进行创作，一定要夺回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迫害失去的宝贵时间。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锻炼。不少的同志带着满身伤痕拄着拐杖来到会场。我们虽然吃尽苦头、受尽折磨，长时间不能进行正常的艺术活动，我们虽然含着悲愤的眼泪接连埋葬倒下去的同志、战友，我们全国委员有许多已经去世，但是我们并不是白白地度过这一段时期的。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是我们也有很大的收获。在这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我们这支文艺队伍给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有不少同志虽然年逾古稀，满头白发，但他们的心仍是红的，精神仍是旺盛的，他们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不少同志在残酷的迫害下，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甚至步履艰难，但是他们仍然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决不放下武器。我们这支队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更加勇敢地战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着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全力以赴，奋勇向前。

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阵痛”，这是产生新的文化高

潮的“阵痛”，一个崭新的文化高潮就要到来了。

这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是把我们的极大的愤怒化为极大的干劲，极大的力量，成为推动新的文化高潮迅速到来的巨大动力。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恢复了中国文联，恢复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宣布了《文艺报》的复刊，其他一些协会也将逐步恢复工作。这样我们文艺战线的战斗力量就更加强大了，更加团结了。我们一定要把恢复的工作做好，一定要在文艺战线上造成一个万马奔腾的新的跃进的局面。

当然，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虽然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但是它的流毒还很深很广，远远没有肃清。“四人帮”编造的种种谬论歪理，在某些地方还在兴妖作怪，我们决不能轻易放过。我们一定要把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现在形势大好，人心振奋。在“四人帮”粉碎后不到两年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遍地阳光、前程似锦，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干劲冲天。我们有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有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我们有紧密团结坚强如钢的八亿人民，我们还有什么顾虑不能打消？还有什么“余悸”不能消除？我们的目标是宏伟的，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跟八亿人民一同前进，在新的长征中，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最大的幸福。让我们把最热烈的爱和最深厚的感情献给我们的社会主

义祖国，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投身到沸腾的生活中去，用各种文艺形式歌颂我们的时代，歌颂我们的祖国，歌颂我们的领袖，歌颂我们的人民。

为了迎接建国三十周年，为了迎接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创作运动，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竞赛，让大家发挥革命干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作为我们的献礼。

最后，我们感谢西苑饭店全体职工对我们的支持和照顾、感谢大会全体工作人员日以继夜的辛勤劳动，这一切对大会的圆满成功都作了贡献。

现在宣布大会闭幕。

1978年6月5日。

我的希望*

《文艺报》复刊是广大读者盼望了好久的事情。事情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严正批判。复刊后的《文艺报》一定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刊物的一个任务就是：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改变他们遗留下来的文风，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彻底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这是一场严肃的长期的战斗。《文艺报》应当是一个战斗的刊物，它的战斗性要强。在文艺战线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刊物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勇敢地战斗；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真正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少登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的文章；批评不怕尖锐，但思想要明确，也要实事求是；批评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绝不搞"四人帮"那一套。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篇文章就是结论，不准别人碰一下。要鼓励大家进行热烈讨论。

文章不一定太长，要说老实话。至于把"成套设备"一齐用上，把大家常说的全照搬，就是不讲出自己真正的见解，这种文章读者不喜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一期。

我这样想：只要不违背六项政治标准，敢想、敢写，都是可以的，而且应当受到鼓励，刊物也要敢于发表。

我钦佩《广东文艺》，它敢于首先发表批判浩然的文章，摸摸老虎的屁股，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要不是从广州发射出这颗“中程导弹”，捂着的盖子一时还揭开不了。闯将是不能缺少的，要是没有人敢于一马当先飞奔向前，大家都看风色、看行情，袖手旁观，那么就绝不会有新的气象和新的局面。

我希望《文艺报》在这方面也起带头的作用。

1978年6月9日。

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最近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在全国展开了越来越热烈的讨论。这并不是一般学术观点的讨论，这是思想战线上一场重要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新的长征是否能取得胜利，四个现代化是否能顺利完成；关系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否能进行到底；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每个人的工作。总之，要搞好这场斗争，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够前进一步。

其实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已讲清楚了。这次讨论中大家也讲得很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就有多处说明这个问题（毛主席不是还说：“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吗？）。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即使说好些年来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思想弄得混乱不堪，但根据我们的经历，根据我们的实践，我们也应当看透了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鬼把戏。对他们讲的“顶峰”、“紧跟”、“句句照办”、“一句顶一万句”、“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五期。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于是我们就受到了粗暴的待遇。他们又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这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吧。他们就是这样地"句句照办"的。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受到非法的待遇,受到接连不断的批判,都是在"高举伟大红旗"的口号声中进行的。因此,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始明白他们是在歪曲、篡改、阉割毛泽东思想,利用《语录》作为他们打人的武器,他们说"句句照办",实际上一句也不照办。他们搞武斗,搞逼供信,搞打砸抢,制造冤案、假案……哪一样不是和毛主席的指示对着干?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却地地道道搞封建迷信。今天我们要全面地、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应当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能由实践检验真理,搞科学,不搞迷信,敢说敢做,解放思想。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落实到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上去。我们文艺界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得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首先还是要解决实践的问题。作品来源于作者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也还是离不开

实践。毛主席说："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就是要看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效果：它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人民群众欢迎它，还是抵制它。好的作品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灵的确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读者的智慧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这样的作品才能在群众中间扎根，才是有生命力的。对作品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读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任何作品都要经过广大群众的实践来检验的。一部作品的价值不是少数几个人点点头说两三句话就可以决定的，正如一部现代文学史也不是几个人关起门就可以随意编造出来的。因此我有一个意见：文艺创作的主管部门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死。在政治上不用说应当把住六条标准的关，在艺术方面还是让"百花齐放"吧。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这里设"禁区"，那里下"禁令"，什么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不见得很妥当。毛主席早说过："不要求全责备。"多演一些戏剧，多放几部影片，有什么害处呢？听说《阿诗玛》要公开放映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读到描述杨丽坤同志的遭遇的文章，我心里燃起一团火，对于这样一个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受害者，我们除了表示同情外，难道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么？现代科学虽然不能恢复她的青春和健康，但是让她的艺术得到广大群众的赞赏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点安慰吧。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对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发展稍微多知道一点，也不是没有好处的！那么，还是多听听群众的呼声吧，眼睛不能专门向上，也应当向下看看，群众才是

真正的英雄，文艺作品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知道应当批准什么，抵制什么。

总之，当前最重要的事还是让人多讲话，多听别人的意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肚子里有话要讲。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的革命事业，还是让大家多讨论、多发表意见，用集体的智慧做好工作，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78年10月12日。

一九七九年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

读了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我有很多感触。这个重要讲话，当年我未能亲耳听到，但是有些热心的同志向我传达了讲话的精神。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总是不准文艺界传达和贯彻周总理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和指示，谁传达了就要挨闷棍，所以我们只得在私下里传递消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界多灾多难，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在这里乱打棍子，随意整人，搞得许多同志不敢讲话，不敢写文章。大家对张、姚都有意见，但就是碰不得，因为在他们背后还有人。因此，当我听说周总理号召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敢于讲话，不要怕棍子、帽子时，我感到总理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一九六二年我还听过陈副总理两次的讲话。这年五月，上海召开第二次文代会，我响应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号召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说，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有勇气，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上海文学》第二期。

我的这个讲话，只能算是学习周总理讲话和陈老总两次讲话的一个非常粗浅的体会。但就是这样一个粗浅的体会也为当时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所不容。我刚从日本回来，就听说《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发言受到了批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更说我是向"牛鬼蛇神"煽动"反党"的勇气。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讲话算不了什么，他们整我，目的是为了反对周总理和陈老总。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感到做什么工作都得有一点勇气，搞文艺更是如此，因为文艺工作者要代表人民说话。总理在这个讲话中说："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面对领导。"这就是说，在今天虽然人民群众与领导者在根本利益上无冲突，但人民的想法同领导者的想法还是常常会发生矛盾。特别是那些染上了官僚主义恶习的领导，许多地方都不能代表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家究竟是作人民的代言人，还是作"长官意志"的传声筒？作传声筒，当然比较保险，但是，你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作人民忠实的代言人，有危险，可能挨到棍子，但是尽了责任。所以，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一定要有勇气，可以说无勇即无文。

我在一九六二年的那篇发言中说："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发现这句话讲得并不全面。许多同志本来很有勇气，写了许多好文章，但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勇气就减少了，至今还心有余悸。这就说明发扬民主要讲两方面，一方面要讲勇气，一方面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

保障。例如什么叫"反党"，我就希望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否则，还可能出现随意用"反党"帽子来整人的情况。所以，我现在认为，一方面要提倡作家们拿出勇气，敢于文责自负；另一方面也要实行依法办事。不仅那些真正属于反党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那些任意用"反党"帽子来诬陷别人的人，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文责自负，依法办事，这样，文艺界的民主就可得到保障，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就有了希望。

1979年1月。

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

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已经进行完毕，大会就要闭幕了。

我们的会开了六天半，在大会和小会中，代表们讨论了邓小平同志的祝辞、周扬同志的报告和茅盾同志的发言。讨论得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的确说出了心里的话。不断的掌声就说明这些发言是受到全场热烈欢迎的。通过讨论，大家对三十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教训心中有数，对今后文艺工作的方向也很清楚。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勇气更多了。具体的问题将通过创作实践陆续得到解决。

我们大会选出了领导机构。作协筹备组的报告中关于今后的工作开了好些支票，我相信它们会一一兑现，因为作家协会并不是管作家的衙门，它是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且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的组织。

现在文艺界形势很好。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出版了小型和大型的文艺刊物，每个刊物上都发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文艺报》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了不少好作品。这是从来有过的。全国出现了不少很有才华的新作家，每个作家都有好的作品：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反映生活面广，而且有深度，有激情。

还有一大批被迫搁笔十年、二十年的作家又拿起笔写出了不少激动人心的作品。

这些新作家和重新出现的作家，他们都是经受过磨练的闯将。周扬同志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文艺事业，不仅需要几个、几十个闯将，而是需要成千上万的闯将。"勇猛的闯将将会打破任何精神的枷锁，冲破一切的禁区。这样的闯将已经有了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百花争艳、满园春色的前景。只要能够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只要没有人对作品横加干涉，对作家乱打棍子，那么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三五年内就会出现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的局面。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乐观。茅盾同志歌唱的"文艺春天"就要到来了。

可能有人要问：春天到来之前会不会刮冷风，出现霜冻呢？我想起两件事情：第一件，最近有个旅美华侨作家访问我。她说向好些人采访过，请他们谈在"四害"横行时的遭遇，最后问他们还会不会再出现像"四人帮"那样的人物，据说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会。我不知道她访问的是些什么人。我的回答不同，我说很有可能再出现，也可能不出现，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再受迫害。要是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备，那就很难说了。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再让人把笔夺走！敢不敢捏住手里的笔不放！第二件，前不久我读到一

本书《重放的鲜花》，收的全是五七年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它们最初出现时就有过争议，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好作品。可是不久运动一来，作品打成了大毒草，多数作者不仅给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且一下子变成罪犯，有的甚至给弄得家破人亡。这种对部分作家的不合理、不公道的惩罚，我们都是点头默认过、或者举手赞成过的。我们当时不想弄清是非，不敢弄清是非。我说不出这是不是遵守了明哲保身的古训。可是作为正直的作家，是于心有愧的。我们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惩罚，而且正是受到这样的惩罚。今天我们怀着无比信心向前看的时候，不能不想念背后无数才华横溢的屈死的作家，连他们也在呼喊：“历史的悲剧决不允许重演！”我们不应当再“心有余悸”了。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今天我们有一部全国人民拥护的《宪法》，这是根本大法。《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不是空话。现在又颁布了一部刑法，明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根据这些，只要作品没有触犯刑法某章某条，按照党纪国法，作家的写作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任意剥夺。我们大家都要守法，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但也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利。

希望我们各级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爱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劳动。在我们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三十年前我参加第一次文艺工作者大会以后，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写过一封公开信。我说："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觉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桩值得骄傲的事情。"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强烈的爱，我永不放下我的笔，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最后，我代表参加大会的全体代表向大会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招待所服务员表示真诚的感谢，没有同志们日以继夜的辛勤劳动，大会不会进行得这样地顺利，取得成功。

现在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1979年11月11日。

我读《红楼梦》*

我对《红楼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十几岁时翻看过它。我最后一次读《红楼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往马赛的法国轮船上，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它当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是这部小说里面有原作者自传的成分。书中那些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悉的，或他所爱过、所恨过的；那些场面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的。作者要不是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他就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来。……

1979年12月15日。

* 本篇原收入一九八二年一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我读〈红楼梦〉》。标题为该书编者所加。

一九八〇年

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出席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我很兴奋。特别高兴的是看到这次获奖的作家，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有几位青年人。其中有专业作家，有业余作家；有熟悉的，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人不断地涌现出来，这说明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我相信，今后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

这次评奖活动，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关心。从全国四面八方，一共投来了二十五万多张选票，推荐了两千多篇作品。经过评选委员们多次认真地分析、讨论、协商，选出了现在公布的这二十五篇。我代表评选委员会和参加评选的广大读者，向二十五位得奖的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我们的文学事业，一旦冲破了"四人帮"的牢笼枷锁，医治了十年浩劫带来的创伤，清除了各种流毒以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去年一年，全国又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多采，风格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文学》第四期。

多种多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次获奖的作品仅仅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国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中篇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也能搞一次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我想这对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还处在初步繁荣的阶段。我们要珍惜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我们作家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要求“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锻炼自己，丰富自己，为攀登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峰，坚持不懈地付出辛勤的劳动！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脱离同人民、同生活的联系。忘记或者忽略这一点，艺术生命就会衰竭下去。作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应当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现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我们的生活在变化，我们的人民在前进。如果我们不和新时期、新的群众相结合，不去了解和熟悉新的生活，我们的创作就很难适应时代的需要。作家深入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但是创作是复杂的艰苦的精神劳动，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那种不分青

红皂白，把作家一律赶下去的"一刀切"的方法，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最好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下去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长期的，短期的，深入下去的，走马观花的，都可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总之，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

除了向生活、向人民学习之外，还应该强调一下向书本学习。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进行创作，学习和借鉴是不可缺少的。从这次获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对大家的影响。如有的作品就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有的作品则汲取了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有的作者，看来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有的作者正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这种种努力，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都需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由于"四人帮"的坑害，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现在就更得抓紧时间，补上这一课，加强各方面的修养，打下扎实的基础。

同志们，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先辈一代一代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我们这一代人也要有雄心壮志，刻苦钻研，虚心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勇于探索，敢攀高峰，写出更多更好的富有生命力

的作品，让我们伟大时代的精神和英雄人民的事迹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最后，祝同志们在八十年代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巴金文学创作目录*

巴金文集第一卷

灭亡(1927—1928)　中篇小说

新生(第二稿 1932)　中篇小说

死去的太阳(1930)　中篇小说

海的梦(1932)　中篇小说

文集第二卷

春天里的秋天(1932)　中篇小说

砂丁(1932)　中篇小说

雪(原名《萌芽》,1933)　中篇小说

利娜(1933)　中篇小说

文集第三卷

雾(1931)　中篇小说

雨(1932)　中篇小说

雷(1933)　短篇小说

电(1934)　中篇小说

文集第四卷

* 本篇系作者手订，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八月《花城》文艺丛刊第六集。

家(1931)　长篇小说

文集第五卷

春(1936—1938)　长篇小说

文集第六卷

秋(1939—1940)　长篇小说

文集第七卷

复仇(1929—1931)　短篇小说集

光明(1931)　短篇小说集

电椅(1931—1932)　短篇小说集

文集第八卷

抹布(1931—1932)　短篇小说集

将军(1932—1933)　短篇小说集

沉默(1934)　短篇小说集

沉落(1934—1935)　短篇小说集

神·鬼·人(1934—1935)　短篇小说集

文集第九卷

发的故事(1936)　短篇小说集

长生塔(1934—1936)　童话集

还魂草(1937—1941)　短篇小说集

小人小事(1942—1945)　短篇小说集

文集第十卷

忆(1933—1936)　散文集

短简(1935—1937)　书信集

生之忏悔(1929—1934)　散文、序跋集

点滴(1934—1935)　散文、杂感集

梦与醉(1937)　散文集

控诉(1931—1937)　杂文集

无题(1936—1940)　杂文集

黑土(1939)　散文集

龙·虎·狗(1940—1941)　散文集

废园外(1938—1942)　散文集

怀念(1938—1946)　散文集

静夜的悲剧(1945—1946)　散文集

文集第十一卷

海行杂记(1927)　记事

从南京到上海(1932)　记事

旅途随笔(1933—1934)　记事

旅途通讯(1938—1939)　记事

旅途杂记(1940—1942)　记事

文集第十二卷

火 第一部(1938—1940)　中篇小说

火 第二部(1941)　中篇小说

火 第三部(1943)　中篇小说

文集第十三卷

憩园(1944)　中篇小说

第四病室(1945)　中篇小说

文集第十四卷

寒夜(1945—1946)　长篇小说

谈自己的创作(1957—1961)　创作回忆

感想(1939)　杂文集

慰问信及其他(1951)　杂文集

华沙城的节日(1951)　散文集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1952)　报告文学

英雄的故事(1953)　短篇小说集

保卫和平的人们(1954)　报告文学

谈契诃夫(1954)　随笔集

明珠和玉姬(1956)　短篇小说集

大欢乐的日子(1957)　散文、特写集

友谊集(1951—1959)　散文、随笔集

新声集(1959)　十年作品选集

赞歌集(1960)　散文、特写集

李大海(1960—1961)　短篇小说集

倾吐不尽的感情(1961—1963)　散文集

贤良桥畔(1963—1964)　散文、随笔集

巴金近作(1977—1978)　散文、杂文、序跋等

爝火集(1979)　三十年散文选集

随想录(1979)　随笔集

多鼓励，少干涉*

出席这次全国人代会，我有一个想法，我上了年纪应该退休了，而且一个作家应该把时间放在写作上。

关于文艺工作，最好开文联全委会讨论一下。我早就想过，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究竟怎么样？有什么成绩，有什么缺点，要好好总结一下。好的推广，不好的，以后就不要再犯这种错误。我虽说是搞文艺，其实我不懂文艺。有一个问题至今搞不清楚，就是文艺的作用。有时候被人看得很高，认为一部电影、一个戏剧、一本小说、一首歌曲就可以使青年犯罪，要作者负责任。一个作品发表了，存在一些缺点，就有很多人出来讲话，好像一部作品就可以亡党亡国。其实我们这些人哪里有那么大的作用？有时候把文艺的作用抬得很高，有时候却又把文艺的作用看得很低。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很差，有的人甚至连一张写字桌也没有。我知道一位搞翻译的，自己有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没收了。现在要一个房间摊开书来从事翻译都不可能。既然认为文艺有那样大的作用，却对文艺工作者这么不重视，实在不可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二日《文艺报》第十期

解。现在大家都在谈为四化服务，搞四化就要靠知识和知识分子，他们应该起重要的作用，但知识分子的政策至今没有完全落实，知识分子并未得到信任。现在需要知识分子，要靠他们发挥积极性，不给他们一点工作条件怎么行！我觉得这次会开得很好。但也只是讲得很好，写得很好，至于将来做得怎样，我看阻力还是很大。过去空话说得太多，人们不敢轻易相信，要多做取信于民的工作。反官僚主义，最高领导有决心，在中层动起来就很困难。许多事情未必可以乐观。我们要想得难一些，道路曲折一些。应该认真来做，好好地做。本世纪末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群众的信心还是不足，还要做许多工作。我觉得要重视文艺。文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培养崇高的心灵，树立为国家、为人民的理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文艺工作者应该受到重视。给他们安排一些较好的工作条件。我主张多鼓励，少干涉。

祝《萌芽》复刊*

《萌芽》复刊，主编同志要我讲几句话。倘使我没有记错，《萌芽》创刊时我曾写过短文表示我的祝贺和期望，但现在不需要我出来讲什么了。前些时候我的家乡成都要创刊一种叫做《青年作家》的杂志，有人来向我征求意见。我说，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作家，现在并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缓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头。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但是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我不大喜欢"培养"、"接班"这一类字眼，我也不喜欢"老作家"这样的称呼。在国外好像没有人用这种称呼。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既然称"老"，不管是"衰老"，还是"老朽"，都得退休。所以有人抱怨"老"作家霸占着席位，新作家起不来。还有人抱怨"老"作家不肯带徒弟培养新人。我看问题还是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萌芽》第一期。

在"老"字上。我建议取消这顶帽子。我们生活在九亿人口的大国,就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作家,空着的席位多得很,谈不到谁霸占谁的席位。只要读者接受你的作品,你就可以大步走进"文坛",那么多的空席位任你挑选。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这样想。

我也不赞成"带徒弟"的说法。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是在生活中间锻炼成长的,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别人不能代替他感受,也不能替他出主意怎样下笔。别人能替作者改动的只是错别字和文法不通顺的字句。这种事情文学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做得比"老"作家更好。拿我来说吧,我一九二八年从法国把第一部小说《灭亡》寄给上海朋友,原稿上还有些别字。我并不认识叶圣陶同志,更没有想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圣陶同志把我的小说拿去发表,绝不是看上了那些错别字,而是为了小说的内容,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我当时还不能驾驭文字,也不想"进入"文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学家",我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客串"。但是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我只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凡是对我写作有用的我都学。我学会了少写别字,少说废话。

我没有才华,也不会玩弄技巧,我写作一方面靠辛勤劳动,另一方面靠生活中的爱憎。我希望我的文章起较大的作用,打动更多人的心;我尽全力把故事讲得好一些,感情倾注

得多一些，用自己的真实感情去感动别人。我不喜欢那些浓装艳抹、忸怩作态、编造故事、散布谎言的文学作品。我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可能有脱离内容的技巧。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表现手法，这是从他的创作经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也读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例如《悲惨世界》和《复活》）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我因为自认为是一个"客串"，精神上没有包袱，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写，不必管有没有"文学腔"。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话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不能找别人帮忙，请别人"培养"。我听见有些年轻人说："我想写，写不出来。"自己写不出来，别人也无法代写，反正写得出的人不会少。全国有一百几十种文艺刊物，它们需要稿子。

前两个月我遇见一位青年作家，她说她在农村插队九年，有很多话要说，她一定要写出来。她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她还准备写出更多的。这样的青年作家我见过好几个，我知道他们的数目不少，各省市都有。他们有生活，有爱憎，有话要说，有精力从事创作劳动，不让他们写也不行。读者需要他们。他们是正在生长、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们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他们向读者交出整个的心。他们是靠作品而存在，而战斗，而成长。他们将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勇往直前。在他

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热诚地欢迎他们，也甘心让他们把我抛在后头。

1980年11月28日。

一九八一年

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大会上的讲话（书面）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看望获奖的作家、诗人，不能和大家一起欢聚，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为我们祖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向所有获得荣誉的作家、诗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还要代表千万的读者向你们表示感谢，并且要求你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尽管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全部获奖作品，但是其中中篇小说部分我基本上都阅读了。可以看出，这些作家都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所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都很熟悉；艺术概括能力也比较强，因此表现的思想、生活既很真实，又有深度；在艺术上都不甘于蹈袭旧的俗套，而是努力探索，立意创新；驾驭运用语言文字方面也各显本领，各有特长。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我们文学创作水平正在提高，文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我深信，在你们中间，将会出现不少卓越的艺术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这四年来，我们文学界仿佛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竞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为广大读者热爱的优秀作家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不少作家刚写了一部好作品，接着又有更好的新作发表。这都是过去数十年所不多见的现象。从一九七九年起，我们已经连续三次进行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现在又完成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的评奖工作。这些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我们在这短短几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反映了我们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更新。这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但也因此更加需要珍惜现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兴旺局面。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我在阅读这些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深的感受：许多优秀作品都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心灵。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平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干部，但是他们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劳动、斗争。固然有些作品揭露了我们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描写了我们的一些缺点，但是作者更着重地写出了主人公对待困难、同缺点作斗争的态度，那种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那种鞠躬尽瘁、坚定不移的决心。我可以这样说：许多作品都写出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作为这些人的同胞，我感到自豪。这些作品给了我们以勇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一百多年来，我们历尽了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严峻的考验，却仍然坚毅地走着自己的艰难创业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些作品中，正是洋溢着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是用作家的生命之水写成的。作品所表现的，也和人民的生活一样，像一股激流，永远在跳跃，在奔泻。不管通过多少乱山碎石，都不能阻止它；它一定要奔汇到汪洋大海中去。在它奔腾的途中，也会射出种种水花，就像我们生活中有过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希望和悲哀；但是它总是鼓舞着人们去和邪恶作战，去执著地追求美好的生活。作家总是用自己从人民中间汲取来的热和光，去温暖、照亮、鼓舞别人的心，我就是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力量的。在我们优秀的作品中，主人公就像高尔基的“勇士丹柯”，他掏出自己的燃烧的心，带着人们前进。

当然，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的文学创作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我们的得奖作品都应该是艺术精品，能够经受更长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代表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应该与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灿烂、高度发达的文学历史相称，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这个要求可能是比较高，比较严，但它是我们应该达到、可以达到的。

在这许多次的、不同门类的评奖活动中，还有一个大家都已看到的现象：得奖者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作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中青年作家、诗人已经成了当前文学创作的中坚、成为文学园地中最活跃的成员。他们创作数量多，思想艺术水平也不低，他们跑到前面去了，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令人欣慰的呢？

特别是想到我们青年时代所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我深深感到我们更有责任去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我自己在青年时代就曾受到鲁迅先生、叶圣陶先生、郑振铎先生、茅盾先生各位前辈的爱护、关怀和帮助。我们都知道，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在漫长的艺术实践、生活实践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因此也就更需要同志式的友爱和鼓励，诚恳温暖的关怀和帮助。粗暴简单的办法，轻蔑指责的态度，不仅会伤害这些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作家，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的令人难忘的教训的。我们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确地处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促成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健康地发展，日益繁荣昌盛。

同志们，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你们去创造，去争取！继续努力吧，我衷心祝愿大家取得更大的成绩！

1981年5月。

学好《决议》，继续肃清“左”的流毒*

学习了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大家一样，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精神十分振奋。党在《决议》中，认真地回顾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充分肯定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毫不隐讳缺点和错误。我感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又恢复和发扬了。认识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就能满怀信心地大踏步前进。通过《决议》的学习，我们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通过拨乱反正，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势的确很好。创作空前繁荣，队伍不断扩大，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好作品越来越多。这种兴旺的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大家要格外珍惜它、维护它。

但是，也应该看到，前些年文艺界深受“左”的思潮的祸害，我们上海也不例外，“四人帮”的所谓“金棍子”就出在上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日《文学报》第十八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栏。

海。要彻底肃清“左”的思潮的流毒，消除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年三月《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曾指出：左倾错误是全局性的问题，“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这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现在，党中央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文艺界，也要在学习《决议》的基础上，本着《决议》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对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认真地回顾一下，总结经验教训，努力肃清“左”的和其它各种错误的思想对文艺的影响。肯定成绩，纠正错误，记取教训。这样，我们的文艺事业就会更加兴旺繁荣，我们的文艺队伍就能真正团结起来。

《巴黎的忧郁》题词*

波德莱尔这个小集子要出版了，我很高兴。相信它会为我们中国文坛增添一些有意义的新东西。希望我们今后更多地介绍国外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断开阔我们的视野。

巴　金 81年10月15日，北京。

---

* 本篇原刊于亚丁译《巴黎的忧郁》(一九八二年八月漓江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三届二次会议开幕词*

两年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我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强烈的爱，我永不放下我的笔，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现在我在这里讲话，我充满了更大的勇气和信心。在我面前的都是些经过十年浩劫严峻考验的文艺战士；在会场外还有更多的有才华、有胆量、有见识的中、青年作家。的确，我们的文学事业有极大的发展，优秀的作家成批出现，好的作品大量产生。我看到了一个热烈竞赛的场面。作家们辛勤劳动，大家比作品质量的高低，比作品数目的多少，比对祖国和人民的贡献。我和一些老一辈的作家谈起来，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文艺报》第二期。

们对这样的形势都感到万分高兴。我并不是在盲目吹捧。我们的作家和作品，当然也会有缺点，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不难克服的。半年多前，我和一个美籍华人作家代表团谈起中国现在的情况，我说："最近，我读了不少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和作品已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作品读得太少了。我劝他们多读些作品，这样才能对我国现在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今天我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我向那些用大量优秀作品来丰富我国文艺百花园地的作家们，表示极大的敬意。

1981年12月17日。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三届二次会议闭幕词*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说实话，作家协会主席这个职务对我很不合适。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普通的会员，一个普通的作家，紧紧捏着自己的笔，度过我最后的三、五年。今年十月，在苏黎士城，一个汉学家向我提了二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做作家协会的代主席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个职务对我不适当，我同意担任这个职务，不过是表示我对作家协会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这样：我支持作协党组的工作，支持主席团的工作，支持书记处的工作。除写作外，我尽力想做好一件事，就是促成现代文学馆的早日建成，它将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搜集、保存大量的资料，同时也是新文学六十年经验的总结。现代文学馆将反映中国作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保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我们要爱护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们有必要让社会更多地、更正确地了解文学的作用，更多地关心文学事业，使正在从事辛勤创作的作家们能有更好的条件，心情更舒畅地从事创作实践，促进文学事业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文艺报》第二期。

大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它作出自己的贡献。让我们团结起来，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工作！

1981年12月22日。

一九八二年

向中青年作家致意*

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谨向从事创作实践的中青年作家致意！

当前，中青年作家和各条战线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是我们国家各方面活动的骨干。这些年来，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任劳任怨，辛勤劳动，不计报酬。他们中许多人工作、学习的条件是非常差的，白天辛苦一天，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做家务。但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充满着热爱，有多少力量就献出多少力量。由于他们，我们国家前途更有希望。

文艺事业主要靠中青年文艺工作者，所以，一定要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希望我们社会多一点关心他们，多一点爱护他们，多一点关心文艺工作，了解文艺的作用。我觉得，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只要出一部好的作品，多一个好的作家，都是我们大家的光彩，任何成就都是属于整个国家的。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大家努力，搞好文艺工作。

我在这次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开会的时候说过，我年纪大了，但是除了写作外，我还要做两项工作：第一、促进中国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恭贺新年好，更上一层楼"专栏。

代文学馆早日建成，以便总结六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绩和经验。第二、爱护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给中青年作家以鼓励，尽力支持他们。

近几年来，文艺形势很好。我相信，一九八二年一定更好。

1981年12月30日。

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和我们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开始了。我最近身体不好，不能前来参加，感到很遗憾。我热情支持这个会的召开，并祝它圆满成功。

军事题材是文学创作题材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军队几十年艰苦的奋斗，创建了历史性的巨大功勋，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壮烈事迹，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丰富源泉。建国以来，我们一大批长期经历了战争生活的作家，写出了很好地表现革命战争、歌颂英雄人物的作品，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这些作品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最近几年也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在群众中都有很好的影响。

解放初期，我曾到部队去了一个时期，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我第一次和部队的指战员生活在一起，接触到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人民日报》有编者按语："这是巴金同志的书面发言，本报略有删节。"

些普通的战士，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我开始爱上了那种生活，爱上了那些人。在斗争最尖锐、生活最艰苦的朝鲜战场上，人们习惯于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爱和恨的感情。年轻战士以吃苦为光荣，以多做艰苦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争先恐后地献出生命，他们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使我感动，给我教育。我和志愿军指战员们交了朋友，思想感情也渐渐发生变化。我第一次去住了七个月，第二年又去住了五个月，虽说时间不长，作品写得不多也不好，但在我笔下开始出现了年轻战士的形象，并通过作品把我在朝鲜战场上的感受多多少少传给我的读者。直到今天，我所爱的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激动着我的心灵，鼓舞我前进。

我们的军队是可爱的军队。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这些年又立了新功。我觉得军队的光荣斗争历史、军队的英雄榜样，应该大写特写。这是我们作家的责任。当前国际形势还是动荡不安，战争危险依然严重存在，人民解放军继续站在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无论从教育青少年后代、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准备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角度，或是从文学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大力提倡和发展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

感谢解放军的领导同志，靠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个座谈会很顺利地开成了。这还是建国以来头一次开这样的会。我们作家协会做的工作不多，但是我们愿意配合着

你们，做一些组织、推动的工作。从这次座谈会开始，今后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应该把组织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组织地方作家到部队去深入生活，加强对军事文学的研究、评论，作为自己经常工作的一部分，放在重要的位置，抓出成效。

在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方面，我们许多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同时也都感到有一些创作思想、创作问题需要研究、探讨。这次座谈会可以总结、交流我们自己的经验，充分肯定成绩，看到不足，提高对军事题材创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以便推动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

我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讲不出多少意见，只想谈一点感受。

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别的创作一样，也面临提高质量的问题。文学作品当然需要相当的数量，因为我们有广大的读者，读者的要求又是多种多样。但更重要的是质量，要努力创作出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提高创作质量，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如开阔视野的问题。将军事战线和其他战线联系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表现战争、表现军事斗争，而不是孤立地、与社会生活隔绝地去写战争、写军事。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就做得很好，他一开头不是直接写抗美援朝战争，而是展现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欣欣向荣的画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刻画人物，显示这场保家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使人看见壮阔的历史背景，觉得很有气势。

又比如真实性的问题。怎样尊重生活的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向现实生活的深处开掘，而不是主观随意地“拔高”或肢解。鲁迅先生早就讲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样的话。我喜欢读报刊上发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那些烈士们给亲友的书信，还有日记，它们是那样真实、朴素、亲切、感人，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颗为乡土、亲人，为祖国而战的高尚纯朴的心。它们当初并不是为发表而写的，但有时比经过“加工”的华丽文字更加动人。艺术作品当然需要作者的加工，但我的理解，这种加工不但不应违反生活的真实，而是要更加深刻地发掘生活的底蕴、表现时代的真实。这样对时代生活比较深入的开掘，就使得人物富有时代特色，作品有一定的历史深度，而不是停留在表面、肤浅的描写上。

再如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写人物的性格、命运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斗争生活是丰富、复杂、多姿多彩的。英勇卓绝的斗争锻炼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钢铁战士。我们的文学作品写人、写人的性格和命运，就要把人物置身于复杂的矛盾斗争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这一点，很可以从我国古典的军事题材作品取点经。像《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作者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不同人物的鲜明的性格，跃然纸上，使人难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家把他的人物摆到斗争的漩涡中去写。说到写英雄人物，又比如怎样处理好英雄和平凡的关系、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等等，也是需要在创作实践中加以注意的。

最后，我讲一下熟悉生活、深入生活的问题。我看，这是繁荣军事文学创作的关键，也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前提条件。生活的确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个源泉里汲取养料，找寻素材的。脱离了生活，作家还有什么可写呢？又怎样能写出好作品呢？不从生活出发，就只好从概念出发，向壁虚构。作家有没有生活，人们从作品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作家缺乏生活积累，生活底子不厚，对生活的体察、研究不深入，在写作品的时候，种种缺点都会暴露出来。我自己深有体会，五十年代我要不是经过全国文联的安排，两次奔赴朝鲜，我就写不出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品。但是我只在朝鲜待了一年，生活的积累究竟有限，日子久了，熟悉的又变为生疏，新交的朋友又中断了联系，不太了解了。要创作出反映新时代的新作品，光有过去的生活积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新的生活积累，新的知识和本领；而这些，都只有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才能逐步熟悉和掌握起来。只有深入今天军队的火热斗争生活，才能写出真实、深刻地反映当代军人新的精神面貌的作品。

我相信，这次座谈会之后，会有更多地方上的作家到部队去体验生活。部队作家与地方作家这两支力量的亲密团结和合作，一定会使我们的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走向更大的繁荣。

让我们大家拿起笔，把笔当作火，当作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歌颂“伟大的长城”和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打击和消灭黑暗、腐朽、丑恶的旧事物。用我们的作品为亲爱的祖国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贺与希望*

——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茅盾文学奖”发奖大会，我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参加。写下几句话，表示一点我的祝贺的意思。

长篇小说评奖，我们建国以来还是头一回。说明现在创作有雄厚的基础，人才很多，书也出得多。这几年，光是长篇小说就出版了四百多部。得奖的六部小说，是从这四百多部中间评选出来的。当然好小说不限于这六部。不过我赞成选得严一点，精一点，因为这是向全国人民郑重地推荐；也是鼓励作家写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多拿出一些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作家写出的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形象，更是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青年的心灵。所以，好作品就是榜样，就是力量。这是作家的光荣，也是崇高的职责。读者从来不嫌好作品多。好作品越多，越能对生活起积极的影响。我们奖励好作品，就是期待作家们在社会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有益的作用。

长篇小说是一种容量很大的文学形式。照列宁讲的，它可以成为反映时代、认识生活的一面镜子。但是要写得精，写得好，很不容易。

这几年的长篇，我读得不多。就读过的作品来看，我感觉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还是生活的开拓方面，都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尤其在质量上不能满足。我觉得要提高长篇小说的质量，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讲两个字：一个是“新”，一个是“深”。

第一是新。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文艺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等等，都有很大的变化和革新。毛主席当年举过法捷耶夫的《毁灭》的例子，它带给人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当然不是一两部作品，而是有一批作品，像《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解放后，我们国家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比起旧社会，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年，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变化更是十分显著。我说的新，是指有些题材、主题和人物，还没有引起我们作家注意。或者是由于我们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思想还不够解放，或者由于作家对生活还不够熟悉，尽管有了四百多部，而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取材的角度，相对说来还不够丰富，给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还不多。

第二是深。我们的作品，可不可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深一点？生活开掘深一点？思想更有深度一点？通过解剖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工厂，一个商店，或者一个小镇

的变化，可以反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部作品只有写出一定的深度，才能显示一定的广度。我想一部优秀作品的标志，总是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两个叫人掩卷不忘的人物形象。中外古今的名作，所以能流传久远，就在于它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当时生活的深刻描写，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长篇评奖虽然是第一次，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当然还有经验丰富的老作家。希望你们在熟悉生活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的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好作品。

祝大会圆满成功。

一九八三年

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

——在全国四项优秀获奖作品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这次全国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优秀作品评奖，是近几年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说明我们的文学事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我因病住在医院，无法前来参加授奖大会。我衷心祝贺获奖的同志们，并希望他们不断取得新成绩；我也衷心感谢编辑同志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次获奖的作品，是从全国大量的优秀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搞好评奖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仅中篇小说，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达一千一百多部，工作量是很大的。在广泛听取读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评委会的同志们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评选了现在这些篇目。由于名额的限制，实际上好作品大大超过了这个规定数，被评上的作品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评选工作做得再细致，遗珠之憾恐怕也难免。我看过一些作品，保留着很深的印象。我想，在我们国家里，勤劳的园丁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要相信读者的眼光。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标题为《人民日报》编者所加。

正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是不会被人民遗忘的。

这次获奖作者中青年作者大为增多，短篇小说获奖者二十名中，半数以上是文学新人，最小的才十九岁。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文学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不断更新，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一大批有思想、有生活、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更快更充分地发挥文坛主力军的作用。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青年作家的成长，除自身刻苦努力外，更需要多方面的扶持。老作家的热情关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条。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文学期刊编辑的作用。听说这次大会邀请了部分编辑同志参加，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编辑的劳动正在日益受到尊重。广大编辑同志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有些编辑本身就是很有写作能力的作家，只是为了给他人做好嫁装，自己宁愿少写或搁笔。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我至今感激叶圣老，是他引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者和作者应当成为密切合作、互相了解的朋友，大家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的工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我们国家、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

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漫长崎岖、永无止境的，写出一二部好作品决不能成为包袱，以致影响更大步地前进。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目前文学发展的水平，比之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学艺术，比之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必须更加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在不久前举行的“茅

盾文学奖”发奖大会上，我曾说到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点感想：新和深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内容的深度上下功夫，要熟悉生活、积累生活，用正确的思想去认识、提炼生活；同时，还得认真学习，汲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更准确地表达作品的思想，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上也可以大胆探索、创新。创新也许成功，也许失败，这都无妨，问题在于是否善于及时总结。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昌盛，必须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作家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在这一点上，鼓励是有作用的。

近几年越来越使人强烈感到，文学已走入了社会生活的海洋。很难想到有那么多的人在关心文学创作，关心显示文学发展水平的评奖工作。因此，希望我们的作家们拿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贡献给人民；也希望今后评奖工作做得更认真严格，更取信于广大人民。

接受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时的答辞*

感谢总统阁下充满热情和友谊的讲话。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被译成法文，得到读者的喜爱，这就是对我的很大荣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法国写成的，从此我走了文学的道路。五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也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我怀着愉快的、感谢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今后，我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努力。……

1983年5月7日。

---

* 本篇为作者于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在法国总统密特朗主持的授勋仪式上的答辞。

致《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原名《译文》)创刊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这不寻常的三十年是很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我，作为你们刊物的一个读者，曾经亲眼看到它像我们新中国的整个文学艺术一样，经历了初创、成长、被禁锢和再生；我也怀着和你们同样的心情，希望看到它更加兴旺发达。而且我深信，它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我们吃够了闭关锁国、耳目失聪的苦。现在不再是关上大门、自吹天下第一的时代，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十亿人的目光再局限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内了。人们需要更多地观察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各个方面，在比较和鉴别中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坚定些。你们正是在文学领域中从事着这样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这纪念《世界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除了表示祝贺，我希望你们孜孜不倦地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坚持下去，使刊物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成就，为开阔我国人民的文学视野、繁荣中华民族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世界文学》第四期。

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巴　金 1983年7月5日。

我与世界语*

——介绍《日本世界语辞典》

我认真学习世界语是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向上海一家世界语函购书店买了十几本书，其中有Dro. Zamenhof 的《基本文选》，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十几本书念完，我也可以用世界语写信作文了。

一九二八年我从法国回来，经友人介绍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ŜEA)，还担任过《绿光》(Verda Lumo)杂志的编辑，发表过介绍"世界语文学"的文章。那个时期我还从世界语转译过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等三篇。后来我工作繁忙，离开了世界语运动，《绿光》也早已散失。前几年日本世界语者德田六郎访问上海，他回国后给我寄来《绿光》全份复印本，德田先生的深情厚谊，点燃了我青年时期的热情。

我对世界语始终有深的感情，多年来我一直关心国际语言的问题。参加一九八〇年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后，我对世界语的信念加强了。世界语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公认的唯一的辅助语，它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各民

---

* 本篇系应日本友人岛田恭子之请，为推荐《日本世界语辞典》而作，标题为编者所拟。

族除了使用自己的语言外，可以用世界语和别的民族友好交往而达到互相了解。

世界语有着光辉的前途。我开始学习它的时候，就只有薄薄一本 Kabe 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带插图的大字典了。中文解释的字典我国也出过几种，新的还在编辑中。《中国报道》月刊按期出版，向全世界发行。我们的青年世界语者成长很快，有些省份开办讲习班，初学者多达几万人。

日本是世界语运动发达的国家，有不少有经验的热心的世界语者。最近在医院中收到日本世界语学会寄赠的《日本世界语辞典》，我非常高兴。这本美丽的书是老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先生花了十年功夫精心编撰的。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有用的书。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日本世界语运动更大的发展会起促进的作用。我衷心希望它取得大的成功，也相信它一定取得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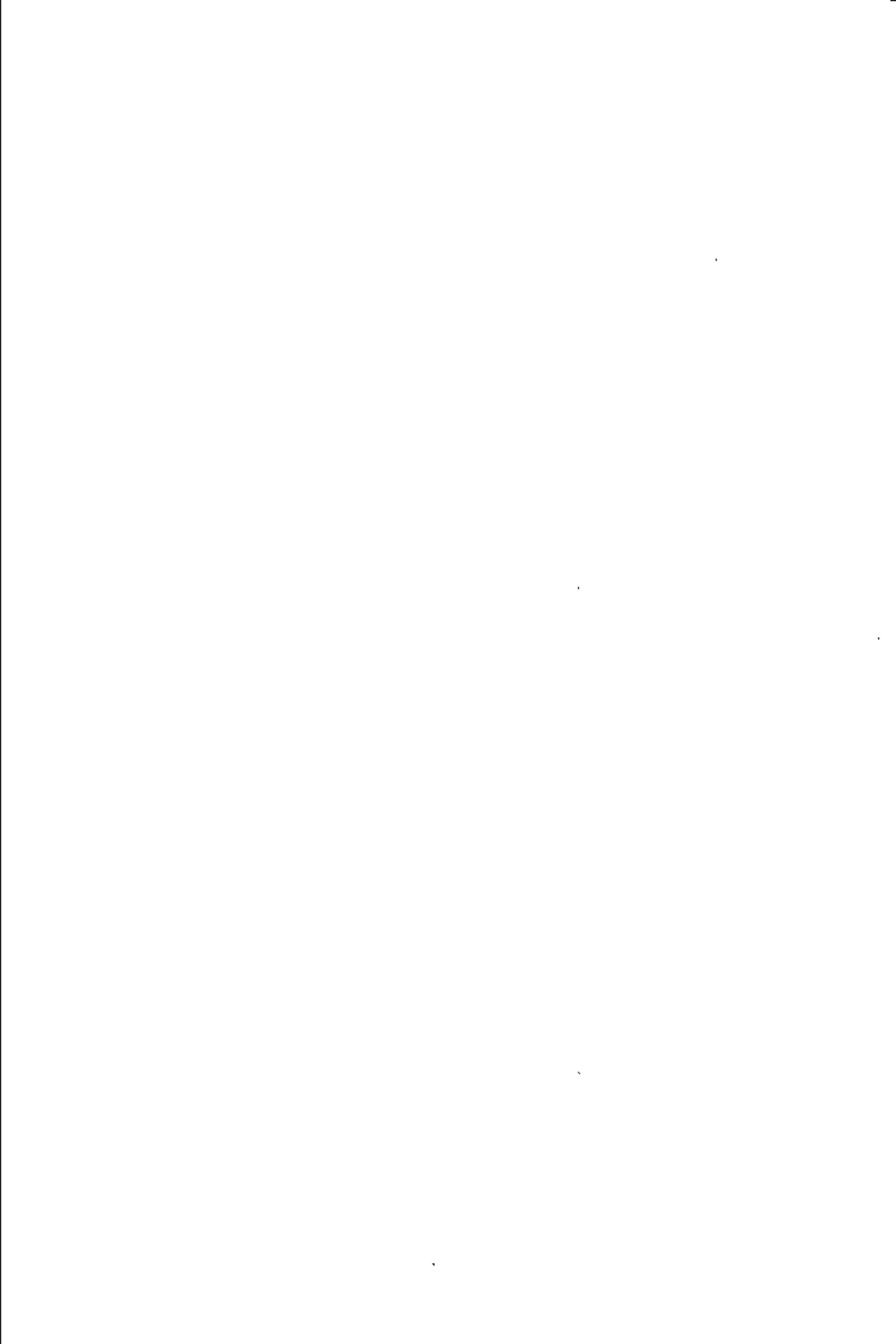
巴　金 83年12月5日。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题词*

六十多年来的中国新文学，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的矿藏。

巴　金 83年10月。

* 本篇原刊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宣传手册》。一九八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



一九八四年

我的期望*

今年五月，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将在东京举行。在这次规模空前的各国作家集会中，除别的议题外，还将讨论日本文学的成就和世界影响。这次世界作家盛会在我们的友好邻邦举行，中国作家特别高兴。

中国笔会中心和《外国文学》、《日本文学》杂志准备联合出版日本文学特辑、专号庆祝这次盛会，要我讲几句话，我就写一点感想吧。

这两年，我身体一直不好，长期住在医院里，写字走路都不方便。去年年底，我的老友、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到上海，来医院看我，邀请我出席东京大会。一年前他到医院探病的时候也提过这件事。盛意难却，我说，要是健康情况允许，我当然出席。井上靖先生笑着说："那就希望您一直住在这里好好养病。"我感谢他的盛情。

我的确愿意出席这次东京的大会。首先我希望和相识多年的日本朋友见面。我也想会见更多的日本作家。在日本有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很想念他们，同他们欢聚交谈，是十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外国文学》第四期。

分愉快的事。参加世界作家的大会，对我的创作活动也是一种鼓舞的力量。我们愿意同各国的同行交流经验。中国历来“以文会友”的精神，似乎也正是国际笔会的宗旨所在。

一九八〇年我访问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对朋友们说过：

“我是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

可是，当我结束了十六天的访问从长崎回国的时候，我才发现友谊的债是偿还不清的，只有越欠越多。友谊的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朋友的心拴在一起，越拴越牢。看到日本朋友惜别的眼泪，我也无声地哭了。这友谊的眼泪，像春天的细雨，滋润着我的心，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

在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受外国文学影响较多的一个。年轻时候我念过不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那一次在朝日讲堂讲话，我举出一些外国老师的名字：法国的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

有的日本朋友感到奇怪，问我为什么会同时喜欢各种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我喜欢那些作家，因为他们用不同的笔调，来描写自己经历的生活，使我感到亲切，引起共鸣。我写作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把心交给读者。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我需要武器。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上，我都用上去。

我过去读过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几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还创办了专门介绍、评论日本文学作品的季刊《日本文学》，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了解文坛情况，这是件好事。我以为，加强文化交流，首先要多介绍彼此的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我们尽量多翻译出版和评介日本的各时代、各流派、不同风格的名著。

在与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感我们应该向日本作家学习两点：一是日本作家非常用功，研究探索很多问题；另一个是勤奋写作，作品多。

我期望：文学成为加强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这与中日两国文学的因缘，国际笔会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我期望东京的盛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1984年9月14日。

《作文》月刊题词*

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

---

* 本篇原刊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郑州《作文》月刊第二期"作家寄语"栏。

我敬爱的老舍同志*

今年二月三日是老舍同志的八十五岁诞辰。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举过一杯酒为他祝寿，今天首都文艺界为他的诞辰举行纪念会，我又因病不能参加。我是他的老读者，又是他的老朋友，我们在共同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他遭逢恶运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支援；他横遭凌辱的时候，我不能替他辩护；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我没有为他的亡灵雪冤，我深感愧对故友。

最近读了杨沫同志追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仿佛又回到乌云盖天的日子，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同志的结局？我不能相信！在这之前四十四天，七月十日上午我还在人民大会堂遇见他，我们一起坐在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的主席台上，在会前休息时间里，他讲了一些他的情况，也问了一些我的情况，他高高兴兴地说："我很好。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震荡了快十八年了，今天还是那样地响亮！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 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及上海《文汇报》。

他“没有问题”，全世界的读者都相信他“没有问题”。

首先写文章悼念老舍同志的似乎还是日本的作家，日本的朋友。那些时候我为了保全自己，不断地在批斗会上作自我检查。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底我才第一次写文章提到他的名字，表示悼念之情。半年后我在北京八宝山参加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大厅里挤满了人，我看不见那无数的头，我听不清对死者的悼词，我只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我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不能死，我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我把这句话带进城，带到招待所，使我得不到安宁。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也对朋友说：“让老舍死去，我们应当感到惭愧。”然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死者也不可能复活了。

我读过井上靖先生的散文《壶》以后，曾经对作者说：“老舍离开了我们，可是人亡壶不碎，他已经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我指的是像《骆驼祥子》、《月牙儿》、《龙须沟》、《茶馆》……那样的艺术杰作，它们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但是我忘记说，他带走了多少美好的东西，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他会献出更多他心灵中的珍宝！

就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最后那次交谈中，有一句话还刻印在我的心上，他说：“我是一个正派人。”他又说：“正直的人。”他很激动，似乎有不少的话，但没有能完全说出来。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说：“我们都相信你。”我还想说一句：“我们都敬爱你。”可是开会的时间到了。我绝没有料到这就是永别，更没有想到一个光辉的生命在四十几天后就要离开人世。到今天我还懊悔没有在会后约他出去找个地方畅谈，让他讲出

心里的话，我也倾吐我的敬爱之情。

从三十年代前期我在北平同他相识，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永别”，三十几年中间，我们有时几年不相见，有时经常接触，我们之间很少书信往还，我却始终注视着他的创作道路上的脚印。他的文品和他的人品是一致的。我敬爱他，首先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不仅正直，而且善良。他不仅善良，而且坚强、勇敢。例如在抗战期间，他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顶住国民党政府的压力，排除各种干扰，团结了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把这个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抗战团体办得很有起色。我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在会里看见他，他有时严肃，有时幽默；大家欢聚畅谈显得十分愉快；应付困难局面，他又显得非常沉着。有一个时期张家花园的聚会对我好像是欢乐的节日。老舍同志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亲切讲话的情景还深深印在我的脑中。

我敬爱他，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全部作品都贯串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的一生的工作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愿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了解他，因为我也看够了外国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也曾像一个无家孤儿在国外遭受白眼，任人欺凌。一个熟悉的声音像警钟似地在我的脑子里敲了几十年，“我爱咱们的国呀！”我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多少怨恨，多少悲痛，多少愿望啊！愿望，是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民有一天会站起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文艺界许多亲

密的同事和战友在殷切地等待，当时还在美国的老舍同志毫不迟疑地动身回到北京。人民需要他，他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把后半生贡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事业。我敬爱他，他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北京市赠给他的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热爱人民，熟悉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掌握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他始终和读者心连心。

他一生谦虚，习惯称自己为"写家"。他的确每天写，不停地写，一直写到"文革"夺去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一位勤奋的"写家"。我敬爱他，他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大量的作品表现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和丰富心灵。他又是旧时代、旧风俗的忠实的记录者，在他的笔下，古老的北京城闪闪发光，旧社会的人物个个如生。

我敬爱他，他"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他自己叫它做"热爱今天的感情"。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十几年中间，一连写了十多个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社会的话剧剧本，就是这种感情使他"欲罢不能"。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正因为有了它，他才能和人民同喜怒、共哀乐。他说："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龙须沟》的作者把心交给了我们。热爱今天的人有权活到今天。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共度诞辰，我感到遗憾。然而这样一颗火热的心是不会死的。即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留下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他的那些杰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1984年2月17日，上海。

《中国比较文学》创刊贺词*

对于比较文学，我不大熟悉。但是，我觉得，通过比较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学是有益的。现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是件好事，我热烈祝贺，并希望比较文学界能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扎扎实实地做点工作。

巴　金

* 本篇原刊于一九八四年十月杭州《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

《炎黄儿女》题词*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在于争取。

嘉尧同志

巴　金 1984年12月16日。

---

* 本篇原刊于任嘉尧编《炎黄儿女》，一九八六年七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举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五年来的文学工作，讨论今后文学发展的问题。会议是在党中央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这对于我们的文学工作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我们的会议也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这次会议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我因病不能参加大会，感到十分遗憾，谨向同志们表示敬意。

上次代表大会迄今已有五年了。五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惊人的根本性的变化。文学界也并不例外，我们这支队伍历尽了风风雨雨，在全国成千上万的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开始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许多同志公正地指出，这些变化和成就是过去三十年所不能比拟的。刊物之多，创作之繁荣，理论之活跃，作家队伍之壮大，都是前所未有

---

* 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

的。五年前，有的同志不无"青黄不接"的忧虑，现在这忧虑完全消除了。这五年中，老、中、青几代作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不能否认，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勤奋写作，作品数量多，反映的生活面广，特别富有生气。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才刚刚起步，就表现出一股巨大的锐气和潜力。希望在他们的身上。中国文学界的前途一片光明。谁也不能不为这种生机勃勃的现象而精神振奋；当我得悉今天会场上将要出现不少新的年轻面孔时，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新人的数目还不够多。我热切地希望再过五年，他们将是下届大会的主要力量，并由他们来致开幕词和作大会的报告。

人们常说，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回忆过去，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人新作，但是与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还是不相称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需要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需要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体育、音乐可以在世界上夺取冠军，我们的文学又有什么理由不应该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我深深地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样的伟大作品一定会产生在我们伟大民族的中间。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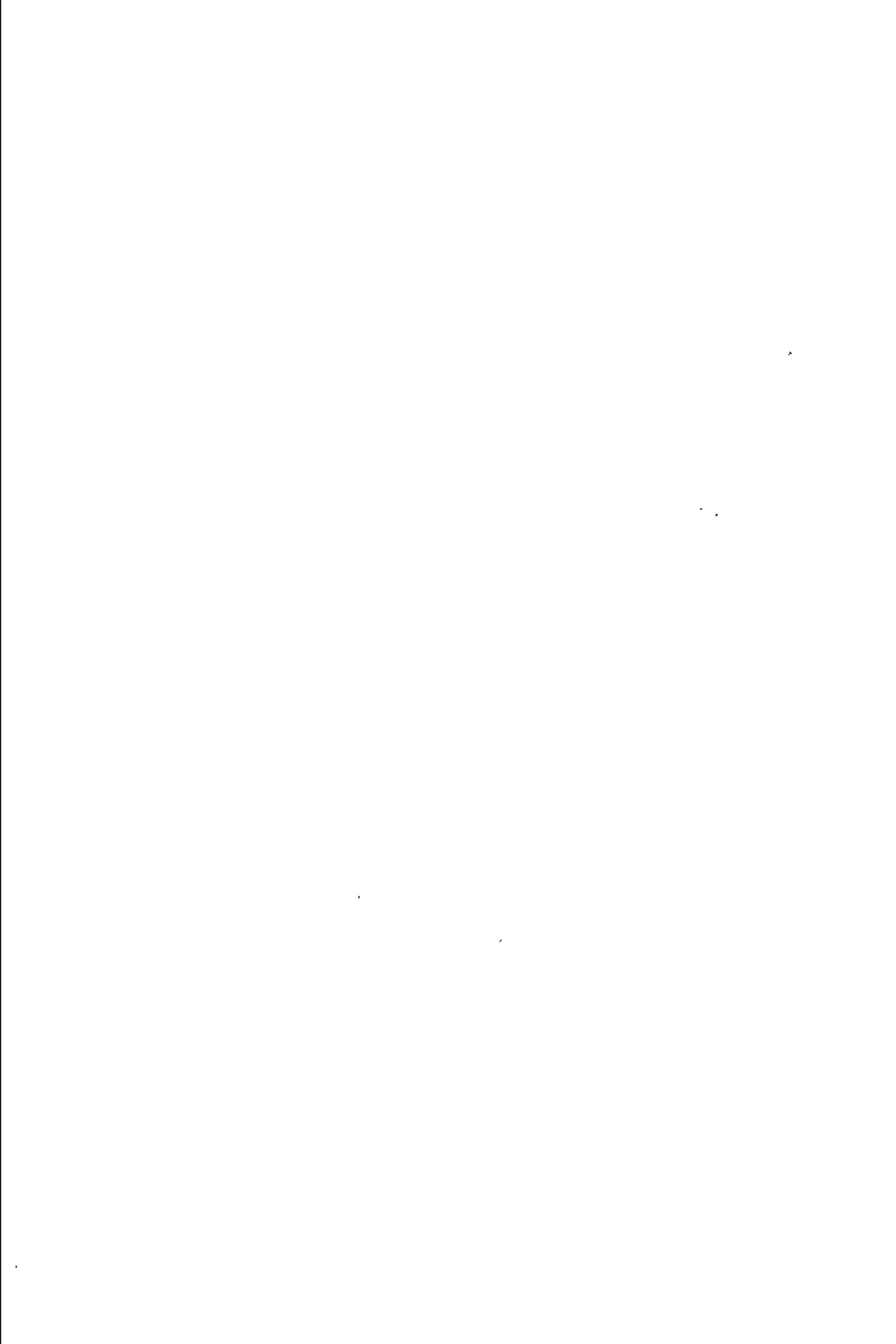
也是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因此，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也就格外需要整个社会的鼓励、关心和帮助，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护。对于我们文学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应该严格对待，应该展开批评。但是，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更有前进的信心和勇气。鼓舞人们前进的是希望，而不是灰心。只有充满信心，才能充满希望。充满希望就敢于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会解除精神束缚。没有顾虑，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创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外来的，只要有用，都可以借鉴、吸收，融会消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以为，把吸收传统的和吸收外来的对立起来，对外来的文学怀着一种过于戒备的警觉，未必是有益的。我们文学界也要开放，相信我们的作家和读者经过广泛的比较、充分的鉴别，有能力去芜存菁，汲取应有的营养。当然，只会模仿和依傍而没有自己的创造，那是没有出息的。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是非得失也就微不足道了。我想，作家的名字应该和作品联系在一起；读者需要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如果大家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从事创作、从事理论研究，从事社会主义文学建设，那么对于促进我们文学界的大团结、大繁荣也是大有好处的。

最后，祝各位代表、各位同志身体健康；祝我们的大会圆满成功。



一九八五年

《儿童时代》创刊三十五周年题词*

作为一个五十年代的老读者，我祝愿《儿童时代》办得好上加好，在开创新时期儿童文学中作出新的贡献。

巴　金 1985年2月5日。

---

* 本篇原刊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儿童时代》第四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我很感谢大家。我是个病人，讲话有气无力，所以本来不想讲话。

今天我能来我心里很高兴，因为今天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的日子，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当有一个这样的文学馆，至少应当有一个。现在成立了，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规模很小，但是从今以后就会从小到大。今天虽然开个头，以后会大大地发展，我觉得前途是无限光明。刚才乔木同志也讲，党中央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前途更无限光辉。

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就将证明这个事实。我又病又老，可以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我想，这个文学馆是整个集体的事业，所以是人人都有份的，也希望大家出力，把这个文学馆办得更好。将来不但办一个，而且还办两个、三个，各地大的省市都有分馆，这样发展，我相

---

* 本篇原收入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

信这个前景是会实现的。

我讲不出什么别的话了，我只是说这几句，说明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1985年3月26日。

少发空言，多做实事*

现在不少人在谈论我们的文学创作攀高峰问题。攀高峰，这很难说。我觉得作家还是应该少发空言，多做实事。过去我们空话说得太多，这有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空话还是太多，这是个大问题，写文章也是套话不少。我个人的意思，不要讲什么"攀高峰"，每个人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认真地写出来，很好地写出来，是不是高峰，读者会评论的。

我们说我们要走在世界前列，要面向世界，向世界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要实事求是地宣传，要让别人知道，别人了解。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重视，自己要尊重它，重视它。

整个社会要爱惜作家，要造成一种空气。这同我们整个社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是一致的。作家也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还有评奖问题。评奖是个好办法，对鼓励创作、促进繁荣有好处。但要把评奖的威信树立起来。评奖就是奖励好作品，多就多奖，少就少奖，实事求是，注意质量。不一定要平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文艺报》试刊号。

衡，更不要照顾，要严、要精。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青年作家一个个出来，一批批地出来，形成了一个竞赛的局面。这不是哪个人培养的，这是生活本身培养出来的。

我为什么写作*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上的尘垢，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周围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

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

---

* 一九八五年初，法国巴黎图书沙龙与瑞士《二十四小时》分别邀请各国知名作家就"您为什么写作"为题撰文。本篇即作者应邀而作，其后曾辑入法国《解放》杂志编印之《您为什么写作》一书，现据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收入本卷。

一九八六年

《小说选刊》题词*

我反对“闭门造车”，我也不赞成把作家当作“鸭子”一样赶到“生活”里去。过去人们常说“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我相信过这种说法，但我也吃过亏上过当，我看到了不少的纸花。总之存心说谎的作品和无心地传达假话的作品都是一现的昙花。说谎的文学即使有最高的“技巧”，也仍然是在说谎，不能震撼多数读者的心灵。

巴　金 1986年11月。

---

* 本篇原刊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小说选刊》第三期。

一九八七年

致青年作家*

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去看望你们。但是，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这是第三届青年创作会议了。我还不曾忘记一九五六年首届会议召开的盛况。不少有才华、有见识、有朝气的年轻人带着理想和希望来到会场，又满怀信心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以为从此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热烈的心奉献给祖国人民，却没有料到恶运就在前面。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刚刚显露才华，就受到历史的不公平对待，甚至给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在苦难中挣扎了二十年。但是，冤案终于给平反了，他们重见了天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分子，他们用大量的作品充实了我们祖国的文学宝库。不用说，要是没有这二十年的灾难，他们在创作上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你们看得见他们长长的脚印，那么多的污泥，那么多的石子！你们看到这条坎坷的道路，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你们比他们幸运，你们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在你们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比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文艺报》第一期。

较宽松、和谐的环境，这种安定团结的气氛是人们渴望了很久的。老一辈作家期待了多年的创作自由终于在你们眼前露面了。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有那么多的期刊发表你们的作品，那么多的读者关心你们的成长。我们的事业在前进，我们的队伍在创作实践中壮大。大家都在谈论当前有利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条件会培养出更绚丽的鲜花，但是从事创作的人倘使不维护这些属于他们的权利，他们即使得到它们，也不能保持长久。这一点你们也明白。

近十年来，作家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十年动乱把大量的青年人扔进大熔炉里、大油锅内磨练，教会他们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写作，于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作家从生活中涌现出来，这次出席大会的仅仅是他们的代表，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人困惑不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对文学创作感到兴趣？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时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担心后继无人。我看这困惑、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本身（不是别的）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过这不是说生活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作家，作家必须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和发现。要用自己的脑子指挥拿笔的手，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不要人云亦云，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自己不愿说的假话。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留下多么深重的心灵创伤和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但是深刻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作品至今还不多见。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有人劝我们忘记过去，目光永远向

着前面的光明；还有人坚持不让揭露自己的疮疤，说是家丑不可外扬；然而也有人忘记不了铜头皮带在头上挥舞的日子；还有人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真有创作的自由？"人们在思考，人们在探索。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先生敢想，敢说，敢写，他从来不用别人的脑子替自己思考问题，他更不曾看行情，看别人脸色写文章；他探索、追求，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为了社会的进步，他用笔作武器战斗了一生。他用作家真诚的、热烈的心指引读者走生活的道路。他从不向读者装腔作势，讲空话、假话。在他的每篇作品中我都看到作家的艺术的良心，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两年前，在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我曾提到我们文学界百花争妍的景象，我说创作之繁荣、理论之活跃、作家队伍之壮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仍然保持这样的看法，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前途，我还是十分乐观。当然别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看到"危机"，有人发出警告，有人大声呼吁，我觉得他们都有道理，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要求争鸣，要求开放，要求人家说心里话，要改变说惯了的、没有变化的同样腔调，就免不了有"噪音"。我看这倒是个可喜的现象。一潭死水久了会发臭，活跃的热闹场面才会带来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用怕乱，可怕的是停滞和沉寂。只有各人讲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才能有比较，有竞争，有辩论，最后才会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我们欢迎严肃、认真的作品，我们希望青年作者有话不要咽在肚里，有感受就写出来，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献

给读者，读者会感激你们。

我不过是比你们早两三代的作家，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只是我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和我的同代人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国家里，生活在忍饥受冻的人民中间，我们不能不和读者同甘苦共患难。我希望你们不要管自己写的是不是伟大的杰作，不要考虑某些人是不是喜欢你们的作品，只要看你们是不是使出了全部的精力，是不是写出了你们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都是为了找到一个机会接近人民，向读者吐露自己的心声。我们那一代的作家只是想献出自己微弱的力量，对我们在苦难中挣扎的祖国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我相信今天的作家也不会脱离社会，远离读者，你们也一样会同读者一起寻求中华民族真正腾飞的道路。

两年前我还说过，"我们的文学没有理由不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更明白中国作家首先是为中国的读者写作。倘使我们的作品不能打动中国读者的心，不能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能支持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激发他们的羞耻心和正义感，帮助他们取得为崇高目的献身的力量，倘使我们的作品不能在中国读者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得到本国读者的热爱，中国文学怎么能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得不到自己熟悉的人民理解，不能同生活在一起的本国读者心连心，还说什么夺取"世界冠军"?！所谓划时代的巨著也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

该是高尔基的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

十年浩劫带来莫大的灾难，浪费了几代人的宝贵时光，对年轻人也不例外。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青年作家必须不断学习，提高修养，继承我国文化遗产，学习外国的各方面的成就。学习是无止境的，不论是传统文化或者西方现代科学艺术，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变为自己的东西，在创作实践中丰富我们的知识，锻炼我们的笔。不用害怕文化开放，开放会带进来各种新的事物，好的我们大量借用，坏的我们可以不要。两种文化接触，一定互相影响，比赛高低，你化我，我化你，好的东西不会给人随便化掉，优秀的文化也不会一碰就倒，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不要因为害怕污染，就关上门不见人，死守着祖先遗产永不更新。不学习，不思考，哪里会走上振兴民族的光明大道？

我年过八十，靠药物延续生命，已经到了搁笔的时候。放下这支使用了六十年的笔，我不能没有留恋。但是面对着一片繁荣的景象，我仍然保持着一颗热烈的心。我说过："文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有集体的智慧，也有个人的苦心。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对这个事业，每个作家都有份。我好比一滴水，文学海洋中巨浪奔腾，一小滴水也不会干涸。"我们的事业会大放光芒，一代一代的作家将为它作出自己的贡献，更大的希望还是在你们的身上。

大会开始了，我充满信心乐观地在倾听响亮的年轻声音。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

切的眼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丢开顾虑，不用胆怯，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

《收获》创刊三十年*

《收获》杂志创刊三十年，编辑部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说："过去文艺界办红白喜事，常常找我作吹鼓手。现在击鼓我手无力，拿着唢呐，又吹不出声音，装腔作势，有何用处，免了我吧。"

编辑同志不以为然，又说："你是《收获》的主编，杂志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你总有一些感受。譬如看见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做父母的、做老师的总不能不高兴，唱一首生日歌，祝他长命百岁，有什么不好？"

我一时答不出话来。本来我在家养病，坐在藤椅上，什么也不想，只觉两肩轻松。现在听见提到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仿佛迎头一巴掌，发昏之后又大动脑筋，即使躺在床上，也不能休息，我觉得肩头非常沉重。我想起一些与《收获》有关的事情。

想着《收获》，我不能不想到靳以，他是《收获》的创办人，又是《收获》的主编，我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助手。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这个新生的孩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声不响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收获》第六期。

献出全部精力。多出人，多出作品，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五个人办这样一个大刊物，他并不感到工作繁重。他发病住院的时候还在看校样，写信组稿。虽然刊物也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在他一生创办的刊物中，《收获》算是办得最顺利，而且销路最大的了。没有想到，他为这个刊物工作的时间就只有短短的两年，刊物按照他的希望成长发展，走上自己的道路，他却意外地闭上了眼睛。他留给我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收获》的第一次停刊。事情发生在他逝世后一年。

《收获》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作协书记处委托靳以创办的。作协的几位负责同志过去都是靳以主编的刊物的撰稿人。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谈到靳以从前编辑的大型刊物，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讲不出什么。我答应做一个编委。连我在内，编委一共十三人。我说："编委就起点顾问的作用吧，用不着多开编委会。"《收获》的编委会果然开得少。刊物在北京印刷发行，因为靳以不愿把家搬到北京，编辑部便设在上海，由靳以主持。大约在创刊前三四个月，有天晚上靳以在我家聊天，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严肃地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就只有这么一句，我回答了一个字："好。"一九三六年他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就用了我们合编的名义。我们彼此信任。我

这个习惯于到处挂名的人，听见他谈起刊物的工作，常常感到惭愧。我不能不想他怎样每期看那一百多万字的来稿。我最后一次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看见他，他还对我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这句话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发表了悼念靳以的文章以后不久就忘记了他的话，我并没有把他丢下的担子挑起来。那些年我就像是在冰上走动，一直提心吊胆，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在困难的时候，还是让罗荪同志帮忙，抓刊物的工作。大半年后《收获》出满三年，中国作协派人来商量停刊的事，说是纸张缺乏，我感到意外，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也无话可说。靳以创办的刊物由我来宣布结束这不是第一次。一九三五年年底《文学季刊》停刊，他在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去北平看完校样写了《停刊的话》。这一次又轮着我来结束他创办的刊物。想想，我有些难过。不过我觉得少挂一个名，肩上的负担也轻一些。张春桥（他经常是我们的"顶头上司"）的阴影就像一只黑蜘蛛在我四周织成一个大网。靳以在世的时候，我和他可说是无话不谈，可是我们也谈得不多。主编《收获》的两年间他只向我发过一次牢骚，就是要他离开杂志到工厂深入生活，而且事前并未征求他的同意，后来还是作协书记处表了态，他才不曾放弃编辑工作。其实他遇到的阻力不用讲，我也想得到。他是在"双百方针"发表时筹办刊物的，可是刊物尚未印出，"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收获》本来没有《发刊词》，第一期已经编好，纸型由上海寄到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忽然收到靳以寄来他写的《发刊词》，他征求编委的意见。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

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想他不会比我轻松。他接着在第二期又发表了《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文章给我看过，我了解他保护刊物的苦心，我自己也想多找机会表态，不加考虑便在原稿上署了名。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态文章，我还仿佛接触到两颗战栗的心和两只颤抖的手。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不管有多少干扰，他坚持着把全部心血花费在刊物上。勤奋的工作促使他过早接近死亡，但是他亲手浇灌的花开放了。我不像他，我东奔西跑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写成一部废品，我只想避开头上达摩克里斯的宝剑，结果，蜘蛛网越收越紧，悬在空中的帽子还是落到我的头上，我过了十年的地狱生活。

一九六四年一月《收获》在上海重现。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者“小收获”，它不是原来的《收获》，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改出“新收获”，记得是以群在领导，萧岱同志做实际工作。但是“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已经提出，在张春桥、姚文元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刊物注定要走向毁灭，努力和挣扎都没有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不但“新收获”给革命左派砸烂，连以群也挨批挨斗、跳楼身亡。在“文革”期间我才知道“新收获”为了发表我的文章，曾遭到张春桥的训斥。

《收获》第三次出现，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它是上海的《收获》，不过复刊在乌云消散、蜘蛛网砸烂的时候。新的《收获》

仍然走着团结作者、为读者服务的道路，严肃地、沉默地、一步一步地前进。路越走越平坦，脚步越走越踏实，刊物同读者、同作者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仿佛一闪眼间新的《收获》就到了第九个年头，前面一片亮光。刊物在读者中间扎了根，孩子一天天发育成长，难道我不高兴？这些年我再也看不见黑蜘蛛的阴影，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听老爷们的训斥，难道我不高兴？

我高兴。但是对刊物的发展，我并不曾尽过力，我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要是靳以能活到现在，那有多好！他做了一件好事，人们不会忘记他。我又老又病，作为挂名的主编，我应当休息了。我羡慕正在为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刊物走上了一条宽广的路，你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只要能团结人，只要不脱离读者，你们会得到支持的。

《收获》创刊三十年，休刊十五载。流逝的时光是追不回来的了。我不是老师，也不是长辈，只可以说是一个关心的朋友吧，今天在这里庆贺《收获》的生日，我真诚地祝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不寻常的事情。

1987年9月15日。

关于《煤》的一点说明*

这小说原名《萌芽》，一九三三年八月在上海由现代书局出版，印两千册，未售完，即被禁止发行。三四年八月，我替书中人物改名换姓，并重写结尾，又将书名改为《煤》，交给开明书店刊行。全书排竣，打好纸型，但在送审期间，忽然得到当时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停印的通知，开明书店感到为难。我也不服气，便向开明买下纸型，自费印了一版，印数不过千册，书名改为《雪》，说是由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其实委托上海生活书店在国内秘密发售。后来图书审查委员会一度取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我便将《雪》的纸型送给文生社。三六年十一月《雪》在上海公开出版，但所谓初版，已是第三版了。(生活书店售出的一部分算是第一版，未卖完的由我收回，换了封面和版权页，改装为"新时代小说丛刊"精装本，这是第二版。)所以接着在十二月又出了"再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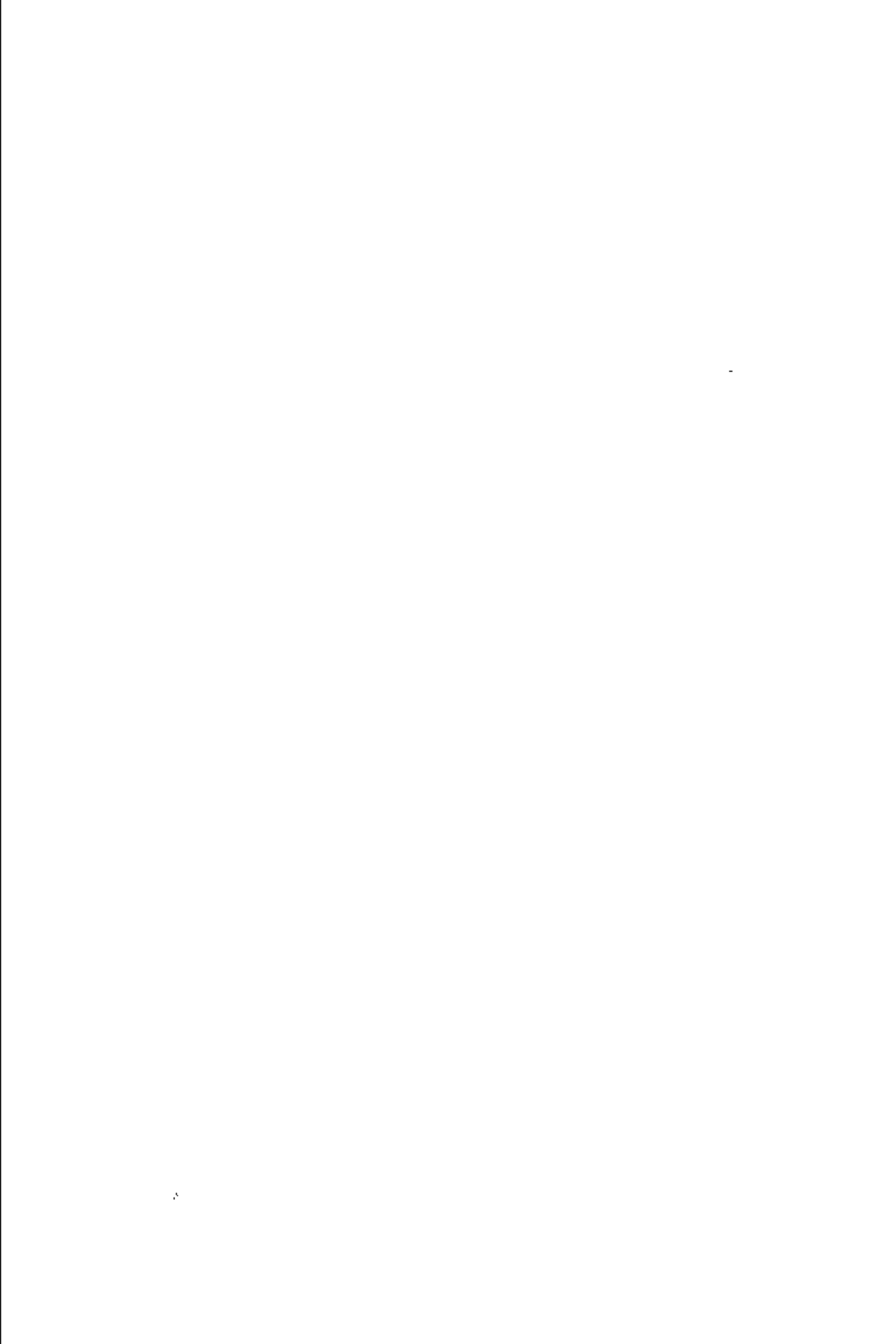
关于《煤》我就只保留了这一份清样，这是唯一的一份，是在别处找不到的。八年抗战，十载"文革"，它都不曾受到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系作者为将小说《煤》的清样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时所作。

害。造反派抄走了它，又把它送回来了。现在我拿它送给现代文学馆，让它在这里安息吧。

1987年9月27日。



一九八九年

怀念从文*

一

今年五月十日从文离开人世，我得到他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想起许多事情，总觉得他还同我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辩论。他那温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隔一天我才发出回电："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将代我在亡友灵前敬献花圈，表达我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请保重。"都是些极普通的话。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满信心的欢聚的日子，那些奋笔和辩论的日子，都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西奔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

---

* 本篇原收入一九八九年四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版《长河不尽流》，系该书之"代序"。

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现在大梦初醒，却仿佛用尽全身力气，不得不躺倒休息，白白地望着远方灯火，我仍然想奔赴光明，奔赴希望。我还想求助于一些朋友，从文也是其中的一位，我真想有机会同他畅谈！这个时候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我才明白过去那一段生活已经和亡友一起远去了。我的唁电表达的就是一个老友的真实感情。

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导，提到女儿小林代我献的花篮，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可是连这短短的报导多数报刊也没有采用。小道消息开始在知识界中流传。这个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轻烟散去，未必我得到噩耗是在梦中?！一个来探病的朋友批评我："你错怪了郭玲春，她的报导没有受到重视，可能因为领导不曾表态，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规格发表讣告、刊载消息。不然大陆以外的华文报纸刊出不少悼念文章，惋惜中国文坛巨大的损失，而我们的编辑怎么能安心酣睡，仿佛不曾发生任何事情！？"

我并不信服这样的论断，可是对我谈论规格学的熟人不止他一个，我必须寻找论据答覆他们。这个时候小林回来了，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

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过去了。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

二

一百多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从文的事情。

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他当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书局门口分手时，他要我到青岛去玩，说是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

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

在青岛他把他那间房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他听说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他就是这样开始教课的。他还告诉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了，徐志摩便介绍他到大学教书，起初到上海中国公学，以后才到山东大学。在当时山大的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杨振声，后来他到北平工作，还是和从文在一起。

在青岛我住了一个星期。离开的时候他知道我要去北平，就给我写了两个人的地址，他说，到北平可以去看这两个朋友，不用介绍只提他的名字，他们就会接待我。

在北平我认识的人不多。我也去看望了从文介绍的两个人，一位姓程，一位姓夏；一位在城里工作，业余搞点翻译。一位在燕京大学教书。一年后我再到北平，还去燕大夏云的宿舍里住了十几天，写完了中篇小说《电》。我只说是从文介绍，他们待我十分亲切。我们谈文学，谈得更多的是从文的事情，他

们对他非常关心。以后我接触到更多的从文的朋友，我注意到他们对他都有一种深的感情。

在青岛我就知道他在恋爱。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我坐人力车去府右街达子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进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

客厅连接一间屋子，房内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显然是主人的书房。他把我安顿在这里。

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静，我住得很舒适。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

我初来时从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他不在大学教书了。杨振声到北平主持一个编教科书的机构，从文就在这机构里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只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这个时期他还为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为了写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经常有

人来同他商谈。这些已经够他忙了，可是他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国闻周报》上的连载，《记丁玲》。

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到欢迎，得到重视的，一方面人们敬爱丁玲，另一方面从文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作者用真挚的感情讲出读者心里的话。丁玲几个月前被捕，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者赵家璧委托我向从文组稿，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我办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赵家璧拿到全稿，已无法编入丛书排印，过一两年他花几百元买下一位图书审查委员的书稿，算是行贿，《记丁玲》才有机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见到天日。可是删削太多，尤其是后半部，那么多的××！以后也没有能重版，更说不上恢复原貌了。

五十五年过去了，从文在达子营写连载的事，我还不曾忘记，写到结尾他有些紧张，他不愿辜负读者的期待，又关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写作通宵。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为她的自由奔走。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我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情形里写下这一段话，但这的确是真话。在一九三四年也是这样，在一九八五年我最后一次看

见他，他在家养病，假牙未装上，讲话不清楚。几年不见他，有一肚皮的话要说，首先就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信上那几句。但是望着病人的浮肿的脸，坐在堆满书的小房间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他心爱的家乡的风景和他关心的小人物的命运，这部中篇经过几十年并未失去它的魅力，还鼓舞美国的学者长途跋涉，到美丽的湘西寻找作家当年的脚迹。

我说过我在从文家作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写稿、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表后我拿回原稿。这手稿我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第二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业发展，自己并不曾得到什么报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发展为今天所谓的争议，这争议曾经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

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他那个新家的客厅里，他对我不止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后来他在上海对我、对靳以、对萧乾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当时并不同意，不过我相信他是出于好心。

我在达子营沈家究竟住了两个月或三个月，现在讲不清楚了。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在发展，不少的事逐渐走向遗忘。所以有必要记下不曾忘记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为文学季刊社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过去，我便离开了从文家。在靳以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我们经常去这两处。从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里，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从文还定期为《文艺》副刊宴请作者，我经常出席。他仍然劝我不要浪费时间，我发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读过，有时也坦率地提些意见，我知道他对我很关心，对他们夫妇我只有好感，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感到温暖。一九三四年《文学季刊》创刊，兆和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她唯一的短篇集①后来就收在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

---

① 短篇集：指《湖畔》，署叔文著。一九四一年六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三

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

在从文和萧乾的书信集《废邮存底》中还保存着一封他给我的长信《给某作家》（一九三七）。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横滨编写的《点滴》里也有一篇散文《沉落》是写给他的。从这两封信就可以看出我们间的分歧在什么地方。

一九三四年我从北平回上海，小住一个时期，动身去日本前为《文学》杂志写了一个短篇《沉落》。小说发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

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因为我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回国以后我还和从文通过几封长信，继续我们这次的辩论，因为我又发表过文章，针对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对朱光潜的批评，后来我也承认自己有偏见有错误。从文着急起来，他劝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责备我：“什么米米大的小事如×××之类的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还说：“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

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因为我那封留底的长信在“文革”中丢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没有退回来。但我记得我想向他说明我还有理性，不会变成狂吠的疯狗。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我回国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到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给房子退租。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同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

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文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动身回上海，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再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城市充满阳光，北平解放了。

四

抗战期间萧珊在西南联大念书，一九四〇年我从上海去昆明看望她，四一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师节，教书老师普遍受到轻视，连大学教授也难使一家人温饱，我曾经说过两句话："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书常常给人带来不幸。"这就是那个社会的特点。他的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饮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在昆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不再辩论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

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我也感觉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离开昆明后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写信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我说："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潜在力量"；又说："我极赞成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没有能再去昆明，我更想念他。

他并不曾搁笔，可是作品写得少。他过去的作品早已绝版，读到的人不多。开明书店愿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说，他陆续将修订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遗失，他叹息地告诉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后一句不是原话，他也不仅说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主要还是对那种越来越重视金钱、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在这一点，我倒理解他，我在写作生涯中挨过的骂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说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并没有让人骂死。我也看见他倒了又站起来，一直勤奋地工作。最后他被迫离开了文艺界。

五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后上海解

放。六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赵家璧他们去北平，出席首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各地来的许多熟人和分别多年的老友，还有更多的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艺战士。我很感动，我很兴奋。

但是从文没有露面，他不是大会的代表。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家去，见到了他和兆和，他们早已不住在达子营了，不过我现在也说不出他们是不是住在东堂子胡同，因为一晃就是四十年，我的记忆模糊了。这几十年中间我没有看见他住过宽敞的房屋。最后他得到一个舒适的住处，却已经疾病缠身，只能让人搀扶着在屋里走走。我至今未见到他这个新居，一九八五年五月后我就未去过北京。不是我不想去，但我越来越举步艰难了。

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一个熟人。然而文艺界似乎忘记了他。不给他出席文代会，以后还把他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据说郑振铎到那里参观一个什么展览，见过他，但这是以后的事了。这年九月我第二次来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为首都，这次我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我几次看望从文，交谈的机会较多，我才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北平解放前后当地报纸上刊载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还是在香港报上发表过的，十分尖锐。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很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他只好到华北革大去了，反正知识分子应当进行思想改造。

不用说，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仅在今天，在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从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声不响、认真地干他的工作。政协会议以后，第二年我去北京开会，休会的日子我去看望过从文，他似乎很平静，仍旧关心地问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我每次赴京，总要去看看他。他已经安定下来了。对磁器、对民间工艺、对古代服装他都有兴趣，谈起来头头是道。我暗中想，我外表忙忙碌碌，有说有笑，心里却十分紧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埋头译书，默默地工作几年，也许可以做出一点成绩。然而我办不到，即使由我自己作主，我也不愿放下笔，还想换一支新的来歌颂新社会。我下决心深入生活，却始终深不下去，我参加各种活动，也始终浮在面上，经过北京我没有忘记去看他，总是在晚上去，两三间小屋，书架上放满了线装书，他正在工作，带着笑容欢迎我，问我一家人的近况，问一些熟人的近况。兆和也在，她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偶尔谈几句杂志的事。有时还有他一个小女儿(侄女)，他们很喜欢她，两个儿子不同他们住在一起。

我大约每年去一次，坐一个多小时，谈话他谈得多一些，我也讲我的事，但总是他问我答。我觉得他心里更加踏实了。我讲话好像只是在替自己辩护。我明白我四处奔跑，却什么

都抓不住。心里空虚得很。我总疑心他在问我：你这样跑来跑去，有什么用处？不过我不会老实地对他讲出来。他的情况也逐渐好转，他参加了人民政协，在报刊上发表诗文。

“文革”前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动身去越南采访。是在晚上，天气热，房里没有灯光，砖地上铺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从文说：“三姐生病，我们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会，不知怎样我们两个人讲话都没有劲头，不多久我就告辞走了。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不出一年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头上那把利剑，正在缓缓地往下坠。“四人帮”后来批判的“四条汉子”已经揭露出三个，我在这年元旦听过周扬一次谈话，我明白人人自危，他已经在保护自己了。

旅馆离这里不远，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过去我们的辩论，想起他劝我不要浪费时间，而我却什么也搞不出来。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过给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脚步很沉重，仿佛前面张开一个大网，我不知道会不会投进网里。但无论如何一个可怕的、摧毁一切的、大的运动就要来了。我怎么能够躲开它？

回到旅馆，我感到精疲力尽，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机场，飞向南方。



六

在越南我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采访，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每周开会讨论一次，人人表态，看得出来，有人慢慢地在收网，"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场了。我有种种的罪名，不但我紧张，朋友们也替我紧张，后来我找到机会在会上作了检查，自以为卸掉了包袱。六月初到北京开会（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机场接我的同志小心嘱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过关，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我在这种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个多月，我的确没"出去找任何熟人"，无论是从文、健吾或者冰心。

但是会议结束，我回到机关参加学习，才知道自己仍在网里，真是在劫难逃了。进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渊，别人都把我看作罪人，我自己也认为有罪，表现得十分恭顺。绝没有想到这个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会持续十年。在灵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铁锤在我的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还有脸去见他？这种想法在当时也是很古怪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过些日子它又在我脑子里闪亮一下，然后又熄灭了。我一直没有从文的消息，也不见人来外调他的事情。

六年过去了，我在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里学习和劳动，在那里劳动的有好几个单位的干部，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有一次我给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

鹿路作协分会旧址学习，我刚刚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位年轻姑娘走进来，问我是不是某人，她是从文家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处。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我在干校见过。从文一家平安，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连"，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遵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

五页信纸上写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

他还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我为什么如此缺乏勇气，回想起来今天还感到惭愧。尽管我不敢表示自己并未忘记故友，从文却一直惦记着我。他委托一位亲戚来看望，了解我的情况。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

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七

等到这个“结论”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渐恢复，我又忙起来了。多次去北京开会，却只到过他的家两次。头一次他不在家，我见着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里连写字桌也没有，只放得下一张小茶桌，夫妻二人轮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经搬家，可是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甩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

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后来在上海听说他搬了家，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子里散步，也曾替他高兴一阵子。

最近因为怀念老友，想记下一点什么，找出了从文的几封旧信，一九八〇年二月信中有一段话我一直不能忘记：“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

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他说“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谈起他的工作，劲头还是很大。他是能够支持下去的。近几个月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要是能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太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那么他的讣告是不是也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导应当用什么规格？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和职称吧。”又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关心一个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我无法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动笔更困难，思想更迟钝，讲话声音更低，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我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

倘使真的和从文见面，我将对他讲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

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1988年9月30日。

一九九〇年

接受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时的答辞*

我长期生病，在家中疗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感谢苏联人民授予我人民友谊勋章，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多次访问苏联的往事。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始终记得列夫·托尔斯泰那句话："把人民团结起来的就是美的、善的。"直到今天，托尔斯泰仍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和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曾唤醒我这一个中国青年的年轻灵魂，使我懂得热爱文学、追求人民友谊，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保持艺术家的良心。……

1990年4月11日。

* 本篇为作者于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一日在苏联驻沪总领事斯特罗科主持的授勋仪式上的答辞。

我和日本*

——在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书面)

尊敬的市长先生，

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对于福冈市政府决定授予我一九九〇年度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创立特别奖，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对亚洲文化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杰出的贡献，得此殊荣，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个人的成就，这是福冈市政府和福冈市人民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尊重，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因此，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这项荣誉。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作家。六十年前我写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甚至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我在法国开始写小说。一九二七年春天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了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苦苦地思念着远离的祖国和亲人。那时我的国家正进行着一场革命和反革

* 本篇为作者于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在日本福冈市政府授予"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仪式上的发言，由李小棠(作者之子)代为在会上宣读。

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我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和寂寞，便借用纸笔，在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中，写下了一些痛苦的场景，发泄我的爱和恨，倾吐心中火一样燃烧的感情。我不停地写。终于，在法国大诗人拉·封丹的故乡沙多-吉里，我写完了我的第一部作品《灭亡》。手稿寄回国内后，被《小说月报》的主编看见，拿去发表了。从此，我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让我的痛苦、我的愤怒、我的理想、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就这样，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一写就是六十几年。

我说过，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友情。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我的生命就会枯萎。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的心同朋友们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在我六十余年的文学生活中，我曾多次出国访问，结识了许多国外的作家朋友，但是，我访问的最多的是日本(先后共六次)，结交朋友最多的也是在日本。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几次访问日本，总是满载友情而归。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

当时去日本，因为我喜欢日本小说，也想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的两个叔父在光绪年间留学日本，回国后常常说起日本的生活，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又读了鲁迅、夏丏尊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感情。我乘“浅间丸”到了横滨，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凌晨，几个穿西服的刑事破门而入，搜查了我的住处，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

小时。后来我的朋友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约我担任编辑，我便提前回国，还根据这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遗憾的是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学好日语，不能用日语直接与日本朋友谈心。

相隔二十六年之后，我第二次到日本。一九六一年三月，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去东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飞机到达羽田机场时，我从玻璃窗内朝下看，只见一片鲜明耀眼的殷红，数不清有多少面五星红旗，我的心突然激烈跳动起来，觉得自己身上凭空添了许多力气。

那时中日两国没有邦交，我们的访问处处遇到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到处有援助的手。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

就是在那次访问中，我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者、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中岛健藏先生。他长我一岁，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兄长。也就是在那次访问中，我第一次到井上靖先生家里做客，开始了与井上靖先生二十多年的友谊。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青野季吉先生四壁图书的客厅里谈天说地、与龟井胜一郎先生同游富士五湖、与木下顺二先生重游上野公园的情景。还有秋田雨雀先生、芹泽光治良先生、石川达三先生、白石凡先生、有吉佐和子女士……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一连三年，我怀着以文会友的心年年东渡，每次访问都结交了不少真诚的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联系起来，人民友

好的崇高事业，使我们为之共同奋斗。相互信任，坦诚相见，彼此的心融合在一起。我曾经对中岛健藏先生说，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和安宁；反过来，中日友好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蒙受灾难。

在“文革”的十年中，我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我的作品被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当我在“牛棚”里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常常回忆起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促膝畅谈的情景，这使我绝望的心感到了暖意，得到了慰藉。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我从一些友人的口中，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时候，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为我的处境担忧，一再要求与我见面。当时年近九十的土岐善磨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允许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也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

一九八〇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我第五次到日本访问。这次我是怀着偿还朋友们的友谊之债而来的。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但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破例在东京朝日讲堂讲了《文学生活五十年》。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讲了《我和文学》。我讲了许多个人的事，也解剖了自

己，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以报答他们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友情。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从东京、广岛，到京都、奈良，又到了德岛、长崎，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日子过得愉快，过得充实，过得有意义。在长崎机场动身回国时，同朋友们挥手告别，我看见西园寺公一先生、清水正夫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眼泪，我也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走上飞机，我知道我又欠上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为了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我第六次到了日本。那时，我患帕金森氏综合症，又因骨折，连续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我们为什么写作》这篇讲稿，就是在医院里写成的。亲友们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怕我身体支持不住。我有感于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相邀的盛情，终于实现了我的诺言，也满足了我和日本朋友欢聚的愿望，按时在东京的大会上念了我的发言稿。

我还记得，当我坐着轮椅被推出成田机场时，我看见一张张亲切、熟悉的脸，我握住一双双温暖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又来到了朋友们中间。我忘记了疲劳，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到东京的第二天，我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的陪同下，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了花，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四周空气清新，安静肃穆，望着中岛先生的墓碑，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多好的人，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似乎看见了他的笑脸。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他活在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中。

很遗憾，我没有到过福冈。但对于福冈我并不感到陌生。在我的书房里，有一本印刷精美的画册《日本山河之八——福冈》，封面是银白色的关门大桥，封底是碧波上的浮云。里面详细介绍了福冈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远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朝时代，日本的留学生到中国去，就是从博多出发的。博多自古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有悠久历史的、与中国有深远关系的地方，举行集会，是令人兴奋和向往的。

然而，我恐怕没有精力再一次东渡了。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疾病缠身，步履维艰。尽管我心中充满了对福冈这片美丽土地的向往，对福冈人民深厚情谊的感谢，我已力不从心。我让我的儿子代表我，在这里献上我对福冈市人民的深深的友好之情和真诚、美好的祝愿。

我今年八十六岁，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愿把余生献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即便我的生命化为灰烬，我那颗火热的心也会在朋友们中间燃烧。

为上海青少年写作竞赛题词*

我们写作，不是为了“说谎”，而是说真话，掏出自己的心。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

巴　金 1990年11月8日。

* 本篇原刊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一九九一年

怀念井上靖先生*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清晨，我在病床上听"早新闻"节目，意外地听到了井上靖先生逝世的消息。四周非常安静，屋子里闪着灰白色的亮光。我疑心是在做梦。难道三十年的友情就这样结束？我想着，往事一件一件地出现在我眼前。前些时候我还在等待他去年十月二十七日的访问，天天在计算日期，后来访问推迟，我经常从访日归来的朋友那里打听他的近况，我的儿子在福冈回国的途中也去东京拜望了他。我始终相信还会同他再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我也等待过他，还作好了接待的准备，可是这月下旬井上先生到达上海，我已因骨折给钉在"牵引架"上，不能动弹了。以后又发现患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不到两年中间他三次到医院探病。当时他正忙着筹备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盼望我一定参加。朋友们为我的健康担心。我一口答应，就在病房里写了大会的发言稿《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带着它飞到东京，坐在轮椅上给推出机场，迎着井上先生的笑脸，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六日日本《产经新闻》。

"我来了!"我实践了诺言。

我没有想到这一次在东京是我们最后的相聚，短短的十几天中我们除了在会场见面和会外应酬外，还为电台、为刊物进行过三次对谈。井上先生讲话不多，却常常一句话打动我的心。记得十年"文革"后我从"活葬墓"回到人间，一九八〇年我再访东京，在一次招待酒会上我在祝酒辞中讲了井上先生的几件事情，其中有两件，一是一九六三年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在座还有杜宣)，毫无拘束地交谈。他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接近。"一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灵之门。我们东方人不轻易吐露感情，但是谁触动到我们心灵深处，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可以奉献一切。一个共同的人民友好的事业把我们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第二件事是"文革"后我们在上海见面，他送给我几本近作，晚上我在家翻看他的散文集《桃李记》，意外地发现了那篇揭露作家老舍悲剧性死亡的《壶》，是七〇年写成的。第二天早晨到虹桥机场送别，我向他表示感谢，我说中国作家对老舍之死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出来为他们的中国友人雪冤，我一共读到三篇文章，我们真该向日本同行学习交友之道。……酒会结束前，我又一次见到他，他告诉我有人问他是不是中国客人都这样讲话，他说："不都是这样。巴金却是这样的。"我说："对朋友应该掏出自己的心。"对真诚的朋友我的确掏出了心来的。

一九八四年东京对谈，我还保留了一盒录音磁带。当时他在写作关于孔子的小说，我们便谈起了孔子。我是五四运

动的产儿，我的老师是打“孔家店”的英雄。我在封建大家庭中生活了十九年，从小在私塾中常常因为背不出孔子的书给打手心，长大成人后又受不了要大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恪守本分的那一套规矩，我总觉得人们抬着孔子的神像在压制我。在老友面前我讲了些过去真实的印象。先生不加反驳，始终带笑地谈下去。最后我答应他的书出版后要认真地读一读。

在去年十月等待他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他的书出版了，我得到一册中文译本，想起对谈中的诺言，争取时间读完了它，我不由得发出赞叹。他写的孔子也就是我幼小时候把“他”的著作和讲话读得烂熟的孔夫子，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这个孔子爱人民，行仁政，认为人民是国家之本！两千几百年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人，真了不起！在我们这个时代，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孔子放在原来地位上描写出来，这就是井上文学。……

往事像长了翅膀似地飞来飞去，已经到了尽头。屋子里渐渐亮起来。播音员的声音还是十分清楚，仿佛有人用针刺痛我的心。这不是梦，这是永别。我那些话他再也听不见了。我痛苦地记起来，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闭幕，他到京王广场饭店话别。我注意到大会后他仍然得不到休息，有点担忧，就劝他“节劳”。他含笑说：“过一阵子就不忙了。”我听说他会柔术，有惊人的体力，以为应付得了。哪里知道两年后他就因食道癌动了五个小时的大手术。他制服了不治之症，却并没有战胜死亡，他走了，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三十年并不曾白白地

过去，两个作家的友情也不会徒然地消亡，我们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中日人民友好的事业将永放光芒。尊敬的井上先生，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1991年2月26日。

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题词*

祝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年。作为作者，也作为读者，我希望你们出版更多的好书。

巴　金 1991年3月。

* 本篇原刊于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当代》第四期。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几个月前我给冰心大姐写信发牢骚，抱怨自己的处境。我们通信话都很短，因为彼此熟悉、了解，许多话不需要写出来，发牢骚也不用长篇大论。我讲两三句，她就明白了，或者给我一点安慰，或者批评两句，其实批评的时候极少，我的牢骚常常引起她的共鸣，或者给她带来烦恼。

我从小爱发牢骚，但绝非无病呻吟，而且我不善于言辞，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嘴讲不出来的，我只好靠笔帮忙，因此走上了写作的路。我不是经过刻苦钻研、勤奋读写，取得若干成就的。我不过借用文学作武器，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不管拿着笔，或者放下笔，我都是在生活。写作几十年我从未想到什么成功，什么成就。摊开稿纸，我只有一个念头：奋笔前进。

我就奋笔前进吧。直到某一天出现了人畜互相转化的“魔法时代”，我给捆住胳膊绑住脚，整整十一年没有能写一篇文章。我真的相信自己给“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忽然发现那些符咒都失了效力，我的手仍然能写字。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收获》第一期。

"牛棚"关了十年之后，我还是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要继续前进，可是我已年逾古稀，奋笔无力了。

年轻时候我不高兴听见"老"字，我常常对朋友说："我只要活到四十。"岂但四十！不知不觉中我已过了六十，开始感到疲倦，正考虑搁笔的时候却被当作"牛鬼"揪到干校，不准言老，也不敢言老了。在干校我和另一个审查对象抬一箩筐菜皮送到猪场，半路上跌进了粪沟，自己从水里爬上来，没有人关心地问一句，我只听见几声大笑。

只有十年梦醒我才懂得保护自己；让人称公称老，我才记起自己的年纪；疾病缠身，我才想到搁笔休息。活到八十七岁，我的确感到精疲力竭，但是今天和从前一样，我还得老老实实地活下去。我的原则仍然是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其实这不过老调重弹。我并非自吹自擂独家贩卖真货，或者我在传播真理，我唯一的宗旨是不欺骗读者，自己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停地探索，不断地追求，倘使发现错误，就承认错误，绝不坚持错误。读者是我真正的"评委"，我并不要他们跟着我走。有话要讲，我才拿笔。我的手不听指挥，我又把笔放下。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渴望安静，也只是为了勤奋而有效地使用这支笔。我回顾过去，写作一生，我并未尽责，也未还清欠债，半夜梦醒，在床上想来想去，深感愧对读者，万分激动，我哪里来的安静？当然到了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假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

个字：讲真话。

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标榜“心口一致”，追求“言行一致”，为了讲真话，他以八十高龄离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车站上。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说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他就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我说的“讲真话”就是这样简单，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

1991年9月8日。

怀念二叔*

近几年我常为自己的《全集》写后记，一年中写三四篇《代跋》，要解释旧作，我有时谈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虽然写得少些，但是我做过不愉快的梦，在一间有纱窗的木板壁漆成绿色的书房里，我和三哥李尧林站在书桌前听二叔讲书。"必讼！"二叔忽然拍着书桌大声说，"说得好！"

我吃了一惊。在八九年大病之后我总是睡不安稳，也少做梦，就是进入梦境，也恍恍惚惚，脑子并不清楚。这一次却不同，我明明感觉到舒适的夏夜凉风。醒在床上，我还听见二叔的声音，他讲书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讼！"我很激动，一两个小时不能阖眼，我在回忆那些难忘的事情。

对二叔李华封我了解不多，他平日很少同我和三哥交谈，也不常对我们训话，我们见到他打个招呼，他温和地答应一声。他的住房在后面一进，旁边便是大厨房，前几年我没有进学堂而在私塾中又相当自由的时候，午饭前常常溜到大厨房里看谢厨子烧菜，很少听见二叔房里骂人或吵架的声音。人们说他的脾气不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九二年香港《二十一世纪》十月号。

我只知道二叔是本城一位挂牌的大律师，年轻时候在日本东京学过法律，他在成都也有点名气，事务所就设在我们公馆里，三叔是他的助手，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我和郑书记员熟习了，晚上没有事就去找他下象棋。郑书记员有一回向我称赞二叔法庭辩护很精彩，他甚至安排我同他一起去法庭旁听。我们的确去了，可是本案审讯临时改期，我以后也没有再去。

我没有听见二叔谈日本的事情，只知道他有一个笔名（也就是室名）叫箱根室主人。他活着的时候我说不出箱根是什么地方。一九六一年我访问日本到了箱根，不由得想起亡故多年的二叔，好像一下子我们的距离缩短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在那个时候就喜欢箱根，我一直以为他是守旧派，甚至把他写成《激流》中的高克明。在小说里我还写了淑贞的缠脚。但我堂妹的脚不久就得到了解放，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说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过我和三哥的语文老师，在我们离家前两年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每天晚上我们到他的书房，讲解告一个段落，我们便告辞回屋。他给我们讲书，因为他对《春秋·左传》有兴趣、有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太寂寞，三个儿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这样。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对他平日总是敬而远之，并无恶感，但也不亲近。我还记得一件事情：编辑《平民之声》旬刊

的时候，我常常把刚刚印好的刊物放在家里，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对面的空屋内。有一天我进屋去拿新送来的报纸，门开着，二叔走过门前便进房来，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上面有我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的长篇连载，最后还有报社的地址：成都双眼井二十一号李芾甘。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话，却什么也没有讲就放下报纸走出去了。我以为他会对大哥提起这件事训我一顿，后来才知道他只是要大哥劝我在外面活动时多加小心。这些话我当时听不进去，以后回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他的好意，我和三哥出川念书，也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便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画笔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

"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怎样写文章，我本来一窍不通，听惯了二叔的讲解分析，我感到一点兴趣，有时也照他的办法，分析读过的文章，似乎有较深的理解，懂得一点把文字当作武器使用的奥妙。以后我需要倾吐感情、发泄爱憎的时候，我寂寞、痛苦、愤怒或悲伤的时候，我就拿起笔疯狂似地写着，深夜我在自己房里听见大哥一个人坐进放在大厅上的轿子、打碎窗玻璃的时候，我不能控制自己，便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不成篇的长诗。后来我在法国沙多-吉里读到报导两个意大利工人遭受电刑的时候，我写出小说《灭亡》中一些重要的章节。我写着，自己说仿佛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猛抽。我对准痛处用力打击，我的感情仿佛通过我的心、我的手全部灌注在笔下写在纸上，变成了我的呼唤，我的控诉，我的叫号。

最初的年代里我到处跑，只要手中有一支笔我便到处写作。心里想些什么，我就写些什么。我并不苦思苦想，寻找打击要害的有力的字句，我让感情奔放煽旺心中的火，推动我这支毫无装饰的笔飞越一张一张的稿纸。我没有学会一字诛心的笔法，我走自己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终于从荆棘丛中走了出来。

我一再声明，反复解释，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有人嫌我啰嗦，其实我不过在讲真话。"文革"期间我曾几次被赶出文坛，又偷偷地溜了回来。现在我还不知道是否已在文坛"定居"。但是自己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太久了！

接连几个不眠的长夜，我睁着眼睛在思索，在回忆。灰堆里还闪亮着火星。我不是怀念亡故的亲人，难道是在为自己结帐，准备还清欠债？

那么是时候了。

又想到了二叔，关于他，许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我父亲只活了四十四岁。二叔活过了五十，但是他做五十大寿的时候我早已离开成都，现在连他的忌辰也弄不清楚了。我们出川后还同他通过三四封信，"文革"之后只剩下一页无尾的残笺，他的手迹对我还是十分亲切，使我想起他那些勤奋治学的教诲，最近我把六十几年前这一页旧信赠给成都的慧园，说明我今天还不曾忘记我的这位老师。

我记不起我搁笔有几年了。写字困难，我便开动脑筋，怀旧的思想在活动，眼前现出一张一张亲切的脸。我的确在为自己结帐。我忽然想再翻一下《春秋·左传》。多年不逛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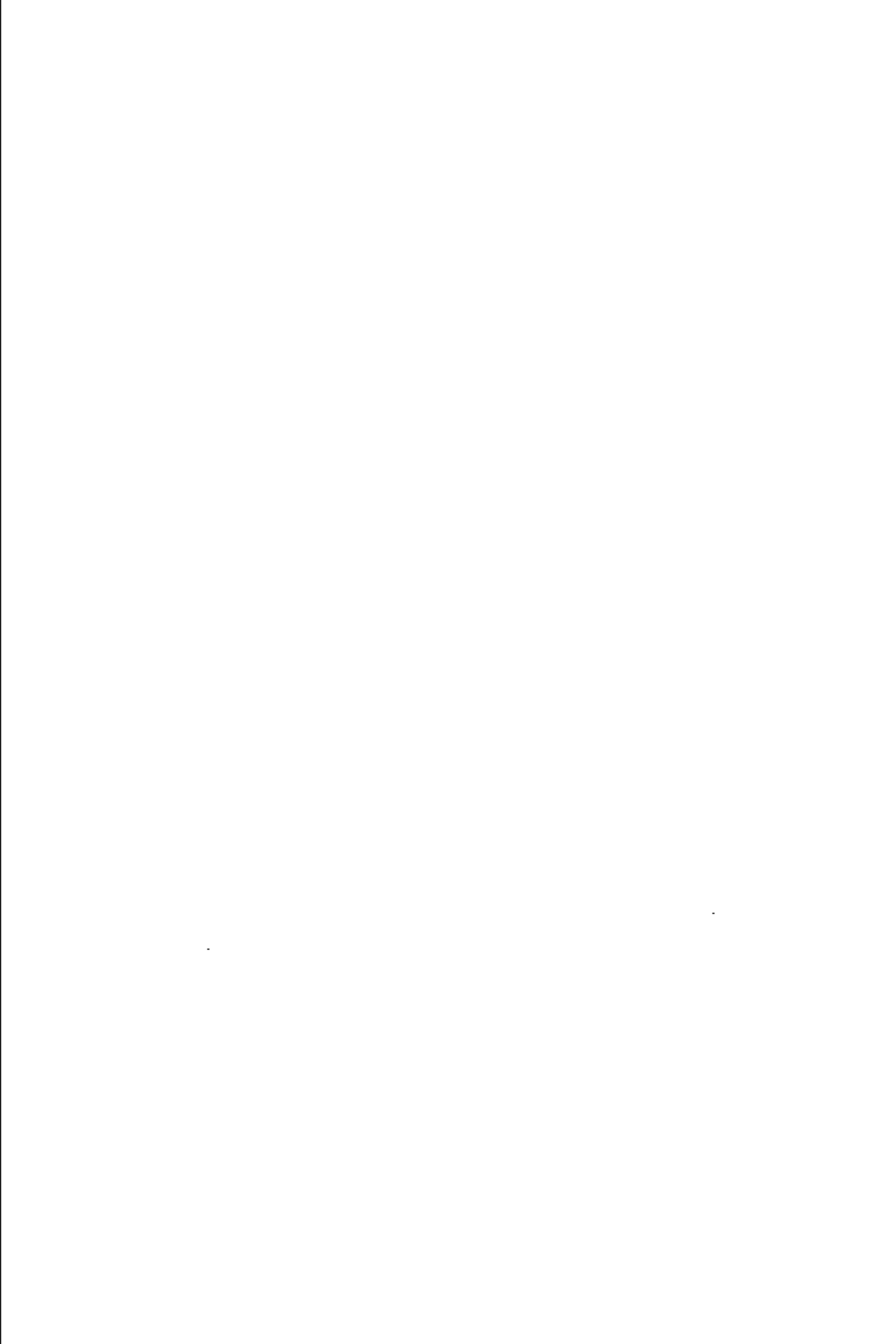
了，我请友人黄裳替我买来一部有注解的新版本，不厚不薄，一共四册，我拿着翻看，翻过一册又是一册，我忽然停住，低声念了起来："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不再往后翻看了，我仿佛又站在二叔的写字台前。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治学有骨气，做人也有骨气。人说真话，史官记实事，第一个死了，第二个站出来，杀了三个，还有第四、第五……两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这个道理，他便没有让"太史尽死"。

崔杼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即使不放过一个史官，他也阻止不了"执简以往"的人。二叔知道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他的确是我的老师。

1991年11月15日。

附　　录



在黑暗中*(对话)

——赠德国朋友和同志埃尔内斯特·利贝特劳

夜。场上一片漆黑。可以听到有人在黑暗中走过。

兄妹二人。

妹：这路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远着吧？

兄：不知道！

妹：天多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

兄：我也看不见。

妹：我眼前更暗，黑洞洞的望不到头。

兄：也许是吧。可是别怕。

妹：有石头挡我的路。

兄：踢开它。

妹：我的脚痛。

兄：没关系。

妹：没关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绿光》(世界语刊物)第十至第十二期。周流溪译。

兄：没关系！

〔沉寂片刻

妹：什么声音？

兄：我没听见。

妹：没听见？听着烦人哪！

兄：好妹妹，别管它，我们只管向前走。

妹：可它老在我耳边响！

兄：拿手把耳朵捂起来吧。

妹：可那刺耳的声音还是听得见。

兄：那有什么关系呢，好妹妹。走进光明的世界，你就什么刺耳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沉寂片刻

妹：啊！这是什么？

兄：你碰到什么啦？

妹：好像是死尸。

兄：死尸？

妹：是呀，哥哥，真吓人！

兄：别管它。赶路吧。

妹：可它挡道呀！

兄：迈过去！

妹：不，我不想迈过去。

兄：为什么？

妹：因为他也是追求光明的人，跟我一样。

兄：不过……

妹：好哥哥，帮我把这具尸体搬到别处去吧。

兄：好。

〔沉寂片刻

兄：走快点儿。路还长呢。

妹：哎哟！

兄：什么事？

妹：我摔在地上了。

兄：让我扶你起来。

妹：……

兄：你的手在哪儿？

妹：在这儿。

兄：啊！你的手湿了。

妹：是啊。

兄：那是血。

妹：可能是血。

兄：我用衣服给你擦擦吧。

妹：多谢了。

〔沉寂片刻

妹：刮大风了。

兄：不要紧。

妹：沙土太多了。

兄：别管它。

妹：哎哟，沙子都跑到我眼睛里去了。

兄：把它弄出来吧。

妹：眼泪都出来了。

兄：让它流吧。

妹：这路是怎么回事？

兄：还远呢。

妹：也许我们永远走不到绿星那儿了。

兄：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向前走。

妹：我记得……

兄：别提了，妹妹，我们要忘掉一切。

妹：可我心里难受；孤零零的，叫人失望。

兄：绿星在路的尽头等着我们呢。

妹：听人说，光明世界美极了。

兄：像美梦一样。

妹：我记得，只有在梦里我才是幸福的。

兄：可是在光明世界里，人会更加幸福。

妹：也许我们没那份福气活在光明世界了。

兄：但是，我们的责任比我们自己更重要。

妹：我们到底应该为谁寻找绿星？

兄：为了一切俯伏在黑暗里的人。

妹：不过，他们并不想要绿星！

兄：因为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俯伏在黑暗里，现在他们都习惯了黑暗，甚至怕站起来看见光明！我们不应该恨他们，应该同情他们。我相信，一旦绿星在天上闪耀，用它那永恒的光芒驱散黑暗，那时他们就会站起来。

妹：多美妙的梦啊！

兄：那可不是梦。总有一天，绿星会在全世界大放光辉，全人类都会兄弟一般和睦相处，就像一个大家庭。

妹：我沉不住气了。路那么长，我们也太寂寞了。走了这么远的路，连一点儿人的声音也听不见。（啜泣起来）

〔长久的沉寂

兄：妹妹，你看！

妹：看什么？

兄：绿星！绿光！

妹：在哪儿？我没看见。

在远方天地相接处有一颗绿星在闪烁。那闪光在夜空中越来越亮。

妹：啊，哥哥，我看见了！

兄：怎么样？

妹：我真高兴。

兄：我也很高兴。

妹：在绿星后面真的有一个光明的世界，像梦一样美吗？

兄：对，真的。

妹：我们走快点儿，走到绿星那儿去。

友　　谊*

从不久前访问过我国的苏联诗人苏尔科夫写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这首热情洋溢的诗里，我听到了深厚的友谊的声音。苏联人民的友谊的声音是我们很熟悉的。苏维埃人热烈地祝贺我们，向我们表示亲爱之情。每一个访问过苏联的中国人都受到这种友谊的鼓舞。听到苏联人民支持的话，正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忘我劳动的六亿中国人民增添了力量和信心。中国人民友好地向自己的苏联弟兄伸出手来，中国的男女青年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微笑欢迎从苏联来的客人，建设者们恭恭敬敬地聆听苏联专家的讲述，学习他们的丰富经验和渊博知识。

苏联的文学艺术教育了我国青年，充实了他们的心灵，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我们的学校里有保尔班、卓娅班。许多人屏住呼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和卓娅的母亲写的关于卓娅的故事。不止一滴热泪落到这些书上。青年学生渴望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保尔和卓娅为之献出了生命的事业。在中国，任何一个年轻人都知道柯察金、卓娅、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苏联《真理报》。陈馥译。

青年近卫军英雄们、海鸥。他们的光辉形象教育我国青年更勇敢、更忠诚地为人民的伟大事业服务。

没有什么比友谊更能鼓舞人、帮助人的了。三十八年来，苏联人民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给我们的友谊和支持。在艰苦的斗争年代，在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以及后来，在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直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中国人民始终得到苏联朋友的伟大的、无私的帮助。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以他们的优秀品质鼓舞着我们的工人和技术员。他们把我们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一样。他们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哪里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到哪里去工作。他们时刻准备用第一流的技术和渊博的知识帮助我们克服任何困难。多少中国工人和技术员在向苏联朋友学习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灿烂前程！

我国的少先队员们紧紧围着来中国访问的卓娅的母亲，亲切地叫她"妈妈"，对她说："我们都是您的亲生儿女。"

我国儿童热情地朗诵苏联诗人的诗歌。他们给苏联儿童写许多信，表达自己的友好情谊。我国的英雄和劳动模范紧紧握着苏联朋友的手，向他们祝贺。

我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从苏联文学艺术中汲取灵感。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想向苏联朋友表示热烈的感激之情！

我们在苏联访问的时候，也得到亲人一般的接待。无论到什么地方，孩子们都大声地欢迎我们。年轻人更是拦住我们热情地问候。处处都看到朋友的笑脸。许多人要我们签名留念，愿意为我们做最好的导游，向我们详细介绍苏联的成

就，要我们向中国人民致敬。

在顿河罗斯托夫，许多青年人骑上自行车沿着滨河大道尾随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游艇。在雅尔塔附近的美妙的阿尔捷克夏令营，苏联儿童为他们的中国大朋友开了专场音乐会。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争着要一位中国客人和他们同席。像这样动人的事例真是写不尽也说不完。每一个访问过苏联的人都把这友谊的温暖永远铭记在心。

的确，在苏联我们没有陌生的人。到处都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就连俄罗斯的田野也使我们感到亲切。

我们终生难忘西伯利亚的森林和贝加尔湖的湖水，雅尔塔的黑海海滨和壮丽的列宁运河上的水闸，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格勒的白夜，大剧院的金光闪闪的包厢和莫斯科地下铁道的仙宫，走向列宁的陵墓的无尽头的人流，克里姆林宫塔上的发光的宝石红星。甚至在回国以后，我们还常常梦见。莫斯科的每一片广场和每一座纪念碑、每一个机器拖拉机站、每一条小河都出现在我们眼前。有的时候，我在苏联见到过的一条小河似乎就从我家窗下流过，清风哼着我在苏联剧院里听到过的歌曲。

萨肯这个边远山村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纯真的爱情使我们激动。在中国简直就找不到一个人不热爱苏联文学！找不到一个人不关心苏联人民的生活！莫斯科是革命圣地，是全体进步人类的和平堡垒。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莫斯科就像自己的祖国一样。对于我们，那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珍贵的，亲切的。

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点。因此，作家和艺术家们应该有更多的作品描绘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些作品一定会使两国人民的感情更加深厚，一定能鼓舞他们，教育他们。我们所歌颂和珍视的友谊，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事业的结果，是我们彼此理解、互敬互爱的结果。我们两国人民正在为全人类的光辉前景而奋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各国人民的幸福与和平的事业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跟随着苏联人民走在一条伟大而光明的道路上。苏联人民向中国弟兄伸出援助的手，使我们能够更顺利地前进。今天激动着苏维埃人的心的那些梦想，同样激动着中国人民的心。那个鼓舞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道路上前进的信念也鼓舞着中国各族人民。我们共同的爱、我们相互的信任和紧密的合作，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和前进的决心。

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感觉疲倦，当我们为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一个熟悉的鼓励的声音，看到鼓励的目光，得到苏联人民的有力的支持。

当我们为取得成就而高兴的时候，我们又听到苏联人民祝贺我们的声音。我们时刻都听得到一个鼓励的声音说："加油！让我们一起前进！"这些年我们就是这样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今天，六亿中国人民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有四只手、两个大脑、双倍的力气，因为我们有苏维埃人做我们的朋

友，他们鼓舞着我们，时刻同我们在一起。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体现了最美好、最无私、最忘我的感情。苏联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的三十八年中取得的斗争经验和辉煌成就，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劳动热情使这种感情更加强烈。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经验和六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加强了这种感情。随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友情还会继续得到加强。

这种友谊的发展能够给人类带来持久的和平和普遍的繁荣，让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的生活，使母亲们对自己的孩子放心，给下一代幸福的童年，并且有助于把地球变成鲜花盛开的花园……这种友谊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意义何在，无需多说。我们两国人民互敬互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友谊是自然的、牢固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它将与世长存，永不凋谢！

鲁　　迅*

——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

鲁迅……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就不由得要回想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激动不已。

在半截玻璃棺盖下面，是一张清瘦、慈祥的脸、下垂的眼帘、紧闭的双唇……只要一闭上眼睛，这一切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同遗体告别。到处是鲜花和花圈。鲁迅仿佛安卧在香花丛中。他真的像是睡着了一样。假如他醒过来，我想……但他没有醒过来。我们永远地失去了他。

回忆去世的亲爱的人总是使人难过，想到鲁迅不能和我们一起目睹他的理想已经实现，更加使人难过。他为新中国奋斗了一生。他没有能够看到新中国的太阳是件千古憾事。每想到鲁迅，我总忆起我同他相见的情景，眼前就出现他那慈祥的、亲切的微笑，他一面喷着烟雾一面同我谈话的样子，好像他就在近旁，在这儿，面对着我，他的风采光照着我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苏联《文学报》。陈顧译。

也许我算不上鲁迅的朋友，而只不过是他的一名读者，一个学生。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熟读他的小说，后来在多年的浪迹中也没有离开过他的作品。我错过了几次同他相见的机会，到了一九三三年才在文学社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记得那天晚上我比他先到。大厅里已有茅盾和另外两三位客人。在这以前我也从未见过茅盾。我知道自己不善言辞，尤其是在初次相见的人面前，因此我不愿去打搅这位受人尊敬的作家。但是，像这样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和他在一起很自然，很随便。我们谈了起来。这时候，门帘掀开了，鲁迅走进来。这是我从许多照片上早就熟悉的一位老人，矮小、清瘦，头发和眉毛又黑又浓，穿一件普通的长袍……只是脸上的表情比照片上的更加和蔼、诚恳。

那天晚上在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作家。谈话自然围着本行转，谈到我们的工作、作品、文人。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他说话极其朴素、自然，用辞简短、鲜明而又富于表现力，不时露出温和、慈祥的微笑。他谈到当时刚刚创刊的《文学》杂志的内容，谈到他打算写的作品，谈到帮闲文人所起的卑劣作用，谈到愚蠢而又肮脏的国民党宣传手段。当然，不是鲁迅一个人谈。其他人也就这些或那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大家每次都想听听他的看法。

宴会进行了两个小时。只是在向鲁迅告别的时候，我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鲁迅和茅盾一道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他们从视野中消失才回家去。一路上我不断地在想，这个人是多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啊！以后我还看见过他。

那个时候《文学》杂志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有几次我们不得不到旅馆去会面，商量对策。我们需要讨论问题的时候，一般是到大旅馆去定一个房间，要些酒菜。在饭桌上谈话比较方便和安全。有时我们像这样一坐就是好长时间，直到夜里十一点以后才散。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去日本前，文学社的朋友们为我饯行，在南京饭店定了一个房间，鲁迅也来了。记得那天晚上他兴致很高，谈到日本，谈到当地的风俗习惯，还讲了几个笑话，都是中国留学生由于日语不好闹出来的。饭后我们继续谈天。鲁迅告诉我们他有几个熟人被捕，还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无法把信传递给他。看得出来他很担心。他说到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时，眼睛里燃着怒火。

第二年秋天，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又见到了鲁迅。他显得有些消瘦，但仍像先前那样精神饱满。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刚成立不久，我在那里任总编辑)准备出版"译文丛书"和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部，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他刚完成这部译作，正准备出版画家阿庚所作《死魂灵百图》。我问鲁迅是不是有意写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和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什么时候动笔。他抬起头来，吸了一口香烟，想了想，笑道："想得很多，就是怎么也做不成。"的确，在那个时期他还准备写《中国文学史》，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我那时正好打算出版"文学丛刊"第一集，便请他为出版社编一本他的作品集。鲁迅答应了。几天以后他就把这个集子的名称和内容通知了我。他告诉我，有三四篇东西应该收进去，可是还没有动

笔，只要一写出来就寄给我。这是他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

他刚写完短篇小说《出关》，健康状况就恶化了。我估计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编成。可是当出版社宣布不久将出齐“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卷书的时候，鲁迅着急了。一个月之内他就写完了几篇，编好了集子，并且寄给了我。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见到鲁迅，我请他再为出版社写点东西，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他的作品。他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些日子，鲁迅托作家黄源转告我，这一卷题名《夜记》。不久他就病了。康复以后，他一连写了几篇。听说他专心致志地编《夜记》，把其他几篇他没有写完的东西都搁在一边。疾病和猝然降临的死亡中断了他的工作。十月十七日下午，他感觉还好，甚至去看望一个朋友。十月十九日早上就不在了。《夜记》（“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一卷）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夫人许广平编辑出版的。

我在这里讲到的不是我和鲁迅的全部会见和谈话，那还要多些。但是我没有记下来，因此也不可能讲得很全。我从他的作家朋友们那里听到过不少他的趣谈趣事。鲁迅对敌人一向是有原则的，坚定的。即使是跟很熟的人谈话，只要感觉到对方在说谎，他就会拂袖而去。但是对朋友，对青年，鲁迅总是特别和蔼诚恳，关怀备至。他把大量的时间给了青年，而他本来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去写作，比如写他的长篇小说，或者《中国文学史》。鲁迅经常关心青年作者，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为他们批阅手稿，把自己的手稿拿给他们看，设

法为他们投稿等等。有时他甚至出钱为青年作家印作品。像"奴隶丛书"中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就是用他的钱出版的。他还为这些书作了序，把它们推荐给读者。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最初也是由鲁迅出资印刷的。鲁迅亲自校改译文，出版后又亲自发行。他把这本小说的出版当作一件大事。

鲁迅资助过不少个人和事业。他曾经无私地支持了一些像上海世界语学会这样的文化团体。没有他的帮助，像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的出版社也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巩固的。鲁迅把他的一些著作和译作的稿费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去支付《死魂灵百图》的出版费用。文化生活出版社理应在书卖完以后把这笔钱还给他，但他只是在确信出版社已不存在财务困难的时候才同意接受下来。必须指出，鲁迅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没有任何关系，他帮助出版社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这家出版社是"美好的"事业。只要有可能多出一本有益的书，他总是非常高兴，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可能性。他一贯热心助人，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每次和鲁迅见面我都感觉到了他对人的热诚，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他从不对人说教，从不以导师自居。他只是经常关心人，愿意帮助人，使人变得更好。同鲁迅谈话的时候，你不仅感觉到一颗仁爱的心在跳动，你甚至触摸到他的光辉个性的魅力，你似乎被他眼睛里射出来的智慧的光芒照透了。

他叫人不能不敬他，爱他。有他做你的朋友和同志，你会

觉得幸福。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好,让他因此而高兴,你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位作家。

我们为什么热爱苏联文学*

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即将来临，不久前北京和上海的文学杂志号召作家们就两个问题谈一谈，一个是“苏联文学给了我力量”，一个是“我从苏联文学中吸取了什么宝贵的东西”。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编辑们都很清楚，对于中国作家（可以说几乎是对于所有的中国作家），苏联文学起了特殊的作用。这个倡议自然就得到了极其热烈的响应。

我不想只谈自己。我个人从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是他们使我懂得了文学的强大吸引力。我看到他们是如何严肃地对待人的问题，又如何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解决这个问题的。细心的读者在我的长篇小说中会发现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影响，在我的中短篇小说中发现高尔基的影响。在我近几年写的东西里面，又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作家的巨大影响。我曾经在谈高尔基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他的作品帮助读者热爱生活，热爱人。他用自己的强烈的爱和恨感染你，使你感觉到现实生活的脉动；他用他个人的魅力使你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去思索。他像丹柯一样高高地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苏联《文学报》。陈馥译。

起他那颗"燃烧的心"，给人们照亮道路，自己领头向前奔去。我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而高尔基对所有的中国作家的影响都是无比巨大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非常喜欢高尔基的作品，亲自把他的《俄罗斯童话》译成中文。鲁迅称高尔基为"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说他"是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在高尔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革拉特科夫的《士敏土》等许多苏联文学作品。《毁灭》是鲁迅根据德文本和日文本翻译的。他还编辑了苏联作家中短篇小说集两卷，翻译了班台莱耶夫为儿童写的短篇小说《表》，直接参与了他的友人们翻译的《铁流》、《士敏土》、《静静的顿河》的编辑工作。已故的瞿秋白和曹靖华从俄文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论著。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瞿秋白特别强调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学名著的任务，他说"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鲁迅在复信中说，他很喜欢这些作品，"就像

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他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再译几种能够使我们的创作家得到“正确的师范”的作品。一年以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写道：“凡这些(指苏联文学作品)，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那个时候原版的苏联书籍在中国很难得到，而朋友们从苏联寄来的又无一例外地要遭到邮政的查禁。当时能够从俄文翻译的人也不多。翻译家们简直像大海捞针似的搜集苏联文学的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日译本，然后再把它们译成中文。可惜那些译本多半是节译，经过检查机关大删大改，只是在解放后才有可能恢复原著的全貌。一九三四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一百四十九种新文艺书籍，其中有许多“或系普罗文学理论或系新俄作品”。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在中国大受欢迎，一年之内出了两版，但是不久就遭到查禁。据出版人说是因为封面上画有鲜血的印迹。“红色”刺激了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们，所以这本书的第三版改用淡绿色的封面。然而就连这一版也很快被列为禁书。

无论是警察的迫害还是查禁，都没有能够阻止苏联文学在中国传播。读者们不顾危险地寻找他们喜爱的书。我听到过许多动人的故事，现在我想讲一讲其中的一个，那是上海的一位公共汽车售票员告诉我的。

一九三二年秋天，他走进内山书店，想买鲁迅翻译的《毁

灭》。这本书的价钱是一元四角，他身上没有带这么多。他拿着书翻看了许久，不知道怎么办。忽然，一个面孔清瘦、神色疲惫的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走过来问道：

"你想买这本书吗？"

"是的。"

那个上了年纪的人就从书架上另外拿了一本像《毁灭》那样大小的书，封面上印着《铁流》两个字。

"买这本吧，这本翻译得好些。"

售票员看了看价码，那本书的价钱是一元六角。他叹了一口气说：

"先生，我买不起，钱不够……我只有一元。"

"没有关系，你就出一元，我把两本都卖给你。"

这时候他才认出，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是鲁迅，他是这家书店的常客。接着鲁迅指了指《铁流》，又说：

"这本书我本来也可以白送给你，但它不是我的，而是曹靖华先生的，我就收你一元。这一本我送给你。行吗？……"

中国作家从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们不求个人出名，而是把文学看作斗争的武器，看作可以用来向旧制度进攻、为人们谋幸福的武器。他们怎么能够不万分珍爱这些作品，怎么能够不向苏联作家学习啊？！

中国的进步诗人都受到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在斗争的年代，那些从城墙上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的"口号诗"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对于我们曾经是多么有效的武器啊！苏联作家描写战争的作品，对于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们又具有多么大的认识价值啊！

我曾经同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几位军官交谈过。他们告诉我，在战斗中，在情况对于他们十分困难的时候，他们从别克的《恐惧与无畏》、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这样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不少益处。这些书的确教给了他们许多东西。我常常听到一些在解放区工作过多年的同志说，行军的时候，为了不使背包过重，他们把什么都扔了，只带几本苏联书籍。他们就背着这些书转战南北！他们知道，在困难的时刻，甚至在危及生命的时刻，他们总是能够从书里得到启发、安慰，这些书使他们想到，他们并不孤独，有一个支持他们的大国和把自己的全身心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广大的人民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版苏联文学作品的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人们再也不需要像探宝那样去寻找苏联书籍，再也不怕读苏联书籍会给抓去坐牢，不怕失去工作、丢掉饭碗了。许多苏联书籍译成中文出版，每年有几百种。最重要的苏联文学作品我们都翻译了，而且一连出几版，印数往往达到百万册。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印数就有这么大。这些书成了中国青年的真正的导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育者。许多学校的少年儿童组成保尔·柯察金学习小组，许多班级命名为卓娅班。他们像《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海鸥》的主人公一样，是中国青年的光辉榜样。

中国读者不仅赞美和敬仰苏联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们，而

且效法他们的高尚行为。例子很多，不需要去寻找。中国志愿军战士黄继光受到马特洛索夫的形象的鼓舞，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枪眼。……

中国人民跟着苏联人民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在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苏联的无私的帮助，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苏联的建设经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共同的目标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文学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新文学的道路。

我们今天所处的优越条件是鲁迅只能梦想的。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赞美我们如此热爱的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现在没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幸运的，终于盼到了鲁迅和他的战友们那么盼望的时代，苏联文学名著正在全国系统地翻译和传播，理想正在成为现实，我们可以通过中译本阅读苏维埃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了。

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觉到中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共性，中国作家和苏联作家之间的牢固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伟大的现实把我们两国的作家团结在一起，不仅是因为我们两国的作家都在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老师和朋友——苏联作家走在我们前面，而且也因为我们和苏联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爱，热烈的爱，爱苏联！

北 京

心连着心*

不久前我在苏联度过了一段愉快的、令人鼓舞的时光。我怀念莫斯科和塔什干的朋友们，怀念沐浴在阳光下、充满玫瑰花香的乌兹别克花园城市。我还怀念我在乌兹别克大诗人加富尔·古利亚姆家里作客的三个多小时。我的心首先不是被东方音乐和精彩的舞蹈(它们美极了!)迷住，而是被老诗人对中国人民说的深情的话激动了。

老诗人说："加富尔·古利亚姆的家就是每一位中国同志的家。我家的大门随时都为你们开着。"我回答说："每一个中国同志的家也是诗人古利亚姆的家。我们的大门也是随时都为你们开着。"当时我多么愿意向他敞开我的心扉啊!

我在塔什干有了自己的家。像这样的家，我在基辅、莫斯科都有。因为一年多以前柯涅楚克和波列伏依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此刻上海是寒冷的午夜，我坐在快要熄灭的火炉边怀念苏联，怀念我远方的朋友们。……

在每一个民族的民间口头诗歌和文献中都有许多歌颂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苏联《文学报》。陈馥译。

的友谊的精彩词句和激动人心的作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多少世纪以来都是诗人和艺术家们的一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的源泉。然而，所有这些作品集合起来也无法表达今天把中苏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深厚的感情。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来的九年间，我有幸五次访问你们的国家。每去一次我都更加热爱这个伟大的国家，更加依恋它，更加充分地体会到中苏两国人民的血肉相连。在苏联，我仿佛沐浴在美妙的友谊的海洋中。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家里，在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中间。

苏维埃人的心是真诚的，无私的，博大的！这是高尔基笔下的英雄丹柯的燃烧的心。它使人升华，使人奋发，使人永远大步前进。

苏维埃人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苏维埃人和他们的中国同志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道上并肩迅猛前进。他们总是高兴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幸福。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常常收到苏联读者的来信，他们的朴素、诚恳的话语总是使我激动。当美国帝国主义在台湾威胁我们的时候，一位苏联读者寄给我一封信，表达了他在必要的时候拿起武器誓死捍卫中国的决心。我相信，中国读者也会给苏联作家写这样的信，因为许多苏联文学作品早已成为亿万中国读者心爱的书。通过苏联文学作品，中国人民对苏维埃国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民。许多苏联英雄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苏联工人总是以特别高涨的热情为中国工厂制造机器和设备。中国工人就大大提高劳动速度，增加产量，以报答这种友谊。苏联专家在中国是工作认真负责、奋不顾身的榜样。他们精力充沛，一往无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每一个成就里面都有我们的弟兄——苏联专家们的不少心血。他们赢得了我们的深深的、永远的尊敬。

不用这种兄弟的情谊，还能用什么来说明倪寅初的功勋啊？年轻的中国边防战士倪寅初，为了抢救一位病危的苏联女专家，在寒冷的黑夜里，摸着渡船用的钢索，游过波涛汹涌的黑额尔齐斯河，一个人把渡船划过来，顺利地把病人送到对岸机场，又乘飞机送到医院。

由于他挽救了一个苏维埃人的生命，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这位勇敢机智的中国战士一枚荣誉勋章。中国人民都知道倪寅初的功勋。中国作家们写了诗和小说来歌颂这位英雄。

倪寅初本人是这样描写他当时的感受的："这位苏联女专家在莫斯科有两个孩子。我在照片上看到过。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为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这位苏联妇女扔下自己的孩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个荒僻的山区。她住帐篷，起早贪黑地工作，不管刮风下雨，跟我们一块儿挨饿受冻。她干起活来那么热情，就像是在自己家里干自己切身的事。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当她病危的时候，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一定要挽救她的生命！……"

倪寅初的功勋不过是无数这类例子当中的一个。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厚，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这友谊不是什么奇迹，虽然它已经成为许多奇迹的源泉。这友谊体现着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史无前例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七年计划反映出苏联人民的豪情壮志。苏共二十一大展示了共产主义建设的美景。这一切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吓得发抖。

苏联发射强大的宇宙火箭的时候，中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情景是我们每一个人终生难忘的。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欢呼声。这件大事使人们兴奋得一夜夜不能合眼。在街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互相祝贺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中国人民把苏联科学技术的新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我们都清楚，除了这种看得见的宇宙火箭以外，苏联人民每天都在发射无数看不见的胜利的火箭。苏联人民在为全人类造福。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人民即将创造更加惊人的奇迹。

我国人民为有苏联人民的友谊而自豪。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不辜负这友谊，正像我们都知道的一首歌里唱的："中苏人民心连着心！"

我们要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唱着《莫斯科—北京》更加迅速地走向我们的友谊的更大胜利，走向共产主义！

上海，2月。

我的祖国*

我仿佛在梦中。我的四周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前头有无限的光明。一支快乐的歌不停地在耳边响着，这支歌充满了我的全身，我的心也像是在那迷人的曲调中融化了。我真想把朋友们引到这里来，并且拥抱他们，拥抱一切一切人，无论多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多么幸福啊！

不必说，这根本不是梦，人也不可能做这样长的梦。从四方八面包围着我的是伟大的现实，这现实感是如此强烈，我甚至觉得我的心贴着祖国的心。不久前我在上海作家的一次会议上也听到过类似的热情的话。发言的人都激动地谈到我们祖国几十年间走过的漫长的路。提起那残酷、黑暗的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话说。

我有一种感觉，仿佛经过多年寻觅，我找到了自己早已失去的母亲。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从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回到自己的住处。激动的心情没有一刻离开过我。就像是宣誓一样，我在心里反复地对自己说："祖国，我的母亲！我终于找到了你！……"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苏联《文学报》。陈馥译。

从那个时候起，十年过去了。我一天也忘不了自己的誓言。相反，我对祖国的爱一天比一天深，我越来越为她，我的母亲，感到骄傲。

……作家会议开得十分热烈。有一个人在发言中说："今天的气氛太热烈了，可是我的心里比这还要热。"别人不无道理地对他说："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在沸腾？到处都是这样！"不仅我们的会议在沸腾，这些日子整个上海，整个国家都在沸腾。一个天大的喜讯惊动了所有的人：两年内我们要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我们在同时间赛跑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与自然作斗争方面也有不小的成绩。

我们党的八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决议点燃了六亿五千万人的心。天津六位工人在他们集体创作的一首诗中称之为"激动人心的诗篇"。

我们眼前正在发生惊人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想拿出他的好东西，最好的东西，来装点自己的祖国，以新的成就迎接十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

这种感情当然是苏联朋友们熟悉的。我们走的道路就是你们走过的道路，在飞速前进中，我们时刻感觉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有四十多年生活在旧社会，旧中国。现在我眼前正在创造奇迹。最近十年是我们伟大的国家成长的十年。不久以前我国人民还是一盘散沙，今天他们却像钢铁般团结一致。

我看到，在从前荒凉偏僻的地方建起一座座热闹的城市，在曾经是人迹不到的山区出现新的强大的工业基地。荒地变

成良田。新的铁路干线伸向海边。河水给我们让路，高山向我们低头……

今天的中国就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新的社会制度好比童话中的神奇的桌布，能够创造奇迹。集体的智慧、获得新生的人民的团结能够胜任一切。

> 困难只能在软弱者面前存在，
> 挡不住久经锻炼的士兵！

这是一等残废军人刘渝生写的诗《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是在医院里写下的。他身上到处是伤，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但他的心并没有残废，仍在跳动，那是一颗战士的心，他要他的心继续为祖国服务。刘渝生的诗是由他的战友们在电台朗诵的。

我听到了这首诗和听众的反应。每一个字都感人肺腑，召唤人前进。我感觉自己像是又触到了人民的火热的心。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约十个月前)，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炼钢工人邱财康的讲话录音，是在上海一家医院里录制的。由于高炉发生事故，铁水喷到这位二十九岁的工人师傅身上。邱财康被严重灼伤，生命危在旦夕。很难想象他是怎样忍受疼痛，怎样同死亡作斗争的。

治好这样严重的烧伤几乎不可能。但医生们没有泄气，他们决心挽救病人的生命。报纸公布了邱财康的事迹，全国都在谈论邱财康。

病人需要的一切，立刻送到医院去了。他需要输血，就有

几百个人向医院申请献血。他需要植皮，几天之内就来了八百人，坚持要医院取他们身上的皮。志愿者当中甚至有这家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病人的主治大夫。他第一个报了名，而他早已不年轻了……

在旧社会我曾经住过医院。这十年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啊！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了。我在自己身上就体验到了这一点。只要邱财康的病情一恶化，我就通夜不能成眠。当邱财康经过半年治疗终于全愈的时候，我就像自己家里人病好了一样高兴。

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感情，我对人的态度在随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在新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变得多么亲密．我甚至要说是亲密无间！

究竟是什么把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不消说，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节这几天，我国的观众将从银幕上看到根据我刚才讲的邱财康恢复健康的故事拍摄的新影片，片名是《春满人间》。用这个题材还写了一部话剧叫《共产主义的凯歌》。

十年前我们还不能制造今天出口的许多精美的商品，那个时候我国一年才生产十六万吨钢，而今年预计将生产一千二百万吨钢。哪一个西方国家能够梦想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不必在这里列举数字，虽然这些数字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枯燥。它们像真正的音乐，像满怀激情的诗人的诗句一样激动人心。苏联朋友们已经为我们高兴过了。他们像我们一样赞美这些数字，因为从这些数字中他们看到了苏联专家们的功劳，看到

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友情。

半年来，我跑了许多地方。我参观过几个人民公社，到过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在工地上，我见到许多从全国各地来的工人。有的来自东北，他们参加过功率强大的小丰满水电站工程；有的不久前还在官厅水库工地上，许多人亲手筑起狮子滩拦河坝并以此自豪。再过几个月，他们又要转到别的工地上去。

社会的风气在变，国家的面貌在变，人民的精神在变。每天都有崭新的新人出现，哪里都有，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几十个，而是成千上万。人们每天都在创造他们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奇迹。他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他们在和时间赛跑。他们打的粮食越来越多。他们要在工业战线上实现更大的跃进。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得新中国人民在第一个十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我们对明天充满信心。我们的一腔最热烈、最美好、最深沉的感情化作一支歌冲了出来：

"美丽的土地！中国，我的祖国！愿你更加美丽，愿你永远年轻，无限美好。让我紧紧地贴在你的心上，永远和你一起飞速前进！"

上海

为了子孙后代*

只要一提起笔来，望着稿纸，我的脑海里就呈现出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上那红旗的海洋。我又看见无数张脸和挥舞的手臂，听到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庄严的声音：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那个我终生难忘的晚上，直到天安门前的人群散了我才回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纸上写下："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正是在这一天，苏联文学、艺术、科学代表团来到北京，他们和我们一起欢庆这个伟大的节日。他们和中国人民，和站在他们周围的观礼台上的、以及像无尽头的洪流一般经过广场的游行队伍中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们一起欢呼，鼓掌，挥手。他们深深懂得我们的感情。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听到了苏联同志们的兄弟的祝贺，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为了庆祝我们的节日，他们带来了衷心的祝愿和精彩的文艺节目。在苏维埃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迈开坚定的步伐，沿着通向社会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陈馥译。

主义的道路前进。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有过不少激动的日子，见过不少惊人的奇迹，流过不少欣喜的眼泪！只是在解放后的今天，我才第一次明白幸福对于人是多么重要，第一次充分体验到自己和祖国血肉相连。

请看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谁没有受过压迫和欺凌？哪一个中国人在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能够昂首阔步，做自己的生活的主人？从前中国人把自己的祖国看作一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她眼看着她的儿女蒙羞受苦，却无力帮助他们。在那些年代，许许多多人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为了寻求真理而饱尝铁窗风味，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些漫长的苦难的年代，想起来就像噩梦一样。不，我们绝没有忘记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穿过痛苦的黑暗走向光明的。

不消说，十年来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变化，会有历史家给以充分的、详尽的描述。也会有人通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去分析我国经济生活的不可抑止的发展。生活在这些变化当中，我们觉得自己仿佛登上了仙山，或者是入了仙境，每走一步都能看到新的宝物和奇景。越往前走，越有信心。我们不仅看到周围不断地在发生变化（越往前走变化越多），而且感到我们自己也在变。我们开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最剧烈最深刻的变化与其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中，不如说发生在人们的心里。

三十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常说，我走遍“人心的荒漠”，找不到一个人肯向我敞开他的心扉。旧社会在每

一个人的四周筑起无形的高墙，好像世上的人彼此毫不相干。人人都只为自己活着。

现在呢，每一天，每一分钟我都看到最密切的心灵的交往，接触到新的情感和新的温暖。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年比一年深地感觉到，我的心脏开始和集体的大心脏同步跳动了。我的心越来越接近六亿五千万人的心，终于溶化在那颗大心脏中了。过去，一些抱有成见的西方人喜欢把中国比作"一盘散沙"。今天六亿五千万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这种豪情壮志确实惊人，证明中华民族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凝结在一起的人民的意志。

人们说："为了让子孙后代幸福，我们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向时间要钢，向大面积要丰产！"在过去，这是吹牛说大话，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超过最大胆的幻想若干倍。我们筑起的海堤上面能跑火车，我们把海岛和大陆连接起来，我们在荒凉的草原上建设现代化的城市，我们使沙漠变成鲜花盛开的绿洲，我们叫千年为害的黄河驯服地为祖国服务。人的双手、人的智慧不停地在运动，都是为了不荒废一寸土地，不虚度一秒钟宝贵的时间。在短短的十年间，钢铁和粮食的产量猛增。"向时间要钢，向大面积要丰产！"是我国人民的豪迈的口号。

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是旧中国的常见现象。今天人们在欢笑，他们干活的时候唱着歌：到处是工厂，日夜冒青烟。

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了无边的幸福。这就是十年来出现的新事物。

只有在新社会，劳动果实才能够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在新社会，人民才能够体验到劳动的欢乐，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事业。在旧中国，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太多了。而在新社会，人们是自愿去劳动，就像过节一样。

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盼望解放，盼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和自己的同胞紧紧站在一起，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现在，充满责任感、认识到自己从事的事业光荣的人们不甘落后！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有无限的信心。紧紧团结成一个集体的人们觉得自己身上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起来就能够胜任一切、哪怕是最艰巨的任务，做出最惊人的事情来。

十年的成就只不过是一桩伟大事业的开端。苏联同志们当然比我们更懂得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走苏联老大哥走过的道路。关于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中国人民和苏联同志们并肩前进，就仿佛每一个人都有两双手、两颗心，他们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也仿佛增加了一倍。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海一样深，像血一样热。今后我们要紧紧拉着老大哥的手，迈开更大的步子，一同走向我们共同的目标——共产主义！子孙后代的幸福就在我们面前！

友　　情*

据《人民中国》日文版编辑部来信，始知今年六月该刊即将迎接创刊十周年，不禁浮想联翩。我是这本杂志的读者，也是撰稿者。十年前它就登过我的文章，但是当时和我的关系没有两年来这么密切。前年，访日归来之后，似乎有某种力量把我吸引到这本杂志来。所谓某种力量，就是日本人民的友情。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文章赞美友情，表达了思念友人的殷切心情。我写这些文章似乎从心底倾吐自己的感情。一拿起笔来，眼前就浮现日本友人亲热的笑容、炽烈的目光。友情——它并非空洞的话语。友情，犹如奇妙的画笔不断地画出动人心弦的画面，又宛如火把照亮我的前程，点燃了我的灵魂。一想到这种友情，顿觉眼前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两国人民紧紧地手挽着手，为共同的目标、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为两国人民和子孙万代的幸福作着不懈的努力。我以激动的心情给一位日本朋友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怀着求友的一片心愿，访问了贵国，得到许多真正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人民中国》(日文版)第六号。柯森耀译。

的友人，实在太高兴了。我感到以心传心的喜悦。你们如同兄弟般地款待了我，我和你们共同度过十分愉快的时光，深受感动。和你们手挽着手唱起友谊之歌《东京——北京》，不由眼睛湿润，双臂有了劲，围着一圈的人们再也不想分开；即使初次相会，也立即互相被吸引住，没有疙瘩，没有隔阂；见一次面就结下生死之交，唱一夜就互相打开了心扉。我走访了许多从没到过的城市，可是在那里见到的人似乎都是老相识。我指的不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面孔酷似。我说的是，在那里素不相识的人总是向我伸出手来，说心里话。……当我想起在那个美丽的春宵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事，便深深地体会到长达二千年的人民的友谊如同大海一般辽阔。沉浸在友谊的海洋越久，我的幸福感就越大，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光辉的壮丽景观！……我们的心和许多朋友的心融合无间，不断地壮大。它燃起友谊之火，为子孙缔造幸福。

我写给日本朋友的信不只这一封，写信的对象也不只一个。第二次访日时，我带回了多少颗日本友人的心呀！半年前，我离开东京时，依依不舍地向许多朋友说：我要把半颗心留在各位身旁。这不是客套话。想到朋友，想到友情，我总觉得自己的心和朋友们的心连结在一起，永不分离，手拉着手前进，给子孙造福。我们常说，这样心连心的人民的友情一定能够创造伟大的成就。如果能够为这样的友情尽一份力量，我们必将和朋友们一起看到友情开花结果。这是我们莫大的

幸福。

我衷心感谢《人民中国》日文版。通过这一本杂志能把我思念朋友的声音和幸福感不断地传给日本朋友，同时能把朋友们诚挚的回音带给我。这本杂志如同一座桥梁，使我们的心接触到许多美丽的心灵。我相信还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感谢这本杂志。因为这本杂志把求友的人们的心越发广泛地连结在一起。

以上所述，仅仅是这本杂志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本杂志为中日两国人民美好的友情所做的事也不只这些。不过，这一点各位读者早有了解，不必多说了。我衷心祝愿《人民中国》结成累累果实，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我和黎烈文起草的。当时《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已经发表，鲁迅、黎烈文、黄源和我都没有签名。我和黎烈文都认为我们也应该发一个宣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样，就由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宣言，第二天见面时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鲁迅当时在病中，黎烈文带着两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在鲁迅家中把它们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名。因此，正式发表的《宣言》很可能经过鲁迅的修改，但鲁迅到底怎样修改的，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记得《宣言》中“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等语是我草稿中的原话，我在别的文章中也这样说过。① 《宣言》经鲁迅签名后，就抄写了几份，以《作家》、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时题为《访问五位同志的谈话记录》，本篇为其中的第一部分。访问者为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篇末有记录者“附注”：“此记录经巴金同志本人审定，两条注释为巴金同志所加。”

① 见开明书店出版《新少年》二卷七期别册附录《新少年读本》（一九三六）第一篇。

《译文》等杂志社的名义分头去征求签名，胡风也去找他熟识的人签名。然后在《作家》、《译文》、《文学丛报》等刊物上同时发表。《宣言》发表以后，并没有开展什么活动。

至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鲁迅日记》载："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是上海杂志公司为《译文》复刊请客，由黄源出面邀请，这是当时书店与作者联系的一种方法。那天到会的人不少，鲁迅、萧军、萧红都出席了。但会上没有讨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事，起草这个《宣言》是以后的事，并没有开会讨论，而是黎烈文和我搞的。

后来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是冯雪峰拿来要我签名的，谁起草的我不清楚。

黎烈文在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先担任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与老板意见不合而去职，后来一直在台北大学任教。……我一九四七年去台湾时见过他，他在那里生活并不好。以前有些注释本说他是"反动文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与事实不符。他已在前几年去世了。

孟十还①抗战期间在重庆国民党的一个机关里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曾来信说在一家轮船公司里工作，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原名文化生活社，是吴朗西、丽尼、伍禅等人在一九三五年五、六月份搞起来的，出版"文化生活丛刊"，九月份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丛刊"最初出版的两本书是

① 孟十还：原名孟斯根，改名原因见《杭州文艺》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六〇至六一页黄源的文章。

许天虹（笔名白石）翻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乐》(纪德著)。八月份我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了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回国以前，出版社已通过黄源与鲁迅联系，出版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的童话》。

1978年4月29日。

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

问：你为什么会在一九二七年来法国？根据官方记载你是来攻读经济的。

答：当时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在寻找出路，以求救国；你知道周总理和邓小平就都来过法国半工半读。当时在成都办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办了两班，招收学生考试——我考过一次，失败了。其实我所寻找的可以说是"真理"；为了这个，我自费来到法国，起初当然也是想攻读经济。在巴黎的第一个月，我在法国文化协会学习法文。但没有多久家里无法再寄学费来，我便停止了正式学习法文。跟着我的健康开始恶化，一位医生劝我休息，我就去了Château-Thierry。那里有一所中学，有些中国学生在学习法文。不过正如在巴黎一样，我在那里也是陷于孤独之中。在巴黎光是听到圣母院的钟声就足以惹起这种孤独感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或者是

---

* 本篇原刊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八日巴黎《世界报》，译文（黎海宁译）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二日香港《大公报》。收入一九八三年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巴金论创作》时，该书编者作有如下题注："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七日，巴金在巴黎接待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Pierre Jean Remy)访问，本译稿原文即由雷米记录整理。在收入本书时，译文曾经巴金看过。"

为了表达这种孤独感吧，我第一次提起笔来写小说。圣母院的每一声钟声都响得这么长久——我无法入睡，于是我便写作。所以，可以说因为在法国，我才学会了写小说。

问：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英国或者苏联呢？

答：首先是因为法国较其他国家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当时中国学生可真不少。其次是因为生活费用较低。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法国是很多被放逐者的庇护所，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来到法国生活。

问：那末这些来法国的中国学生之间是否有着明确的政治上的联系？我可以想象这当中有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你与哪种人接触得最多？

答：我接触得多的是中国人。在这些人当中，我记得一位姓吴的好朋友，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被驱逐出境。我法文懂得不多，无法与法国的知识分子交往，但另一方面，我却有许多不是知识分子的法国朋友。

问：在这期间有哪些外国作家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答：俄国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之中，主要是《复活》——我的《家》就受它的影响。但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写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当时罗曼·罗兰只有廿二岁，而托尔斯泰详尽地为他解释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参与人类的联盟。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很大。

至于法国作家，大家都知道莫泊桑和左拉在中国最有名气，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对我来说，就不止于莫泊桑和左拉。我更要提到雨果和卢梭。最近一位法文编辑送了一些 Pleiade

版的卢梭和左拉的著作给我，我非常高兴……

问：普鲁斯特呢？他就算对你没有影响，起码也影响了与你同期的一些作家吧？

答：没有。普鲁斯特差不多一点影响也没有。盛澄华（原文 Sun Sse Hua有误——《大公报》编者）对纪德的理解倒是很深的，他也曾经想翻译普鲁斯特，但结果没有完成。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追寻失去的日子》。总的来说，要是拿中国跟日本比较，我们翻译的外国作品实在太少了。

问：你与西方所熟悉的中国伟大作家，尤其是共产主义作家的关系怎样？

答：在三十年代，我与很多共产主义作家的关系密切，不过我却是独立地进行创作活动的。我特别推崇鲁迅、老舍和茅盾。我极希望能追随鲁迅的道路；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问：除了茅盾和鲁迅，你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中国作家是应该介绍到西方来的？

答：李劼人（原文 Li Dien有误——《大公报》编者）的作品。他是写实主义者，描写四川的生活。还有沙汀（Sha Din），他和我同年，但他最近身体不好。在较年轻的一辈当中，一定要提到《青春之歌》的杨沫及《红旗谱》的梁斌。（原文误作Liang Ding，书的译名亦有误——《大公报》编者）

问：现在中国的作家怎样生活？可以完全依靠作者版税吗？

答：还不可以。今天的中国只有极少数的作家是可以靠版税生活的。在旧中国也只有三个可以这样做：鲁迅、茅盾和我，所有其他作家都非得干其他别的工作不可。拿我来说，我至今仍靠版税维持生活，因为我出版的书多——我写了好几十本书！不过今天的版税比从前少得多，作家拿国家的薪金也无所谓版税不版税了；薪金足够维持开支的。这个制度导致这么个情况：比方说在日本，一个作家一年内最少要出一本书才能维持生活，可是在中国，你大可十年内什么也不写，却仍然有饭吃。听说在香港，一天要写八千字才能过得舒舒服服！可以看到，每个地方的情形都非常不同。

问：我现在非常希望从字面的准确意义上，来跟你谈谈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否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有意义的、限于文化范畴内的革命，能导致文艺的民主化呢？因为解放后的中国的文艺圈里仍然潜伏着一些特权分子啊。

答：只有将来的人可以替文化大革命下结论。现在来说，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林彪、"四人帮"先后起了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他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问：中国的传统文艺如京剧，是否有可能脱离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复苏？

答：除去了腐败的内容和残旧的形式之后，这些文艺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但它们先得为人民所喜爱。《家》再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后记》，解释《家》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在革命的进行中，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当我想在香港

《大公报》再次刊登这篇《后记》时，我发现这是不真实的，我的书没有过时，而且并未完成它的使命。它应该在革命中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因为封建制度——至少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在中国仍然存在。如果“四人帮”在中国人民的生活里能成为如此重要、如此可怕的角色，那么我作为一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设法也起一点作用。

问：你是如何度过这段被压抑的日子的？听说他们拿了你书房的钥匙，不让你看书……

答：虽然他们没有殴打我，但我受了不少精神上的折磨。他们逼我承认一些罪状，要我责备自己。最初几次我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承认了错误；也许我是受了“左”的影响。坦白地说，我那时真的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很坏的。我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我住在一间有花园的大房子里，我对自己说，我享受着太多的特权——而我是有诚意的。结果他们封了我银行的全部存款，每个月只让我取一笔仅仅够生活的费用。跟着他们送我下乡达两年半，我在乡下种菜！不过在这期间，我的身体从来也没这样好过。我的妻子才是这种种迫害的牺牲者，她因为缺乏适当的治疗而死于癌症，只因为我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问：你的作品，或者应该说有法译本的三部作品里的一个重要主题，为什么是女性在旧中国社会里所受的苦难，以及她们寻求解放的斗争？《家》和《寒夜》里就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文学里几个最美好的受苦和斗争女性的形象。

答：在这方面有两个因素对我影响最大。第一是中国的

传统小说，在这些巨著里，你可以看到女英雄们的非凡业绩。第二是俄国的小说，这里面女性常是积极和革命的人物。

问：《家》里被压迫的女性，不是因为缺乏照顾而死，就是自杀，而《寒夜》里的女主角却决意自立，反抗环境而放弃了一段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为什么？

答：《寒夜》里的男主角是个完全绝望了的人，他承认他的妻子找到了一种希望，虽然这也就表示她要离开他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反面的人物。《寒夜》写的是蒋介石政权的压迫，而唯一的出路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男主角的忍耐也只可到此为止——就是在胜利的时刻他就死了。《寒夜》里的男性和女性处于同等的地位：两人都是时代和制度的牺牲品，但丈夫却从来没把妻子当成物品一样看待。

问：对你说来是否一切写作都是政治行动？

答：在我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碰到很多矛盾。我的小说，特别是《家》表现了我个人的矛盾。我的每本书都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期写作时的感情。

问：你最近的创作情况如何？在写些什么？

答：最近大家给我很多荣誉，我成了大忙人了。但我最希望的是完成正在写的两部小说及赫尔岑的翻译。我还要写五册《随想录》。至于我的两部小说，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

问：你的所有作品——我看过的所有作品——毕竟不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吗？

答：对，我作品大部分都写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中国知

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写得成功，当我写别的类型如矿工时，我就不一定有这种信心。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我要在此加上一句，在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

答香港董玉问*

问：巴金先生，见到你很高兴，香港的读者对你是非常熟悉、非常关心的，你的作品永远是那样感人。

答：这两年，我为香港《文汇报》写过创作回忆录，也给《大公报》写了十几篇《随想录》，谈一些个人的想法看法。其中有一篇，纪念我的爱人萧珊，有八九千字。有一些话要讲，讲出来就是，不一定面面俱到。准备继续写下去，讲我心里的话，讲我现在的看法。总之是讲自己的话。

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问：听说你最近正从事赫尔岑《回忆录》的翻译，工作量一定相当大吧？

答：《往事与随想》的中译本大约有一百五十余万字，我想分五册出版，五年内把它搞完。现在第一册已经译完，将要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三月香港《开卷》第二卷第八期。发表时题为《访问巴金》。收入一九八三年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巴金论创作》时，该书编者作有如下题注："一九七九年春，巴金在香港接待董玉访问，本文即由董玉记录整理。"

出版，第二册正在译述中。

这部回忆录的前两册（共四卷）描写的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情况，我越译，越觉得"四人帮"同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一世相似。我在书的《后记》里说了两点：一点是说，从书中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某些人的嘴脸。书里有个皇太子到一个边远的省份视察，他在一个招待会上吃了个桃子，桃核扔在窗台上，回身就走了。参加招待会的一个官员看见，赶紧把桃核捡起包好，同时又去买了五个桃子，吃掉，拿出桃核包在一起。六个桃核分送到了社交界太太小姐们的手里，并且对每个人都说："这是皇太子吃剩下的桃核。"于是，这六个桃核都被当作宝贝一样供奉起来。这个例子不是很深刻吗？那个时候，江青送这送那，她喜欢的也不就是这一套？

还有一点，是说朋友们对我的翻译工作的关心和无私帮助。赫尔岑的这部著作议论很多，典故也很多。还要加大量注释，搞起来是比较费劲的。但是当读者知道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很多人来信支持，表示愿意给我帮助，有的愿意当助手，有的愿意为我校对，还有一位厦门的教授，把他译好的四卷译稿全部寄来给我参考。还有人主动地给我校对全部译文。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今天的新社会！过去我搞翻译，都是一个人单干，现在大家都支持、关心这个事情，能得到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的鼓励，这就是所谓集体的事业。它将促使我更加奋发、更加努力地工作。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这部著作的？

答：一九三六年，在鲁迅先生创办的《译文》月刊复刊的时候，我曾选译过两则。这两则回忆是叙述作者的母亲遇难和妻子病死的一部分。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读过这部分原稿，他感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

我一九二八年初在法国买来这本书的英文译本。那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赫尔岑的文章很有感情，他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几次翻译它，都有这样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这次，从一九七四年九月起我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是把我的笔再练练。

问：在"四人帮"垮台以前那样困难的日子里，你能下决心坚持翻译全书，是什么力量促使的呢？

答：我一直就想有机会翻完这部书。一九三六年我曾告诉鲁迅先生，我要全译赫尔岑的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倘使我能够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实现这个诺言，这将是我莫大的幸福。另一方面，我也是不甘心。"四人帮"要使我"自我消亡"，我不甘心。我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这一生的最后一件工作。

写作长篇小说的新计划

问：多年没有读到先生新的长篇小说了，大家都在盼着，你有此考虑吗？

答：已经开始在写长篇，写知识分子在这十几年的遭遇，从侧面写，从个人的经历写。不一定有把握写好。但我有生活，有感受，也有感情。别的写不了，至少这个是可以写的。我要在八十岁搁笔以前写一至两部长篇小说，因为这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写长篇。

另外，还答应一家出版社编一本关于回忆失去的故友的散文集，已写了几篇。

这些，两个长篇，一些短篇，随想录，回忆录，我准备跟赫尔岑回忆录的翻译同时进行。今年我已经七十五岁了，八十岁以后就搞不了了。哈哈……

问：自传呢？准备写吗？

答：自传不写了，记忆不一定准确，年代太久了。

问：不，像你这样的老作家，辛勤写作了五十几年，应该留下一部自传才好。

答：到八十岁以后再说吧，这几年我还是要抓紧搞搞创作。

问：现在你每天能有多少时间写作，习惯于什么时候写？

答：有时间就写，抽空写。我这里不断有人来，自己很难掌握时间。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不太好，常常不约时间，突然

到人家里来，有时就感到为难，刚拿起笔，又得放下。茅盾同志把这个问题在《人民日报》上提了出来，这样倒好，希望有所改变。

问：多是约稿的吧？

答：找我做这样做那样，帮忙讲话，转信转稿，还有采访，外调，最后就是抢救。我们这种人，年龄大了，过几年就要死掉，所以有些东西要抢救。仿佛我还有不少材料，也要抢救，哈哈……。有些事是很可惜的，像冯雪峰同志，鲁迅的很多事他知道，却来不及写下来。茅盾同志也有很多东西应当留下来。我记得抗战前听他谈过他有一个大的长篇计划，准备从戊戌政变写到抗战以前，提纲就有几万字。可惜他后来太忙，只写了一本《霜叶红似二月花》，现在他八十三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我们这些老的，自己也愿意多写。有时间就搞，抽空搞就是了，我还是习惯这样。

畅谈创作的经验

问：你的十篇《谈创作》，沟通了作者和读者的心，使很多人从中得到教益。今天，能不能再请你谈谈这个创作问题，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怎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答：作家写东西一定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我说过，我不过是一个加工工人，用生活的原料来进行了加工的工作。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

动人，没有从生活里来的原料，我写不出任何动人的东西！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是因为他有了那样一段生活经历，才可能写出这部伟大的作品。

当然，说作家要写他最熟悉的东西，也包含着不熟悉的可以去熟悉这样一个方面。但是去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应该由作家自己去选择基地，不是领导上需要什么题材就派你上哪儿。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个适应的问题，有些人对这方面适应，对那方面不适应，另外一些人对那方面适应，对这方面可能就不适应。不适应的生活，再好也熟悉不了。这是跟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素质、思想方法、知识面都有关系的。如我去部队，花一年时间，熟悉一点生活，勉强写出点东西来，去工厂不搞十年以上，恐怕就写不出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文艺作品跟其他生产不同，别的东西做得不好可以降价卖出去，作品写得不好就根本不能拿出去了。所以，这个生活要由作家自己选择，不能说这里需要写就把作家放在这里，写不出来没有办法。

不能把文艺和宣传混为一谈

我还认为，文艺应该起两个作用：潜移默化、塑造人们灵魂的作用和宣传的作用，而主要的应该是前者。作品中应该有一些带永久性、长期性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作品只是作为宣传工具，完全为当前政治中心服务，那么过一个时期它就会过时，以后就不会受到人们注意。作为宣传，就必须解释政

策、说明政策，等政策一改变，就又变成违背政策的东西，不能存在了。要是我们文艺作品没有较长的生命，那实在是不可想象。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定不能狭隘理解成为为当前一定的政治中心服务，起宣传作用的作品只能是小部分，大部分的、主要的还是要起教育的、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属于塑造灵魂的东西。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一年的讲话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我自己就有感受，我去过两次越南，战争轰炸时期我还到过贤良桥边，写过两本书，一本印出来了，一本还来不及发表出书，现在都成了废品。如果尽写这些废品，我算什么作家呢？所以我觉得，培养作家、使用作家不能光限制在为当前政治中心服务。要宣传，我们有报纸、有广播、有别的手段嘛！作家可以两方面都写，属于宣传的可以写，别的也可以写。我们看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现在还抢着看。它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不是解释当时政策的，它是真实的东西，无形中也在影响、教育别人，使人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这些东西也需要。所以我们也应该提倡，要努力产生一些新的作品来代替这些作品，培养人的更高尚的感情。我们要把这十几年，乃至解放后三十年来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使我们知道怎样前进。

文艺需要创新和民主

在一次学习周总理讲话的座谈会上，我们谈到一篇文章，

就是瞿白音的《创新独白》。这是那次总理讲话后他根据大家的学习讨论写成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他受到多次批判，还给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实际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文艺到底要不要创新？创新是不是就是反革命？我就说，如果都不动脑筋，长官讲什么，我也跟着讲什么，这对我们的文艺发展会有利吗？这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每个人都有对生活的不同感受和对社会的不同贡献，你参加这个集体，就要带点东西来，当然东西有好坏，要经过检验，但你总得带点新东西，总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抄一抄，加进来，自己就算是个作家了。这总不大好吧。当然，让他创新总要允许他犯点错误，但他要创新总是好的，总想着我们要前进一步。我们现代化也是要创新的，提高一步不行，还要再提高，技术革新也就是创新。文艺也是必须创新，必须不断进步。

还有，我们需要艺术的民主。对文艺不能管得太紧，不能管得太死。《上海文艺》有篇文章，谈艺术与民主，谈对文艺创作不应树立样板，这是对的。我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艺术上的绝对权威。事实就是这样，哪个人敢说他艺术上是绝对权威？我们的文艺，重要的还是创新，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使我们的文艺园地繁荣起来。

还有一个题材问题，现在的题材还是单调，而且题材先行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解决。听说电影厂拍片子，往往先定一个题材的比例，现代题材的多少，历史题材的多少，知识分子题材的多少，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先定了比例，有的好作品就难办了。尤其是把文艺和宣传混在一起，就更难了。我们常

常把读者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生怕他们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给加了各种限制。《望乡》的演出就是这样，就怕青年知道妓院。其实我们过去生活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但那时我们青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新时代中国的人民和青年，他们应该懂得更多的东西，心胸眼界应该非常宽阔，那就应该让他们了解一切，告诉他们一切，而不是什么都不给知道。作品的题材丰富了，风格形式也就能够多样化，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就会更丰富、更美好。我们的青年是会鉴别美与丑、香花与毒草的。

这次《家》再版，我在后记中说《家》所提出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后来我就觉得话说错了。在我们国家，封建的余毒还深得很，农村里还有不自由婚姻，甚至城市还有买卖婚姻，其他方面封建的东西也还很严重。我们要搞四化，封建的余毒就拖后腿，这个余毒不铲除，现代化就实现不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就要思想现代化，封建的东西必须改变，官僚主义等坏作风要去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一个法制，一个民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九亿人民团结努力，是可以实现四化，实现文艺发展与繁荣的。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

问：关于双百方针你能不能再谈些什么，比如说怎样才能真正贯彻？

答：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我看必须做到两条：作家要有

勇气，文艺要有法制。

双百方针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后并没有认真贯彻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愿意，一种是不习惯。我总以为创作应该有些自己独创的东西，同样为祖国服务，每个人都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如果都是同一种语言，一个人写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提出要繁荣发展文艺，就必须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要鼓励作家从各个角度来歌颂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促使历史的发展。但是经过"四人帮"十几年的愚民政策、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内伤是很深重的。尤其你搞创新，要走新路，从新的角度来表现你的思想感情，为社会主义服务，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可能犯错误。所以还有种种顾虑。一九六一年周恩来总理号召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敢于讲话，不要怕棍子帽子，我感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在一九六二年的上海二次文代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说，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有勇气，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过这十几年，我越来越感到这勇气的重要，因为文艺工作者要代表人民说话。但我也更体会到，要真正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文艺界的百花齐放，不仅是风格流派方面的问题，应当说只要不是违反宪法的，都应该让它存在，让它发展，凡是有一点长处的都应这样。当然你没一点长处，瞎说一通，别人也有权不印，不发表你的作品。总而言之，要求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中外的一些巨著、古典作

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缺点。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提倡作家们拿出勇气，敢于文责自负；另一方面也要实行依法办事。这样，双百方针的真正贯彻就有了保障，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了希望。

另外，文艺创作还需要交流和探讨，要打开眼界，要给大家创造一些文学交流、参观调查的机会和条件，先在国内，有条件的话再在国外，眼界要打开，这样知识丰富、生活丰富，就会有更多的好作品出现。

希望在青年身上

问：现在青年作家的状况如何？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答：我们出了一批很好的青年作家，我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说“希望在青年身上”，青年确实是最富有革命精神、最有希望的。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作品，接触了一些新的问题，人民关心的问题，不是作家写出来的，是一些年轻的初学者写出来的，如《伤痕》、《于无声处》等。这些作品，作家不一定写得出来，不是不能写，不是没有感受，主要是作家还是有框框，有束缚。青年不管这些，他没有框框、顾虑，没有什么坛坛罐罐，他不怕。生活里有感受，觉得有问题应该反映出来让大家讨论解决，他就写出来，青年就是有这个朝气。回想起来，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我开始写文章也并不是想当作家，就是在生活中看出很多东西，我不平，要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提出来让大家帮助解决，我也可通过写作实践

提高一点。在最初的二十年，我写的作品是最多的。现在我们青年中有很多东西，发表了一部分，许多还在写，前途是很乐观的。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我们写作的情况很不相同。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很艰苦，个人奋斗，社会歧视。而现在是各方关心，群众支持。比如《伤痕》发表，工人、干部、战士，各方的人都写信支持，都关心这个文艺，把它作为集体的共同事业。这跟旧社会很不相同，旧社会有些朋友有共鸣，但像这样多的人关心这个事业，是不可能有的。当然，要写出优秀的人民喜爱的作品，主要靠自己刻苦锻炼，辛勤劳动，捷径是没有的。

问：记得你五十年代写的《谈创作》中就特别强调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

答：是啊，这是很重要的。初学写作的青年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想当作家的，写点东西出来，东想办法西想办法，东投稿西投稿；还有一种是他有感受，有话要讲，要写东西，写出来之后先在朋友中间传阅，或在学校墙报上发表，慢慢才正式发表。这样的青年能刻苦钻研，也能辛勤劳动，这些人是有希望的。主要一点就是怕社会上有些旧的风气，捧一个人就一步登天，这不好。对他们不仅要表扬，而且要给以机会，他们还需要锻炼，不能脱离生活。表扬过分的话，他就容易忘乎所以，因为他年轻，经验不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作家，既写过好作品，也写过不成功的作品，不会所有的作品都是好的。我写的作品也有差的，有的很蹩脚。不经过刻苦钻研，不经过

辛勤劳动，任何作家都是难以写出好作品的。尤其是青年作者，表扬过多，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出来一个作品大家就抢，没等仔细琢磨，马马虎虎写出来就拿出去发表，这样瞎捧，就会把人捧坏了。你爱他实际是毁了他。因为要是他投稿前多看两遍，多想想多改改，这对他会好得多。抢稿子，给地位，开会多，应酬多，对他们写作没有什么好处。应该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发挥他们的才能，鼓励他们走上政治上鲜明、艺术上更加完美的道路。文艺界的希望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相信他们在五年十年之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寄语海外读者

问：对海外读者，你能讲些什么吗？有什么希望？

答：我是一九二七年二十三岁时到法国留学的。航行途中先到西贡。在街上走走玩玩，不熟悉路，就到一个中国公司去问，主人没有认真回答，我们就出来了，走了几步他又追了出来，说："起初以为你们是日本人，后来看是中国人，我应该给你们好好指路。"非常亲热。以后我们又乘火车到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去玩，在车上遇到一个华侨教师，他热情地主动陪我们玩了整整三天。后来到新加坡，天气热得异常，我想买条裤子，我们在街上走着讲着，就有一个中国人过来，不但带我们去逛街，还帮助买了裤子。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个时候，我们祖国地位低，华侨在外面受人欺侮，遭人歧视，称作海外孤儿，见到祖国来的亲人真是分

外亲切。前年，和几个朋友谈起这些，还很动感情。那时，我们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解放以后情况不同了，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华侨也有了强大的靠山和精神支柱，他们更加心向祖国，关心祖国的发展，希望祖国更加强大。我相信，我们不会辜负海外同胞的嘱望，总结了经验，扫除了障碍，人民将更加奋发。当然，也十分希望海外同胞都来关心和支持祖国的建设，使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更加美好。

今年中美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一九四七年我去过一趟台湾，住了一个月，印象很深，我很怀念那里。台湾有不少人是从上海去的，现在我还有好些朋友在台湾，多年没有见到了，时常想念他们。也想象得到，从上海去台湾的人也会很想念家乡，他们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在上海，一定也想回来看看。我希望他们早日回来看看，尽早促成祖国统一。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希望和朋友们多通通信，交流情况，探讨创作上的问题。这个事情的实现看来也快了。邓副主席说希望尽快解决，这也是人民的愿望，我是很乐观的。

答谭兴国问*

……………

一　巴金一开始就主动谈起他今后的打算以及关于传记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他说：

我今后打算，至少可以再写五年。这五年中，写五本"随想录"，一本"创作谈"，一本小说，没有功夫考虑立传的问题。我不想别人替我作传。一个作家主要靠拿出作品，不是靠人吹捧出来的。去年有所大学要出一本作家自传。我写不出来。至于有的同志想写评论，主要靠看我的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什么作用。

书，① 我有一个意见。我在香港《大公报》一则《随想录》中谈过这个问题。你和有的同志都说我对所批判的人有点同情。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说实话，

---

* 本篇摘自一九八三年三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谭兴国著《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后记》。文末原有著者"附记"："这个《后记》是一九八〇年五月写的。巴金的谈话，根据我当时的笔记和后来的追忆整理，经巴金看过，并作了些改动。"

① 指《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初稿。

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唯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家》中冯乐山这种人，我不是批判，而是无情地攻击、鞭打。

二　问：请您谈谈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创办《警群》的情况。

答：《半月》被警厅查封以后，成都聚兴诚银行有几个人想办刊物，他们自己办不成，找我们去帮忙。当时我们也想利用他们一下，吴先忧、张拾遗、我，参加进去。第一期我们把《半月》没发出的文章用上去，文章是激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姓闵的说，太激烈了。他们害怕了。因此只办了一期。我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的进了学校，正好碰上那位曾经争吵过的姓闵的学监，就是指的他。

三　问：请谈谈到上海求学和留学法国的情况。

答：离家去上海读书，几弟兄各有各的想法。大哥想复兴家业，因此三哥一提出到上海上学，他也同意。他希望我进工科。到上海后，因为我没有中学文凭，只好和三哥一起投考南洋中学。三哥考入三年级。我入二年级。如果读到毕业就要五年，太久了。因此只念了半年书，经一个朋友介绍就转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上课，半年后，我和三哥一同升入高中三年级。一年后毕业，我去投考北京大学，发现有肺病，没考就回上海休养。这时家里来信，说家中有困难，要我回去。我不愿，留在上海一边治病休养，一边搞点翻译。

为什么去法国？当时几个朋友已经先去，比如吴克刚，写

信来约，还有几个从法国回来，谈起那边情况，就打算去了。

到法国后，首先要读法文，才能进学校。读了一个月，家里没寄钱来，上不了学，身体又不好。医生劝我休息，我就离开巴黎到法国中部小城沙多-吉里去了。住在一所中学里，补习法语。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就回来了。

四 问：短篇小说《我的眼泪》写到在巴黎，从报纸上知道某处有许多人像猪一样被人屠杀，是否有所指？和国内"四·一二"大屠杀有无关系？

答：是就整个而言，也包括了国内的大屠杀。我那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是爱国的。我受《夜未央》、《告少年》影响。这些书在当时鼓励人参加社会革命，不论做医生，做科学家，都要革命，才有出路。

五 问：您在《谈〈灭亡〉》等文章中都谈到"巴金"这个笔名的由来，为什么这次替我校正《年表》删去"首次使用"的"首次"二字？

答：我以前谈过，第一次用这个名字在沙多-吉里，写完《灭亡》之后。巴，是纪念一个在法国自杀的留学生巴恩波；金，是一位学哲学的朋友看到桌上我刚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他说就用这个"金"字。后来回到巴黎住了一个多月，胡愈之编《东方杂志》，叫我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论托尔斯泰》，我翻译后用"巴金"的笔名。这篇文章用这个名字在后，发表在《灭亡》前。

六 问：三十年代您和左翼作家的关系怎样？

答：从一九三四年起，我和鲁迅、茅盾认识，和文化界许

多人认识、交往，都是朋友关系。三十年代初期，我不出来活动，写的文章都通过开明书店的索非替我交稿。

三十年代后期，我参加了一些文艺界活动。关于"两个宣言"问题，我在《鲁迅研究资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了。

七 关于几部作品。

问：您多次说特别喜欢《爱情的三部曲》，为什么？

答：那是我写"总序"时的看法。主要是里面写了些朋友，人物有影子。有的只看到好的地方，当然理想化的地方也有，怀念一个人嘛。

问：《春天里的秋天》写的那个疯了的女孩和短篇《光明》中那个给作家张望写信的女孩是否同一个人？

答：是两回事。《春天里的秋天》我也写文章说了。《光明》中女青年给作家的信可能是有的，也许我只是从总的方面看，存在着那样的问题。

问：您写《我的呼号》、《灵魂的呼号》时，看来心里很痛苦，以致想搁笔，是什么原因？

答：我记得，当时有些意见，我对别人的批评认为人家不了解我，创作上很痛苦。我想让人了解，因此我总爱在作品前后写序，写后记。我一生想革命，但艺术又甩不掉，矛盾，说放笔，又忍不住提起笔来。

问：一九三四年您写《知识阶级》对大学教授颇有微辞，背景是什么？

答：当时叫知识分子做知识阶级。我在北京看到有些"京派教授"，以高等华人自居，生活过得很好，写文章刺了一下；

抗战后，看到教授生活苦得不得了，又同情了。

问：短篇小说《星》的背景怎样？

答：我从前谈过，《星》里面写过一个土匪汪国刚，那是高维国。他曾占过那个古城，后来被民团赶了出来，以后一直驻扎城外，终于被陈国辉打败捕杀了。我在这篇作品中主要写一个人脱离革命的矛盾，想参加革命，没有找到路，又不参加，这也是我自己的苦闷。

问：《旅途随笔》后记中说是为教育界朋友留下的纪念，这些朋友是什么样人？您后来好像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答：我写了一个广东朋友姓陈（按：原作A），我讲话当地人听不懂，他替我翻译，把"水流"译成"水牛"。他们当时也追求社会变动。我把他想得很完美，希望很大，幻想多。我把人想得太好，也许有些片面。

八　问：请您谈一下《文学季刊》终刊的原因和《文学丛刊》筹办的经过。

答：《文学季刊》终刊原因不清楚，可能是生活书店有两个刊物（按：另一个是《文学》）。要停刊的那一期（第二卷第四期），靳以母亲病了，他回天津，由我写《终刊辞》。

"文学丛刊"的筹办，先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我从上海到北平，第二年和靳以一起计划编印"文学丛书"，叫"水星文学丛书"，初步计划十二种，艾芜的《南行记》就是那时定的。但是当时书籍、杂志销路不好，《水星》停刊，丛书也没出成。直到一九三五年文化生活社办起来，我建议文化生活社出版这套书，托靳以找原来的书店交涉，把一部分稿子接过来，又约鲁

迅、茅盾写稿，第一集十六种就在一九三五年底出版了。

九　问：您一九三四年去日本的打算怎样？

答：我在《关于〈长生塔〉》中谈过这个问题。多年来想学日文。曹禺他们从日本旅行回来谈起那里的印象，我就想去。我和吴朗西谈起，他写信介绍一个日本友人（按：横滨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可以住他那里，费用不高。当时从上海到横滨很方便。我记得到横滨时武田夫妇带着两个女儿，打着“欢迎黎德瑞先生”的小旗到码头接我。住在他家，他每天念经，我受不了。后来到东京，被关了一晚上，不久就回国了。那时化名黎德瑞，是避免引起麻烦。“黎”与李相近，德瑞是借用了北京时听陆孝曾讲的一个铁路职工伍德瑞的名字。

十　问：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来往怎样？

答：抗战期间认识周总理，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接见一次。

十一　问：您对无政府主义怎么认识？

答：这个问题我搞不清楚，解释也没有必要。“五四”以前，中国有各种思潮，我最先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那时给好多人写了信，也给陈独秀写过信。给《半月》写信他们就约去谈，以后读了几本小册子，很受影响。其实如果真正是无政府主义，就不写小说了。真正革命就要去搞了。我思想上有矛盾，既感到有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又丢不掉艺术。我是爱国的。

十二　问：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您写作很少，是什么原因？

答：一九四七年本来打算写一本小说，但我担任文化生

活出版社工作，看稿，看校样，没时间写作。我看校样也不行，比如校萧乾的《人生采访》，有人就说："书倒很好，错字不少。"我把时间花到工作上去了。

解放后，想写新人新事，没充分时间深入生活，不熟悉写不好，要写自己熟悉的才行，但要熟悉就要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这方面安排总有点不妥当，杂七杂八的事很多。

还有些问题，好些老作家解放后写的不如解放前好，跟形势，越跟得紧淘汰得越快，写了的也淘汰了。老舍写得多，还是《茶馆》最好。茹志鹃被批判，说她只写"家务事、儿女情"。为什么只能写英雄，不能写普通人民？

作家要有版权，著作权。现在不够尊重作家。我在《随想录》中谈到冯雪峰，雪峰应该有东西留下，但把他在文化革命中写的交代材料作为遗著发表，这怎么行？作家有权过问，不能高兴发就发，高兴出就出，责任得负，权利没有。那样创作繁荣不了。国家应该保护人民的权利，对国外，也要保护作家的版权。

十三　问：您过去曾说，打算在《家》、《春》、《秋》后写一本《群》，现在有无这个计划？

答：《群》我在一九三五年写了两三页，后来就丢开了。手稿送到北京去了。现在写就困难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十四　关于《巴金文集》的一些问题。

问：《文集》是何时动手编的？

答：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适夷通知我。我

早也想在六十岁的时候整理一通，印一点送朋友，从这时起就开始编。

问：有无重要的遗漏？

答：编的时候想尽量保存，没有重要遗漏，过去的版本都收。

问：编集时主要作了些什么修改？

答：改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看稿，每次都要改，觉得不好就改；另一种是当时为了宣传点什么，现在看不行了，也改。比如在日本写的《点滴》，原先有一篇《几段不恭敬的话》，把日本文学骂得一钱不值，因为当时在日本，看见日本文艺界有些人把中国骂得狗血淋头，我也就抓住少数人、个别人的问题回骂过去。解放后，重读这篇文章，自己也看不下去，就删去了。又比如《旅途随笔》中主张把线装书烧掉，说它妨碍今天的前进，也删了。《火》第三部，原先写朱素贞死了，现在改成她去了延安。其他差不多都是文字上的修改。殊不知文化革命中，有人说你改也不对，不改也不对，真没办法。

问：你表示《文集》不再版，有的作品不好，指什么？

答：我说不再版，因为其中有的作品写得不好。《火》写得差，为了宣传抗战。我只想印几本像《家》、《春》、《秋》、《寒夜》、《憩园》……另外编几本短篇小说集，留七、八个中篇。《旅途通讯》有两本是我的生活纪录，作为作品不行。

十五　最后，巴金谈起文学作品给人指出出路的问题。他说：

文学作品只能给人指出方向，不能教育人具体作法。路，

要靠读者自己去找。作品只能启发、帮助他一下，他看了，对环境不满意，要走出家去，找自己的路。至于第二步怎么走，我没有说，作品也用不着这样去回答，不能要求每篇作品都指出具体的路。我常常自责没有给读者指明出路，是从自己要求更高一点来说的。

三个小时的谈话过去了，我心里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也似乎还有些疑问，但我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我不能不歉然告别。我握着他那写过、译过上千万字作品的手，心中暗暗地祝福道：千万保重！

与香港李黎的谈话*（节选）

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地点是初秋的上海，巴金的家。

我正在写长篇

李：听说您现在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巴：我在写个长篇，暂时定名《一双美丽的眼睛》，也许会改也说不定。

李：从这篇名推测，大概是写萧珊的。

巴：也不一定，我想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遭遇。

反封建的任务还多得很

李：也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二月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二辑，发表时题为《巴金先生谈过去、现在、将来》。现据一九八三年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巴金论创作》收入本卷。

巴：抗战期间我出过《家庭的戏剧》中间的一部分，后来六几年又重新改过、又出过。但这一次是预备出全集。共有五本，第一本最近就要出版了。这部书我一九二八年在法国买到英译本，读了很受影响；他的笔锋带感情，他的写法我很喜欢，所以一直想翻。我一直没时间。这一次"靠边"的时候，我先把《处女地》修改重译一遍，去年出版了，以后就搞这工作，一共大约一百五十万字。我在靠边的时候读这部书有更多感触，"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很像尼古拉一世搞的。我从《第二次解放》后写的第一封信到现在，思想也有很多变化。《家》重版我写了一篇后记，后来看法又不同了。我当时觉得小说的历史任务已完成了，但后来在《爝火集》的序上我说：现在感觉反封建的任务还多得很，还远远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里还有很多封建的东西，那时我确实一点也感觉不到。

李：中国有不少现存的问题正是封建的问题，可是有些制度一般人没有想到它的封建性。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现在正在推行的顶替制度：孩子可以顶替退休的父母在原单位工作……

巴：（笑了几声）嗳，这个事情——关于这个办法提出讨论时我也参加了。当时没想到这一点。当时是考虑实际情况，但执行的时候发生很多没想到的问题。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完备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机构；赫尔岑的书就是攻击俄罗斯那时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官僚阶层、公文旅行、时间花在公文里……。四七年我到台湾旅行一次，跟一个朋友谈

起，他说那时日本人比中国还进步一点，不经过公文旅行，电话就解决问题了。我们现在什么事都要静候批示——任何大小事情，时间上都很浪费。这是与现代化冲突的，一定要打破。

我这支笔要对祖国、人民有贡献

李：你早年旅行极多，但写作也始终不断；是什么促使你不断写作的？

巴：我不是艺术家——三十年代我就写文章说我不是艺术家，到现在我在《随想录》里也讲我不是艺术家。要想用我这支笔对我的祖国、人民有贡献，我就是不断地写，看了什么就反映出来。工作就是写作。我过去不是写就是翻译，不是翻译就是编，所以时间很要紧——，我四十多岁才结婚，怕家庭妨碍工作；每年写上八个月，再到处看看朋友啊，住两三个月。我在写的实践中间学习。我最初写小说时还常写别字，后来慢慢学习，慢慢改，慢慢熟了才懂得文章怎么才能写得更好一点。我最初写文章"欧化"得厉害。现在外国有人说我修改自己的文章，是"迎合潮流"。我说我不是，我从最初拿笔时候起就改自己的文章，每印一次就改一次，不断地改，每次发现缺点就改。我说文章又不是考卷，你可以根据我的初版本来评论我的思想变化；但我的作品是要与读者见面的，我愿意以最好的形式出现。所以我说作家有权改他自己的作品。

我还要写八本书

李：你最好的创作作品多半完成在四十多岁之前。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原因？是不是有一类文学作品是要在比较年纪轻的时候创作的？

巴：这倒也不一定。我解放后写的少，因为别的事太多。我如果没有别的事，还是可以写的，虽然不一定写得好——我写作是我要工作，并不是自己想成名，是有话就要说。但有别的工作时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写作是无论如何需要时间的。我今年七十五岁，我预备写到八十岁，这五年功夫我得多做点事，把其他事撇开。过去是想：反正以后有时间，现在是时间不等人哪！我要用这五年时间，抓紧写五本《随想录》、一本回忆录、两本小说，还要翻译赫尔岑的回忆。我说我不是艺术家，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写，我有感情；到今天为止，别的谈不上，但我爱国——我爱我的祖国，爱人民。我感情还很丰富，我可以写很多东西。我的思想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也是个很大的启发；我自己也算经过一次锻炼、一次考验——生死关头的考验。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人经得起生死关头的考验的。我们算是经过了这个。要不要死？很可以一下就死掉，但是没有死。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顾忌，写东西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把我的感情留下来献给人民。

我们从茅盾起，后来都没有写作品，应该好好总结一下

李：三十年代一些伟大的作品，像您的、像茅盾先生的和其他人的，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一到解放之后，你们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了。好像一条线之后就一切都好，只能歌颂了？

巴：〔又笑了几声〕所以我说今年的"文代会"我提议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些年的成绩和缺点。文艺要繁荣，第一是要多，然后是要好。过去有些缺点，过于限制，一定要写工农兵，主人公、英雄人物一定要是工农兵。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我自己的缺点：我想写新人物、写新社会，但我不够熟悉，写不好，写不成，写不多。我常说我们从茅盾起，后来都没有写作品，他主要是文化部长忙啦，但他从前写的几部长篇是很好的。我们这辈的老作家都没有写——都想换支笔来写一写，有些想改造好了再写。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通过作品在实践中间改造……。所以，我觉得应该总结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希望还是"繁荣"。我的意思觉得宽是可以宽一点，只要歌颂新社会。

应该让作家写他自己擅长的东西

李：中国的文学传统，从《诗经》开始，就是有并行的"美"

与“刺”——歌颂与批评，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用一种比较灵活的观念去解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巴：我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发言——“文革”时为这篇东西检讨过好多次，是个罪名哪——我就说该松一点，对待文艺写作放松一点，只要不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都可以放松。我主张应该让作家写他自己擅长的东西，只要是歌颂新社会就可以。譬如像茹志鹃这样很有才能的女作家，有一篇《百合花》，茅盾推荐过它；她有两本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很有才能，善于从小事反映大事，从一个人的普通生活反映出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但她就不断受到批评，说她是写“家务事、儿女情”，不写英雄人物。我觉得可以提倡一部分人写英雄，但多数人不一定都要写英雄人物；我们主要还是平凡人多些，英雄少。有些人说——我也这样说过——要树立榜样呀，大家学习的榜样呀。事实上读者不是这样的，不是读一本书就可以学得来的，所以单写英雄人物就跟一般读者距离很远。他们学不上的。写一些平凡人物，像五十年代写一些中国社会风气，一般人民的思想、青年人的思想，也是很好的。我也知道的很多，譬如那时有工商界朋友的小孩不要家里的财产遗产，尽管父亲有钱，却愿意靠自己生活。但到“四人帮”时却把青年人的理想完全搞掉了。所以青年人思想的问题都是“四人帮”造成的。就拿插队落户来说，最初到农村去的青年都是满怀雄心壮志，什么都不怕；但后来没人管，没有人好好照料，搞得像这个样子……

并不一定要“做官”才方便“体验生活”

李：看您这样争取时间写作，使我有个感触：我回来见到一种现象，就是作家一旦成名或者成功以后，就往往有了许多头衔，要处理许多业务、开会、见人……，然后就没有时间写作了。

巴：这也是一种，但另一方面自己也有困难。还有，我们有培养青年作家的任务，要看稿子、改稿子，这里演讲那里作报告，讲怎样写作品啦。这样一来一部作品出来，第二部就比较困难了。另一方面是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没有真正贯彻。

李：我前几天见到丁玲先生的时候也与她谈到这个问题，她说作家要不是“做官”，收入少不说，想去什么地方“体验生活”也不可能，所以虽然做官会占去你许多写作时间，但比较起来做做官对写作还是有方便。

巴：（笑）做官嘛就是方便一点。至于“体验生活”是有办法的，倒并不一定要做官才方便体验生活。我主张作家不该脱离生活。脱离了生活再去体验生活就差一层了。我自己的经验是去部队体验生活，我起初很怕，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部队，但我一去部队里倒很简单，大家庭一样，一熟悉了很受感动，处得很好。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就困难了，好像食客似的，闲着无事可做，再深入就比较难了。所以“体验生活”是有很多困难的。你要熟悉自己写的东西，这还是要由作家自己选择。这种生活也许我容易熟悉，那种生活我却不容易熟悉。所

以生活得由我自己选择，不能由机关或作家协会替我选择。上面说这部分人需要反映，我生活下去了，却写不出来。

我们有人可以不写作品也照样做作家

李：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写出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品，许多三十年代的作家亦复如此。可是国内现在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巴：我跟很多日本作家来往，发现他们写很多作品，而我们没有多少作品。我有一种说法——有人不赞成——就是我们有人可以不写作品，但可以成为作家，可以生活。我们养起一个专业作家，他可以不写作品也照样做作家，报上常见面，这里也有活动，那里也有活动，几年不写作品。但是日本那些作家要不写作品就生活不了。过去我的工作就是写作，我把第一本书写完就要写第二本书，我一有时间拿起笔就写。现在我见到茹志鹃就讲：我在她这年纪，二十年里写几十部作品，她就是两本短篇。就是种种原因限制着她、不让她发展。所以我主张以后应该宽一点，只要一个大目标，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我们国家、不反党。现在有刑法了，违背刑法可依法起诉，不违背刑法，宪法上讲的有从事文艺创作活动的自由。宪法上保证这个自由的。作品写得不好，写篇文章批评就算了，不是犯罪。古今中外文章写得不好也没犯过罪，是不是？

李：有一种文学批评不是文学批评——不是就文论文，而是动不动要从文章"抓思想根子"。

巴：是啊，就像文章作为代表行为的样子。……

《重放的鲜花》中有些“右派”文章写得不错

李：想听听您对新一辈年轻作家的看法。

巴：年轻作家我想先从五十年代的一批说起。最近不是出了《重放的鲜花》吗，有些“右派”的文章，当时受批判的。这些文章有写得不错的，当时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发展、写下去的话，今天很不错。中国今天的文坛很不错。今天许多年轻人作品都不错，比我们初出来的那个时候都要好。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让这些发展。作家协会，只要有什么事提醒他一下，让他发展去。我总是说不要养作家，不要设专业作家，宁可有稿费高一点的业余作家，给他种种方便。作家总得要写作。我们现在作家不写作。这个问题我吵了好多年。还有一个是“跟得紧”的问题。我写了很多作品，以前三十年代的作品现在都编入了文集，丢掉的很少。但我现在很多作品稿子写好就不能用了：我写越南的有两本散文，出了一本，另一本写好了，一部分发表一部分没发表，结果出都不能出了。……我写一篇文章记在朝鲜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当时到处发表，后来彭德怀“有问题”，这篇文章就从我的集子里抽掉了，现在彭德怀平反了，文章才又见天日。……

应该尊重作家

李：中国自古来作家的地位在统治者的眼中是不高的。

从前是与倡优并列，皇帝盖了宫殿，一高兴就把大作家如杨雄、司马相如等等叫去写篇东西歌颂报道。

巴：……。今天陈登科来，我跟他谈了。他提倡作家该有版权。我说是该有版权嘛，我们现在国内也不保障版权，作品写出来是社会财产，出版社来指挥。出版社高兴出就出，不高兴出就不出，他忽然高兴要出，又没有出……但起码要不要出，要怎么样发表，应该尊重作家。这是第一。第二是对国外，我们也不能保障我们中国作家的版权。外国要翻译我们的东西也不经我们同意。

李：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版权的组织嘛。

巴：所以我们应该参加。国家应该保证这个。对作家应该重视。在国内也不给他版权，在国外也不保证他的版权，作家地位像一般干部那样。真正作家的作用应该像是灵魂的工程师，塑造人的灵魂。我的思想，我对是非善恶的观念，也是受所读的书的影响。所以对作家应该尊重——不必养起来，但稍为重视他一点，不必像使用一般干部那样子，高兴时捧几句，不高兴时骂一通。

有时把文学作品说得一钱不值，
有时候一部作品不得了，影响好大……

李：要说不重视也不尽然，有时对文艺工作者可紧张得很，把他们写出或演出的影响力估计得太严重，好像非得狠狠批倒、肃清流毒才行。

巴：我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会的发言中也讲过了：有时把文学作品说得一钱不值，作家也是，说托尔斯泰没用；有时候一部作品不得了，影响好大！

李：可以"流毒无穷"？

巴：为那发言后来我在"文革"时检讨，罪名很大。青年学生把我叫出来，叫我"自报罪行"，我说我写书十二卷、十四卷，另外是第二次文代会的"反动发言"——美联社把这份发言作为电讯稿发出去了，它成为"反华的炮弹"。

真正写作的人，他是从生活里出发的

李：我想请教您一个所谓"典型"的问题。现在有一种文学批评，比如批评《伤痕》一类的文学，常说：这个不够典型；好像非得真要有多少个姓甚名谁的这样的人在面前才叫典型，否则便是制造低级趣味或者别有用心。

巴：这个，我们现在有，过去也有，就是对每一个人物都说不典型，我说这个没关系，比如要是有人写个作家是坏人，我也不会说"这不典型"而提出抗议。说典型，有许多理论是研究理论者自己搞出来的，是为了研究起来方便，还想指导作家。真正写作的人从来没想这些问题，他是从生活里出发的，生活里给他印象最深、感觉出来的就写。一般作家是没什么"主义"的，有一种作家想创造一条路子，先搞个什么"主义"出来，大宣传一通，怕别人不了解。像欧洲一些现代派画、抽象画，我实在看不懂，几十年了我也看不懂，你说它有什么道理

不？我讲不出。就文学作品来说，它还是要为多数人服务的，它将存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存在下去还是要人懂的，有少数知识分子比如想创新，想找路子，想更特别不同一点，所以搞出些东西只有少数人懂。现在欧洲许多画，不管怎么再说多了不起，一幅画可以卖几十万，但是几百年后要是多数人不懂的话呢？作品本身价值还是要由人来决定的。很奇怪，有些人搞创作先要自己解释，要搞个理论。其实作品跟读者见面要作品本身能打动人，而不是要先看理论；有些打动人的，一辈子忘记不了。

…………

“民主”主要的还是要作家自己了解自己的勇气和责任，不能靠别人给

李：请谈谈你对当前中国文艺的前途有什么看法吧。

巴：首先一个是要贯彻“双百方针”，一个是“民主”。主要的还是要作家自己了解自己的勇气和责任，不能靠别人给。作家不是在上层指挥下写出东西的；文学史也不是这样写出来的，还是要靠作品写出来的。现在很多青年没有理想，但也有青年是很关心国家民族的、有才能的，有些人写出了作品来。希望他们能多写些东西出来，只要编辑方面能大胆一点，反正有法在，该吃官司就吃官司。

李：要他们写不是问题，问题是写了敢不敢发、能不能发；框框条条多不多。

巴：就是这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发，一个是改不改他的。

李：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年轻人反映现实生活的感受，也许在目前是没有太多编辑敢发。

巴：就是这个问题啊。不过现在好一点，全国刊物很多，有时这个刊物不敢发，另外的敢发；也有几家敢说话的刊物。现在是编辑责任重大。我觉得应让题材广阔一点，让作者放手写一点，胆子大一点。

李：中央叫大家胆子再放大一点，可是才大一点就有歌德缺德这些话来了。

巴：直接管的人也不同啊，编辑也不同。慢慢来嘛。都是这样子：民主是争来的，都得出点力，不会明天起来就忽然形势好转了。我们在旧社会生长，做中国人，在上海也受外国人的气，今天真是站起来了，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到从前去。所以大家要努力搞。

李：您觉得前途——

巴：前途还是光明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李：现在有些人似乎丧失了这份信心。

巴：有些年轻人丧失理想，崇洋媚外。我到外国去，觉得要一个人长期离开祖国回不来，也很悲惨，在国外也不容易生根，即使很有办法，好像也没多大意思。我觉得人总离不开自己国家，所以还是好好把自己国家搞好。

我以后的五年工作等于办“善后”，对自己的一生做总结

李：在外边的人也很关心您的生活和工作。

巴：我说以后的五年工作等于办“善后”，对自己的一生做总结。所以有人来同我说写传记什么的，我说不要搞，等我八十岁以后再说。现在我自己工作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以前想可以拖到以后，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对“文化大革命”要总结，多留点材料也好。现在也复杂得很。总得要总结，总得慢慢地弄清楚的。这种情况前一年还不可能讲得这样清楚。一方面是群众的意见、人民的意见。本来是说等以后下一代总结嘛，现在好像等不得了，恐怕得总结了。总之，前途是有希望的。中国有伟大的人民，人民是好的。中国人能吃苦。五十年代初期希望很大。以后好好搞，也有可能的。……关于文化、文学方面，要民主，要大家讲话，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现在是有进步的。

1979年11月整理于美国加州。

与意大利留学生玛尔格丽达谈自己的创作*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

玛尔格丽达：我非常感激您这次接见。我很高兴有机会看到您，这对我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我给您写信已经告诉您了，我到中国留学研究您的作品。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从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在这段文学史中，我着重研究的是您的作品，您的活动，我到中国以后，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找资料、买书等等。我读过好几篇文章，有的是您自己写的，有的是别人写的关于您的论文。可是我想，这还不够，因为我们西方有一个习惯：作家都有传记。好像这个不是贵国的习惯，为什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芒种》第三期，由玛尔格丽达整理。发表时题为《巴金与意大利留学生玛尔格丽达谈自己的创作》，文末并附有《芒种》编者作"附记"："玛尔格丽达·彼雅斯科(M.Biasco)女士是意大利文学博士。她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留学期间，翻译了巴金同志的名著《家》，由意大利鄱姆彼阿尼(Boupiani)出版社出版。她现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

巴金：不是这样。现在我知道，有几本写好了，大过概几年就能出版。有的是传记。问题不是我们没有习惯写传记，而是很难写。比如说，我今年是七十六岁，资料不好找，也有很多过去的事情记不得、记不清楚，所以现在没有条件能够集聚这个方面的资料写一本书。现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他正在写这样的书，一共写了二十几万字。恐怕他工作很忙，还需要一年多才能够出版。

玛：我还不完全了解关于您的生活、您的活动，现在我就想跟您谈一谈这些问题，可以吗？

巴：可以，可以。

玛：五四运动中国出现了新的文学，开始文学革命。您那时候对发起这个运动有什么看法？您参加了没有？

巴："五四"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不到十五岁。所以，还在家里。我的眼界打开了，开始看一个新的世界，读新的报刊，新的书，听新的宣传，新的知识。以前在家里读的是旧书，"五四"以后开始了解和考虑新的问题。我肯定是受到它的影响了。

玛：您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文学活动的？

巴：文学活动是这样开始的：我的觉悟慢慢地提高了，开始看外文书，以后跟别的青年出版新的报纸和杂志。但是，我是在法国才开始写小说的。

玛：您什么时候去过法国？

巴：一九二七年初，差不多二十三岁，不到二十三岁。一九三一年开始写《家》。在法国，我住在一个城市，我有机会写

完了一本小说。我的第一本小说是《灭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作品能不能成功，主要写了为自己，也不想出版，只寄给我的大哥看一看。以后在上海，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在出版社、书店工作，还认识杂志的编辑，后来在上海《小说月报》连载四期。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玛：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当作家吗？

巴：是的，我没有想到。我开始写只为了自己。那时候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一边写一边改，不断地改，不断地学。

玛：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巴：年轻时，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成都，我跟一些朋友都很年轻，有一些活动，也出版一张报纸，出了几期。

玛：有很多人参加吗？

巴：不多，有十个人，都跟我年纪差不多。

玛：您也翻译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吗？

巴：我译了好几本书，是到法国以前。

玛：您对无政府主义是不是还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还是跟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完全相同？

巴：我读过好几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对它们有感情、有兴趣，但是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过去的作品——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重要的是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

玛："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播到中国，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您怎么却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呢？

巴：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宣传早一点，是在"五四"以前，一九一七年就已经开始了。对青年来说，"最先为重"。

玛：我想青年很喜欢自由，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巴：对，这个也有关系。特别是那时候，年轻人在家里受到很大的压迫，很多年轻人为他们的自由开始斗争。

玛：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参加革命的？

巴：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分化了，有了几个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看法。有的投靠共产党，有的投靠到国民党里去了。

玛：您跟意大利的工人萨柯与樊塞蒂通过信，是不是？

巴：是的。我在巴黎的时候，巴黎发生了一个保卫萨柯和樊塞蒂的运动。我看过了他们的很多照片。他们被关在Boston 监狱，有五年的时间，以后被判死刑。后来，我找到一本樊塞蒂写的书，是他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我看过以后很感动，所以我给他们写信。他们也给我回信，一直到他们被处死。过了五十多年，给他们平反。他们的家庭很穷，生活很苦，我很感动。

玛：解放后，您在文学上有什么贡献？

巴：没有什么贡献。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有别的工作，时间紧，没有写多少作品。

玛：一九五〇年以后，好像在中国关于文学和文艺的路线和政策限制了作家的创作，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巴：解放后作家开始写关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了解新的社会。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多少实践。那时候我在上海。我在想，怎么解决写新的作品的问题，了解新的情况。

玛：解放前没有出现多少女作家，为什么？

巴：解放前妇女的条件很难，她们在家庭里受到很大的压迫。她们不能学习，没有自由。

玛：但是，解放后呢？

巴：解放后出现很多女作家。

玛：中国新文学史都是写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可是对一些女作家却没有那么深入地分析，为什么？

巴：因为我们的文学史资料工作做得不好。"四人帮"时期，我们的资料工作完全停了，只有鲁迅作品集，想要买一本郁达夫的小说都买不到。我们应该多工作，多研究，写新的著作，重新出版过去的资料。还有，我们应该了解外国文学，翻译也很重要。

玛："四人帮"的时候您的情况怎么样？

巴：关于"四人帮"时我的情况，我写过两篇文章，如《怀念萧珊》，在那里说到了我的情况。我好几次受到批判。

玛：他们批判您的时候，您有什么看法？心里觉得怎么样？

巴：他们批判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批判得很对。因为从解放后我在想，在新的社会我应该写什么？要创作什么？一直到他们批判我，我还在考虑这些问题。他们批判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创作道路，我自己要改造。后来，过了几年，我慢慢地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不是改造，他们批判是要消灭作家，批判是没有道理的。

玛："四人帮"粉碎以后，您想中国文学能新生吗？

巴：现在作家都应该多写一点，内容丰富一点，应该有很

多新的作品、新的资料。去年评奖大会有二十五篇小说获奖。现在，在文学上有许多新的人物。最近一位女作家在上海的《收获》上发表一篇小说《人到中年》。这位女作家是一个新作家，写了好几篇。她的名字叫谌容。她在《人到中年》里写的是一个女大夫，是一个中年人。中年人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解放后培养的人才。

玛：现在作家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能随便写吗？

巴：现在我们有经验了，胆子大而且思想解放，会随便写。

玛：共产党再次把"双百"方针提出，您想这个口号真能实现吗？

巴：我想这个方针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作家自己要解放。共产党促进他们，作家不应该等领导告诉他们怎么写，自己应该想办法去创作。

玛：我有这么个看法：从苏联早期的历史经验以至于中国的情况来看，好像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解放后文学艺术的水平比以前低。资本主义的国家有很多问题，人民生活有时很苦，可是好像在文艺上限制不多，让作家自由地写。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管理、限制太多。他们写作品好像都在模仿，一样的公式化。

巴：这个很难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三十年代我写过很多作品，以后我也没有写。我也有矛盾，小说很难写。

玛：您对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有什么看法？

巴：我未考虑这个问题。我写作品的时候，不知道是浪

漫主义还是什么。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在社会里受到感动，受到影响，拿笔把它写出来。

玛：我读过您解放前写的一些文章。您常常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您鼓励他们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您很相信他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吗？

巴：我相信青年，也同情他们。因为青年不知道社会的变化，所以"四人帮"歪风刮到了他们身上。三十年代，青年的力量很大。现在，我认为青年人还有希望。我回忆接到樊塞蒂的第二封回信，开头就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

玛：在《家》的前言中，您写过生活需要大胆，现在的青年也应该拿大胆来生活吗？

巴：可是在"四人帮"的时候我并不大胆。

玛：您想，现代的青年对《家》还有兴趣吗？

巴：现在封建家庭没有了，所以影响不大。五十年代电影的影响比小说大。不过，还有一些青年喜欢看《家》。

玛：虽然封建家庭现在没有了，但是，我想中国青年还有他们的斗争任务，特别是妇女，还应该追求进一步的解放。

巴：是的，现在还有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比如说买卖婚姻，这些问题还应该解决。

玛：我想另外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爱情问题。现在我的意思是，中国年轻人还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比方说要找个对象，却要听妈妈的主意。可是我要问，是谁结婚？妈妈吗？还有找到对象以后，如果发现两个人的性格、看法不一样，

两个人处不好，想改变关系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人们会议论……这说明封建主义的思想还存在。

巴：是的，这个是真的，所以，需要提高文化水平。我想，过了几年情况能改变。

玛：唉，还需要好几年！

答《语文学习》编者问*

问：《海上的日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答：这篇文章是我二十多岁时写的作品。一九二七年一月，我从上海乘"昂热号"邮船去法国留学。在旅途中，我随时记下了海上的见闻，写下了一路的风光，寄给我的两个哥哥(大哥和三哥)看，使他们知道我是如何在海上度过一段时日，并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乐趣。原稿存在我大哥那里，他死后我把它要回来，稍微改动一下，给一个书店出版。

这本题名为《海行杂记》的游记，有些文字是在邮船上写的，有一小部分则是到了法国以后写的。记得用来写《海上的日出》的本子，还是在西贡停船时买的；后来我在巴黎写小说时，用的也是这种练习本。

问：文中描绘的三幅图景是一天所见，还是途中感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日《语文学习》第四期，发表时题为《巴金谈〈海上的日出〉》。发表时篇首有该刊编者按语："《海上的日出》是著名作家巴金同志早期的优秀散文，现选入部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语文》课本。最近，本刊编辑部陆续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来稿，恳切要求作者谈谈《海上的日出》一文的创作情况、主题思想等有关问题，以有助于正确理解并进一步教好这篇课文。为此，我们特地走访了巴金同志。承巴金同志热情接待，在亲切的交谈中具体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答：我们写文章，总是先有生活，才有感受。因此，只有看了日出，才能描写日出的奇观。人们喜欢看海上的日出，就像爱登泰山观日出一样。我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当时，的确是这样。日出时的美丽景色吸引了我，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我就写下了《海上的日出》。

据说，有些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在分析《海上的日出》时，把我文中所描写的三幅日出图景，看作是一天一回所见，甚至还把文章归纳为"日出前——日出时——日出后"三个层次。这大概是由于《语文》课文的编者，把此文开头"我常常早起"改成"我特地起个大早"而引起的误解。其实，正像前面所谈的那样，我所写的确实不是一天的日出景色，而是集中地概括了我几次在船上看海上日出所得的总的印象，具体的观感。

问：怎样理解《海上的日出》的主题思想？

答：有人说，我这篇文章是写祖国的河山，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我当时远离祖国，写的是外国的河山，不是中国的河山。我当时是个普通的青年，思想单纯，想得不会多。但新的一定战胜旧的，光明必然代替黑暗，这个信仰贯串着我一生和我后来的全部作品。《海上的日出》当然也有向往光明、奋发向上的这个意思，但并不是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

研究别人的文章，要有自己的见解；但分析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当然，别人的文章也可以改；但要尊重作者的原意，要改得对。你改别人文章，如果九十九处都改对了，有一处改错，别人拉住你不放，也只好认错。我当过编辑，有这方面的体会。

和木下顺二的谈话*

一九八〇年四月，巴金先生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来日本访问。我上一次见到巴金先生是一九七七年在上海，这次是相隔三年之后的再次见面。巴金在日期间，匆匆忙忙见到了几次，并且荣幸地有机会一起畅谈。这次谈话，是为了给《读卖新闻》文化栏写一篇《会见记》而由该社安排的。(《读卖新闻》四月十二日刊载了我写的《与巴金先生交谈》一文。)

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各国会议”上。这次随团来访的谢冰心女士，也是那时认识的。而且他们是我最早结识的解放后的中国人。后来又多次在中国或日本见面，也曾几次光临寒舍。几年以后，又和他们重逢，心中感慨万端。二十五年前召开的“亚洲各国会议”，是同年同月召开的“万隆会议”的“民间版”，这两个会议的

---

* 本篇由陈喜儒译。原刊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小说界》文学丛刊第一期。发表时题作《巴金和木下顺二的谈话》。文末原有译者“附记”：“木下顺二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剧作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就开始了戏剧创作活动。他的主要作品有：《风浪》、《山脉》、《暗淡的火花》、《神与人之间》等。木下顺二先生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关切。他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夕鹤》，曾以话剧和歌剧的形式与我国广大观众见过面。

“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木下顺二先生曾与团长巴金同志亲切交谈。本文根据《图书》杂志译出，并由巴金同志订正。”

决议中，都高举了后来有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十项原则)。

在会议后的二十五年中，特别是近十几年，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如果引用我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话来讲)"巴金先生质朴诚实的风格和谢冰心女士高雅的魅力至今未变！"这两个惊叹号，就是我感慨的内容。这里补充一句，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先生，是同我在亚非作家会议上一起奔波的朋友，六、七年前到我家时，曾写下这样两句诗：山移谷动松柏青，风雨深处见友情。

虽然这是他游览北海道的昭和新山时的感受，但他正是在巴金先生下面谈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由中国来到日本的。他当时写这两句诗的心情，我现在才能理解，同时，联想当前的情况，更使我思考很多问题。

——木下

关于《家》

木下：巴金先生的书，很受读者欢迎，但其中最畅销的作品，印数有多少？

巴金：最多的是《家》，大约一百多万吧。这本书是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出了三十几版，一版开始时印二千册，印数很少，后来重版时，一次大约印一万册。解放后印了几十万册，在"四人帮"时期，一本也没印。打倒"四人帮"以后，大约又印了五十万册，现在也仍在印。最近我曾想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封建家庭已经不存在了，再出

版《家》,在中国青年中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反映。但实际上,在青年中的反响非常强烈。我感到,封建的流毒和糟粕,在中国还是顽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我想,中国正在搞的四个现代化。其中也必须包括大反封建主义的内容。

木下:《家》这部作品,译成了几国文字,印数有多少?

巴金:十几个国家。英、法、德、俄、日,还有朝鲜、越南、匈牙利、波兰、捷克。法文译本是去年出的,出的最晚,但销路最好,在法国反响也强烈。

木下:《家》是您的代表作,也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它为什么受欢迎呢?刚才您讲了现在也有反封建的问题,进一步讲,是什么因素激发了您创作的热情呢?前天(四月四日)您在《朝日新闻》讲堂讲《我的文学生活五十年》时,曾谈到了这个问题,但听后仍有不明白的地方。

巴金: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反封建。我生在旧官僚封建家庭,从小就生活在充满不平等、压迫、专制的环境中,所以常常想,要打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在拿起笔写作的时候,一种不可遏制的感情就从笔端流泻出来。

我写这本书,还为了给我大哥看,我想叫他知道他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以及继续这样活下去,等待他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但我的大哥没有看到这部作品就自杀了。

木下:我再提个问题。《家》,可以说是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但从日本文坛来看,不知这部作品应该属于哪一类?不讲文坛也可,那么从日本文学作品的分类来看,这部作品应该属

于哪一类呢？如果说，归到哪一类都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也就无法继续谈下去了。实际上，一部作品归属到哪一类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在日本文学中，小说有很多种类，如“纯文学”、“大众文学”、“私小说”、“教养小说”、“社会小说”。我觉得巴金先生的《家》，是既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又包括这一切内容，或者超出了这些定义范围的作品。诚然，发行一百多万部，是以庞大的中国人口为前提的，但也充分证明了这部作品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这部作品绝不是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而写的，所以它既是“大众文学”，又是“纯文学”。而且刚才作者讲了，这部作品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是属于“私小说”的范畴，但同时，又可以明确的说是“社会小说”。

还有，巴金先生在讲演中说，自己喜欢并且受到影响的日本作家有：夏目漱石、田山花袋、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还有岛崎藤村，好像还有一个人。这些日本作家对您都有所影响，您对于他们都很尊重，这从日本文学的角度，也是不好理解的。当然这有种种原因。岛崎藤村在巴金先生五岁的时候，写了一部与巴金作品同名的《家》。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描写了一个旧家庭，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浪涛中解体、崩溃的过程，同时把“家”的问题，放在个人与个人的冲突中，描写了人不可自拔的堕落。这一点同巴金先生带自传色彩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目漱石的《道草》与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都是取材于“家”的问题。但夏目漱石和志贺直哉所写的《家》，着眼点在于从那无法忍受的“家”的樊笼中偷偷逃出来，维护和确立自我。巴金先生的《家》则是正面与“家”针

锋相对，这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还有田山花袋，他写自然主义的小说，把自我袒露在人们的面前。有岛武郎，是人道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是非常有理智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是无思想的善良的作家。这样粗略的划分，虽然过于笼统，但还是可以这样来区分的。这些各不相同的作家，如果说您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并且对他们都很尊重，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很难想象，日本的文学家，对此也很难理解。这一点，与其说是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不是文学家"

巴金：我在《朝日新闻》讲堂的讲演中，曾多次说过，我不是文学家……

木下：是的，我也想知道您为什么说"我不是文学家"？

巴金：我写文章，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心中有非说不可的话，不吐不快，为了把心里话说出来，才拿起笔写小说，写文章。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小说家或者文学家，对于某篇作品是某种风格，某人写某种文章的问题，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反正是读了这本书，觉得喜欢，于是对作者就感到非常亲切。我是谁的文章都读的。

我为什么举出刚才几个作家的名字呢？到目前为止，中国介绍的日本小说，主要仍是三十年代的作品，至少我自己没有机会看到过别的作品，自己直接读日文原作有困难。

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作家呢？因为他们用不同的笔法来描

写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使我感到亲切，引起了共鸣。我是业余作家，不是专业作家，平常总是这样，当写作的欲望在我的心中燃烧的时候，我就拿起笔来写。

木下：业余作家？也就是爱好者——不，这样解释意思就变了。

巴金：文学怎样分类，我自己属于哪一类，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常常想，要与旧社会进行斗争，就需要武器，不管是什么武器，只要能用来进行战斗，我就拿来与旧社会搏斗。

木下：已经逝世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冈崎俊夫先生，在河出书房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巴金篇》中，曾作以下说明："当时确有不少青年读了他（巴金）的作品，挣脱家庭的枷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与日本夏目漱石、志贺直哉的小说没有使人成为革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夏目漱石和志贺直哉这样评价，确实像一个中国文学专家的样子，所以我至今仍记得这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您才不认为自己是文学家吧。"我不是文学家"这句话，在讲演中至少出现了两次，我很有兴趣，才问这个问题。在日本，说自己不是文学家，不仅在口头上，自己也确实这样认为，并且又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作为特殊的例子，也许有，但我却不知道。中国的作家们告诉了我们尚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是有自认为不是文学家而从事文学工作的人。

巴金：我刚才送给您的《随想录》（第一集，香港三联书店，七九年出版）中，多次写到我不是文学家。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创作的时候，我不曾有一边想着自己是作家，一

边写作的经验。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过，拿起笔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作家，是文学家。我常常想，甚至一直都在想，干一点什么别的工作吧，同时也写一点东西，但结果是，别的工作什么也没有做，总是在写。我也考虑过，或许有比文学更适合于我的工作。

木下：……呵！您是这种心情……

巴金：虽然我总是这样想，但还是没有做别的工作，一直写到现在。去年到巴黎去，我对巴黎的朋友说，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写呵，写呵！到底没有离开文学艺术。

我的儿子现在大学读书，专攻中国文学，学校里开设文学理论等一些课程，回到家里来，常常说起这些问题，在文学理论上应该怎样怎样。爸爸的作品应该怎样怎样，特别是最近，他批评的更多。这时，我就常常对他说，我不是文学家，那些理论我不懂，我自己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写。对于那些理论，你是专家，可我不懂。

过去有一些外国朋友问我，你到底是现实主义作家呢，还是浪漫主义作家呢？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于是就老实地对他们说：在创作的时候，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当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我不知道。

木下：您说自己不是文学家，我想把这句话的意义作为日本文学的一个问题来考虑，这对于日本文学是有益的，必要的。因为日本文坛上的职业作家和不必要的专门性的作家太多了。

巴金：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我只是说自己从

来都不是文学家，什么也不懂。正如我在讲演中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创作和生活的完全一致，是作家和人的一致，我自己总是这样想的。

最近我给香港杂志写稿，其中谈到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绝不认为自己现在的想法就一定正确。这也是今后应该继续探索的问题。

木下：巴金先生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想继续思考这一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木下：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发表以后，一直是关于文学艺术的最高指针，在文革后的今天怎样对待这一讲话呢？

巴金：对此，中国还没有讨论。我现在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写作，对于这些理论问题，也没有探讨过，只讲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讲话》是一本好书。对于作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书。但是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写，不论多么好的书，多么重要的书，归根结底，也只能作为创作的参考。作家必须依据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写。

最近我收到很多青年人的信，他们想写很多东西，但又不知怎样写，怎样学习，我回信时劝他们学习《讲话》。为什么劝他们学习呢？我希望他们能在《讲话》中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写文章的问题。搞文学创作，绝不是为了出名，绝不是为了宣扬自己，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创作，而不能为名利而创作。在《讲话》中，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所以我劝他们读一读，是有好处的。

其次，以什么样的态度创作，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一点在讲话中也有很好的解答，因此，我劝他们一定要读一读《讲话》。

有很多青年，为了当作家而写作，我以为，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我没有到过延安，也没有参加一九四二年的座谈会。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吧？我给芹泽光治良先生写信时，曾向他推荐这个《讲话》，我自己的创作思想当时也受了这个讲话的影响，所以写了那封信。

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必须依靠自己的思想，自己对事物的观点来写。

木下：对于《讲话》怎样看，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问题。日本作家中，有多少人读了这个《讲话》，我不清楚，但我认为《讲话》谈到了作家创作时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有个朋友叫我问一下，中国是否可以自由出版包括《金瓶梅》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

巴金：古典文学作品是很受欢迎的。关于《金瓶梅》这本小说，在旧中国也是不公开发行的。解放后内部发行过。

木下：所谓内部发行，是为了供给专家吗？

巴金：是的，为了满足文学家、艺术家的需要发行的。我原来有一部，读了一点，但没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把它烧了。为什么烧呢？那时候红卫兵来了，什么都抄，我不想叫他们读这部书。

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木下：现在有很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日本。巴金先生前天在讲演中说，要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写出来。我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是轻率的，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也有好的一面。比如，随着搞现代化，提出了对于官僚制度进行批判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文革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文革有没有好的一面呢？

巴金：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说不出有什么好的一面。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今后必须对文革进行总结、研究、分析，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在八、九亿人口的大国，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人民经历了世界各国人民都没有经历过的事，要总结一下，原因在哪里？有没有好的地方？坏的地方又在哪里，为什么坏？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必要的，所以说，是非花时间总结不可的。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倒有好的一面。这就是，通过文革，我变得聪明些了，头脑中朦胧的不明白的问题，现在明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收获。

中国人民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我们遭逢了不幸，因为人民吃了苦头。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体验了世

界上罕见的事情，而且认真总结经验，就可以使全世界人民不再吃这种苦头，这对于人类，也是一种贡献。

对于一切事物，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必须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只看报纸上的文章，只听别人的讲话，不消化理解，生吞活剥，那是不行的。因为对于事物不自己观察、体验，不思考分析，就要吃苦头。有许多外国朋友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来到中国，会见了一些人，读了一些文章，脑袋里被灌进了许多东西，并且信以为真，回国之后出于美好的愿望，通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文化大革命好。但现在，全部翻过来了，这些朋友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在国内丧失了信任，大家都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他们非常窘迫。

我自己也是这样，像中了催眠术一样，在莫名其妙之中，不知不觉地也跟着讲，并且真心实意地相信这一切。

在法国，一些左翼青年，也要在法国搞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确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响，老实讲，我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那样的。文革初期开大会批判我，我自己也高喊“打倒巴金”的口号。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总结、分析、研究。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想认真总结，使自己不再重复这种糊涂事，并且尽可能也不叫别人再干这种蠢事。但我自己与别人不同，在进行总结的时候，我要自我解剖，自我分析，并不想责怪别人，归咎别人，而是想通过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这是非常沉痛的教训，但也是宝贵的经验。总之，要用自

己的头脑分析判断事物，如果不动脑筋思考，轻信别人的话，就很可能重干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的滑稽事。

那时我曾真诚的认为，自己写的十几本书，都是不好的，我的确是罪恶深重的人，别人把我当做罪人，我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罪。

木下：郭沫若先生曾严厉地批判自己，否定自己的过去。

巴金：郭先生比我更彻底，他不但否定自己，而且连唐朝的著名诗人杜甫也全部否定了。

五 年 计 划

木下：听到您在文革中的经历，我很感动，您曾说要把这一段生活写成作品。

巴金：是的，要写成长篇小说。

木下：您曾讲过“五年计划”。

巴金：我去年七十五岁，到八十岁还有五年时间，要写长篇小说二部；翻译赫尔岑（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小说家、思想家）回忆录五卷，还有刚才送给您的《随想录》，每年写一本，五年写五本，还有一本《创作回忆录》。

木下：《创作回忆录》并不单单写文革时的事情吧？

巴金：从我开始创作到文革前为止，回忆一些作品写作时的情况。加在一起，总共十三本书，在八十岁前完成。

木下：真是宏伟的计划，我很羡慕。但我希望能早日拜读您写文革的作品。京都大学的竹内实君，在十年文革的高

潮时期——一九七一年，写了一篇文章，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其中有非常令人敬佩的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他以完全不能理解的心情，注视着当时文革中的文学，在文章的末尾说："真正的中国文学的自我恢复，只有当经受住这场光荣而悲惨的'革命'的文学家用文学作品描写它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社，一九七二年刊)。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将由经受过这场革命的先生来完成。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文学家现在能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这虽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以为现在尤为迫切。从世界政治来看，现代的政治就是事后贴橡皮膏，一个事件发生以后，政治家们忙得团团转，做些马后炮的工作。相反，我认为文学家必须抓住人类的根本问题。巴金先生联系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完全理解了。

巴金：我们中国作家要向日本作家学习二点：一是日本作家学习非常用功，研究很多问题，钻研很深。另一个是作品非常多，很勤奋。

木下：我写的非常少，是一个不写东西的作家……〔笑〕

巴金：日本作家产量高。这两点，我们与日本作家相比，确感不如，特别是作品的数量，我们比日本作家少得多。

木下：中国作家不仅写作，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吧？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巴金：我们中国作家，常常为此向中国政府要求说，虽然参加社会活动是好事情，但希望给作家更多的写作时间。

木下：在朝日讲堂讲演时，您也讲，要把全部力量和时间投入创作，但那次讲演，不就是中国作家代表团来日的社会活动吗？〔笑〕

巴金：这次到日本来，是为了看一看日本朋友，大家在一起谈一谈，这对于我的创作，是一种鼓励，是一种力量。在那次讲演会上，我是想把我的要求，讲得更清楚些，给我更多的时间。〔笑〕

需要新的纽带

木下：您虽想见一见日本作家，但能见到的很少，而且即使见了面，时间也极为短暂，真是遗憾。您虽然讲要向日本学习，但我却想请教一下您对日本文学的希望或者批评。

巴金：非常抱歉，我今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在中国，对于日本文坛，或者日本作家的作品介绍得很少，所以我们接触不到现代日本文学、日本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常常呼吁这个问题。两国的文化交流、文学交流如果相互不介绍作品，那是致命的弱点，因此，我希望尽量多翻译出版日本的文学作品。

我们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尾崎秀树先生讲了《日本文学的现状》，我因有别的事没能参加。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正是这样。

但从现象来看，日本的文学、文坛非常繁荣、兴旺，其中一个现象是书多、作品多，新人每年出现。我感到非常高兴的

是，在近一、二年内，中国也涌现了不少新的青年作家，他们虽然年轻，但其中有的人写了很好的作品。

木下：现在日本有很多年轻人，与其说真正要写点东西，不如说是想当作家，发表了一、二篇作品，就以为是作家了。

刚才您讲到了尾崎秀树的名字，他的讲话，一定很不错，但他一九七八年到中国去的时候，可真为难了。在日本，埴谷雄高是纯文学的代表人物，而竹村健一这个人，他的作品就发行了几百万部，怎么说呢？反正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作家，好与坏且另当别论。但他们是根本不同类型、不同立场的作家。中国方面说，他们虽然不同，但都是写文章的人，可以从他们的共同点讲起，谈一谈日本文学，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先从大前提讲起——我记得尾崎秀树君什么时候曾对我讲过这件事。他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一次一定能讲好。

巴金：我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界对此不太了解。不仅对日本，对欧洲文学、世界文学不知是否也可以说不甚了了。刚才我送给您的书中，曾呼吁要翻译世界名作。与世界各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首先要翻译各国的作品，如果不了解对方国的文学作品、文学界的情况，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文化交流。我感到非常焦急的是，该做的事情堆积如山，这些工作不做，也就谈不到文化交流，中国还有不少同志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还不想去做。

这次到日本来，深深感到，在我们紧关大门十年，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圈子里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世界迅速地前进了。日本的发展也很快，因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

平，当然也包括文学、精神修养等方面，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木下：日本也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对此，我想以后再说。您今天谈了很长时间，一定很累，我想谈话到此结束。但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在亚非作家会议期间，杨朔先生是中国事务局的局长，很能干。他最后的情况，您知道吗？

巴金：关于杨朔的情况，我也是听人说的，在文革初期自杀了。对于他的批判和斗争，比我还厉害。我有一个时期也想自杀，曾认真地考虑过死的事情。知识分子在对于未来失去希望，而又遭受肉体侮辱、精神折磨的时候，很多人无法忍受，就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如果杨朔能忍辱活下来，大概也会和我们一起到日本来。后来恢复了他的名誉，骨灰也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杨朔散文选》最近将再版。在文革中自杀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

木下：谢谢。

和周策纵的对谈*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

从“五四”、北大谈起

周策纵：……这样我们就随便谈谈。……五四运动那个时候，巴金先生你还在成都，是不是？

巴金：我在成都，我是受“五四”的影响，就是这样的，“五四”使我们眼睛睁开，就是这样看到更多的东西。那时新文化的一些发展，新的书不少，你将来可以看看。

周：我看你的自传，写你在四川年轻时的生活……

巴：那个时候的回忆，真有意思，所以写一点。

周：那个时候的影响很大，那个时候的青年突然一般的朝气蓬勃。

巴：那个时候的青年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子，都说要“替祖先赎罪”。就是这种心理，就是所谓追求救国救民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展望》半月刊第四七九期。发表时题为《周策纵、巴金谈话记录》，文末并注有“根据录音整理”及“小题为本刊编者所加”。周策纵：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教授。

道路。

周：那时候最好的一件事，是要找出救国的根本办法来，要创造新的文化，（巴：对！就是这样。）要检讨过去，要吸收别人的好处，要检讨中国的传统。一切要拿证据来。

巴：那个时候不是有留法勤工俭学吗？我也考过留法预备学校，没有考取。

周：我这本书里头（指周策纵先生著之英文《五四运动史》一书）讲了很多关于勤工俭学的事，法国早期的留法学生，如蔡元培等，都在法国受到很多影响。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深。

巴：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是北京大学，主要是《北大学生周刊》。年轻人都把要创造新文化的书找来读。

周：那时候真是有点像"百家争鸣"的样子，（巴：就是，就是！）各派的思想都介绍过来。

巴：所以蔡元培在北大也能容纳各学派，都能容纳，大家辩论，因为辩论，所以能打动人，所以能征服人心。

周：我常常觉得，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趣味的时代，一个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思想发达得很，另外一个比较短，但是影响很大的，可能就是五四时代。因为我认为"五四"不纯粹是学生游行示威、罢课的事情，思潮是最重要的。

巴：是的，等于开了一个窗，让西方的东西进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有一点比较，自己怎么样，怎样改革自己。那个时候青年人是朝气蓬勃。

周：现在有些青年不容易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在海外有很多学生都想知道，在"五四"当时青年的心理和思想状况，所以我很想请巴金先生讲讲。

巴：我也很难讲。我只是个学生，受了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是"五四"的产儿，"五四"的产物。

周：这一代出的人材真不少。从"五四"开始一代出的人材很多。

巴：主要的是这样子：中国人不少，所以出的人材也不少。我看中国人这一百年来受气太深。而我们也不愚蠢，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搞不好？所以大家应该有决心，有志气，认真来搞。

周：可是要有一个机会。要给青年一个机会，一个环境，他就可以发挥。别的时代也有。从鸦片战争以来，当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可是"五四"这短短十多二十年中间，出的人材特别多。

巴：本来是，五十年代我们觉得我们国家也搞得不错。那时也是朝气蓬勃，还不是这样的。就是"四人帮"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一来，走了很多弯路，损失很大。

周：这损失很可惜。

巴金在五七干校

巴："四人帮"这样搞，是坑了连续三代啊。我们这一代也受到了……这个……

周：受了很大的打击。

巴：中年一代，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受到摧残，年轻人把时间都浪费了。走了一段歧路，走了一段弯路。

周：你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文革的时候？

巴：基本上是在家里，有两年半在干校。

周：哦，在五七干校，在什么地方？

巴：在奉贤，算是上海的一个县，靠海边。

周：两年半在乡下？

巴：在干校，我反而身体倒好了。这一点，我们在干校，对劳动分配比较还好，对我是轻微劳动：种菜。只是两年半时间浪费了。不能够写作，不能搞这种东西。但是种种菜，也很轻松。后来我的爱人病危，所以我就回来，没有再去了。

周：你太太萧珊那个时候分开的？

巴：不是，她没去干校，她住在家里。她就住在这里。那个时候，十年中间，我楼上封起来了——我现在住楼上——楼上封起来了，我就住楼下，我，我爱人，就都住在这房间，就在这个房间。现在又搬上去了。

周：那个时候你在干校工作……？

巴：我在干校，我的爱人还在家里，她没有去。

周：你那边一个人……

巴：一个人，当然我们"靠边的人"好多。每一个月回家一次，休假。

周：每一个月？

巴：一个人嘛，不是有四天或五天，星期天集在一道，回来休息四五天。每个月回来一次。

周：可有没有朋友可以大家一块儿讨论？

巴：在干校，作家不少，我们常在一起。我们管讨论叫“学习”。“学习”指定的文件。

周：有什么小说、文学作品可看吗？

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周：什么都没有？

巴：都没有。

周：那就是精神上很苦闷？

巴：精神上折磨，就是精神折磨。我比较没有受什么肉体折磨，什么虐待也没有。就是精神折磨，就是这样，这一场梦呀，所以现在我也是这样主张，我不是写了《随想录》吗？以后不能“再有文革这种事发生”。

（录音中断了一会）

周：你刚才讲的，怎么样避免这种事情（指文革）重复发生，是最根本的问题。〔巴：就是，就是！〕本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也没有方法补救了。现在要看你怎样子使它……

中国的封建东西

巴：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有两派人。有些人主张，过去的已很久了，不要再讲了，我们要往前看就对了，这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的意见不同，这些事情还是要讲的，讲讲就是要避

免以后再发生。〔周：对！〕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以前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主要是我们对过去的封建流毒没有肃清。所以我自己讲，我写《家》七七年再版《后记》的时候，我还说：旁人以为《家》的现象已经不存在，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后来我说，现在看看，任务并没有完成，一般人的脑子中，现在连我们自己也难说，封建东西有没有完全除掉。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都给缠住了。所以旧的东西也好，各种东西，总之，一时摆脱不掉。现在很普遍的是这样：父母对子女的看法，子女对父母的看法，还是旧的观念很多。〔周：对！〕是不是呀？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亲戚朋友都株连了，这完全是封建的东西。

周：问题是这样的：中国遗传下来的很多观念，总是还可以抬头。在海外中国人居住的几个社会，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它们都是中国人很多的地方，他们对中国传统还在那里推崇，可是国内所讲的封建遗毒，在这些地方，却还没有引起过像文革这样重大的破坏，这样的"浩劫"。所以我们在海外有些人想这个问题，除了中国传统社会所有的坏影响之外，是不是还有些别的，外在的因素，譬如就制度来讲，受了些苏联的影响，是不是？问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的社会，还没有发生过像文革这种事情，但是他们还拚命在那里提倡孔孟的道理，提倡中国传统。

巴：这个封建呀，孔孟道理，我很难说，因为我没有研究。就是说呀，日本有许多地方可以研究研究，他们旧东西保存得很丰富，但是新的东西也吸收。我们这边，孔孟的东西在每一

个时候不同。但是在“五四”的时候，“打倒孔家店”，那时都认为旧的不破，新的不能起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当然，每一个学说，也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周：对！〕我们要排除它的坏东西，吸收它的好东西。也应该这样。所以这种东西，倒也好，中国这一次，到底怎样的情况呀。我觉得我自己是在总结，我写《随想录》，就是从自己思想起来总结，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到底是怎样，自己要弄清楚。我说就是这样的。有外国人问我，“四人帮”只有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力啊？我说我过去回答得含含糊糊，讲不清楚。但是首先，我自己就有责任，因为我听、我拥护“四人帮”，我承认他有权威。“四人帮”有时候一勒令，马上我就听话，去报到，去靠边。就是这样的。所以自己思想也有问题，作风也有问题。所以自己要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

周：是不是现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

谈到“四人帮”含含糊糊

巴：我看这个问题，首先是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要提高文化水平，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思考。〔周：对了！〕要真正通过自己思考。才能相信什么。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子？每个人都这样，那就好办些。每个人都可以多了解一点。〔周：对呀！〕我们就是这样子，经过好多年之后，慢慢的清楚一些。但是首先就是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我是知识分子，所以我讲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

不错的。他总是想，首先就是爱国。他因为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国耻，感到我们受气，受别人的欺侮，地位低落，他感到有把国家搞好的必要。所以我就讲，每个中国人，你们在国外也一样，中国强盛，跟你们有关系。你摆脱不掉，你总是中国人。我就是说，我不是中国人，人家还是把我们当中国人，还是摆脱不掉。所以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作后盾，是每一个人都少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有愿望，把祖国搞好。我以前到国外去过，感觉到非常痛心，中国人抬不起头来。所以好容易五十年代，就是解放以后，国际间又不同了。那时候知识分子最愿意尽力量把祖国搞好。

周：可是我觉得"四人帮"文革这阶段的事情可以发生，真正检讨起来，我们高级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好像有责任，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巴：是呀，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不能推给别人。去年我在日本讲过一次话。过后一个日本人跟我讲："你是第一个人这样讲，把'四人帮'的责任推给自己。"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们随便让"四人帮"胡说一通。你承认，你拥护。他说什么，你不通过自己头脑思考，不研究，他会随便乱讲。江青那样，会随便乱编历史，不学无术。但是有很多人相信她。不像中国过去许多知识分子有些好处，身家性命牺牲都不怕，都不在乎，真有民族气节。

周：上面一讲怎么样，我就赶快跟着改；没有经过思考，就引一句这个人说过是怎么样，我就跟着怎么样。没有推理，没有独立思考。

巴：是的，忠是很好的。

周：忠心是好的。

巴：但是愚忠就太不应该。过去就是这样。封建的东西就是愚忠。

周：假使这种风气，这种思想和态度，这种作风，不改变的话，这样事情很难办。没有保障。

巴：我也觉得是这样。大家应该什么事都要通过自己思考。拥护什么也好，随便什么都要通过思考，真正了解，彻底了解，了解是非。当然只能了解到某个限度，思想也有局限性。但当时了解到什么程度，我就讲到甚么程度。所以我现在讲，一个问题是独立思考，一个是讲真话。(周：对！)我以为是这样子，就这样讲。今天我可以辩，可以错，错也好。我还是不知道我是错。"四人帮"最初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好好的思考过，他批评我，批判我，我自己承认，感到错误，感到很可怕，我承认有罪，我真是愿意；他喊打倒我巴金，我也举手喊打倒巴金，我也就是承认他有权威。这也有几种原因，我也问过好些人，有几种原因。一种原因是自己思考不清楚，脑子胡涂，是非搞不清楚。所以我有的时候，彻底否定自己，真正把自己否定了；但是现在又并不否定自己！还有一种原因，有人说，当时封建方法，牵连到九族，很多人害怕，这也是原因。个人好办，我当时也感觉到，个人眼睛一闭就完了，就没有什么了。但是你总是有亲戚朋友呀，你有子女呀，搞得也很紧。所以"四人帮"那种方法搞得太可怕。

周：可怕！

巴：可怕就是利用中国封建的东西。

周：当时有很多人都自杀了，譬如，好多作家都自杀了。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刚才巴金先生提到这件事情。有些人忍耐下去了，我改悔，只好上面怎么讲就怎么讲，因为我还有家族的安全种种考虑。但是有人受不了就自杀了。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他们也许没有考虑到：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我个人受不受得了，或者我的家族安全不安全。刚才巴金先生也讲到，我们所关切的是中国这个民族，中国这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民的前途和将来，我们子孙万代的前途怎样。其实我们当时如果自己牺牲掉了，或者就完全听他们怎么讲。这种种……我觉得，总而言之，应该考虑到我到底是不是留下我这条命，或者要留到要怎样讲，才对我们这整个集团的人的前途和利益，有最大的好处。这一点，我觉得好多人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巴：不过这种事是这样子，这种事情很复杂。这现象是这样的：自杀也有多种多样。有些人是这样，你看电影呀，甚么小说也有，有许多所谓自杀不是自杀，是被逼，把他搞死，就推到说是自杀，因为自杀就更有罪，就作为畏罪自杀。所以这种人不是自杀，是被杀的。有些人就不同，各种人不同，有一种人是受不了刑罚，他不要再受下去，这点是受不了，这种人是自杀。还有一种是气，怨气。一念之差，想到某一件事就这样做了，多想一想也许就不自杀了。所以可以说原因是多种多样。譬如老舍先生自杀，到底是怎样也搞不清楚。总之不同的一点，是他受了虐待，体刑呀；以及他想不通，有许多旧的

观念，所以这么样子。各种各样呀，他受不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也知道，有些人实在被打得熬不住了，也有这个。现在唯一的贡献，就是我们相信，以后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尽自己责任，把国家搞好。

周：我们当时觉得，就是我们海外华人有一种看法，我个人也有这种看法：觉得当时社会改变了，因此许多人把功劳，把革命，归功在一个人身上，或一个少数人集团。于是把权威捧得很厉害，好像那个权威是绝对的，他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在海外的人看不到这个。海外的人总觉得，即使你社会政治改变，假如对老百姓有好处，这应该是老百姓自己起来做的事，并不能说是某个人赏赐给我的，我因此要感激他。因为他是领袖，我就要感激他。假使知识分子都这样鼓吹下去，使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某个人是绝对权威，他要怎样讲就怎样讲，或者是个少数人集团有这样的权威，因为他是老百姓的救星，所以我们都要听，结果弄到知识分子当时跟着那么讲，讲了以后遗害到自己身上来了。就是说，自己打了自己了。是这样一回事，我觉得。

“能够思考！哈哈！”

巴：这是很难说的，我也没有研究。知识分子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影响也有限。恐怕影响也不会怎么大。老百姓见到知识分子就怎样吧，也不会是这样。主要我觉得是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比较低。首先应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使人人能

真正独立思考。

周：是要能独立思考。可是怎样才能保障、提倡独立思考呢？

巴：不说独立思考，只要能够“思考”！哈哈！

周：能够思考！哈哈！这已经很困难了。〔两人会心地笑起来。〕

巴：所以说要提高文化水平。知识分子一向……不是知识分子所宣传的……讲话也没有人听。

周：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多年来我们在海外……我们……

巴：所以你们不应该先有成见，海外许多人有成见，应该最好自己回来，体验一下生活，虚心考虑一下许多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把国家搞好，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不算是批评，要解决问题。

周：我们在海外的人并不是不想到中国这个社会来。刚才也讨论到独立思考这些问题，有一本刊物，有我的一篇访问，本来是讲治学方法的问题。这一本我讲了好些东西。我可以送一本给巴金先生，其实这虽然是个单纯的问题，真正来讲，还是牵涉到中国一些根本的问题……一般人不过……

巴：总是这样子，现在我觉得，一个是要提高文化水平，一个是甚么人都要自己独立思考，还要多讲真话。

周：可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有时社会不允许你讲真话，因为有一种权威……

巴：你真的要讲，也还可以讲。有时候受点影响，多些

曲折，稍微转弯抹角一下也可以的。（这里因谈到周先生一九七七年在香港探访蔡元培墓后所作的一首新诗和四首旧诗一事，录音中断了一会。）

周：刚才讲到这三年以来，我个人的两次观察，现在是比较开明，但最近这两三个月来，我们海外的人觉得，对作家的限制又稍微多一点了。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关心，因为我们不希望对作家一下又可以开放一点，一下又说你不能够听人的随便讲话批评。最近两年来，对于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有好多小说家、戏剧家、诗人都写了好些批评，起初是伤痕文学，后来有暴露文学。最近这几个月来，到底对他们有没有心理上一些压迫或压力？

巴：是这个样子，我也是个作家，我也是这样看法，不过不同一点，你们在国外，我在国内。我觉得国内不是所有的人，十亿人都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像我这样看，个人应该有思考，就是说，国内也有些人主张改革的，有些人主张放宽一点。也有些不大赞成改革的，有的保守一点，主张不要那样大放的。所以有些不同的意见，讨论啦，有时候这种意见抬起头来，有时候那种意见抬起头来。意见是不能完全一致的。我是赞成放一点，松一点。我也是赞成改革的。总之要把中国搞好，首先要把中国搞得富强。

"假使总有一个框框"

周：我是希望巴金先生领导中国作家协会，能够给作家

有些更宽的尺度，更大的自由。

巴：我的主张是这样的：最近这次茅盾去世，作家协会主席团要我出来代理主席，开会选举的时候，我这样说：我自己没有举手，其他人举手。我觉得我来做这工作也不适当，我还是写作，个人关起门写作，比较好。而我写作的时间也不多了，工作时间也不多了，乘这个时候写一点。但是我说，大家要我作代主席，我也同意。第四届文代会议以后，作家协会的工作，我表示对他们支持。这几年，我觉得他们工作还不错。所以我支持，我还是挂了这个名，表示我支持他们。现在作协里面，作家里面，在看文章，在评论方面，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主张放一点，松一点，像从前大家这样，有些人主张对作家要求不要太严格。过一些时期试试看，放一放。但是也有许多人觉得要抓得紧一点。有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我觉得现在作家协会的意见，跟我的差不多。现在有些人，各自或共同的，还是倾向于爱护作家，肯定这几年的成绩。我觉得这几年文风、作风、形势比较好。前不久有一个美籍华人作家访华团，王靖宇先生和李欧梵先生他们。（周：我都很熟。）我对他们说，现在出来的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好的不少。从来没有过最近这种好现象，文学刊物现在有一百多种，大型刊物就有二三十种，多的销到一百多万份。作家作品，最近在评奖中篇小说，有的描写的生活面很广，面且深度也相当深，而且各有各的风格，有很多作品比三十年代好得多。也应该好些，几十年应该有进步。

周：可是有一个问题，假使总有一个框框，有一个政治的

框框在那里，作家就觉得有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才不妨碍他们创作的动机？他们创作的力量才不会受到影响呢？假使有外在力量来干涉，往往会引起矛盾。有这样一个问题。

巴：说到框框问题，我觉得要看这个作家是不是承认这个框框？主要的是要思想解放，在乎这点，你要是从生活里面感受，你可以不照着框框写。要看作家能不能够突破这个。这一点靠作家。我看有些作家，遇到阻力时，也可以自己写文章，也可写自己的感触，不照框框写。主要看你自己，自己如果突不破的话，自己承认有框框的时候，就会这样。我觉得我自己过去作品不行，是自己脑子里有框框，是自己脑子里有框框。

周：每个时代的作家……

巴：所以好的作家就不会有框框限制得到他。任何好的作品，都不受框框的限制。每一个时代大概都是有框框的，任何时代都有框框。可是好的作家，真正好的作品，可以不受框框限制。作者拿出作品来，你可以不……所以现在作家也可以不受限制。〔周：可是，譬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人到中年》这篇小说，就是个女作家写的，她就没有受到框框的限制……

《假如我是真的》

巴：……还有好些作品，最近中篇小说大概有几篇得一

等奖的作品，预备有好的作品，我们推荐的好作品，有《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这电影王靖宇他们都看到过。还有《没有航标的河流》。这些作品都没有框框的限制。

周：可是《假如我是真的》这个电影剧本，像是遭到批判了。

巴：这个《假如我是真的》，我也写过文章，主张不要限制它。（按见《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第三十二则《小骗子》。）剧本是个话剧剧本，写得比较粗糙。当时我就说：当时不限制它就对了。有许多人觉得怎么不好。结果搞了很久。演了好几场，最后还是不演了。不晓得怎样就没演了。当时我就说让它演嘛，演过一个礼拜差不多也就会没人看了。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作品本身不算怎么样。我是主张演下去的。有人主张劝作者不要这样再搞下去，以后就没搞了。

周：这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压力，--限制以后，其余的作家就说：我写作，如果超出了某种范围，超出了某种框框的时候，我的作品就不能发表了，就不能给大家看了。因此，写的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束缚了。

巴：现在不同，现在什么作品都有地方发表，因为全国有一百多种刊物，这里不发表，那里可以发表。如何限制？我觉得，就一个作家来说，我如果真是相信我的作品，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我就不怕受什么限制，不会因你是官方讲一句话，我就这样了……

（中断，换录音带）

……如果写得不好，你照以往框框写，当然很难有什么的，你要通过自己思考。我觉得作品要写的好，要通过自己独立思考。

周：可是问题是这样，就以《假如我是真的》这位作家来讲，他写的时候一定愿意真正写事实。他认为这戏剧是对大众有利的；但是呢，有另外一种信仰的人，或者是在政府里工作的人，或者在政治上有目的有力量的人，他觉得不对不好，作者只有一个人，在这样外在压力下，有人说不要演出或不要写下去，这样对作者就没有保障了。

巴：就是啊！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好作品的话，作家也可以通过辩论，讨论有结果。《假如我是真的》也印过，也演出过，看过的人也很不少。作品如果是很有价值的话，它总会存在的。我当时就说过，这个作品最好还是让它演，别人说这个火爆了一点，演过了也没有多少人再去看嘛！

“你有责任保障作家自由！”

周：我觉得，巴金先生，你这看法是对的，而且你作为作家协会的主席，我觉得你有责任来保障作家的自由，就是说他没有心理上的威胁。至于作品到底写得好不好，绝大多数人喜欢不喜欢，将来自有公论，不过不能用外在的力量来限制他……

巴：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他也没有受到什么很大的压力，也没有处在什么特别情况下，至多是几篇批评啦。现在

情形比较好啊，没有人因为写了什么东西就受到大的打击。这不会有。

周：巴金先生，以你过去的声望，我觉得你领导作家协会最恰当不过的了，你过去也有经验，了解写作自由、学术自由的重要，你目前个人的写作当然也很重要啦，不过你刚才也讲到，年纪大了，写不了多少年了，但是你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以你的地位来说，你更重要的事情是保障其他作家写作的自由。我讲的自由不一定是指“自由主义”这些东西，写作自由是基本条件，文学没有自由不会弄得好。就说曹雪芹吧，他受了很大的限制，他到底还有足够的自由把《红楼梦》写出来了。社会上还是容纳他，让他写出来。

巴：不过这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第一，这方面我做不了什么事，另一方面，我觉得不需要怎么的。每个人现在都可以保护自己，我觉得现在形势比较好，文艺情况比较好。每个作家他可以保护自己〔周：你觉得可以吗？〕，读者也可以保护他。〔周：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现在可以，读者也可以保护作家，作家也可以保护自己，我觉得可以啊，一般来说是可以啊。现在情况是比较好。所以另一方面我也保护不了什么，我除了写作而外，其他的事我都不适宜做，我话也不会讲，现在我还讲一些，过去我连话也不讲，讲不出来。

周：不过这件事情很重要呀！你只要一讲，人家就要注意，以你的地位，说出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好，松一些让他过去，不要给他限制，你一讲的话，人家非注意不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蔡元培，他在北大当校长的时候，因

为请的教授各色不同，外面也有压力。〔巴：就是！像林琴南就是。对，对！〕可是他要让不同的意见发表，要大学有学术自由，造成一种新风气。你现在的地位就有点像蔡元培当时的地位。〔巴：那也不能说。〕当然是有些不同，那个是学校，是吗？你这个是关于作家写作这方面。……

巴：这也不能说。我自己经过这十年浩劫啊，我觉得我也有些收获，受这个磨练有一些所得，所以我一方面是想总结这一生的经验；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花脑子独立思考，想了一些，考虑一些问题。过去十多年，没有好好用过自己的脑子，批判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是非问题，也许我有错，我发现有错的就讲，发现近年形势有好的我也讲出来。如果看到有好的作品，我会替它鼓吹，替它辩护。再说，任何国家都一样，事情总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十亿人，总有不同的意见。我对作品的态度是，好比我生了病，我承认有病，把病治好就是了。有人却觉得，有病不必讲出来，讲出来泄气，冒充健康人的样子。我不同，我认为有缺点就要改正过来，非改正过来不可。就算别人不知道，你如果一味掩盖，反而害了自己。所以总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总有斗争，说客气一点，讨论也好，评论也好，总有不同意见。就一个作品来说，总是有人反对的，譬如说，《人到中年》，你看过吗？〔周：看过。〕就有人反对。它写一个女医生，终于出国，终于外流。有人就觉得不应该写，我觉得是可以写的。写了这情况，就可帮助改善，把条件改好，外流的人也许就回来了嘛！〔周：对！〕你如不写，不承认，外流的人越多，又有什么好处？现在就是这样子，自己知道一些毛病，把

眼睛睁开来看，对他们好一点，对知识分子好一点，把问题解决，就没有问题嘛！所以可见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对，对！这个……”

周：西洋政治制度与我们中国传统有不同的地方，西洋那一套制度，在基本上从保障个人的权利做起点。就是说，没有更好的方法，唯一方法是用法律来保障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他的生命财产，他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基本人权，必须有法律来保障，别人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摧毁，除非这人真已犯了罪，侵害别人的生命、自由、权利，才可依法制裁；要不然，决不能用别的理由，爱国也好，道德也好，宗教信仰也好，政治上的主义也好，都不能用来限制他的基本人权。这一点在西洋政治哲学上，几百年来考虑了很久很久，没有比法律保障个人基本权利更好的办法。否则单从效果讲，单从道德的标准或政治的正确与不正确来评判制裁一个人，这些都可以随便讲的啊！〔巴：不过……对，对！这个……〕这就像中国宋朝人讲的“以理杀人”啊！不能以理杀人啦！说他这个不合理，或者不合主义，不合一个权威的思想，就可以禁止或取消他个人的自由权利，这在西洋是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的。

巴：他们的法律是多年斗争发展起来的。〔周：对！〕他们是有一套东西。我们还没有。主要是这样子，我们的水平还不到。我觉得，首先，我们如果自己不能保护自己，别人就要侵犯我们的权利。所以有两方面，一方面要自己能保护这权利，

我们还没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子。〔周：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有甚么权利。〕是啊，他也没有来关心到这事！

周：所以我说，中国作家现在有责任使一般老百姓了解这些东西，这个启发的作用也许还是很重要。要使他们知道，自己有任何别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巴：我看是这样子，你要是小心仔细一点看看中国这几年的文学作品，那是有些变化。〔周：有些变化。〕就是这样子。总的来说，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中国——最近有许多中篇小说，我上次特别作介绍，有些人不满意这些小说写了些缺点，暴露缺点。我觉得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写缺点；另一方面写有些中国人怎样对付缺点的态度和方法。这是可感动人的。这种态度，这种精神世界、思想感情，是高尚的，有些作品还是认为中国人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看法还是乐观的。我们要看看民族好的地方。中国在前进中有些困难，很多人还是埋头在工作，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子，《人到中年》也是这样子。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条件很差，但是只要有工作，还是工作下去。所以主要一点是，我们要关心这些人，给他们好的条件。所以缺点还是要讲出来，写出来，要承认自己的缺点，使大家知道这缺点，应该改善。

周：你讲的这点很重要，我们提倡要讲出来，写出来；而且每个作家有这个权利。〔巴：对，对！〕可是问题是：怎么样保障他呢？

巴：我这样想：大家应该把智慧拿出来，集体智慧才会

产生；如果大家都不拿出来，都不用脑筋的话，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这有两方面：一方面自己要重视这个东西，自己要把智慧拿出来，自己爱护智慧；另一面也要别人尊重你的智慧。要有这两点。现在情形还是比较好的，比前几年好得多。

周：比以前是好些了。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最近这几个月来，是不是又有一些转变？

巴：这个不一定。本来一直是几种不同的思想在起作用，有时候比较强调这样，有时候那样，总有不同的意见。这么多人，不可能思想完全一致，经过这么多年动乱之后，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怎么的。

“枪杆子干涉笔杆子”？

周：会不会有我们最担心的“枪杆子干涉笔杆子”的事？

巴：我的看法不会，只要我们自己在岗位上有力量不放弃的话，照中国情形，这种事不大可能。〔周：不大可能？〕不大可能，我想是不大会。

周：这种事，在海外的人看到有些报导。〔巴：就是。我想不大可能。〕因为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人，有许多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实际的工作，或者搞组织工作，或者搞军事方面的工作，都是很实际的。他们对作家或知识分子所想的东西不一定能看得懂。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同情，有这种事情发生时……，

巴：是这样的，有的人是听了别人的话，有的是过于把文艺效果看重，于是随便发表一些言论，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也不会怎么样，并且多数读者也会清楚的。国家有困难，现在是需要安定团结，就是这样的。

周：可是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大问题，假使每一个作者都在想，我这个作品为了要替某种东西服务，要发生积极的效果，为某种政治运动建设的工作产生好的效果，这就变成一种宣传文学了。

巴：这看你作家自己怎么样，你愿意写宣传文学，你就去写宣传文学好了。我的看法是这样，作家不一定看政治或看上面领导人什么的，你给我出条件，我就来写作；我始终觉得作家是靠自己奋斗，如果不写作，也没有说非要我写不可，要我写作，也不能出条件嘛，我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样子的嘛！〔周：你说的很对呀！就是说作家要凭自己的良知来判断！〕你要写宣传文学，你就写宣传文学吧，所谓求仁得仁。

最主要的，我说作家是生活培养出来的，是靠读者养活的，文章没有读者看了，写了东西卖不出去，那就完了。我在中国是这样，我没有拿工资，我是靠稿费生活的。我的东西要是过去没有人看，我就没有饭吃，所以说是靠了什么，没有读者靠什么也不行的；所以作者要自己不怕。过去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杀头也不怕，有些作家就是这样，〔周：对！〕是吧？他们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写起文章来稿费没有，我们还是要写，就是这样子的。

周：现在作家协会在你的领导之下，正是要去保障作家，

鼓励作家，让他有可能性，凭作家自己良知去判断，不应该受外力的压迫，要做就去做，这个我觉得……

巴：不是这样。我想这样说，一方面是这样子，你若是愿意跟着别人怎么样，也可以，像中国人说的做“风派”，你愿意做“风派”就去做“风派”，但作家是应该有所为而写作，我觉得作家是以写作为工作，自己应有一个工作态度，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有些人为了做作家而写作，那又不同，现在很难说。所以我觉得有许多问题不成问题。就说王蒙，他被打成右派，经过二十多年，他反而写了很多作品，锻炼好，他还是大量写作，他倒没有改变什么。

周：刘宾雁怎么样呢？

巴：刘宾雁写报告文学多，他不大写小说。

周：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限制没有？因为我们海外的人，去年在爱荷华大家要我也签名写了一封信给中国当局，就是说要让他出去一趟。

“我不清楚，”“我不大清楚。”

巴：我不清楚，不过他还在写作，作品还在发表，他的《人妖之间》影响很大。

周：去年邀请他，听说他不能出去，所以后来我们就写了封信，给中国方面……

巴：这个情形怎么样，我不大清楚。不过他的作品还在发表。我这次到北京还看到他。他还在写作。

周：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在现实生活上受外在压迫、压力，可能摧毁一个作家，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事情。〔巴：对对对对！这是有的。〕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们，不受外面的束缚、摧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良知来写，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巴：但是有些作家，他所受不利的影响，反而促成他作品的成长。所以就我来说的话，我"领导"时什么话都讲不出来。我实在不宜于说；我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时还是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是我个人意见；我现在讲话，也是我个人意见，有时候讲了话到处传，我也受批判。外国、香港还有人来问呢，我说大概也没有关系，事实上也好像没有关系，所以个人意见我发表，没有关系，要是作为作家协会什么的，我就不好发表什么意见，至少我得看大家意见怎么样。我还是以个人资格讲话。

周：你觉得你有时发言的时候，或者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在下意识里，觉得可能我这个要超过某种限度，或者最好不要超过某种限度？有没有这种潜在的下意识的束缚？

巴：现在倒没有，过去是我自己思想也有框框，过去在文革前我的话也在这框框里面，我现在写文章倒没有什么这样的了。

周：你过去那个时候的思想框框是怎么样的？

巴：我过去觉得自己应该为光明服务，写新人新现象，所以解放以后我想换一枝笔来写新人物，写……什么……〔周：英雄人物，是不是？〕工农兵英雄人物，这也很难说，如果我很熟悉的话，也可以写得好的。但是我不熟悉新的生活，结果时间不

够，条件也受限制，所以一直到现在没有——

周：你刚才讲到写工农兵英雄人物，一两年以前香港有一批年轻的朋友，创刊一个刊物叫《八方文艺丛刊》，他们在创刊号里面有一篇访问到我，讲"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就，我就提到工农兵文学这问题：我认为当然写工农兵的材料也可以，但是不要限制在这方面，譬如说写知识分子也可以呀，写别的题材也可以呀！

又再谈到"框框问题"

巴：这个问题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自己那个时候有个限制，有许多批评家说，写文章应该怎样怎样的。你如果不理他也没关系，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思想不解放呀，总觉得要受他的影响，其实你不理他也没关系，像我现在就不理他。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他有道理，〔周：一个风气，一个趋向，大家都跟着去做。〕这是自己思想有弱点。譬如说现在有人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的问题，你讨论也没有用处啊！你写英雄人物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是英雄，你不会写他的缺点。当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好感，你只看到他的好处，有缺点也不一定写出来，所以外行人才讨论这些，真正写作的人不会有这个问题。你要受他影响，你永远搞不好，写不好。你首先就要写人物，怎么不要写缺点？〔周：这就糟了！〕就是。所以这个框框问题主要在自己，你真要写得好的话，读者不会不接受，你要怕批评家怎样讲，别人怎样讲，这些是个人得失，真正

写作的人，真正从生活里走出来的作家不会想到个人得失。

周：这个框框问题，你刚才讲到是自己心里有框框在那里，这点很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或者搞别的权利或组织的人，他可能用宣传的方法加在我们知识分子心理上一个框框，知识分子因心理上没有独立思考的训练，就等于一个人身体本质很弱，外面细菌可以侵袭到我们。于是我们这个思想就跟着跑，我自己思想框框也就把我自己限制住了。但追溯这原因呢，一方面是受外在的影响，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就是知识分子原来思考的方法同基本态度有种弱点在那里，那种弱点不从根本着手改革好，以后还是会重复发作的，外在的力量一来，社会上许多人起哄了，群众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知识分子就反省了，我应该怎么样说，我是错了，我应该跟着跑。……

巴：你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是要彻底把这种问题解决啊。

周：中国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以后，有这么样一个基本的教训，不过这个教训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至于在上面的领导人，比较有权力的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基本教训了解得好？要不然呢，就只等于翻了一个身。加拿大一个记者去访问茅盾先生。茅盾也是在文革的时候吃了很大的亏，身体都有了很多摧毁。〔巴：他倒也没有。〕不过他那个腿呀，〔巴：他那个腿是年纪大了，作用不行了。〕是不是膝盖受了影响？〔巴：不是，不是的。〕那个新闻记者问他的身体在文革时有了损害没有？他就拿手杖敲着他的膝盖说："这就是文革给我的成绩。"他也没有

讲别的。〔巴：这个大概是误解，据我所知，他没有这个样子，但是他受了一些精神折磨。比我还要好一点。他是背后有人批判他。〕这个外国记者说：他们谈了话以后，茅盾就同他坐车子从天安门经过，他们看到街上青年人来来去去从车前走过，茅盾的车子就按喇叭赶走他们。这记者脑子里想：茅盾先生是不是还回忆到，在文革的时候，他就像是这走在路上的人，别人就坐在车子里向他按喇叭，他还得拿着手杖在路上走；现在茅盾坐在汽车里，是不是想到这问题呢？这记者的意思是说：等到我翻了身以后，自己有写作的自由了，他现在是作协的负责人啰！到底那些年轻的人，还没有成名的作家，他们正在那里挣扎。别人批评他也好，上层的人也好，编辑也好，对他如有什么压力，或者不肯给他发表，这些年轻的人还没有名气，他们是要别人给他支持才行。假使没有的话，他们要出头也很不容易啊，问题是要怎样来保障这些弱者，使他不再受这外来的折磨。

谈到巴金早年的作品

巴：你这话是对的。现在青年作家、中年作家是我们创作重要的一员。他们本身还是能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我的看法：文学事业是集体事业。我们出一个好作家，大家都有光彩，我们中国人都应该去保护他。我所认识的我们领导方面、文艺界方面，也是感觉这样子，就是说，好的作家大家都爱护。我们自己若是写不出好东西，而别人写出好作品，也就等于自己一样，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好的作家是受到保护的，一直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就是这样的，而且现在作家也不会过于反对什么来造成这样的大事情。现在拿一般作家来说，他写作，对社会的情况也都是熟识，他也能应付那情况，也不会闭着眼睛随便写啊。主要是使读者能接受，读者能起作用，就是这样的。

周：巴金先生，我想稍为问你一下，你在年轻的时候，在"五四"或以前、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时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很流行。俄国、法国有一批作家像克鲁泡特金，像屠格涅夫啊，都喜欢自由，人道主义观念非常强烈。我也受过他们的影响，我喜欢看他们的书。克鲁泡特金的英文自传，我有初版本，像这类我都搜集了很多，我总觉得在某种时代知识分子对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等的理想很高，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都放在这方面。但是等这社会制度改变之后，往往他们原来所要求的基本权利、自由，他们都不能够达到，自己后来弄出来的框框，甚至使下一代所受的约束更大，像苏联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总觉得你回忆你年轻时的那种感觉，譬如你写《家》的时候，传统的大家庭制度有很多束缚，所以你提倡青年要有自主的权利，但是后来你这种理想是不是打了好多折扣呢？

巴：问题是这样子，我的作品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我自己在一篇文章里讲过，我过去一生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很多人不了解，我的作品里爱国主义很浓厚。主要问题是从小出来，就感到中国人受外国

人的气，影响很深，所以我一生要求自由主义，就是要求自由主义，但是有一点，总希望只要国家强，不要像以前中国人在日本人、法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总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站起来，能富强起来。五十年代以后，国家改变了，站起来了，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努力，把国家搞得富强，中国人可以站起来，因此尽量拥护，由于这个缘故，国家就限住了自己，这三十年来，我觉得这方面努力就对了。结果文化大革命就把这当成我的罪行。我只想要中国好，愿意献出自己一切。现在到了晚年了，我要整个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下，自己得了些什么，把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的看法提高一点。

巴金要搞文学资料馆

周：我有一个朋友唐德刚教授，他写了一本回忆胡适的书。他要我写一篇序，我就提到这一点：我本来要胡适之先生也写一些自我检讨，把从五四时期以来的思潮清理一下，正如他以前也曾要梁启超检讨满清末年的思想一样，不过可惜后来胡先生没有写出来——

巴：所以我建议政府将来搞一个文学资料馆，把从“五四”以来的资料都收集起来，很多人都赞成，将来一定要搞起来，所有“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情况，一些资料、书刊，在国外收集的很多，美国就很不少，但是关于作家在文学上的书信、手稿、照片、材料，在国外就很难找到。

周：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您说知识很重要。我

们要把这些原始的历史材料保存起来，这样人家就不能歪曲历史，〔巴：对对对对〕我们才能够实事求是。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历史材料我们都看不到，过去出版的东西现在大家都不能够看，我们不能够去挖证据，人家讲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又不能找历史资料来看，这样子真是最糟糕！

巴：所以我想是这样，将来不仅要收藏，而且必须供应资料，关于你要了解某个作家，他的书信啊、笔记啊、手稿啊，都可以供应，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损失不少。〔周：简直不得了。文革里面破坏多少文物啊！〕就是就是！所以以后应该收集起来，现在大家都赞成嘛。〔周：都赞成。〕所以可做的事情太多，应该做做。应该自己了解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来新文学到底有了什么成就，什么成绩，有系统地看一下。

周：您到过外国哪些地方啊？

巴：外国是欧洲去过，最近是去过法国，以前也是去法国，在一九二七年到二八，在巴黎，后来又到乡下一个小城市。

周：美洲呢？日本呢？

巴：美洲没去过，一九三五年去过日本，只去了几个月。

周：我四十年代曾经发现，二十年代在美国西岸三藩市附近"中国城"（唐人街）流传的一种小册子，大概是无政府主义小组织的地下刊物，好像是有几篇与您有点关系的。

巴：有一个华工，他现在已死掉，他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有点钱，就印点小册子，发行刊物，我在法国给他写了好些文章，是一个叫《平等》的刊物。Olga Lang 大约也引用到这点。〔周：其实是我告诉她的。〕

周：我多年以前在美国还看到过，将来要是收集起来寄给你，有这个资料馆也可以放在里面，这个资料收集很重要。

我这次回来，讲到《红楼梦》研究，将来应该建立一个《红楼梦》和曹雪芹纪念馆和研究所，当然还要包括一个《红楼梦》的图书馆。在美国就有个莎士比亚图书馆。

巴：对对！我就觉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该有文化纪录，多年纪录下来，你没有这东西，空口说是不行的。我觉得曹雪芹纪念馆应该建立，这个意见很好。起初困难，以后就方便，供应材料就方便。〔周：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次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就得到很多人赞助。……〕是是！

周：巴金先生，您提的这个文学资料馆很重要，要不然时间愈久资料散失了，将来要研究很困难。

让大家看到海外书刊

巴：我想慢慢来，稳步前进，今天有一个建筑师写信来，他在北京找到一个地方，修建这资料馆，说要花一千二百万元，将来要有十年搞个很大的资料馆，包括展览、影像等。

周：不过我觉得有一点，要请您注意，资料馆是好的意见，我们最怕的就是在收集、管理的时候，假使有心胸很窄的人，只收集某一种资料，别的他不喜欢的，他就不放在里面。

巴：现在是各党各派什么都收集，只要是作家就行。

周：这个是很重要，要不然就更不好了，反而歪曲事实，

歪曲历史，搞得更坏。〔巴：对对！什么都要有，都要收集。〕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才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写下规定来，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资料都要保存在里面，绝对不能因为政治、道德、思想、信仰的关系就不放在里面啊！

巴：我们讨论过一次，大家都是这样的意思，搞是一定要搞起来的。

周：我希望海外的人能够参加一些意见，因为旁观者清，有些资料也许在国内找不到的，在海外反而找得到。

巴：是这样子的。因为海外也有好多作家。譬如很多资料，胡适的，徐志摩的，现在都在整理，将来要收集起来。〔周：应该是这样的，要不然割掉一段，受到垄断，就完全歪曲历史了。〕对对！将来要建设起来是很漂亮的，很大的，每天招待很多人。当然海外华人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当然大家也要出力。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现在也是不容易，大家研究讨论，需要时间来做。

总之我觉得好像一年比一年好，当然我们自己也得独立思考思考一下。

周：首先我是觉得国内的作家或知识分子或青年，能够看到海外的一些出版物，这很重要。

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态度，一方面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我见到外国朋友，老实讲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看到外国作品，情况也不了解，就是这样的。十年动乱搞得这样子。所以现在要努力，以前的书虽然不多，还是有一点。

周：其实不只十年。还有一点，不单是翻译啊，我的意思

就是说，世界各国出版的报纸、刊物、书籍，应该大量的供应过来，让大家自由看，要不然全世界别人搞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是吧？

巴：现在开始有一点。但是人才不够。

周：不过这些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大家心胸就闭塞了。

“这件事要慢慢来！”

巴：这件事要慢慢来，要有些人在叫：主要的是，等到你认为你可以看，他也可以看，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要这样叫才行，你要是不提，他也许就忘记了。你要两次三次去提，说我也必须看才行。别人才会注意，以后才会让你去看。

周：主要是要有人去要求，要慢慢来，我们要去鼓励鼓励，提倡提倡。所以我觉得，巴金先生，我讲您个人写作固然重要，在您这个地位，您的责任还是有的，您要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帮助、促进这个知识界、作家向比较开明、好的方向走去，对整个中国有贡献，对整个中国生活水准可以提高，知识程度可以提高，这样您还是要去讲一讲，我的意思是说您还是有影响的啊！

巴：我倒没想到这点，我只是作为一个作家，身体也不好，时间也不多，我只计划写点东西。当然我看到，考虑到什么事情，我会讲出来的，作为个人意见讲出来，大家参考一下。个人能力有限，我能起作用的，有把握的还是把东西写出来，

其它也不容易。

现在我们是十年动乱，困难太多，有些问题一下是很难解决的，有时候讲了话也起不了作用。

周：起不了作用是因为有阻碍，这还是要看我们应该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巴：自己看到的话，应该讲出来。

周：我不能耽搁你太多时间了。我们谈得很痛快，我觉得您所谈的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将来会写信给您，我们将来再联系。我们海外的人看到什么，或别人有什么建议，我可以告诉您，或者也能引起国内的注意。

我觉得国内也应该想到，海外知识分子也不是只受到外面的影响，不是这样的。

巴：我了解。

周：有时候批评，也是觉得不讲不好。

巴：我也觉得这样，你一味说好也没有用处，我就不赞成这个，有时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反而好些；一些办事的人主要外围有智囊团，这样是有好处的。

周：多年前郭沫若批评杜甫的时候，我也写过文章说他不对的呀！

巴：大家对他也觉得很可惜，……

周：太严重了，他歪曲杜甫，而且他没读通，就这样冤枉杜甫，就太糟糕了。〔巴：他不一定没读通，不知怎样那时忽然来那么一下。〕我在香港有些资料，将来寄给您。知识分子的病根就在这里，当时国内还有很多人不敢起来批判郭沫若。

巴：应该这样，做学问也好，研究道理也好，应该实事求是。……

周：所以国内社会上要是提倡自由，大家可以互相批评的话，自由批判就好，要不然，他变成权威的话，别人就不敢批评他了。

巴：现在大家都这样说吧，培养一种空气，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互相讨论。每个读者有权利批评，是作者也有权利替自己辩护。（周：就是。）所以我写有文章说，我过去有一个时候不敢替自己的文章辩护，结果自己迟早受到惩罚。作者首先应该替自己的作品辩护才是。

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

质量充实的一年

田所：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界的现状的？

巴金：一年多来，作品的数量激增，而且质量高。全国的文艺刊物多达一百多种，其中北京的《人民文学》、上海的《收获》分别发行一百一十万份。短篇小说评奖已经连续举行了三年。从今年起，中篇小说也开始评奖了，报告文学、诗歌也越来越充实。

中篇小说的获奖者中的《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作者叶蔚林、《天云山传奇》的作者鲁彦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作者张一弓、《蝴蝶》的作者王蒙，以及“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写出了《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等，都是四、五十岁左右，他们都是将来很有希望的作家。

---

* 本篇原收入一九八四年九月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巴金创作生涯》，篇末原有如下附注：“选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日本《朝日新闻（文刊）》，标题系编者所加。施小炜译，经巴金先生校审。”

田所：建国后三十年间，批判胡风、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接连不断，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巴金：批判胡风的时候，我也“人云亦云”，站在批判者的一边。现在他早已恢复了名誉，恐怕没有反革命的事吧，我在反省自己当时的言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发言，这是不行的。

不过以前运动过多，人人自危。作家应当坚持独立思考，必须大胆地说真话，写真实。

作品的辩护权

田所：您如何看待白桦的问题？

巴金：我还没有好好看过《苦恋》。作品大概有缺点，然而未必“十恶不赦”。我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有缺点，因此，可以就此进行讨论、批判，也可以针对批判进行反驳。作家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田所：白桦氏似乎还没有作过这种发言……，他是什么样的作家？

巴金：事物总有个过程。他当然是作家协会的一员，好像是湖南一带的人。孪生兄弟二人，哥哥叶楠是去年度最佳电影《巴山夜雨》的编剧，受到了表扬，而弟弟却受到了批判。白桦是有才华的，但写得太快。应当好好考虑之后再写。

田所：今年正值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准备会议上提出方针，强调研究鲁迅要“现实性与科学性相结

合”、“力戒单纯化通俗化”。鲁迅评价是否有变化？

巴金：鲁迅是位亲切的老师，我受到他的很大的影响。他具有令人敬佩的人格。但正如鲁迅自己说的，他的著作并非一成不变的《圣经》，而是经过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以为就应当本着这种精神来学习鲁迅。

田所：听说对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见纷纭。作家如果过分受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的束缚，是不是难以写出好作品呢？

巴金：这问题很难说。去年访日时，剧作家木下顺二问了同样的问题，当时我回答“是本好书”。创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必须为了读者大众。同时作家只有从生活出发，描写自己深有感触的事物，才能写出好作品。

尚有微薄的稿费

田所：您刚才说的小说评奖有无奖金？稿费呢？

巴金：奖金是有的，但不多。主要是精神鼓励。稿费现在还比较少。以前（至“文革”止）是多一些，“四人帮”时代完全取消了，现在正在恢复。我个人的想法是，作家应该仅仅依靠稿费生活。作家靠读者供养，势必会努力写出大量的好作品。我自己就一直是靠稿费生活的，从未领过薪水。

田所：中国文学的今后？

巴金：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很重要的。每个作家都按照这个方针写出好作品的话，就谁也无法捣乱。

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千百年来不都是这样吗？我对既有才能又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田所：想问问您的“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

巴金：制订计划是七九年的事，立了个目标，五年中写五本随笔，五本翻译（赫尔岑），两部小说，一部回忆录。迄今为止，已完成了两本随想录，一本翻译和《创作回忆录》。小说的主题想写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不善讲话，不便口述让人记录，只好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填方格。

田所：祝愿您的工作早日完成，再着手下一个“五年计划”。

巴金：〔笑〕谢谢，谢谢。

作家的任务*

——答南斯拉夫作家问

巴金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会见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马其顿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剧作家勃朗科·潘道夫斯基和马其顿作协秘书、诗人托多尔·切洛夫斯基，并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

问：您是有世界威望的著名作家，著作很多。在回顾您的文学创作道路时，您认为自己的哪些作品最为突出、最有代表性？

答：我自己编的《巴金选集》（十卷集），最近即将编完付印。我觉得《家》、《憩园》、《寒夜》三部小说，自己比较满意。"四人帮"控制的年代，浪费了我十年的光阴。现在，我年老了，准备在一二年内，集中一些时间，专门写两部长篇小说。我认为作家的任务是好好写作，不写就会被读者忘记。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界取得了新的成绩，出现了许多很好的中青年作家。

---

* 本篇原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文学报》。发表时题为《巴金谈作家的任务》，署邵刚整理。

问：二十年代您在巴黎深造过，当时正是法国社会动荡的年代，文学界出现过多种流派，请您谈谈法国文学是否对您有什么影响？

答：我当时是个穷学生，没有接触什么法国作家。在法国一年多，学会两件事：一是写小说，二是看电影。在国内，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作为消遣，读的多了，脑子里记下了不少。

我写《灭亡》是由于我熟悉那些生活。自己有苦闷，就拿起笔来写几个场面，发泄自己的感情。一九二八年八月小说写成。当时我还在法国，想用一些译稿换来稿费，作印刷费，托朋友把《灭亡》印几百本送人，并寄给我大哥看，让他了解我。但是朋友在上海收到我寄回的原稿，就介绍给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来我写《家》，写我大哥，刚写了六章，他就在四川家中自杀了。

我初到法国，身体不好，医生劝我休息。经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外省去住了一年多。乡下空气新鲜，身体渐渐好起来。那时，我读了左拉的小说二三十部。也读了雨果的不少的作品。可以说，我在文学写作上，受到左拉和雨果的影响大一些。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的作品。我现在正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问：可否请谈谈您的文学作品中，题材的来源和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答：作家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我的作品主要是写知识分子的生活。这些是我熟悉的生活。可以说，我的作品中

大多数是控诉旧社会的。《家》、《春》、《秋》等三部小说，也是反对封建压迫，揭露旧社会的作品，引左拉的话："我控诉！"

问：同中国一些作家接触、交谈，他们都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请问您是否也主张这种创作方法？

答：我主要考虑的是怎样了解生活，反映生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主义"，我不管，也没有想过。我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作品中去，用作品去打动读者，影响别人。

问：无论是东方文学还是西方文学，各有其自己的特点，您是否认为现在东方的特色，不吸收西方的特色？

答：我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民变得善良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个目的写作的。所以，凡是好的，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就都吸收它。但不知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写文章是用人物的命运、思想、感情去影响人，感动人，而不是用文学技巧。我主张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要靠外加技巧来吸引人。我主张作家与人要一致，作品与人品也要一致。我要读者相信的，也是自己相信的。

问：您如何看中国文学的发展？

答：作家靠作品与人民联系，近几年来的形势很好，出现很多中青年作家。他们了解生活，有深度也有广度。这些中青年作家知道为什么写作。他们有勇气、有信心。他们用作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有好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所以他们发展的希望很大。

问：过去中国闭关自守，现在向世界开放，文化交流的渠道也日渐广泛，您是否可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其它方面我不了解。我想中外作家应多进行文化交流，互相访问，翻译出版各自的文学作品，今后可以多来往。最近两年来，中国作家同南斯拉夫作家的接触有所增加，但是文学作品相互翻译介绍还做得不够，今后应多做一些。

问：听说您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不知您作何感想？

答：东方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少。去年我在访问法国时，法国朋友中不少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不以为自己可以得到这项奖金。我认为对作家的最大荣誉是读者们的喜爱。朋友们多次问到这个问题，我都是这么回答的。

现在中国作家协会正在筹办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今后我也要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

答瑞士苏黎世电台记者问*

巴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一九八一年他参加了里昂－巴黎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年会。那时，瑞士苏黎世的市议会邀请他访问瑞士。这次访问，实现了巴金青年时的夙愿。苏黎世的市民荣幸地在苏黎世城市的文学讲台上见到了巴金。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巴金作为苏黎世大学汉学系客籍讲师哈罗·封·塞恩尔(Harro Von Senger)先生的客人至今还是第一次，也是破天荒的一次在德语区用中文接受了有关他生平和作品的访问。采访之前，这位瑞士的采访记者用中文把所要提的问题写给巴金。因为巴金的话带有浓厚的四川家乡口音，所以在座的巴金女儿李小林——也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作为陪同，帮了很大的忙，为了避免误解，她时常用标准的汉语把她父亲的意思再重复一遍。

哈罗·封·塞恩尔：巴金先生，很荣幸受苏黎世电台的

---

* 本篇原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文学报》。发表时题为《斗争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马庆发译。发表时篇末有《文学报》"编者按"："这是从瑞士寄给本报的专稿。哈罗·封·塞恩尔先生是瑞士苏黎世大学汉学系客籍讲师。巴金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前往这所大学作客时，塞恩尔先生受苏黎世电台的委托，对巴金作了一次友好的采访。本报根据瑞士胜雅律先生寄来的德文本译出。原题《访问巴金》。因篇幅关系，本报作了删节。"

委托，请允许我对您进行一次采访。在哪一年您选择了这个笔名——巴金？为什么？

巴金：我是在一九二八年选择了这个笔名的。那时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刚脱稿，我把作品寄到一位同乡朋友那里，请他帮助印刷出版。当时，我和中国同学住在一起，他建议我尽可能起一个简单的笔名。我说"行"，就选了"巴金"这笔名。为什么起名为"巴金"？以前我在法国一个小城市Château-Thierry，同另一个中国同学住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他名叫巴恩波。分别不久后，我得悉他自杀了。为纪念他，我取了他的姓："巴"。那时我也没料到，会一直沿用这个笔名，而且会在一九二九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灭亡》时用这个笔名。"巴金"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第一次刊载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译文，一篇托洛茨基作品的译作。借此发表机会，我第一次使用了"巴金"这个笔名。那篇翻译是在《灭亡》完成后才开始的，但是先于《灭亡》发表。

塞：您在青年时喜爱体育吗？喜欢踢球吗？哪种运动是您的爱好？

巴：青年时，我一般不爱好体育，我也不会踢球。从前我喜欢看电影，可现在年纪大了，也不大看电影了。〔李小林补充：晚上，父亲常常独自一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节目。〕

塞：您的文学创作和创作的哲学背景可分成哪些发展阶段？

巴：我的作品是同我的思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时，我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当然以后逐渐改变了。总的来

讲，我想，我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或者两者的融合。

塞：那么，就不能有明显阶段的区别吗？

巴：不是那么明显，但青年时和老年时的感情就不完全一样。

塞：您有句座右铭吗？

巴：青年时，我有句座右铭，不过它仅仅只是一句话：斗争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塞：那您现在就没有座右铭吗？

巴：我整个一生都受这句座右铭的影响。

塞：您对哪些传统的中国作家和哪些文学作品评价最高？

巴：我喜爱并且受其影响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我对这部作品评价很好。

塞：您主要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完成的。为什么以后没有再写过类似的小说？众所周知，您目前正在从事新的长篇小说《长夜》。这部小说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巴：解放以后，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以前我主要描写的是旧社会的悲惨、黑暗的生活。一九四九年以后，描写题材改变了，描写新社会的新人和新事物。要写这些新人和新事物，必须首先同这些新人打成一片。如要真正认识这些新事物，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期。另外，解放后我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因此我的创作时间就相应大大减少了。不过，我还

是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现已出版了两集短篇小说。我没有再写长篇小说，但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我对它并不十分满意，所以至今没有发表，我也不打算再去修改这部中篇小说。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改名为《一双美丽的眼睛》，因为《长夜》这个书名已经多次出现过。我希望，这部小说的第一卷将于一九八二年脱稿。两部短篇小说名为《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

塞：在您全部作品中估计有五十余部翻译作品。您懂几种语言？您的译作在您整个作品中占有什么地位？

巴：在中国，我属于这样一种作家，即从事翻译和创作的一种作家。我翻译的作品都是我喜爱的，并且也是易于为中国读者所能接受的；例如施笃姆的《茵梦湖》和《迟开的蔷薇》。我喜欢他的作品，为了向他学习，我就着手翻译了他的作品。我翻译最多的要数屠格涅夫的作品。我翻译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至于谈到我的外语知识，我确实学过不少外文，但懂得很少。平时使用最多的是英文。

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您在里昂国际笔会上主张发展一种健康的、进步的世界文学。您是怎样理解“健康的、进步的”文学？

巴：按我对文学的理解，文学应该是积极的。文学应把人民大众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文学应给人努力向上的勇气，并促使人们热爱生活；文学应对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团结作出贡献。这些就是在我作品中所遵循的要求。我想起托尔斯泰的一句格言：把人类团结在一起的文学是好的文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塞：您的国内最近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的确，几亿人民的社会实践中，一种健康的、进步的文学发展起来，还需文学批评的促进，对吗？

巴：是的，文学批评的作用更加不可缺少。当然，作家对事物有自己的观点。我的经验告诉我，必须允许发表意见。有时评论家不了解作品的目标，这样的评论家的意见我不接受。我认为：一种健康的、进步的文学应符合广大读者的要求。首先，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家。

塞：在一九八一年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庐山年会上讨论了王蒙的作品评价问题。为什么王蒙如此引人注目？是王蒙特别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吗？

巴：王蒙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他是年轻一代充满希望的作家，准确地说，他属于中年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蝴蝶》获奖了。王蒙一直在探索，非常快地接受新事物，属于年轻作家的一员。按我的看法，他在中年作家群中最使人看到希望……

塞：您认为哪部作品是王蒙的代表作？

巴：他有许多佳作，我欣赏他的《蝴蝶》。

塞：王蒙特别明显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吗？

巴：去年，王蒙前往美国，并在那里逗留了四个月。在美国学习外语。他刚到美国时，不懂英语，可是在告别会上他已经会用英语说话了。

塞：根据您的看法，哪些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

巴：比较好的是《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

塞：浩然的《艳阳天》怎样？

巴：我觉得浩然的短篇小说不错。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我觉得也不错。这部书原来并不需要写成三部曲，但是他把材料拉长。至于《金光大道》和以后的情节发展，他过于拔高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情节发展是不可信的。但是他善于创作。

塞：在您的代表作《家》中，有点类似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写法，也是以一个家族生活为背景。您创作《家》过程中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吗？

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红楼梦》，我在青年时也读过这部书。这部小说对于我的创作不一定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也描写了寻欢作乐、老年和青年人的地位。

塞：您的作品《家》中对于精神过程的解释，是直接受到卢梭《忏悔录》影响吗？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没有这种形式的楷模？

巴：我读过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事实上我受其影响，特别有关心理描写方面，但不仅只受到卢梭《忏悔录》的影响。

塞：可以这样说吗，《家》中的心理描写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首创吗？

巴：〔笑了〕这很难断言，以前有没有。我对于这问题没有研究，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塞：……您的代表作《家》和《寒夜》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城市。您的这些作品在中国农民中引起反响吗？您收到过来自农村读者的很多信吗？

巴：我想，没有很多农民读过我的作品，主要读者是知识分子。我与农民接触很少，我非常熟悉的，是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因此我在作品中写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农民生活我知道甚少，所以没有写农村方面的题材。当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收到许多农村读者来信。因为那里住有许多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农村的婚姻自由更加受到限制。与从前一样，农村的封建影响还很大，不少农村的读者写信给我，因为《家》这部作品中描写了反封建的内容。

塞：瑞士文学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巴：我坦率地承认，瑞士文学著作我读得很少，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印象，我的看法就是如此。凯勒的作品我读的比较多，可是对我来讲比较难，这是要补充的一点。我读他的小说是中文版的，我也有德文版的《凯勒全集》，可惜我没有空去读。

塞：最后，您能描述一下您对瑞士人民和瑞士的风景的最初印象吗？

巴：〔笑了〕我到这里还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印象是：瑞士是世界上的花园，瑞士人民一方面热爱和平，另一方面热爱自由。瑞士人民是纯朴、开朗、善良，首先是平易近人、勤劳的。因此，我想成为瑞士人民的朋友。

塞：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并以瑞士电台的名义再一次感谢您。

巴：我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同您进行了一次交谈，解答了一些问题，彼此加深了互相间的了解。

谈文学创作*

——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早春，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我和文研所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老作家巴金的寓所。七十八岁高龄的巴金到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他身穿棉衣，虽然年迈，但思路十分敏捷，记忆依然清晰，亲切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您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何时？最早采用的文学体裁有哪些？在《文学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诗和小说（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创作？

答：我最早写的长篇小说，是一九二七年写的《灭亡》，当时住在法国蒂埃里堡，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一九二八年写成，登在《小说月报》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还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一九二四年，

---

* 本篇原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延河》第六期。发表时题为《巴金谈文学创作》，署花健整理。发表时文前有《延河》“编者按”：“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五十三期《文学报》上的巴金同志的这篇谈话，涉及了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见解精辟深刻，现予以转载。”

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

问：刚才您说过，您的第一个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写的，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是一九三〇年前后开始的，是不是这样？

答：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说是《灭亡》。我在一九二七 二八年写了《灭亡》，一九二九年写了《洛伯尔先生》几个短篇，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一九三一年写得最多，写了《家》等好多作品。

问：请谈谈您在创作前的理论准备和艺术积累上，对哪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感兴趣？您喜欢文学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因为我不是准备好去做作家才去读各种书，才去写作。我是在生活中有了切实的感受才要抒发，要表现，有兴趣就多写一点，没有兴趣就少写点。

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我倒是翻译过一些东西，譬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还有高德曼的《论现代戏剧》，发表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和《新女性》杂志上。

问：迄今为止，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哪些？

答：三本比较满意的书是《家》、《春》和《秋》，还有《憩园》和《寒夜》。在我写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因为我对里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写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满意，又譬如《萌芽》也是这样。相反，非常熟悉的题材就写得比较好些。

问：您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您觉得您的个性气质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突出影响？您怎样看待作家个性气质和自我完善的问题？

答：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要求自己说真话，要求自己对读者负责，至今我还觉得自己过去有时做得不好。

我喜欢俄国作家赫尔岑，他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我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问：您是采用外国题材最多的一个现代作家，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外国生活过，对外国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怀念那段生活，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因为国民党限制很严，报刊检查严格，我就用外国题材来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时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欧洲生活的，像《洛伯尔先生》、《房东太太》都是这样。

问：在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静淑等，他们有没有模特儿？他们所组织的宣传、罢工、暗杀、辩论等，在生活中有没有真实事例？

答：这个问题在小说总序中已经谈过。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对《家》里写的生活我比较熟悉，原型较多，

就比较真实，不熟悉的编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问：您的前期创作活动持续了二十余年，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后暂时停止了？

答：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写完《寒夜》后，当时忙于搞编辑，搞翻译，事情很杂、很多，因而写作的时间就少了。

解放后我想换支笔，写点新的生活，这要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会活动多，深不下去，写作也就有限了。

问：请您谈谈自己选材、构思、描写的习惯与体会。

答：这个比较难说。最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走文学道路，家里希望我学工，然后扬名显亲，可是我走了另一条路。我说过《家》里面高老太爷和觉新两个人是完全真实的，觉新就是我的大哥。我对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写的时候比较顺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写出来了。我写的时候不是苦思苦想编造出来，我有生活，有感情要发泄，就自然地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问：您的小说创作几十年来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您认为哪些关于您思想与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是较深入的？

答：很难说，我看得不全。陈丹晨的那本书送来后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看，只把书中一些和历史事实明显出入的地方指出来，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评论家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评论家以作家作品为题材。研究的对象不同，评论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独立思考。写书总是写

作者自己的观点，我不好说要别人这样写那样写。研究我的专著，听说南京有人写，四川也有人写了。

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对您的文学创作活动有较大影响？

答：我平时也不大出来参加什么会议和活动，就关在家里一个人写。都由我的一个朋友和文化界接触，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写了什么就交给他带去，编辑部有许多要求通过他转达给我。

我喜欢鲁迅的作品，愿意追随鲁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对我有影响，不过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我喜欢他的《女神》、《三叶集》，后来茅盾的作品陆续发表后，我也开始喜欢他的作品。

在现代作家中，曹禺、沈从文、靳以和我是比较熟悉的。

问：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国《世界报》记者谈话中，谈到您读了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很受感动。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

答：是的，当时罗曼·罗兰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看到托尔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甚至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就写信请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信答复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团结，为了使人变得好一些、善一些，是为了对人类进步有利，是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统一的。我看了十分感动，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托尔斯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要说真话。艺术

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们变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才写作的。

但是托尔斯泰走到了极端，他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我却认为文学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对人类进步起作用的。

问：您说过："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就是让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我认为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让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个性发展。我记得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着他们。我不像茅盾那样写过详细的提纲。当然各个作家的习惯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情一下子写下来，着眼于人物的命运，人物自己活动起来。我把文学作为武器攻击我的敌人，攻击旧制度。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家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

问：您最近还在写作吗？

答：是的，我还在写，不过身体不太好，写字困难，写得比较慢。

“我是把文艺作为武器进行战斗的”*

——会见日本学者樋口进教授时的一席话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来华访问的日本西南学院樋口进教授专程到医院看望了巴金，带来了许多日本朋友的衷心问候。巴老满头银发，虽然腿脚有些不便，但记忆清晰、思路敏捷，与樋口进教授亲切握手，相互问好。

樋口进教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研究巴金的学者。他介绍了巴金作品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和近来日本出版巴金研究的一些书籍，又询问了巴金的二叔、三叔留学日本的情况。

巴金说：“现在出了一些研究我的书籍，如河北出的那本，四川出了两本，宁夏也出了一本，等等。这些书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有些事实没有搞清楚，也许是年代久远了。一些往事，我也记不准确了。如我去世的十妹，我把她的名字也忘记了。但记得她是一九一七年去世的。我的爱人是一九一七年生的。

* 本篇原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文学报》第一五〇期。作者署名花建。

“关于我叔叔的情况：二叔和三叔在日本留过学，大约是在早稻田学法律吧。我的二叔叫李道溥，三叔叫道洋，五叔叫道沛，六叔叫道鸿，父亲叫道河。我的祖父叫李镛。旧时代起名字是按家谱、按辈份起的。我祖父是金字辈，父亲是水字辈，我们这一辈是木字辈，下一辈就是火字辈了。

“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做过县官，一九一一年回到成都。现在成都还有我二叔、三叔、五叔、六叔的后代，我的一些堂弟就住在那里。”

我作为陪同樋口进先生的工作人员，也向巴金请教了自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问：“您在二十年代初就发表了二十首新诗，在以后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您还创作了哪些诗歌呢？”

巴金说：“二十年代初，我很年轻，看了《春水》、《繁星》一类新诗歌，受到感染，模仿着也写了一些，投到《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就是后来登出的那几组小诗。

“‘九·一八’事变时，我也写过诗，当时是《小说月报》要我写东西，我就写了一首诗和一篇散文，他们发表了。抗战爆发后，我也写过几首诗。以后这些诗都收进我抗战时期写的散文随笔集中。

“还有一首诗就是小说《初恋》中的《失去的星》，先是单独发表过，后来就作为小说中一个人物唐君写的诗了。”

我又问：“我觉得您在《家》、《春天里的秋天》、《寒夜》等小说中都有出色的环境描写，创造了一种悲剧的气氛，这是您小说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雨》、《电》等小说中，这类描写就少得多了，这是为什么？”

巴金微笑着，说："我说过我不是艺术家，我是把文艺作为武器进行战斗的。当时我写作是要拿起笔向我的敌人开火，控诉那个黑暗的社会。所以，我是有什么武器就拿起什么武器，能用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什么武器有力就拿它来作战，并无形式上的刻意雕琢。

"我在作品中写进了我过去的生活和环境，对于我所熟悉的环境就写得多一些，细致一些，不熟悉的相对讲写得少一些。

"一般说，我对人物内心描写得多，外表描写得少一些。

"我怀着热情写下作品，写出后总觉得不满意，就反复修改。不断地写，又不断修改，才逐渐满意一些。我是边写边学，后来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

我说："每位杰出作家都是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者。您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中提到了对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和川戏艺术的吸收。我觉得您在实际创作中的借鉴和吸收有更广泛的内容，是这样吗？"

巴金沉吟一下，说道："小说比较难说，倒是我的散文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较深。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了很多古代散文的名篇，当时年龄小，不太懂，后来在创作中回想起这些名篇，慢慢体会起它们的好处，就逐渐消化吸收了。

"我提到过的川戏《周仁上路》，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它用一个人短短的自述把故事交代得那么清楚，写内心斗争和思想反复很传神，很深入，富于感情，突出了人物的

性格，可见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深厚。对这样的民族传统文学(包括戏剧)，我是很喜欢的，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总之，不论古今中外，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我都不断地学，不断地体会吸取，不断有所长进。

"童话创作也是这样，我读过不少童话作品，我比较喜欢的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受到他的影响，写了四篇童话。明年我的童话集的法译本要在法国出版。"

我插问道："巴老，您从年轻时起能够直接阅读哪儿种外国语作品呢?"

巴金笑道："有英文和法文的。读俄文的书，必须借助工具书。那时候我翻译赫尔岑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主要是从英、法文本转译的。我也阅读世界语的作品，对于世界语，我起先学得并不好，一九二四年在南京进行了较认真的自学，以后读书就容易得多了。"

日本客人樋口进教授与巴金进行了自由而亲切的交谈。他表示巴金的这些话，对于他研究巴金著作大有益处。最后，巴金告诉客人，他近来经过医院治疗，身体已经好些了。大家为此感到欣慰，并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答《文学研究会资料》编者问*

我不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跟文学研究会的联系还是早的。一九二二年我在成都读书时，就给《文学旬刊》写过小诗。这些小诗计有十多首，是用“佩竿”这个笔名发表的，还用“芾甘”署名给《文学旬刊》的编者写过一封信。另外，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上也发表过小诗，时间在一九二二、二三年吧。那时的稿子，大都是直接寄给郑振铎先生的。

一九二三年以后有较长一段时间，就再没有写什么。

一九二七年我到法国去，在巴黎和外地写完了长篇小说《灭亡》，寄给在上海的朋友索非(姓周，笔名A. A. Sofio)，他送给叶圣陶先生看，叶先生当时是《小说月报》的代理主编，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它。这部小说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至四期连载时，我已由法国回到上海。

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又写了长篇小说《新生》，交给《小说月报》，还未发行就毁于“一·二八”战火；后来出版的那本《新生》，是我重新补写的。

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有我

---

* 本篇原收入一九八五年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版《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原题为《访问巴金》。署苏兴良整理。整理稿经巴金审定。

的两本书:《沉落》和《生之忏悔》。《沉落》一书在初版时,商务印书馆把书名印错为《沦落》(三十二开本), 后来收到小说集时更正为《沉落集》。商务印书馆还把这本书的第三版编入《初中文库》(王云五主编的小丛书)。《生之忏悔》是四十八开的小本书,是本散文集。

三十年代以后,我跟郑振铎的关系就很熟了,一起编过杂志。

1980年5月17日。

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问*

问：我记得您形容自己的写作时说过："我不过是一个加工工人，用生活的原料来进行加工的工作。"请问您的加工程序是怎样的？

答：我是根据我国人民的看法和分析，把生活写出来。这是我眼睛里看到的、我体会到和感觉到的生活，并不是说真实的生活就一定是这样的。

问：您曾一再强调您是不谈技巧的，并且曾经写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答：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问题。我最初写作时还常写别字，后来慢慢学习、慢慢改、慢慢熟了才懂得文章怎样才能写得更好一点。根据我的写作经验，所谓技巧就是中国一句俗话："熟能生巧"，写多了，写久了就懂得怎样驾驭文字。"巧"就是避开、掩盖、弥补自己的缺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我自己写作是没有什么技巧的，我只是想打动读者的心。比如，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很感动，于

---

* 本篇原收入一九八六年十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版《巴金研究在国外》（张立慧、李今向编）。收入该书时题为《访问巴金先生》，并由编者作有题注："选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访问者为该刊编辑。"

是我说给别人听，说的次数多了，就不断加工，写得更完美一点，使别人有更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作品的存在主要在乎它的内容，不是它的形式，真正漂亮的人是不需要打扮的。当然，打扮也有好处，可以使他更漂亮。但我自己很丑，要我打扮也不会漂亮。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这只是我对写作的一种看法，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问：这大概也就是"但见性情，不见文字"的境界吧。让我们转过来谈谈您前后期作品的不同风格。一般读者以为您早期的作品，情感泛滥，一泻千里，近期作品则转趋醇挚沉厚，您以为怎样？

答：我最初写作时，只是想到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全拿出来，满肚子话全吐出来，要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后来写《憩园》、《寒夜》、《第四病室》时，生活经验多了，对当时的实际生活了解深一点，于是便把生活本身的事实摆出来，去打动和影响读者。到了近来，年纪大了，经验也更多了，感情也深沉一点，不再像年轻人那样的。现在什么事情都考虑考虑，想得多些，周到一些。

问：您的长篇小说都是在解放前出版的，为什么以后就没有再写？

答：主要是过去写惯了黑暗、痛苦的东西，解放后，我希望换一枝笔，写人民的欢乐，写新的人、新的思想。但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不熟悉。而我要熟悉新社会新生活，时间也不够，因为其他新的工作、社会活动也花了我许多时间。所以写得很少，而且都是短篇。我错就错在不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

要去写不熟悉的东西,结果写不出作品来。

问：您现在正计划写两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是吗?

答：几年前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两部是长篇小说。当时我身体好些,外国记者跟我谈话,我就讲了出来。本来早点讲出来也有好处,可以推动我快点写,也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两部预备写的长篇小说是《一双美丽的眼睛》和《扑不灭的火焰》，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文革”中的遭遇，写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一双美丽的眼睛》大概前年已经开始写，本来准备每天写千多字，但后来因其他事情而耽搁了,放下来了。近来，身体不好，三年就住了一年医院,现在更患有帕金森病，写字很困难，要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地写，每天只能写二百字。如果身体好一些的话,生活又没有干扰,这部十六、七万字的小说,一年左右大概可以完成。

问：这部小说是否有自传的成份在内?

答：这很难说。我以前写作就是只有一个主题，没有提纲,开了头就让人物自己发展,让人物自己生活。所以要写了出来才可以作准。

问：您其他的写作、翻译计划,现在进行得怎么样?

答：除了刚才所提的写八本书，我本来还计划翻译赫尔岑(A. Herzen)的五卷回忆录。总的来说，我现在一共还有七本书未完成，晚上睡觉挂在心里。《创作回忆录》出版了，《随想录》也出版了四本,第五本才开了头。小说我希望能够完成

一本，《扑不灭的火焰》恐怕会成为不兑现的支票了。至于翻译的五本书，第一册已经出版，其他的，如果我完成不了，已经说好由一位朋友代我继续翻译。

问：您一九七九年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曾经说过写不写自传八十岁以后再说，您现在有没有想过写自传呢？

答：我想还是先写完最后一本《随想录》和一本小说，以后有时间才再考虑写自传吧。但是我的困难是记忆力差了。茅盾先生最后的一本著作是回忆录，他花了许多功夫，每一件事、每一章写好了，还要到处找资料去核对，我恐怕没有这个条件和精神。

问：您在《随想录》里不断提倡说真话，并且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主要是针对什么的？

答：我写《随想录》是作为遗嘱写的。我写作四、五十年了，走了那么长的道路，是要总括一下自己的看法的。我讲自己的看法，不是一定对，但对后人来说，也是一种参考。所谓说真话，就是讲自己心里的话，自己相信的话，自己思考过的话。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想到自己的问题，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有一个时期也曾相信"四人帮"的假话，也曾在武力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所以我提倡讲真话，这是勉励自己。讲老实话是要从自己做起，我要写下我的经验，主要就是不让这种"浩劫"再发生。如果大家都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作家要创作，就要独立思考，不然，多一个作家有什么好处？

问：中国的作家说真话会不会受到压力？

答：我看压力不能说没有，但也不会大。你认为生活是这样的，事实是这样的，你的分析是这样的，人家也不能强迫你改变。任何一个作品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批评，有人赞成，关键是自己有独立思考，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作家写的如果是真话，别人是改变不了的。

问：现在内地作家是不是仍然受到许多框框的限制？

答：如果自己思想解放一点，就能写得解放一些。如果写的时候，老要考虑这个过不过线？那个对不对？就会觉得诸多掣肘。作家应该说真话，把自己相信的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

问：您觉得现在内地的作家怎么样？

答：我现在生病，看的东西不多，但我接触到一些中、青年作家，感到他们比我们强得多。生活培养作家，经过十年"文革"，很多人对生活的理解也深了，反映生活的题材也广了，他们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都写得较成熟，特别是一些中年作家。

问：您对青年作家有什么忠告？

答：作家要写得好，首先的条件是有话要说。当然他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最好是"武装到牙齿"。其次就是要多写，多写才能熟能生巧。

问：您带头倡议设立的现代文学资料馆，现在建馆工作做得怎样了？

答：文学馆是中国作家协会下的一个单位，有一个二十多人的筹备委员会，设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寺。文学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现已收集了五万册书，其他资料也正在征集。目前有关茅盾和老舍的资料较多，我自己的也有，主要是手稿、信函、图片等。现在已经开了几个专题的陈列室，曾经试过开放给文艺界人士参观，但正式建馆大概要明年初。以后如果有钱，会盖一座较完美的场馆。

问：最后，请您说一说您的笔名的由来，因为过去许多人都误以为您是取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的译名的首尾两字来做笔名的。

答：这个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但是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一九二八年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写完了《灭亡》，想取个笔名，刚好当时的中国同学"巴恩波"投水自杀了，为了纪念他，我便取了"巴"字。而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我就取了一个"金"字，合成"巴金"的笔名。我一九七九年再访沙城的时候，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自己的名字也找不到了，倒找到"巴恩波"的名字。

探索友情*

——与井上靖的谈话

井上靖：今天巴金先生在国际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我非常高兴。

巴金：谢谢。井上先生最近很忙吧？

井上：这四、五天，非常忙。今天本来想跟先生好好谈一谈，但还有一些事情等我去商量，所以不能尽兴，只能谈一会儿。见到先生以后，我回家又查了查日记和资料，和先生第一次见面是昭和三十六年，即一九六一年，离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那时候先生很年轻，我也很年轻。

巴金：记得那天下雪，我们到府上去拜访。

井上：不，我说的是在上海见到巴金先生那次。

巴金：我记得是在日本开亚非作家会议的时候，见到先生的。不是三月，就是四月，后来先生到上海去，我们又见了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当代文艺思潮》第六期。发表时篇首有译者（陈喜儒）所作按语："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下午，应邀赴日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的中国笔会代表团团长、中国笔会会长巴金在下榻的京王广场饭店与日本笔会会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对谈。本文根据日本文学杂志《昴》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第七期和现场记录译出，并由巴金同志订正。"

井上：先生确实到我家里来过。如果说是下雪天来的，那就是昭和三十五年，即一九六〇年吧？

巴金：是一九六一年。从那以后，在上海，在我家里常常见面。

井上：是的。那次在上海到府上去作客，还见到了您的夫人，非常愉快。

巴金：是的。

井上：记得是与龟井胜一郎先生一起去的，还吃了冰淇淋，味道极好，我以为是你家自己做的。

巴金：那天上海非常炎热，所以你觉得冰淇淋特别可口。

井上：一九六三年，我到北京参加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活动，见到了郭沫若先生。途经上海，见到了先生，但时间很短。

巴金：鉴真和尚的纪念会，大概是由中日友协主持的，不是中国作家协会。

井上：是的。

巴金：我是到饭店去看望先生的，而且那天还一起喝了酒，我心里高兴，也喝了不少。

井上：我可是开怀畅饮……〔笑〕三年以后，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文学界的周扬先生、茅盾先生、夏衍先生以及这次来访的刘白羽先生很快就在报纸上消失了。到了八月，老舍先生、巴金先生也不见了。我是从日本报纸上知道这些消息的，心情为之黯然。

巴金：一九六六年六月末到七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日本来的作家代表团中有中岛健藏、白石凡先生。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会后陪着日本朋友到武汉、上海参观，直到送他们上飞机回国。送走朋友们以后，我马上受到了批判，那是八月份。

井上：日本的报纸报道巴金、老舍先生不再露面也是八月。

巴金：对，是八月，因为八月六日会议结束，紧接着我就被批判了。

井上：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去中国。因为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十一年以后的一九七四年，我去中国访问，当时处于"四人帮"时代的末期，当然不会见到先生。昭和五十年，即一九七五年，我去中国，也没有见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我去中国还是没有见到先生。直到一九七七年，形势渐渐好转，我又去中国旅行，在上海机场才算见到了阔别了十三、四年的巴金先生。

巴金：那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吧？

井上：是九月。在机场上，我对夫人的逝世表示哀悼。当时先生说读了我的那篇写老舍先生的小说《壶》，我感到很惊讶。

巴金：那天见到井上先生时，已经要上飞机了。在此以前，我收到了先生赠送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桃李记》。我在入睡之前看书时发现其中有一篇写老舍先生的《壶》，一口气读完了，很感动，第二天早晨在机场与先生讲了。我们知道老

舍先生死了，但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写文章纪念。而井上先生却写出了关于老舍先生的文章，比中国作家还早，我读了非常激动。

井上：当时先生也是这样讲的，我非常高兴。我是外国作家，可以自由写作。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在北京见到了先生，谈了很久，那次访问是我终生难忘的。当时中国生气勃勃。除巴金先生外，还见到了茅盾、周扬、夏衍、刘白羽、楼适夷、杜宣、老舍夫人。

与先生的谈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先生讲，以后要锻炼身体，努力工作，多写东西。这些话，我将永远铭记。

巴金：我是到北京去开会，正好遇见诸位先生。我记得有五、六个日本作家，其中还有水上勉先生。我去北京饭店看望大家，谈了很久，很晚，很热烈，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你们还邀请我参加了告别宴会，周扬先生也去了。他提议大家一起干杯，而且激动地讲了文革中在街头遇见日本朋友的事。

井上：我也记得，在大街上遇见周扬先生的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那次访问回国后不久，从报纸上知道郭沫若先生逝世了。后来，我每年都到中国去，每年都能在上海见到先生。

巴金：有时在北京也能见面。一九八〇年我从瑞典开会回到北京，听说井上先生一行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到上海去。我刚开会回来，不能马上回上海，说不定会见不到先生，所以当天晚上就到饭店去看先生。那次中岛京子夫人也来了。

井上：我经常到中国去访问，受到热情接待，交了许多朋友。但现在有许多人已经不在了。老舍先生、田汉先生，是我最初到中国时认识的。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诗人李季先生也逝世了。还有学者、北京学派的吴晗、邓拓先生也不在了。想起来，这些朋友好像就在眼前。

巴金：井上先生朋友很多，有些人去世了。但又交了许多新朋友。

井上：文革以后，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简直是数不胜数。

巴金：我觉得友情经过时间的考验，越来越深。我曾多次讲过，文革中我在牛棚里受审查时，一想起和日本朋友坐在一起谈笑的情景，心里就感到温暖，感到欣慰。我们的友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井上：三年前，我在上海的医院里邀请先生到日本来参加笔会大会，那时先生说，只要我的身体能动一定去。这次刚刚出院不久，就到日本来了，我真高兴。先生在前几天讲话中说，以前已经约好，所以我来了，是来助威的。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巴金：我是来向日本朋友们学习的。先生在过去的一次酒会上说过，国与国间的友好，民族与民族间的友好，都要建立在个人与个人友好的基础之上。我们两国的历史典籍上记载着许多友好的故事。

井上：无论是读先生的《随想录》，还是听先生的讲话，我都感到只有巴金先生才能这样写，这样讲。先生的作品中，浸透着先生的品格。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巴金文学的特点，我以

为就是真诚的感情和对人类的深厚的爱。先生今天的大会发言之所以那样激动人心，就是因为充满了真诚的感情和对人类的深厚的爱。

巴金：谢谢井上先生对我的夸奖。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靠友情生活，靠感情写作的。我在写作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感情。

井上：先生这次是作为中国笔会会长来参加大会的。这使我想起了日本笔会的第一任会长岛崎藤村先生。日本笔会是在昭和十年秋天成立的。比国际笔会晚十四年，后来作为国际笔会的一个成员参加活动。一九三六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国际笔会大会。那时，藤村万里迢迢出席了大会。他觉得自己是会长，应该去出席。但那一年是多事之秋。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日德签订了防共协定，在欧洲，德国进驻莱茵兰，西班牙内战，意大利控制埃塞俄比亚，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藤村七月乘船从神户出发，路上走了四十多天才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了为时三天的国际笔会大会，并且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文学家历来追求纯洁的美，这丝毫不应干与，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也必须关心世界的和平。我认为这个讲话至今仍然适用。

巴金：的确如此。

井上：他回来时到了法国，当时法国正处于动乱之中，他匆匆而归，顺路到了上海。那时鲁迅逝世刚刚三个月。藤村去了上海的内山书店，坐在鲁迅曾经坐过的椅子上。后来他在文章中说，他恍惚觉得鲁迅的体温传到了自己身上。

我认为藤村的初心，或者初志是可贵的。一个文学家的诚实是可贵的。巴金先生来参加大会，使我想起了岛崎藤村。

巴金：我也很尊敬岛崎藤村先生。大概是凑巧吧，我的几本书与岛崎先生的书同名，例如我写了《家》；岛崎先生也写了《家》，我写了《新生》、《春》，岛崎先生也有同名的作品。

井上：真是这样。

巴金：书名完全相同，真是奇怪。井上先生前几天在开幕式上说，没有别人的幸福，怎么能有自己的幸福，只追求本国的幸福和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没有它国的幸福和繁荣，怎么能有自己国家的幸福和繁荣？我非常感动，完全赞成。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井上：谢谢，您这样讲，我非常高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但是，把这些思想变成现实却是非常困难的，现在还有战乱，还有人间的不幸，但总有一天，没有战争的时代会到来。如果不坚信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活下去。

巴金：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出席东京大会的作家们的愿望、他们的呼声会传遍全世界。

井上：巴金先生在国内的日常生活如何？

巴金：我近来身体不好，很少出去，一直在家里养病，有时写点文章，或者朋友来了，一起聊天。我不太运动，所以身体不好。年轻时一年写七八个月，剩下三、四个月到处跑跑，看看朋友。这三十年，很少出去。

文章比年轻时写得少多了，有一个时期，会议很多，要参加各种会议，做很多杂事，写文章的时间很少。一九七八年井

上先生来访的时候，我说要写十三本书，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一直在写，但一九八一年病倒了，开始时背上长了痈，很是苦恼，之后又跌断了腿，接着又是帕金森氏症，入院住了很久。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可以写作了，但我的身体不好，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工作。但我要争取恢复健康，写两部长篇，如果写不出来……

井上：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文学现状如何？

巴金：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有很大发展，涌现了许多中、青年作家。作品的题材与以前相比，更加广泛、深入了，今后会更好。随便举出几个名字，有一个中年作家叫张贤亮，他最近发表的《绿化树》写得不错。他以前写过《灵与肉》，与《绿化树》相比，还显得不够成熟。《灵与肉》上海电影厂拍成了电影叫《牧马人》。这次笔会代表团有个作家叫邓友梅，懂日语，我觉得他写满族人民生活的作品很精彩。

还有一位比邓友梅年轻的作家叫张承志，我在前几天的酒会上遇见了他。他也写了很好的作品。如《黑骏马》、《北方的河》，《黑骏马》得了奖。

井上：这些作品译成日文就好了。

巴金：这些中年作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革虽然是巨大灾难，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使人经受了磨练，反倒变成了这些作家作品的营养。

井上：巴金先生日本读者很多，最后请您向日本读者讲一句话。

巴金：我希望他们对我提出严格的批评。

与日本作家的对谈*

有朋自远方来

——与井上靖的谈话

个人与个人的友好是民族、国家间友好的基础

井上靖：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是二十三年前。在过去的二十三年岁月中，“文革”时期有十几年没有见面。“四人帮”以后，我们年年见面。想起来，比与日本的要好的文学家见面的次数还多。每次见到先生，我总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换言之，就是觉得先生有一种文学家的温和和严肃。一言以蔽之，就是觉得先生具有文学家的勇气。

巴金：先生过奖了。

井上：不，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丝毫没有奉承的意思。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四年长春《日本文学》第四期。发表时文前有译者(陈喜儒)所作按语：“中国笔会会长巴金作为荣誉客人，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东京大会。在日本期间，他与井上靖、木下顺二分别对谈。这里发表的谈话内容是根据五月廿四日《京都新闻》和五月十八日《朝日新闻》移译的，经巴金亲笔订正。井上靖是日本笔会会长、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木下顺二是当代著名戏剧家。”

巴金：我在日本有许多朋友，其中与井上先生感情最深。我与井上先生第一次畅谈是二十三年前的一九六一年早春。那天飘着小雪，我到先生的家里去作客。还有一九六三年那一次，印象也很深。在上海和平饭店，我们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先生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中两国人民更容易亲近。我很同意。确实，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我和井上先生平素都不大爱讲话，但我感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共同的感情，可以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我们之间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伟大的理想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要为两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交朋友爱说交到底，就是说至死不变。对于朋友要做到三个字——忠、信、义。

我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关在牛棚里。当时到上海的日本朋友要求说"我要见巴金，他不是干坏事的人"，这种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支持我度过了困难时期。我得到了这种友情、我觉得有了两倍的勇气和力量。井上先生说国家的友情、民族的友情，必须建立在个人友情的基础上。我完全赞成，我们的友情正是这样的感情。

用国际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井上：是的，完全是这种友情。在先生蒙受苦难的时候，我有十年没有到中国去。相隔十三年后，在上海机场见到了先生。当时那种喜悦的心情，我是终生难忘的。

先生说，这次在日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一定要开好，因为这是在亚洲召开的大会，而且是在邻国日本召开的大会，一定要开成功。为了支持日本笔会，先生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对此，我不胜感谢。来日以后，先生还发表了充满感情的精彩讲话。

巴金：我这次来参加大会，一个原因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特别是向井上靖先生表示谢意。井上先生为了筹备这次大会，长期以来做了许多工作，非常辛苦，我住在医院里，一年中，井上先生三次来看我。所以我想，即使病没有完全好，我也要参加大会。另一个原因是“核时代的文学”这一大会议题打动了我的心。我想，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全力为世界和平奋斗。我认为这是当代作家的责任。

写“文革”

井上：先生说今后要写两部长篇小说，已经开始了吗？

巴金：其中的一篇写了一点。

井上：太好了。读先生的作品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巴金：我想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日本遭受了可怕的原子弹的轰炸，而中国遭受了“文革”的灾难。我在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但我想，这对人类也一定有好处。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不再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井上：完全赞成先生的意见。我也和先生一样，想再写二、三部小说。为了写小说，必须有健康的身体。今后最重要

的是要保养身体，这样才能有写小说的精神和体力。这一点，我与先生的心情是一样的。

巴金：井上先生身体很好，精神、精力都很旺盛，我想没有问题。

井上：不，我喝酒，周围的人都劝我节制，特别是全体家属，呼声更强烈，最近我多少听了一点他们的意见。

巴金：我也赞成适当控制一点。

井上：让您费心，实在不好意思。既然先生讲了这话，我一定遵守。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巴金：我想，全国的读者也会赞成我的意见。

重新评价孔子

井上：我把还没写的小说主题告诉有世界声誉的巴金先生，实在感到不好意思。但在这美好的日子，还是对先生讲吧。纪元前五百六十一年，召开了葵丘会议，黄河沿岸各国盟约不用黄河之水作为武器。孔子就是在那一年诞生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孔子希望天下安定，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使周围的庶民百姓感到生在人世的幸福。基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仁道"。

简单地概括所谓"仁道"，就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确立父父子子的关系，从生活家庭方面确定人的道德观念。这是了不起的。当时还没有佛教、基督教，在那样的时代，孔子就认为，只要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建立起和平的理想的社会。这就是我现在所想的，要写的。

巴金：我回到上海以后，想读一读关于孔子的书，或者孔子写的东西。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每逢七月二十七日孔子的生日，就要给他的牌位磕头。

小时候每天背孔子的书，背四书五经，背不下来，老师就用竹板打手心。虽然要求背诵，但老师一点也不讲，只是硬背而已，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

渐渐长大了，家里人常常用孔子的话来教训我们。后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开始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号召打倒"孔家店"，我很高兴，很兴奋。

当时我很年轻。对反对封建礼教，很赞成；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反感。在我的小说《家》中，年轻的主人公就有反孔的思想。小说中的主人公反对父亲的压迫，反对父与子之间的仅仅是上对下的关系。我写《家》的时候二十七岁。当时的社会与现在完全不同。先生刚才讲的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现在应该冷静地、客观地重新研究一下孔子，我期望从井上先生的小说中再认识孔子。

井上：我是想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写孔子，这也是我的小说的一个主题。长期以来，人们把孔子当作圣人，我想把他当作普通人来写。二千多年来，孔子一会儿被肯定，一会儿被否定。长期以来，我个人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对孔子的肯定、否定的过程，但我现在肯定孔子，想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

巴金：现在想起从前背诵的孔子的话，有些是很有道理的。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话讲的很正确。

井上：是的。我把先生称为朋友是失礼的，但正像先生

讲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完全符合我的心情。仅从这一点来说，孔子也是了不起的。

作家的责任和良心

——与木下顺二的谈话

木下顺二：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是一九五五年，后来多次见面。我觉得巴金先生精神很坚强，虽然经受了许多苦难，但顽强地支持着，对此，我很钦佩。我记得我们是在二十九年前，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上见面的。那时有和平五项原则，是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时代。三十年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是核的时代。

四年前见到先生时，先生有一个五年计划，要写十三本书，听说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多半。虽然病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休息，对此我很感动。

《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这三本已经译成日文(均为筑摩书房出版)。在这三本书里，您尖锐地进行自我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自我解剖。据说，有的中国人说您对自己过于严苛了。反过来，这也说明您对现在、未来不仅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也充满希望。您在《随想录》中说，要把心交给读者，又说要像春蚕一样，把一切献出来，留给人间一点温暖，这对我也是一种批评，因为我早就觉得应该退休隐居了。

巴金：一九八〇年访日时，我们在新大谷饭店对谈，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谈得很愉快。当时我讲了自己的五年计划，但现在还没有完成一半，而且身体不好，心里很着急。

木下：您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精神极为可贵。而且这种对自己的批评，非常真实、感人。先生身体不好，还做了这么多工作，令人钦佩。

巴金：译五本书，写八本书；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完成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没有完成的工作。

我写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自己走过的路，要把自己的经验留下来，使人们了解自己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感受。叫子孙后代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做人和写作是否一致。现在年纪大了，在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很着急。

年轻的时候，想写的东西，激动着自己的东西，也没有深刻地思考就动笔写起来。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在想，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应该为青年留下点什么？我觉得不能想到什么写什么。

我想要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作家，主张什么，是否实践了。在生活方面是否与自己说的一样？我主张作品与作者的一致，写出好作品的人在生活方面不好是没有说服力的。我要在五本“随想录”里说明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作家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

木下先生刚才说我在进行自我批评。是的，我要自我解剖，把自己袒露在读者面前，包括一切坏的地方……

一九八〇年我访日时，在朝日讲堂作了一次讲演。在我讲完后等车的时候，有一位翻译我的书的友人走过来说，他很

感动。以前听很多人批判文化大革命，但是第一次听到你结合批判自己、解剖自己来批判文化大革命。可是，我却觉得对自己的批判还很不够。

木下：自己解剖自己，这是痛苦的，而把痛苦一行一行地写出来，就像切割自己的心一样。日文版的《真话集》第一百六十八页有这样一段：巴金先生在上海多次被批斗，"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荣幸。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

这一点，与我的想法一样。巴金先生有良心，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没有被重用。也许我的情况与此有些不同。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问题，我没有当过兵去侵略中国，也没有参与把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活动，没有直接的责任。但这并不是因为我高明，而是因为我太年轻，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为此我感到非常不安。

西德有个剧作家叫马路丁·巴鲁扎，他说自己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这是基督教原罪的思想。我觉得没有批判自己的精神是无法批判别人的。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写作品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君在什么地方也说过，文学的确比政治软弱，但即使不直接写核的主题，例如只描写一个残废儿童的故事，但在头脑中也要深刻认识到这是在核时代写作。

巴金：我的想法是与原罪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是个悲剧，是一场灾难。这正像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一样，不是日本人就难以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的大悲剧，除了中国人，很难明白。所以为了使在中国发生的悲剧不再在别的国家发生，我觉得应该总结经验，把事情弄清楚一点，起一点作用。

木下：至于有没有原罪的思想，对文化大革命怎样认识，各国的历史不同，理解也各有千秋，这一点我是完全理解的。

关于您的五年计划，刚才说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我计算一下，觉得完成了一大半。

巴金：我之所以说还没有完成一半，是因为怎样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为什么会那样混乱还没搞清楚，我想搞得深一点，不仅仅是我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

木下：听说您自己也举手"打倒巴金"。

巴金：是的，我当时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怕。为什么这样想呢？为什么那么多人思想混乱，干蠢事？要进一步深挖，但很难。

木下：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京都大学的竹内实君说："中国真正的文学的自我恢复，是经历过这个'革命'的光荣和悲惨的文学家把这个革命作为文学作品写出来的时候才能实现。"当时我还不理解。竹内实君说的光荣的革命实际上是悲惨的革命，而且是不是革命也不得而知。正如他所说的，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才能写出来。所以我能充分理解您为什么

还没有写出来。

巴金：中国现在有很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作家把他们的体验写成了作品。其中有很好的作品。

木下：文化大革命中活跃的作家现在如何？

巴金：文革中活跃的作家并不多。当时比较活跃的是浩然，被称为中国唯一的作家。但在文革期间他也不是那么过分，而且听说还保护了一些人。现在他仍在写作。

文革期间许多文学作品是“三结合”搞出来的，所谓“三结合”就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实在可笑。现在已绝迹了。

木下：就是“三结合”、“三突出”吧？有没有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作家？

巴金：一点也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青年人很少。当时中国有过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运动，很多人都去了，许多青年都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经历培养了作家。

木下：原来的《朝日新闻》记者，已经去世的中国文学专家冈崎俊夫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巴金的代表作《家》使青年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同样写《家》的问题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岛崎藤村、志贺直哉，只是使人脱离家庭，自我独立。同样的题材，日本与中国写起来也不一样。

巴金：我写《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把它搞成文学艺术品。我在封建家庭长大，看到青年受苦，婚姻受干涉，没有自由，理想不能实现，我很愤恨，心里想，我要报仇，为青年人报

仇。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心中的怒火喷涌出来，变成了文章，写成了《家》。与我处于相同境遇的读者们看了以后，感动了，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女青年在车站看《家》，受到周围人的批判，叫她把书烧掉。一九七七年四月，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再版《家》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家》已经过时了。我自己当时也是这样想。但再版以后，几年来发行了一百多万部。

木下：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也许会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发生，为了防止，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巴金：一句话，作家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责任。作家一定要写真话，绝对不能说谎。说真话，也就是写自己相信的东西。如果懂得了自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就不会允许别人侵犯自己的权利。文革中我的悲剧就是在开始时不知道自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只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有罪，所以我现在必须深刻地解剖自己。

木下：这种思想在您的《随想录》中常常看到，也希望在您的小说创作中早日看到。

巴金：我的身体不好，写字很困难，我也希望能尽早完成。

木下：最后，想请您就这次笔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核时代的文学”谈一谈感想。

巴金：我认为保卫世界和平，在世界上消灭战争、消灭核武器是作家的责任、任务。我在大会的发言中讲得很清楚；核军备竞赛就像头上悬着达摩克里斯的宝剑，非常危险。但我

相信人民的力量，因为人民都反对核战争，所以核武器一定会消灭。

木下：我的好朋友野间宏提倡延缓原子能发电运动。最低限度在三年内，全面停止原子能发电的投产、建设、计划，全面公开资金，展开全国规模的讨论。如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也不能光明正大，那么就难以预料什么时候会被当作武力而使用。

两代人家中话春秋

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上午九时许，老作家巴金在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寓所客厅等候着。九时三十分，一辆绿色的面包车停在绿色的大门前，应《上海文学》之邀来沪的作家刘宾雁、陆文夫、谌容、袁鹰、梁晓声、雷抒雁及上海作家茹志鹃、吴强下车走进客厅。他们是专程来拜访巴金的。

下面是这次为时七十分钟会见的实况记录：

〔巴金请大家就座，客人们纷纷向巴老问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为大家送上茶水。

黄金时代要作家自己来创造

刘宾雁（中国作协副主席）：巴老，您近来身体怎样？

巴金（中国作协主席）：我手脚还不太方便。

刘宾雁：按您的年纪论，您的身体还不错。您还经常写东西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生活丛刊》（上海学林出版社刊行）。

巴金．稍微写点，有时还写点信。

陆文夫（中国作协副主席）：您的手写字还行吧？

巴金：写信和写东西还很吃力。每天大约写二到三百字。平时还锻炼锻炼身体。

刘宾雁：巴老，您不喜欢口述吧？

巴金：（点头）我不喜欢，我不习惯。我还是喜欢自己写。

刘宾雁：我也不喜欢口述和叫人记录。我习惯自己用笔写。昨天我听人说，全国文代会要提前开。

袁鹰（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不过，现在只有作协开了大会，其他协会都没开。

巴金：那没关系，春天开也行，冬天开也行。各协会大会和文代会一起开也没关系。

袁鹰：听说您要到北京参加会议？

巴金：我身体不好，不大可能去。全国政协开会也会叫我去。到时再说吧。（对谌容）读者对你的印象很好……

谌容（中国作协理事）：外部对我印象好，可内部对我印象不好啊！

巴金：这次作协大会开得不错。但只是开了个头，要做的工作还在后面。有时一做工作就容易走调，这有个理解的问题，要一下子普遍理解还有困难，所以主要还是靠作家自己。中央提出了要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这使作家很受鼓舞。但保证不能替代创作，作品还是要靠作家自己搞出来。历史上黑暗时期如沙皇时代也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当然政策好，可以使文学事业发展得更快一些。单靠政策不行，主

要靠自已，靠真正地相信真理。黄金时代要作家自已来创造。

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出现个高峰时期

刘宾雁：近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基本定了，国外就看中国的意识形态有何变化。外国记者也从各自的立场提出问题，最近纽约《华侨日报》也提到了这件事。巴老，您看到了没有？

巴金：我也看到了。《华侨日报》寄了一份给我。

刘宾雁：他们都是围绕创作自由提出问题的。

巴金：这次会议主要是选举搞得报好。选举只是开了个头，表示了作家自已的一点意志，这对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创作权利来说，是个好的开头，现在希望报大。

刘宾雁：您对前景抱乐观态度吧？

巴金：我始终认为，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要产生伟大的作品。

吴强(中国作协理事)：这次会议的影响出乎人们意料，许多单位都请我去谈大会的情况，政协也要听。

巴金：是人们想听，而不像以前要安排人家听。

陆文夫：昨天我到宝钢去，与工人交谈，想不到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说明全社会都很关心。

袁鹰：现在是学术界、科学界条件好些，但在理论界还存在困难。最近，在一个理论座谈会上，有位同志说：文学界现在是黄金时代，而理论界还是青铜器时代。(众人大笑)

吴强：我看不但是青铜器时代，还有些像石器时代。

〔众人议论，气氛活跃。

刘宾雁：〔提高嗓音〕我有个估计，可能是乐观了，或许保守了，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出现个高峰时期。到二十世纪末，像欧洲十九世纪和拉丁美洲那样出现一个文学高潮。伟大的作家可能为数不多，但会出现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巴老，您看有没有可能？

巴金：有可能。条件是有的，中青年作家都具有这个条件。我们老的如果不行了，还有我们的后代作家。许多青年作家自己冒出来赶到前面去了，这是很有希望的。作家要独立思考，要用自己的脑筋写自己的话，说真话。

作家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

袁鹰：作家要说真话，文艺要干预生活，这是您的一贯主张。

巴金：〔笑〕那也不一定，我也说过假话。

刘宾雁：这是不得已。

吴强：就因为这点，您还挨批呢。

刘宾雁：在这次作协大会上，胡启立同志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作家需要自己的风格，作品需要有自身的艺术特点。你要管也管不住的。

巴金：这种说法是了解文艺的。这样，文艺才可能繁荣。创作自由是提出来了，但贯彻下去还是比较困难的。关键是

要做思想的主人，作家总得自己相信自己，相信真理。现在文学界没接班人，没人赶上来把我们赶下去。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你讲真话会受到压制，但我还是要写，用各种办法说真话，想各种办法发表。〔对身边的陆文夫〕我要向你说对不起，那次你们来，我没满足你们的要求。

陆文夫：那不能这样说。那次来，已过去二十五年了，是和方之一起来的，是为了向巴金说《探求者》的事……〔刘宾雁插话：那是一九五七年，已有二十八年了〕对，是二十八年了，当时我只有二十几岁，什么也不懂。

刘宾雁：当时巴老见了你们，鼓励了你们。

陆文夫：巴老见了我们，就在这里。

巴金：那时我自己也不行，提心吊胆。我不能说，只能暗示。可惜方之已死了。

吴强：巴老当时说，要把文艺还给人民。

巴金：当时，我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只是感觉到，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

刘宾雁：我当时也是个大傻瓜。写了篇《上海在沉思中》，结果被打成了右派。

茹志鹃（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那时姚文元已写文章，批判巴老了。

吴强：他们都是看风向的。

巴金：不是看风向，而是有上面的指示。我年纪大了，不在乎。知识分子作家头上都有个紧箍咒，几十年来提心吊胆。作家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才能写好作品。

吴强：有人不让我们做主人。

陆文夫：只能做笔的主人。

要有自信，也要有自知之明

刘宾雁：您觉得现在的青年作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巴金：很难说。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过，我认为青年人越虚心越好，这样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陆文夫：有些青年吃了些苦头，不骄傲了，但勇气也没有了，作品也就没了，这样也不好。

巴金：自信和骄傲不一样。要有自信，也要有自知之明。有了这两点，就不怕别人提意见。我不跟人家走，即使人家把我说得一文不值也没关系。

刘宾雁：清除精神污染时，您接见了外国记者，有些人对您说的话不满意。

巴金：不是接见外国记者。那时，我住医院，给瑞士女作家写了一封回信，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里面谈到现代派文学。我对现代派也没说什么，只是说可以学嘛。我有时会写些探索的、讲真话的文章，有些人不高兴。

刘宾雁：巴老，香港出的您的文集，里面抽掉了一篇，这是怎么回事？

巴金：是我自己抽掉的。当时有个文件，说关于"文革"的事不要再写了。后来为这件事，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发牢骚。〔笑〕

刘宾雁：我翻了那本文集，目录上有那篇文章，但里面开了天窗。

巴金：〔笑〕开天窗，这是我向鲁迅先生学的。

刘宾雁：巴老，您现在写些什么？

巴金：我欠帐很多。身体不好，写不多。《随想录》第五本还在写，还有赫尔岑的回忆录，一个长篇。医生要我每天写二百个字。

谌容：写也是锻炼。

巴金：谌容，你可以多写点嘛。

谌容：我最近写了个中篇，名叫《散淡的人》。

巴金：写什么？

谌容：是写一个老知识分子。

巴金：你到美国，听说跑了一大圈，紧张吧？

谌容：接近了美国下层的人，坐大篷车，看赛马，还买赌票，赢了三元钱。

刘宾雁：巴老，您吃药吗？

巴金：我吃一种进口的药。

刘宾雁：〔大声地〕李小林！来。〔李小林进屋〕我告诉你，南宁有种"百年乐"补药，是宫廷秘方做的。运动员拿了奖金都去买。

李小林：我们买不到呀。爸爸最不相信宫廷秘方什么的。

茹志鹃：〔拿出一支烟〕巴老，我抽烟行吗？

巴金：抽吧。

刘宾雁：〔站起身，也拿着烟〕我要换个位子，我离巴老太

近了。

巴金：没关系。坐下吧。〔刘坐下，陆文夫、谌容等也抽烟〕

巴金：茹志鹃，你现在写得不够多，应该写点。

茹志鹃：我杂务太多，没时间写。

吴强：她的东西都给女儿写了。〔众笑〕

茹志鹃：您的精力还很好，去年法国总统密特朗为您授勋时，您没讲稿，讲得真好。

巴金：我在医院里都想好了。

袁鹰：有人想好了也讲不好。

谌容：巴老，您能回四川去吗？四川要搞个四老研究会，您，还有艾芜、沙汀、阳翰笙三老。

巴金：他们邀请我了。今年去不了，怕回不来。〔众笑〕

谌容：刘宾雁，你在作协管什么？

刘宾雁：我不管什么。

谌容：我如果有什么受气的事，可不可以找你？

刘宾雁：那可以呀！你递状子给我。〔众人大笑〕

雷抒雁：问题不是他来管你的事，而是现在连他自己的事都没人管。〔笑〕

巴金：〔对刘宾雁〕你现在哪里工作？

刘宾雁：还在《人民日报》。作协原来的王蒙等人在管。书记处以后会不一样了。党组可能不会管具体事了。

巴金：现在在说作家所得税要取消了？

刘宾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要取消。但我估计财政部不会通过。我们的抽税办法不合理。法国是把稿费作为三年

的收入抽税.我们超过八百元就要抽税。

谌容：刘宾雁，你拿多少工资？

刘宾雁：一百七十元。

谌容：比我多一倍。我的八十元工资只够我抽烟的。我看应该实行版税制度，作家不拿工资，只拿版税。

吴强：拿版税养不活自己。

谌容：现在人家说我又拿工资又拿稿费。

巴金：这没关系，这是多劳多得。

〔众人就稿费问题议论起来，《上海文学》编辑部一位同志走过来说，时间不早了，巴老太累了。我们照个相留念。众人围着巴金照相，然后与巴金告别。巴金将客人送至门口，直到看不见众人的背影，才拄着手杖回去。

巴金访问荟萃*

(1979—1987)

一头的银丝白发，满面慈祥的笑容，眼镜松松地架在鼻梁上，两眼闪着智慧和坚定的光——这就是巴金。他是名人，却丝毫没有一般名人的架子；他也有一些不小的头衔，却丝毫没有一般官人的旧习；他分明是长者和前辈，却又仿佛是你的朋友和亲人。这是我们多次访问巴金后留下的印象。

我们在撰写《巴金年谱》的过程中，为了使书稿的内容更准确、更丰富，真实而全面地叙述巴金漫长的人生道路、创作历程和思想发展的脉络，矫正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史料上的某些失误，更准确地把握和透视老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对历史、现实的新的见解，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我们多次拜访了巴金。不论是在客厅和草坪，还是在他生病住院的病房，也不论是在盛夏还是寒冬，他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诚坦荡。他的亲切接见和谈话，给我们以温暖、启迪和力量。现将我们多次访问的记录、录音和他在我们信上的批语及给我们的信，略加整理归类，选择部分内容，以问答形式，如实记录下来，以图有助于巴金研究的深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八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整理者唐金海、张晓云于篇末作有"按语"："本文经巴金先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于病中两次增删、审定。"

一 关于巴金的小名、学名、号、"巴金"笔名的由来及其他笔名。

问：请谈谈您的本名。

答：我的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那时一般不叫学名。我还有小名，叫升麐，大哥的小名叫果麐，三哥的小名叫安麐，有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

问："鸣希"、"甘宁"、"赤波"、"壬平"是不是您的笔名？

答："鸣希"不是我的笔名；"甘宁"可能是；"赤波"记不清楚了，要看文章才知道。"壬平"、"极乐"、"佩竿"、"黑浪"都是我的笔名。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了。

问："非子"是您的笔名吗？

答："非子"是我一个朋友卫惠林的笔名。

问：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请予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答：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完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

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一九二八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一九二九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二　关于巴金编的几本画册。

问：您编的画册鲜为研究者提及，请先介绍一下画册《过去》的情况。

答：这是我一九三一年编的一本图册，自费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这本图册是我几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国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娅、马拉、丹东、凡宰特、大杉荣等。

问：有没有文字介绍？

答：有。我在图片旁边写有说明，介绍这些革命家的事迹，都很简短。

问：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苦难》中，每幅画的配诗，写得贴切、有力，也富有诗意。是不是您写的？

答：都是我写的，不过写得并不怎么好。当时着手编选画册，就很激动，就想到写几句配上去，来表现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揭露法西斯的罪行。都是随编随

写的。

三　关于巴金解放前上海住所的变迁。

问：您一九二三年春到上海后，虽然辗转住过好几个省市，但六十多年中您主要住在上海。上海应是您的第二故乡了。在上海的好几处住所您先后创作了《家》、《春》、《秋》及《利娜》、《春天里的秋天》等小说和散文。请谈谈解放前您在上海住所变迁的具体情况。

答：我一九二三年春天和三哥刚到上海，在十六铺下的船，坐的是马车。马车伕在路上犯了规章，被罚了款。我们暂时住在四马路（按：即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经在报社工作的亲戚介绍，住进申江旅馆。不久搬到武昌路上学生居住的宿舍。以后，我们到南洋中学读书。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补习班是四川学生江疑九介绍的。江疑九是我在成都时的一位朋友，他在重庆办过杂志。我一九二五年因患肺病，没有念大学，在上海养病。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按：现为黄陂南路一四九弄，具体门牌号数巴金已记不清了），与卫惠林、大概还有毛一波住二楼，卢剑波和夫人邓天矞住底楼。后又迁至康悌路康益里（按：现为建国东路三十九弄）四号亭子间。曾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又与友人卫惠林等发起创办《民众》等刊物。

一九二六年又搬到马浪路（按：现为马当路）住，住址记不清楚了。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去法国留学。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从法国回来。抵沪后，住上海宝兴路鸿兴坊七十五号（按：原来世界语学会会址）；一九二九年一月

迁往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夫妇同住。在此期间曾创作《家》、《雾》、《新生》等作品，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等。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从南京回上海后，知道鸿兴坊和宝光里两处均毁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炮火中，遂与索非等从废墟中抢救出若干书、物，发现书稿《新生》等也与印刷所一起被炸毁。后来迁居步高里五十二号（按：现为建国西路陕西南路口），与友人黄子方等一起居住。曾创作《海的梦》等。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由步高里迁入环龙路（按：现为南昌路）志丰里十一号（按：当时系白俄开设的一家公寓）舅父家暂住。一周后赴泉州访友。自泉州返沪后，就住在刚迁居环龙路花园别墅（按：现为南昌路一三六弄）一号舅父家中。曾创作《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

一九三五年八月由日本回国后住狄思威路麦加里（按：现为溧阳路九六五弄）二十一号，仍与友人索非一家同住。曾创作《春》等作品，又与靳以一起创办《文季月刊》，与吴朗西等创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兼任总编辑等职。

一九三六年，因友人马宗融、罗淑夫妇赴广西任教，遂迁入马家，即拉都路敦和里（按：现为襄阳南路三〇六弄）二十一号（按：现改为二十二号），曾创作《长生塔》等作品，并结识了陈蕴珍（萧珊）。

因马氏夫妇返沪，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迁往霞飞路霞飞坊（按：现为淮海中路淮海坊）五十九号，仍与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一九三九年秋，三哥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一九四五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

处。一九四六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解放后迁入武康路，一直至今。

四　关于巴金赴法留学的目的及其它。

问：您赴法前的学习和思想，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看法，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和三哥在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就分手了。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因发现肺病考不成，只好到上海休养，找一位同乡医生治病。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经朋友秦抱朴介绍与少年时代十分敬佩的美国社会活动家爱玛·高德曼通信；与朋友卫惠林等一起办《民众》等刊物；在《时事新报》、《民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南京上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学生集体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活动；家里也来信要我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这时，我听到和看到的，都是饥饿和疾病、战争和死亡。我很痛苦，找不到出路，心里不得安宁，写文章也没有用。这时吴克刚等几个朋友从法国来信，还有一些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都谈起当时法国的情况，我就打算去了。

问：去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说法：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深入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等，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答：当时还年轻，主要是想去学法文，多读点书，把思想搞清楚一点。法国当时思想界很活跃，是很多外国知识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向往的地方。另外，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不高，经济上还负担得起。

五　关于巴金几篇作品的辨正、作品中人物的代名和创

作背景等。

问：一九三三年在《给E.G.》中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E.G.是爱玛·高德曼吗？"约言"和"应允的事情"指什么？

答：是高德曼。我青年时代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很感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约言"等时间太久了，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当时我觉得写文章作用不大，不能拯救受难的人民，不能消灭黑暗，想干点更实际的事情，做些于国家民族有切实利益的事。我一直为这个事矛盾、痛苦。但我除了写写文章外，别的又不会做，也无事可做。我一直处在这个矛盾的漩涡中。年轻时凭了一股热情说了那样的话。

问：您读了高德曼两本自传后，决定到地中海的巴塞罗那去，为什么？

答：当时西班牙革命形势很好，年轻人的革命热情高涨。想到西班牙去观察，也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后来没有去成。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问：《请大家熟读这一封信》（按：载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平等》二卷三期，无署名）系凡宰特致但丁的信，是您译的吗？

答：是我翻译的。

问：《克鲁泡特金略传》，初收一九二八年二月自由丛书社初版《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署佚名。是您写的吗？

答：不是我写的。

问：您在给朋友钟时的信中提到的《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载何时何刊？

答：是我写的，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平等》月刊一卷三期。署名黑浪。

问：《烽火》第七号卷头语《纪念鲁迅先生》，署名同人，是您写的吗？

答：是我写的。

问：您到日本横滨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您的小说《神》的写作时间也署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日本横滨，这是怎么回事？

答：当时小说下面没有署写于横滨。写的是别的地方，怕房东看见，他不知道我是作家。他出去时，我在书房里写，不给他看见。那个时间和地点，是小说主人公"我"写给朋友信的时间和地点，不是我的写作时间和地点。

问：《丹东之死》是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版的，序是一九三一年才写的，为什么？

答：这是我后来补写的短序。本来是个长序，后改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我写的东西常改来改去。

问：我们从您文章中获悉，您解放后有一个中篇小说没有发表。能不能谈一下它的情况？

答：有这回事。题目叫《三同志》，是个废品。我一直修改，还是不满意。那是我一九六一年在黄山时写完的，写的是志愿军英雄故事。如果改好了，将来全集里会收进去的。

问：请谈谈短篇小说《房东太太》的创作情况。

答：这篇小说是我根据一位姓朱的朋友写的初稿改写的。他叫朱乐夫，比我早到法国，在那里勤工俭学。

问：《龙·虎·狗》单行本中的一篇《死去》，没有收入《巴金文集》，为什么？

答：当时有些人在桂林报纸上批判我。我很生气，就写了一篇《死去》。事后觉得，纠缠在这些事情上不值得；再说，我的器量也太小了。

六　关于巴金青年时代的几位朋友及其它。

问：请介绍一下索非、剑波、吴克刚、卫惠林、中天、太乙、震天、耶稣等人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答：索非是开明书店的编辑。我在法国时，他在上海。我把《灭亡》寄给他，请他帮忙印出来。那时可自费印小说。我到法国前看到一个朋友的兄弟自费印了他自己的小说《洄浪》。我写完《灭亡》时，就想到也自费印一些，很便宜，几十元或百把元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朋友索非把《灭亡》交给了当时在《小说月报》主持工作的叶圣陶。叶圣陶给我发表了。以后我回到上海，常和索非住在一起。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送出去发表的。我不喜欢活动，只写文章。他的原名我记不清了。曾用A.A.的笔名编过《开明》，从前出版过《狱中记》和《战时救护》等书。一九四五年到台湾去了。好久没和他通消息了。听说他现在还在。

剑波，原名叫卢剑波。现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希腊罗马。

吴克刚，现在台湾。我赴法时，他已在法国，常来往。他也是我作品中提到的波兰流亡革命者亚丽安娜的朋友。一九二七年很多人被法国政府驱逐，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缓

期，予同年七、八月间回国。三十年代曾做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我一九四七年六月到台湾，就住在他家里。

卫惠林，一九二七年一月曾和我同船赴法留学，也常为《平等》撰稿，还翻译了一些书。回国以后还是写文章译书，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后来到美国去了。前几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等处讲学两三个月，到广东时中风，又回到美国休养。听说现在不能讲话。他主要研究民俗学。

中天，可能原名叫沈仲九。是吴克刚的老师。他早先研究哲学，后来做官了。他到过福建，到过台湾。"文革"期间患癌症死在上海。

太乙，姓李，这人比我年长，我不认识，他二、三十年代也常写文章。

震天，就是毕修勺，现在上海。

耶稣，就是叶非英。我在解放前出的一本散文集《点滴》中，第一次戏称怀有大的志愿和信仰而又一味苦行的叶非英为"耶稣"。他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后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学的工作，自己身体很差，还是拚命工作。解放后，加入了民盟，仍教数学，生活仍崇尚节俭。后来被打成右派，在服劳役中死去。他一辈子没有家，没有孩子。

七　关于巴金对小说《灭亡》、《家》、《寒夜》以及《随想录》的看法。

问：写《灭亡》的时候，您的信仰是什么？对《灭亡》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写《灭亡》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作家的路，我

是在寂寞和苦闷中写给我的哥哥看的。那时，我信仰无政府主义，也读各种各样的书，受到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影响。但我爱国的心一直很强烈，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我写作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写作，那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申诉自己的爱和恨。我在沙多-吉里，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书。对书中的杜大心，一直有不同意见。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赞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后他只能毁灭。我为他的死而哭。至于写李静淑，我是为纪念我自己死去的一位姐姐。前年，还有朋友要把小说改成电影。作品一发表就是社会的，就由不得作家了，还是让读者去研究吧。

问：《家》出版五十几年了，仅国内就再版了几十次，为什么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写的《家》的再版《后记》中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而不久又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与《家》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答："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和光明。有个青年写信来说，如《家》再版，是过时了。我自己也有这个看法，因为《家》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后来我又听到朋友说去年（按：即一九七九年）重映影片《家》，观众反应很强烈，我自己也看了；再看社会，就有了新的想法。"高老太爷"还有，还在活动，有各种各样的"高老太爷"，都生在封建主义这条根上。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反封建不可。《家》的内容就是反封建。我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五四"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今天还是要有"五四"精神。

问：创作《寒夜》时有没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您认为《家》和《寒夜》哪一部写得更好些？

答：《寒夜》写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那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很多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我只是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哭笑。我不能归罪他们，责任在社会。我同情他们，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是个巨大的网，他们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耗生命，直到这样的家庭毁灭。当时，虽然说抗战快胜利了，我还是看不到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希望，我感到汪文宣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定没有出路，一定要改变那样的环境。日本一个学者说这是本充满希望的书。这个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家》和《寒夜》内容不同，但都写家庭，写青年人的命运，都有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血泪，我都喜欢。

问：有人说五本《随想录》是“忏悔”的书、“揭露”的书、“说真话”的书等等。请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说过，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写第一本和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八　关于巴金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

问：近几年，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篇研究您思想和信仰的有份量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专著，他们看

法不一。请问从总体来看，您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答：就一点，是反封建。年轻时是这样，我写的那些小说主要就是反封建。我现在仍然是这样。也有搞不清楚的时候，那是一九五七年前后，相信了别人的每一句话，还有"文革"开始的时候，有段时期，又是抄家，又是批判，真以为自己的作品一无可取，那都是迷信的结果。

问：您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时是怎么想的？怎么看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对您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分析？

答：一位研究者表示要避开我的无政府主义，顾虑今天谈多了会在读者中产生消极影响。我说不要避开。现在有些文章和关于我的资料书已经写到了，只要是我写的，现在都可以拿来做分析的材料，回避并不好，历史上的事，瞒不住，瞒了这一代，瞒不了下一代。瞒就是说假话，那是对历史、对自己、对下一代不负责。如果有误传的，材料不准确的，也应允许我说话。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首先要搞清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历史上的和现在说的无政府主义内容上有些不同，不下功夫很难搞清楚。我年轻时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今天我精神不好，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我当时是追求真理。"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还年轻，书也看得少，刚一接触心就热起来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后来书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对它就

发生变化了。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但是，我创作时，首先是有感情要倾吐，生活培育了我的爱和憎。我写人物，写性格，我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才去写作的，不是的。现在看过的谈这一问题的文章，我总觉得没有讲清楚，有些文章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距离比较大。他们要么回避，一笔带过，要么就一把抓住那个无政府主义，不分时间，不分具体场合，用它来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结果套又套不住。我曾一再说，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我从前为什么边写作边感到痛苦？因为我爱国，反封建，要改造社会，但对无政府主义又了解不全面，它不能解答我时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我才有很多矛盾，才有苦闷，才有新的追求。从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有的，现在还有，比如它没有严密的组织，自由散漫。今天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

问：有的文章认为，您受到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影响到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的《答太乙书》讲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我从前是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我还受到其它各种思想的影响，我年轻时头脑里有好几个“主义”，我也有我自己的“主义”，就是反封建主义。我的作品自然受到这些“主义”的影响。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讲恐怖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我就不赞成，我赞成一点，就是受了压迫，就要反抗；恐怖主义讲暗杀，这不是办法，也不是目的。我写《灭亡》时刚读完妃格念尔的书，作品受

些影响。

问：有人称《灭亡》等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您怎么看？

答：那不一定。搞恐怖主义是俄罗斯的民粹派，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那种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我去法国之前，写过《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问：有人认为，您的政治观是爱国主义，人生观是人道主义。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答：我思想中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都有。文学作品不是宣传品，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打动人，我主观想这样。我年轻时本来不主张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那时想，爱谁的"国家"呢？人道主义也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在国内、国外都不断地受到刺激，对自己的刺激，对朋友和对人民的刺激，我看到和听到的，还是富的富，穷的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封建的包围中死去。我早年接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后来就主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专制，主张斗争，也自由散漫。它讲反抗黑暗，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各种主义不同。我后来也发现，无政府主义是空的，怎样推翻人吃人的社会，怎样实现人民的理想，它也没有办法。

问：克鲁泡特金对您有哪些影响？

答：从前，尤其是年轻时喜欢读克鲁泡特金的书，也受到影响。他愿意为人类牺牲的精神，还有他冷静的、科学的对世

界分析的头脑，他的热情、流畅的文笔等，影响了我。但我是受各种思想影响的，"五四"前后的各种思潮对我几乎都有影响，我是"五四"时期的人嘛。

问：听说您从前见到毛泽东时，曾谈到无政府主义。当时情况如何？

答："文革"中我在复旦大学挨造反派批斗时讲过这事。那是四十年代在重庆时。他见了面对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说："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后来话题就扯开了。

问：以往的评论家习惯用的评语是某某作家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或"革命战士"、"思想先驱"等。如果有人这样评论您，您有什么想法？

答：这是评论家自己的事，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方法。说到我自己，还是看后代人对我的评价吧。我自己缺点很多。我自己思想很复杂，怎么评定，不是哪一个人口说算数的。我写了一辈子，有那么多作品在，写的、说的和做的，都清清楚楚在。现在的评论家或某个人或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个什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个什么主义者。别人有别人的写作自由。我看，还是由后代人盖棺论定吧。

九　关于巴金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

问：近几年评论家开始研究您和外国文学的关系，那些观点是不是符合您的创作实际？

答：我看得不多，年纪大了，看过也忘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写得认真，读了不少书，思考了不少问题。有些我写作时

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我是中国人，读了大量的外国书，又在中国生活，我写的又是中国社会，单靠外国人的影响是不行的。自然，我和"五四"一些作家一样，思想和写作受到外国影响比较大。

问：您非常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

答：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亚·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契诃夫、爱罗先珂；法国的卢梭、罗曼·罗兰、左拉；英国的狄更斯；德国的斯托姆；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我读了一些。

问：研究您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很少。您的创作有没有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

答：我儿童时代从母亲那里背诵了《白香词谱》，青年时代读过《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还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散文，还看过不少《说岳》、《说唐》、《施公案》等通俗小说。但我年轻时思想偏激，总觉得这些内容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很远。其实，我后来写作时，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问：您喜欢哪些中国现代作家？

答：鲁迅的作品我喜欢读，小说杂文都喜欢，还有茅盾的、叶圣陶的、老舍的、曹禺的、沙汀的，另外，李劼人的作品我也喜欢。

问：您喜欢哪些中国当代作家？

答：《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我都喜欢，王蒙、张贤亮、陆文夫等人的小说写得好，还有张洁、谌容等一批女作

家，小说也写得好；这几年又出现了很多青年作家，很有才气。他们有责任心，有事业心，又有生活，思想又解放，读的书也多，写出了新的水平。中青年作家是中国文学的希望。

十 关于巴金"文革"中的若干史实。

问：请谈谈"文革"中您被迫"考试"的情况。

答：一九六八年忽然给所谓"牛鬼蛇神"和"反动权威""考试"，考的内容有：默写毛主席诗词，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主席的语录等。我在卷子上有的题目下写"记不起"几个字。分数不知道。总之，我考得不好。

问：美国一位研究者说您"文革"中曾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挨批斗，这事属实吗？

答：没有这回事。我说过，"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体罚。

问：请谈谈"文革"中翻译家汝龙和戏剧家李健吾给你赠款的事。

答：有这回事。哪一年记不清了。好好想想就能想起来。第一次是汝龙赠我的，是托李健吾的女儿带钱来的；第二次是李健吾赠我的，也是他女儿带来的。"文革"时，我的存款被冻结了，每月生活费很少，还有人生病。我一直是靠友情生活的。

十一 其它。

问：一九三五年，您受哪位朋友的委托，把手枪、子弹、文件存放到罗世弥家？

答：我那时和索非一家住在日租界，听说外面风声很

紧，索非想起一位朋友寄存的箱子，怕出事。他当我面打开箱子，才发现里面装着枪和子弹，还有东北义勇军的证件。商量结果，就由我坐人力车，把箱子带到马宗融和罗世弥家。他们住在法租界，没有危险。

问：您去找过刘师复的墓地吗？

答：刘师复的墓在杭州烟霞洞附近。三十年代我到杭州去过几次，也到烟霞洞去。刘师复的墓碑上写的是世界语。解放后，我也常到杭州去，因为朋友方令孺在那里，我顺便去看看她。后来我也去烟霞洞，就找不到刘师复的墓了。

问：您说自己一直在矛盾和痛苦中写作，想搁笔又不能。那么，您又是怎么理解文学的作用的呢？

答：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问：抗战时，您从广州逃难出来，东西是寄存在萧乾那儿吗？

答：行李是放在香港萧乾那儿的，因为当时广州遭敌机轰炸。喔，对了，先是存放在萨空了处，萨空了离开香港后，就交给萧乾了。我同萧乾很熟，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第一次认识他的，他那时在燕京大学读书。一九三九年我又到香港去

拿行李，萧珊到昆明念书。

问：卫惠林女儿卫缙云回国时看过您吗？

答：她从美国来上海时，我不在，出国去了。后来她在国内跑了很多地方，又到上海来看我。她很疲劳，又很高兴。随便谈谈国内外的情况，她表示要回祖国干一番事业。她回美国后，给我写信，得了癌症，住院治疗，情况如何还没有最后确定。她对祖国的爱、对事业的爱非常深，在病中还想多做点事。我为她写了一篇文章，收在《随想录》里。

问：您第一次认识日本作家井上靖是哪一年？

答：我说是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时第一次到他家里拜访，他说是一九五七年第一次会见。是不是可能他记错了？但是，我也没有把握，所以不坚持。这以后，我们就常见面了，在上海或在东京。

问：《短简》中《给一个孩子》和《答一个“陌生的孩子”》，哪一篇是您给萧珊的信？

答：到底是哪一篇，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说真话，我没有把握。时间长了，年纪又大了，有些事记不准确。你们考证下来是哪一篇？是《给一个孩子》。我可以再看看原文，再查查，编全集时，有时间再仔细考虑考虑。

问：您五十年代任《文艺月报》主编时，该刊上的“社论”或“编者的话”是您写的吗？

答：在《文艺月报》是唐弢、魏金枝管事，我不管事，稿也不看，只挂名。《收获》也是靳以管事，我一般不看稿。所以，除了解放前我编过《自由月刊》以及和茅盾编过《呐喊》、《烽

火》等文学杂志外，解放后，实际上我没有具体编过文学刊物。三、四十年代，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时编辑出版了很多丛书。

问：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后，社会反响如何？

答：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问：请谈谈您腿摔伤后还到鲁迅故乡去的情况。

答：一九八三年十月，我从杭州坐汽车去的，车上带了轮椅，下汽车后就坐了轮椅去参观、瞻仰，当时陪我去的有黄源和黄裳，还有小林和鸿生。在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在百草园等处都拍了照。还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了心里话："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年纪大了，常常想到鲁迅先生，这次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问：您创作前有没有写作提纲？

答：我写小说，大体上想好了，就动笔。我不喜欢写写作提纲，那样不习惯，受束缚。实际上，写作时常常变化，变得有时连自己也不能预料，但写起来非常顺利。写作不是事先定死的，写作是活的，随时变化的。平时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平时想多了，对自己的人物熟悉了，写起来就快。

问：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发表了，您的日记准备发表吗？

答：我没有多少日记，只有"文革"前二、三年的日记。解

放前，我写过日记，常常是写了又丢了，因为我到处跑，书信没法留。那次从广州逃出来时，全丢了。在桂林逃难时，日记也丢过一次。"文革"初期，连我保存了几十年的大哥的信，也不得不偷偷地烧掉。那时候，谁都可以随便来训话、抄家。

问：您解放前拍的照片，除了已选用在《文集》等书中的之外，身边还有没有用过的吗？

答：我年轻时不大照相，现在照片很多。我从前很少照，因为东奔西走不安定，留下的很少了，差不多全用在十四卷文集中了。说实话，我和萧珊结婚时也没照相。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的全集，问我要解放前的照片，也没办法。

问：《随想录》五卷写完了，您以后有什么写作计划？您计划中的长篇进展如何？

答：身体不好，大概不能写什么了。我一九七九年写了一些，后来搁下了。书名叫《一双美丽的眼睛》，写"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这部小说我说了不能算，写完才能算。很想把它写完，就是身体不好，有帕金森氏症，一写字手就抖。现在为人文社出全集做点事。

十二　关于《巴金年谱》。

问：我们准备编写《巴金年谱》。巴老能不能借给我们一些在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很难借到的书和资料？

答：可以。我这里有不少外文资料，平时我也没有时间看，你们拿去翻翻，也许有些用。有些东西"文革"中烧掉了，大哥给我的信也烧掉了。经过"文革"，作家的资料很难收

全，所以我建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把自己的手稿、初版本等存在那里，集中保管。中国“五四”文学很丰富，当代文学也三十几年了，现代人不搜集、整理，不要弄到后来中国现代作家的资料要到外国去找。日本等国家都有很好的文学资料馆，藏书多，查起来也很方便。你们写书，也可以到现代文学资料馆去找。

问：（在简略介绍《巴金年谱》的体例和撰写原则后）巴金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答：这是你们写的书，你们的作品，你们自己决定就可以了。我看这样写也可以。其实，你们觉得怎样写好就怎样写，不一定要征求我同意。有时倒可以听听出版社的意见。

问：您二、三十年代写的一些杂感、短论和散文，有些一般较难找到，有些文章的内容和今天的时代有些不协调，为真实反映您的创作和思想历程，我们作了一些介绍，不知这样行不行？

答：我说过了，这是你们的著作，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是我写的，我都承认，我觉得不对的，我也可以答复。年轻时写的或译的文章和书，这几年研究我的文章里已提到一些了，那是由别人负责。你们怎么写，别人怎么研究我，评价我，都可以，那是评论家自己的事。

问：现代作家中，《鲁迅年谱》是两册或四册，《郭沫若年谱》是两册。您的创作时间长，创作数量多，在国内外也有很大影响，年谱大概要出两本，有八十几万字……

答：嗯，八十几万字，你们怎么写了那么多内容？你们做

了大量工作，花了不少功夫。

问：原来是六、七十万字，只写到一九八二年，后来写到一九八六年，又加了评论一条线。您看这样行吗？

答：鲁迅伟大，我不能和他比。你们还是根据内容决定吧。我好像没有那么多东西值得写。你们还是和出版社商量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问：出版社的王火、杨啃、杨字心和责任编辑龚明德等商量过了。他们认为这是本有价值的书。写您的年谱，我们感到力不从心。书写好后，巴金先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能不能百忙中审阅一下？

答：龚明德是不是在研究《家》的版本？给我写过信。那次来要看我，正好我身体不好，不能见。下次再来谈谈吧。你们写的书有出版社总编和责任编辑看可以了。要我看一下也可以，不过我只看事实部分，事实部分我可以补充、改正。只要是我的事，我写的文章，都可以写进去。我年纪大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也想知道一些事，有些事连我自己也忘了。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也很好。不过，现在身体不好，常常忘记，有时把别人的书稿放在一边，好长时间找不到，就误事了。所以能不看就不看了。你们自己写吧，怎样写都可以。

1987年10月于复旦园。

与李辉谈沈从文*

……………

去年十一月，我从北京到上海，见到了巴金老人。我与他先后谈了两个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沈从文。年已八十五高龄的巴金，说话十分吃力，但是对往事的记忆却仍然清晰。我们谈到他与沈从文的友谊，谈到他对沈从文的理解。对于我来讲，这是非常难忘的见面和谈话，而他谈到的与沈从文有关的内容，更能帮助我以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友谊，理解沈从文。

回到北京，我以《与巴金谈沈从文》为题，将与巴老的谈话整理出来，寄给他审阅。他很快寄了回来，并在上面做了修改。然后，我又把记录送给沈夫人张兆和，她看后对部分细节也做了补订。

这只是简短的谈话，是一串散淡的话题。但是，我愿意让更多的人读到它。（李　辉）

李辉：很多人说沈老性格温和、忠厚，你对他是什么印象？

巴金：他是个老实人，也很有个性。有的地方他还有些倔。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时题为《与巴金谈沈从文》，由李辉整理。

李：就是说性格中有温和的一面，也有湘西人的强悍的一面。

巴：是的。当然，一般的事情上他也不会倔，还有些事情比较复杂，他了解的不清楚，就会片面。在鲁迅的问题上就是这样。他和周作人的关系好，周作人在他面前总爱讲鲁迅的坏话，说鲁迅有追害狂。

李：所以沈从文对鲁迅一直有误会。

巴：成见。京派、海派的提法是他的偏见，他不太了解情况。萧乾也受他的影响。四十年代萧乾编了一本《英国版画集》，在序跋中有对国内木刻的批评。他交给赵家璧出版，赵要删掉，他不同意。赵找我想办法，我说非删掉不可，他不高兴我也不管。

李：一九八二年我去和沈先生聊天时，他说你们在青岛、在北京常常爱辩论。我说是不是吵，他说不是吵，是辩论。

巴：我们爱写信辩论，但辩论过后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辩论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我的小说《沉落》，他认为我对周作人的态度不对，很不满意。

李：你和他好像是两种性格，你们争吵时发火吗？

巴：不发火。我和从文辩论，有时暗暗发笑，他还以为我发神经，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我骂周作人，也骂朱光潜。

李：你和朱光潜辩论是不是因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有关于眼泪文学的问题。

巴：主要是关于眼泪文学，他那时在大学里批评眼泪文学，我不同意，就写文章反驳他。抗战初期，我在成都，有一次

郭子雄请吃饭，请了朱光潜，也请了我。他问朱，朱光潜说没有关系，问我，我说我也没有关系。年轻人嘛——

李：火盛。

巴：对，也有偏执的地方。朱光潜，还有梁宗岱，我们后来相处得都很好。

李：这大概与沈从文和他的关系好有关。三十年代在北京时，沈从文和朱光潜他们来往很多。那时梁宗岱和朱光潜住在一起，是不是在慈慧殿？

巴：景山公园后面。

李：你去过吗？

巴：去过。那是教授圈子。

李：你是敬而远之。

巴：是的。

李：我觉得沈从文的经历很奇特。他来自湘西凤凰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又没有上过什么学，更没有去过国外念过外文，还当兵，其实是地方武装。可是他和朱光潜、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林徽因这样的文人却关系密切，成为“京派文人”的一员。

巴：这是他自己闯出来的。他主要是有才气，他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还读过不少新小说。有一点，对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并不是真正喜欢。但是他们新月派很赏识他。

李：他和徐志摩关系好。

巴：徐志摩对他很不错，帮了他不少忙。

李：胡适对他也不错。听冰心讲，他和张兆和结婚还是

胡适帮的忙。

巴：他们主要是教授学者，看中他的才华，认为他是才子。沈从文与他们没有冲突，但他有他自己的看法。看上去他和他们挺好，但总是隔着一层。我这样想，他不一定同意他们，但也不反对他们。

李：你当时在北京除了沈从文以外，和别的"京派文人"有没有来往？你见过杨振声吗？

巴：我在沈从文那儿见过几次。人不错，写过《玉君》。

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特别好。你和周作人打过交道吗？

巴：我和靳以到他家去过一次，是去拿稿子。

李：你对他是什么印象？

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抗战时，有人劝他离开北京，他认为有京派海派之争。他说他要留在北京，到了上海左派也会杀他。他主要认为日本人对他不会怎么样。结果一步一步当了汉奸。

李：你是和鲁迅的关系好。

巴：我那时崇拜鲁迅，年轻人都这样。周作人如果离开北京，可能就不至于做汉奸。我觉得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

李：刘西渭（李健吾）算不算京派？

巴：不算。他和沈从文关系很好。他是朱自清的学生。

李：他这个人也挺有才气，才二十几岁他就写了《莫泊桑传》。

巴：《福楼拜传》。

李：对，《福楼拜传》。写得那么漂亮。其实，京派文人都很有才气，比上海的一些作家要强得多。

巴：对。有些人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创作。

李：人们常说沈从文耐寂寞，天性淡泊。我看这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性格。除了创作，他在三十、四十年代对政治还是很介入的。

巴：听说在昆明的时候，他给《战国策》写稿，也和上面的文章争论。

李：从文学范围来说，他引起和鲁迅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还写了很多的评论、作家论。

巴：他的这些作家论写得有独特的风格，这种评论的风格是他独创的，不受人的影响。他写起文章注意创作的文体。

李：我挺爱读他的作家论。看上去没有什么理论色彩，但他作为一个作家，对艺术的感觉、理解写得很优美、很特别。

巴：过去这些文章对文艺界影响很大，帮助了许多年轻人。他对年轻人、对朋友，都乐于帮忙。他自己掏钱给卞之琳出版诗集，萧乾也是他帮忙走上文坛的。他为许多青年作家改稿子，介绍刊物。

李：我准备写一组关于沈从文的文章。

巴：值得写。有很多事情，它的原因、变化得弄清楚。有一件事情我弄不清楚，为什么丁玲后来对他不好？

李：最近发表了他的好几封信，给徐迟、周健强的，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几年前沈老对我说过，丁玲这个人不好，有点儿得志后不愿和有问题的朋友再打交道。听说丁玲好像对沈从文写的《记丁玲》不满意。我计划写一篇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文章。

巴：应该把问题弄清楚，真实地写出来。他当时是从好的方面写丁玲，文章发表时都把它当作进步文章看待。为了营救丁玲他到处奔走，通过教授们想办法。复杂的情况他并不了解，实际上他帮不了什么忙。他在北京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好住在他家。

李：沈从文比较重感情，他们都是湖南老乡。

巴：他们一道和胡也频办过刊物。

李：他写《记丁玲女士》和写《边城》是同一时间。他对我说过，那时他在院子里写《边城》，你在客房写爱情三部曲中的《电》。你写得快，他写得慢，但你过后对内容记得清清楚楚，可他写完之后就忘了。

巴：他的《边城》是在《国闻周报》连载的。

李：《记丁玲女士》也是在《国闻周报》上面发表的。

巴：它是先发的。《国闻周报》发表的是全的，后来出版《记丁玲》时就给删掉了不少，打了许多的叉叉。解放初期，沈从文可能希望丁玲能帮忙他说一句话，替他解释解释。

李：当时丁玲是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比较高。沈从文刚刚挨过郭沫若的批评。

巴：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在香港。

李：北京在沈从文的大学校园里也张贴了，他很紧张。如果这时丁玲出来帮帮忙，也许他要好过一些。沈老还自杀过一次，当时你知道这事吗？

巴：不知道。到北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我和王辛笛、章靳以、唐弢一起去看他，当时他很害怕，很紧张。

李：他的弟弟一九五一年被误杀的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巴：很长时间之后。三十年代在北京，我和萧乾一起见过他弟弟。他的女儿现在在北京。

李：给沈从文做女儿了。听说有的人认为这几年对沈从文的评价太高了。

巴：不高，不高。写文学史大家可以讨论，以后还得让读者评价。他的作品是有价值的。我认为我的朋友中，三个人最有才气，沈从文、曹禺、萧乾。

李：他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类？

巴：《边城》这一类。他有的写男女的小说我不喜欢。他其实很复杂，有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写作时的复杂感情。

李：沈从文的家乡湘西你去过没有？

巴：没有。他文章中写得很美。

李：你的作品他都看，他对你的作品谈论多吗？除了《沉落》之外，对《激流》、《灭亡》他是什么看法？

巴：没谈过这些方面。有时谈一些，我说我有信念。

李：他对你的政治观念和理想是怎么看？

巴：他说我的信念是空的。

李：你对他解放后没有继续写作是怎么看。有的人认为他转而搞研究服装史是很合适的。

巴：他过去就对服饰、民间工艺很感兴趣。他总爱买一些工艺品送给我，送给朋友。所以，他如果不搞服装史研究，在文联、作协工作，也不会写出什么来。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谈一谈。有的事情很复杂，一下子说不清楚。要是二十年前，可以和你多说说。

与李存光谈马宗融*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上午，我与思和一道探访巴金老人，询及《巴金全集·集外集》拟收文章的一些情况，和老人生平、创作中的有关问题；我还就马宗融先生的有关情况，与巴老作了交谈。二月四日，我再次到巴老家中，又补充询问了有关马先生的一些情况。下面，便是这两次谈话的记录。记录稿经巴老审订。(李存光)

存光：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准备印一本研究马宗融先生的专集，要我参与主持。尽管1981年以来我就注意搜集有关马先生的材料，并向四川、宁夏的有关部门呼吁对马先生作研究，但一直未能写文章。几十年来，人们不大提马先生，关于他的材料比较少。巴老是马先生的老朋友，所知甚深，因此，想向您讨教。

巴金：我知道的情况，都写进怀念文章里了，别的没有什么了。

存光：您那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时和收入香港版《真话集》、三联版《随想录》(合订本)时，都题为《怀念马宗

---

* 本篇最初收入《马宗融研究专集》(《回族文学论丛》第五辑)，一九九二年八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融大哥》，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真话集》，却题为《怀念马大哥》，究竟哪个标题准确？

巴金：那篇文章我先交给我的兄弟李采臣，他们编《怀念集》用，后来，马小弥抄了一份，交《新观察》发表。题目有些变动。还是按合订本的题目《怀念马宗融大哥》。

存光：我们准备把这篇文章放在研究专集卷首，可以吗？

巴金：可以。

存光：马先生发表文章常署的名字有"马宗融"、"宗融"和"融"，此外，他还有别的笔名吗？一九一八年上海《救国日报》和二十年代初巴黎出版的《工余》杂志、一九二五年上海出版的《自由人》杂志，是否有马先生写的文章？

巴金：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笔名。不知道《工余》有没有他的文章，《自由人》没有他的文章。《救国日报》出版时我们还不认识，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我早知道他，认识他是一九二九年，他去找自由书店的朱永邦，碰见我，就认识了。

存光：三十年代马先生常在《太白》、《文学》发表文章，他同文学界联系如何？

巴金：《太白》是陈望道编的。马宗融当时住在拉都路敦和里，离陈望道的住处不远，他们来往多，比较熟。他同方令孺、陈子展、靳以等都熟，同他来往的文艺界人士很多。

存光：毛一波先生说马先生与李劼人先生是小学、中学的同学，不知是不是这样？抗战后期，马先生与李先生合译左拉的《梦》，他们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呢？

巴金：不清楚他是不是与李劼人同过学。马宗融喜欢左拉。他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较慢。《梦》可能是李劼人没有译完，由他接着译。抗战期间，马宗融和李劼人都是"文协"的理事，李劼人有时也去重庆。

存光：马先生写作较少，不写小说，这与他"懒散的法国式生活"(胡风语)是不是有关系？他对妻子罗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他对罗淑写小说持什么态度？

巴金：〔笑〕他当然赞成罗淑写作，他对罗淑很好。那个时候，他每天晚上一杯咖啡，关门翻译，主要译居友的哲学著作，还有蒲鲁东的著作，为中法文化基金会译，每月交多少字，付多少报酬。他译的东西许多都没有出版。他爱说，写得少。

陈思和：巴老不爱说，所以写得多。〔大家笑〕

存光：巴老是否了解马先生在广西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时的主要同事？他的学生中，有没有与他关系较密切后来又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人？

巴金：他在中文系教书，在复旦大学与方令孺、陈子展、章靳以关系好，同叶君健也熟。学生好像有邹荻帆。他人缘好，对人热心，对朋友也好。他对我好，别人说我坏话他就不满意。

存光：马先生在《拾荒·序》中说，三十年代初"有人在文人画像录之类里面，把我摆进一群胖作家，而说我是'物质多于精神'的"。巴老知道这里所说的是一本什么书吗？

巴金：这不大清楚。只知道郁达夫的《二诗人》是说马宗融和王独清。(存光按：查郁达夫的短篇小说《二诗人》写于一

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二号，后收入一九三〇年出版的《蕨薇集》、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达夫自选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达夫小说集》。小说发表时，作者在附记中说："作中人物，并无所指。作者因近来读了一篇英国 John Galsworthy的讽刺小说'The Burning Spear'，所以想学学他的笔法。"）

存光：您知道替马先生出版杂文集《拾荒》的翁达藻是什么人吗？

巴金：翁达藻在复旦大学教书。

存光：一九四〇年初，马先生连写三篇文章批评萧军"招标出版"的启事，并为文化生活出版社鸣不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巴金：萧军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绿叶底故事》、《十月十五日》。他要从文化生活出版社撤走一本书，大概是长篇小说《第三代》。当时，转社出版是常事。马宗融认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几个朋友办的，很关心，因而对萧军的举动不满意。

存光：马先生是一位有成绩、有贡献的回族文化工作者。他在倡导发展回族文化方面，在促进回汉团结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巴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巴金：哦！这些情况我不大知道。

巴金访谈录*

——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下午，我到上海巴老寓所访问巴老。两天前，我将要访谈的问题写在纸上，交李小林同志转交巴老过目。这天，巴老依次回答了我事先提出的五个问题，并即席回答了若干具体问题。谈话进行了近二个小时。出于种种考虑，我一直没有公布巴老与我的这次谈话。近八年时间过去了，当我重新翻看这次谈话记录时，益觉巴老的这次谈话深具研究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故将谈话的主要部分整理发表。记录稿经巴老审订。（李存光，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存光：一九七九年四月和一九八〇年初，您在同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和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花建的谈话中，都谈到“追随鲁迅的道路”。我正在思考应该怎样理解您所说的“鲁迅的道路”。能否谈谈您在三十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您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

巴金：你的问题我看了。老实说，你的问题我很难回答。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是不同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文艺报》第三十六期。

想过。

关于"鲁迅的道路"，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真话集》中《怀念鲁迅先生》写过。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对鲁迅的看法，当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到写这篇文章时，考虑这个问题就考虑得更清楚一点，更明确一点。我认为作家的道路就是这样的，写文章也这样写。我觉得鲁迅的道路首先是这样的。比如讲真话，我是这样写的；写作和生活一致，作家和人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写这篇文章时虽说是回忆，但鲁迅对我的影响，我对鲁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不是这样明确，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更明确了。

存光：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您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巴金：我觉得很难明确地说。当然受到影响，但创作主要是生活。明确的我说不出来。我不是有意的。搞创作，写什么东西，主要是生活里有一些感受。所以我说我不是文学家。……我对青年作家说，你写创作，不要管别的，理论也好，美学也好，什么也好。你写生活中的感受，最熟悉的东西，感

受最深的东西。我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反正我也不要做作家、文学家。

存光：您认为对于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才较为确凿？

巴金：这是有关系的。我的作品与我的主张是有关系的。我写作品是宣传我的思想，宣传我的看法。写出作品要打动我，也打动别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话可说就不写东西了。

过去有些东西是别人拉稿写的，现在也有拉稿的。要尽量避免。替别人完成任务，要你写什么稿子你就写什么稿子，是浪费时间。

存光：您认为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巴金：我觉得写一个人的传记，最重要的是你了解他的生活，还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时代最重要，背景、环境最重要。我不想别人替我写传记。我写过去，也需要好些时间来思索，来回忆，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我写《回忆我的哥哥李尧林》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后，《一般》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里就有错，时间和事情都有错，查了几篇东西，才搞清楚，收在《病中集》中的是改过了的。我写东西要有根据。我要写过去哪些事，要考虑哪些问题，也要花好多时间，不能说几十年的事一下就想起来。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把要写的东西多写两本，还有，我还要做点事，证明自己的文品、人品，证明文学与生活、与写作的一致。因此，我没有更多精力来写回忆过去的

东西。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不能老做别人让我做的事。

存光：有人说，写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又有人说，应写出"真实存在着的×××"。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巴金：照我来看，当然应该写真实存在的人。但这不容易，总免不掉我写的东西总有点我自己的看法、印象。比如这个人我讨厌他，写出来总有点反映。他做的有些事你不赞成，你总不可能把他说好。当然，写作时尽可能准确些，忠实一点。过去写传记最困难是材料，我为啥要提出建立文学馆呢？就是为了保存材料。这个馆明年一月一日可以正式建馆。成立文学馆还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成为研究中心。我的意思，先应该是资料中心，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提供资料，主要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服务，还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服务，为很多人服务。研究中心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后发展当然可以办。写传记有了资料也就方便一些。本人谈的只能参考，特别是家属，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大符合事实，家属提供的情况好话说得太多。最困难的是时代怎样创造这个人，能把时代写出来。这个时代出现这个人。

存光：还有几个琐碎的小问题。据我所知，"芾甘"是您的"字"，但有人说是"号"。哪种说法对呢？

巴金：我们那时不讲究。过去名、字以外还有别号。我们习惯不说"字"。我的名是尧棠，后来才知道字是"芾甘"。三哥名尧林，字茂生，他后来没有用。我们小时候叫小名，大哥叫果麐，三哥叫安麐，我叫升麐。

存光：您过去对一九二三年出川这段旅程谈得很少，能稍具体地谈谈吗？

巴金：当时从成都坐木船到泸州，在泸州转小火轮到重庆，经宜昌、汉口(停过船)到上海。从泸州起都是外国船。木船过乐山时下去看了看，那里有两个表哥、一个姑妈。离开成都后给大哥有信，"文革"初烧了。这段路程大约半个多月，路上没有什么耽误。

存光：您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绿光》，是否为一九三〇年二、三月到十月？这期间是您一人编还是与别人合编？

巴金：《绿光》上的《在黑暗中》是我写的，(存光：是用世界语写的一个剧本吧？)不，只是对话。这份刊物本来是盛国成、索非编的，我编的那段时间是一个人编。以后刊物变成大开本(一九三二年吧)，我写了一篇《两兄弟》，还登过别人用世界语译的《复仇》。

存光：请谈谈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在桂林写文章批评过的赖诒恩的情况。

巴金：赖诒恩是广西桂林礼拜堂的神父，从香港来的，英国人。他在礼拜堂放些唱片，搞些文化宣传活动，很多人捧他。〔笑〕我给他抬杠。当时我发表文章的《广西日报》副刊是马国亮编的，这次到香港还见到他，现在编《良友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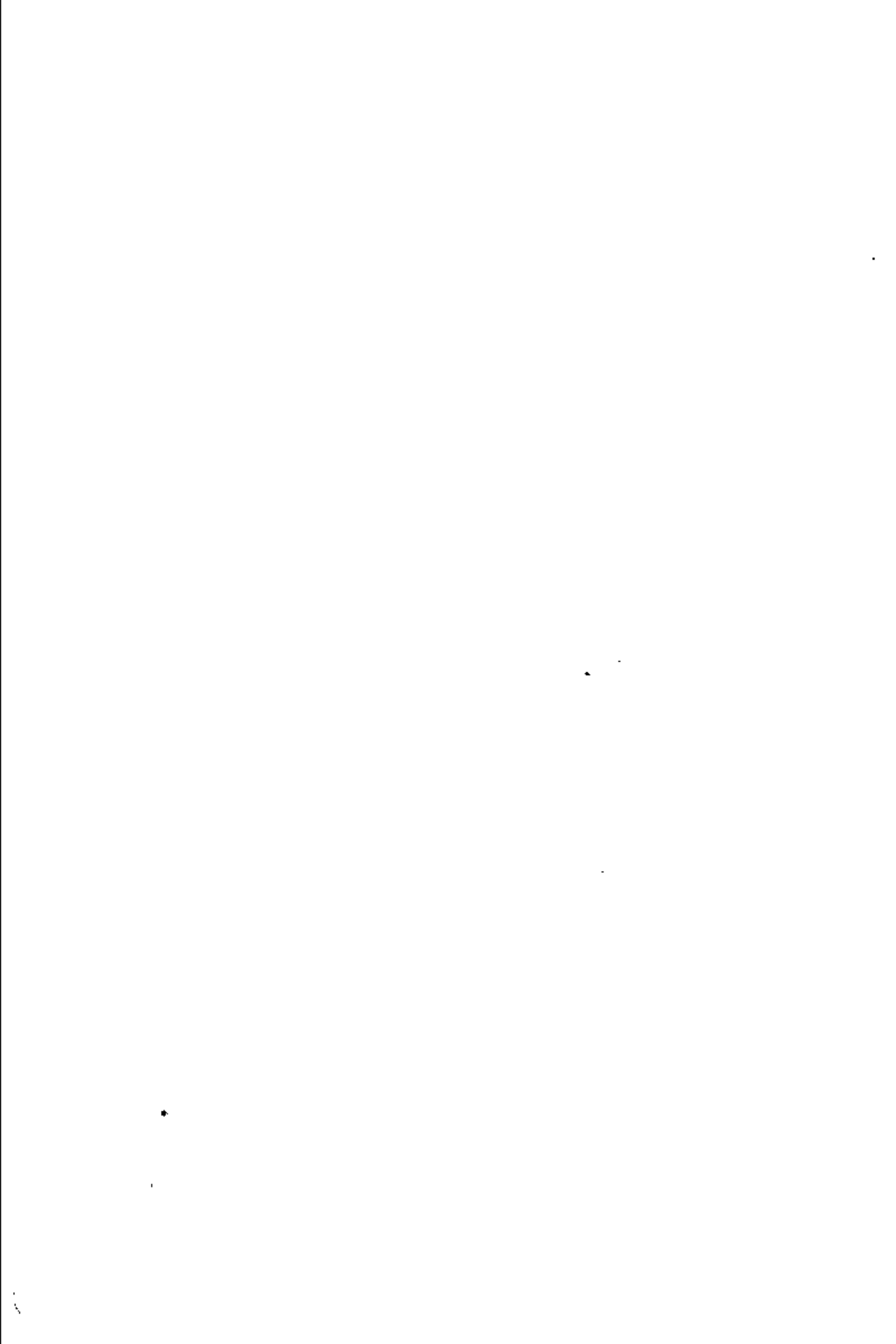
存光：《黑土·前记》中有一句话我怀疑错了一个字。这句话是："我写别人，更多过写我自己。"《巴金文集》第十卷、《序跋集》中的文字都是这样的。

巴金：这段话中的"过"字应该是"于"。校对不细心，常

常有错。

存光：您的笔名"巴金"第一次见于报刊是译文《脱落斯基的托尔斯泰论》，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号。我见到的这一期《东方杂志》有两种版本，一种署"柏金译"，一种署"巴金译"，不知是怎么回事？（取两种署名复印件给巴老看）

巴金：《东方杂志》上印的"柏金"，过去我不知道。会不会当时用口说没有听清楚字音，后来又改了？文章是胡愈之让我译的。



致 树 基(代跋)

一

关于佚文我在十八卷中讲了一点。我觉得我那个想法(让批判与佚文共存)并非毫无道理。回顾七十年的创作道路，我承认自己是在大批判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也就是我挨骂最多的时期。有时四周静了下来，我感到寂寞，我的声音哑了。于是出现无声的文章。这种文章十八卷有，十九卷也有，内容并不一样，但都是靠别人脑子思考写成的。今天的读者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浪费。几十年的长时间，那么多的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还有数不清的冠冕堂皇的标题，加上没完没了的、从不兑现的豪言壮语，我能够对读者说这是“繁荣”，不是“浪费”吗？不，倘使完全由我自己安排，我很有可能将它们一笔勾掉，仿佛我并未写过这种文章，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这些年人人都这么做，大家都习惯了。因此提倡讲真话反倒使人大惊小怪。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真话会遭到围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赖账。既然我同意把那些无声的文章留下来，就让它们给拿去示众吧。首先读者会用自己的脑子对付它们。我看为了辨清是非，也值得再受一次围攻，我再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出一本佚文集就加一本

批判集，后者可以减少前者的消极作用。过去为我的作品发表了那么多的批判文章，我才放心让作品流传下去。作品销行越多，我越是忧心忡忡。长期的恐惧，加上十载的噩梦，梦醒之后我找回自己的脑子，写出了讲真话的书。我不再为过去留下的任何文字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了。我开始用自己写的“五卷书”来衡量我的言行。

二

唠唠叨叨，我越扯越远，应当在这里打住了。读者不见得会喜欢听别人的啰嗦，因此我只拣出几篇文章来说明一些事实。

你根据我给李致的信把一九八一年在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上的讲话删除了，你删得对！因为讲话稿不是我起草，我也不曾改动什么。但四十七届大会上的讲话却是我自己写的。

还有，一九八二年的两篇书面讲话也不是由我执笔的。严格地说我并没有资格参加“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不过既然答应挂了名又给安排发言，虽是别人写的稿子，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也就用我的名义发表了。另一篇《祝贺与希望》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上宣读的时候，我已经摔断左腿给拴在牵引架上，昏昏沉沉、一句话也写不出来。

这类文章过去我都不收入集子，也不看成自己的作品，即使我在会上宣读过，我也只是照别人写好的稿子念。有时我念自己写的稿子，却反映别人的意见，例如一九七八年在文联全

国委员会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部分便采用了上海文联的材料，大讲“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这不会是我自己的主张。

这一卷佚文中讲话之外还有一些开幕词和闭幕词，里面有我的文字，更多是别人的文字，即使是我写的，也没有写出我的想法，我认为会越少开越好。我不开会的时候，却留下很多的作品，长期坐在主席台上我习惯了宣读文件，即使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即使我有时也加入自己的意见，我仍然没有依靠独立思考。

我一九五六年就提出独立思考，可是只有在十年浩劫之后，才找到了它。一部“五卷书”就是我的追求的记录。这一卷佚文中还有一些我和客人的对谈、文学创作的答问、海外文友的漫谈、记者的采访等等等等，关于这一类文章你的看法可能跟我的不同，譬如有一篇同某教授的对谈，我讲话记录不清楚，你要我动笔修改。我想记录不清楚，是自己讲话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我当时确是如此。那么就让我这狼狈相保留下来，这不过是个开始，我在走自己的路。态度鲜明就容易讲清楚了。

以上一类谈话和答问给放在一起，也可以说明我对文学的看法。尽管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但我是一个用文学打动人心的人。要打动别人的心，我先掏出自己的心，掏出自己鲜红的心容易说明一件事实：

没有独立思考，就写不出好的作品。

芾　甘 1992年7月9日。